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概述简论

水陆洲 著

册 4 1968-1969.04

群众出版社

2024 年 05 月

出版说明

水陆洲同志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共约 500 余万字，共计 6 篇，原发布为 A4 大小的 PDF 文档，制作成为 8 个 PDF 文件，如下：

- 册 1：第一篇
- 册 2：第二篇上册，
- 册 3：第二篇中册，
- 册 4：第二篇下册
- 册 5：第三篇
- 册 6：第四篇
- 册 7：第五篇
- 册 8：第六篇

考虑到原 PDF 文件是 A4 大小版面，不利于手机、Kindl 等小屏幕电子设备阅读，而且原 PDF 文件目录太粗略，阅读很不方便。因此我们重新将文件排版做成 A5 小尺寸文档，以适合手机、kindle 等设备阅读，并精细化了目录。一共制作成了 7 个文件如下：

- | | |
|--------------------|-----------|
| 册 1(1949-1965) | ： 第一篇 |
| 册 2(1966-1967. 01) | ： 第二篇上册， |
| 册 3(1967) | ： 第二篇中册， |
| 册 4(1968-1969. 04) | ： 第二篇下册 |
| 册 5(1969. 05-1974) | ： 第三篇 |
| 册 6(1975-1976. 09) | ： 第四篇 |
| 册 7(1976. 10-1985) | ： 第五篇、第六篇 |

目 录

出版说明	i
目 录	ii
第二篇 1966—1969 年炮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5
第一节 杨余傅事件	5
壹、本节概述	5
一、毛泽东要杨成武随从南巡	5
二、中央领导集体作出关于杨、余、傅问题决定	14
三、杨、余、傅在关押中	37
四、为“杨、余、傅事件”平反	38
五、杨成武又一头钻进了政治旋涡	42
贰、本节简论	44
一、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	44
二、“杨、余、傅事件”并不复杂。	44
三、“杨、余、傅事件”的真相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	45
四、说清“杨、余、傅事件”的真相并不难	46
五、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杨成武又一次卷入了政治旋涡。	47
第二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47
壹、本节概述	47
贰、本节简论	67
第三节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68
壹、本节概述	68
一、道县等地发生大规模杀人	68
二、批判极左思潮，处理“省无联”问题	75
三、主席很关心造反派。	80
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03
五、湖南的反三右一风与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104

八、湖南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	108
九、湖南的批林整风与“批林批孔”运动	109
十、湖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112
十一、十月政变后对革命派的镇压	116
贰、本节简论	119
第四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122
壹、本节概述	122
一、革命群众夺省委走资派的权，遭到朱声达等人的镇压	122
二、朱声达等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	124
三、中央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解决宁夏问题	127
四、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150
五、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153
贰、本节简论	153
第五节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58
贰、本节简论	182
第六节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83
壹、本节概述	183
一、解放军支左，造反派内斗	183
二、中央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	188
三、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191
贰、本节简论	193
第七节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3
壹、本节概述	193
一、沈阳军区支左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193
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08
三、陈锡联的讲话	217
四、沈阳军区、辽宁省委召开批陈整风会议	219
五、十月政变后的镇压活动	220
六、张志新事件	221
贰、本节简论	223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228

第一节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228
壹、本节概述	228
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在学校开展军训，狠抓教育革命	228
二、北京市高校两派斗争加剧	232
三、北京高校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错误估计形势提出第三次大串连	238
四、北京市革委举办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243
五、北京高校两派武斗加剧	250
六、“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	257
七、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261
八、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	270
贰、本节简论	275
第二节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80
壹、本节概述	280
一、造反派要求夺省委走资派的权，中央决定对云南实行军管	280
（一）群众要求会见阎红彦而冲击军区，阎红彦拒绝会见群众而自杀身亡	280
（二）军事院校学员及部分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290
二、必须交出鸡街、铅厂、雨过铺三个地方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坏头头，而且要主要的头头。	315
三、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318
四、“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323
五、批林整风、批林批孔	330
六、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云南	334
七、十月政变后的应变活动	343
八、十月政变后的翻案镇压活动	346
九、受迫[害]群众的申诉活动	349
十、对赵健民的审查问题	353
贰、本节简论	357

一、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拒绝会见群众而自杀身亡 ..	357
二、关于中央监护审查赵健民	361
第三节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371
壹、本节概述	371
一、一些人冲击军事机关，福州部队在处理中发生错误	371
二、中央着手处理福建问题	372
三、福建两派群众组织继续进行武斗	375
四、福建有人继续冲击军区，要打倒韩先楚	379
五、中央批准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383
七、毛泽东接见韩先楚等人	385
八、十月政变后对革命群众的镇压	386
贰、本节简论	387
第四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388
壹、本节概述	388
一、抵制广西军区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	388
二、广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391
三、中央决定后两派武斗加剧	399
四、落实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409
五、“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案	431
贰、本节简论	431
第五节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45
壹、本节概述	445
一、“造总”等群众组织宣布夺权并与军区关系日益紧张	445
二、陈明义在大会上的讲话	447
三、中央着手解决西藏武斗问题	448
四、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	449
五、“大联指”一些人抵制革命委员会、不支持军区改正错误	452
六、实现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	452

七、西藏的批林整风运动	453
八、十月政变后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遭到摧残	453
贰、本节简论	454
第六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55
壹、本节概述	455
一、新疆各族群众奋起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455
二、大联合	465
三、中央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467
四、关于新疆的几项改革	468
五、政变后的若干改变	469
贰、本节简论	469
第八章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471
第一节 全国山河一片红	471
壹、本节概述	471
一、中央有关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方针政策	471
二、中央批准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及中央报刊社论	472
三、庆祝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478
贰、本节简论	480
第二节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482
壹、本节概述	482
一、整顿党的组织，征求修改党章意见	482
二、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499
三、周恩来谈几个老师的问题	509
四、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	525
贰、本节简论	526
第三节 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534
壹、本节概述	534
一、代表大会的第一个阶段	534
二、代表大会的第二个阶段	562
三、九届一中全会	562
四、贯彻九大精神	568
贰、本节简论	573

一、《历史决议》说，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573
二、九大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政治报告》.....	574
三、九大的十分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575

第二篇 1966—1969 年炮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本篇概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就是炮打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五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

根据以后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个战役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发动群众，是支持革命左派还是压制革命左派的斗争；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解决彭、罗、陆、杨的问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开展文化大革命作准备。

这一段的内容分为以下几节阐述：

第一节 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二节 处理罗瑞卿事件

第三节 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第四节 中共中央批发《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二个阶段：从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支持群众革命还是镇压革命群众的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等以上学校红卫兵运动兴起，工人阶级逐步走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这一段的内容分为以下几节阐述：

第一节 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

第二节 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制订“十六条”

第三节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四节 工矿农村文革运动兴起、中央制定工矿农村文革的两个十条

第五节 红卫兵运动和学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第六节 中央机关文革运动的开展

第七节 各省市区文革运动的开展

第八节 部队院校文革运动的开展

第三个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支持革命左派夺权还是反对革命左派夺权的斗争。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领导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大批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走上了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岗位。

这一段的内容分为几节阐述：

第一节 一月革命风暴

第二节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三节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四节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五节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十四节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六节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七节 解决陶铸问题

第八节 批刘保帅保肖

第四个阶段：从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一九六七年七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反击二月逆流，反对镇压革命群众。

第一节 大闹怀仁堂

第二节 批判两种反动思潮

第三节 赵永夫事件

第四节 四川“二月镇反”事件

第五节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第六节 抓叛徒

第七节 武汉“七·二〇事件”

第五个阶段：从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促进革命群众大联合。

这一段的内容分为几节阐述：

第一节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二节 批判极左思潮

第三节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四节 “二月黑风”及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五节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六节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七节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八节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九节 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十节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十一节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十二节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十三节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十四节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六个阶段：从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七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处理杨余傅事件，促进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第一节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二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三节 处理杨余傅事件

第四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五节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六节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七节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七个阶段：从一九六八年八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坚决制止各地的武斗，解决各地老大难问题，促进边疆各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第一节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第二节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三节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四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五节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六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第八个阶段：从一九六八年底月至一九六九年一月，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第一节 全国山河一片红

第二节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第三节 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任务尚待继续完成，林彪集团企图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却一步步逼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转入第二个战役粉碎林彪集团武装政变阴谋。

二〇〇七年三月七日初稿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修改

第六章 一九六八年春季发生的右倾风潮

第一节 杨余傅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要杨成武随从南巡

（一九三一年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林彪在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4军任军长，杨成武在红4军第11师第32团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杨成武率独立团到达晋东北的大营镇，再次见到林彪

1938年9月25日，在师主力于平型关发起战斗的同时，杨成武团在腰站地区毙伤日军第5师团步兵第9旅团400余人，迟滞了日军的增援行动，保证了师主力首战平型关的重大胜利。

林彪被阎锡山部误伤返回延安后，到苏联养伤去了。他和杨成武之间便再也没有交往。

一九四八年，在平津战役前线，林彪与杨成武再次见面。

一九五九年，杨成武到总参工作，和林彪的接触多了起来。

一九六五年底，批判罗瑞清，杨成武是军委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罗撤销职务后，由林彪提名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

一九六七年二月，青海省发生了“赵永夫事件”之后，杨成武去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对他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了。”

看到林彪的口气很强硬，杨成武只是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说东道西。

在对待老干部、老师问题上，林彪觉察出杨成武并不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了，问在场的人：“谁封我四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林彪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

杨成武当时也在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一”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师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受命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次回到北京，叶群见了杨成武。当时林彪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的口气很是热情。

杨成武和她客套几句，自然也就问到林彪的情况。叶群马上接了茬：“主席最近有什么最新指示吗？”

杨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

杨成武因此得罪了叶群，也得罪了林彪，他们认为杨成武封锁了他们。

在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日子里，杨成武对林彪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距离，林彪已经感觉到了。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过后，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要杨成武向毛主席报告的问题，综合整理后，于8月3日上午，又一次飞往上海。

3日下午5时45分至8时50分。在毛主席的住处，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河南省军区和一军的领导班子调整打算，与开封市存在的问题，谈了江西省军区领导班子配备的意见，湖南长沙准备武装一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加强武汉军区司政领导的配备，和东北鞍钢的问题以及林彪对各总部各军兵种文革情况的看法，等等。

8月4日，中午12时半至下午2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1点，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周总理让杨成武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

杨成武到了北戴河，向林办通报说来向他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先等着，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听汇报再叫你。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消息，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林彪才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他的语调冷极了。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深夜和杨成武等人谈话。

那天，毛泽东的秘书通知杨成武，晚上开会。

杨成武问：“什么议题？”

秘书说，研究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讨论以后几个月的任务。

晚上 10 点 25 分，杨成武走进毛泽东的会议室时，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人已经到了。

会议从 10 时 30 分开始，杨成武没有想到会开到次日凌晨 1 时 10 分，花了近 3 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视察。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他说：整个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

9 月 23 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北京车站。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杨成武及时组织人将主席的指示进行整理。

要求他们整理时既不重复，又力求详尽、具体，并且尽可能把主席的原话都整理进去。经过几天工作，将整理的稿子抄好报呈周总理、林彪、毛主席，请他们审定。

主席、林彪、总理的指示，要杨在军委常委扩大上传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除军委委员外，各总部、各军兵种、院校和北京军区以及在京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在京的负责人，都出席了会议。

杨成武向到会的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在外地所作的关于形势与任务、上下级关系、军区支左、干部训练、抢枪以及有关军区的组织机构、装备、换防……等等问题的指示。总之，凡是记得的，本子上有的，都向大家传达了，有的地方余立金还作了补充。

随后将可以公开的部分，以《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为题（记录稿，未经本人同意审阅），印发给各单位。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文稿转发全国各地，并在《重要指示》正文前面，写了一大段文字，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情况。要求各单位“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1967年7月，根据林彪的指示，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三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

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主席：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旭君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1967年9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

第二天陈伯达打来电话，他也是福建人，两人说话用闽南话：“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我看过了，也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可以发表，我看可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回答说：“这恐怕不合适，文章是别人写的，怎么能用我的名义发表？”

陈伯达说：“用你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很为难，他就说：“伯达同志，你不是修改过这篇文章吗？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

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绝对权威的文章，陈伯达同志已经改过了，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101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文章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1967年11月3日，“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某日，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

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然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湖南请示报告的批示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毛泽东在该件做了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了 36 本书。不要专吃青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举行审查样板戏晚会，由刘锦平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出席。江青一定要请林彪出席，杨成武事先没有通知，临时请林彪到会。

叶群批评杨成武、吴法宪：你们两个当了总长、副总长，就得意忘形了，忘恩负义了，眼睛里就没有林总了，你们两个主持这次演出，为什么要等林总睡了觉才通知我们，要江青同志在这里等林总，你们这是干什么？用意何在？

一九六八年某月，黄永胜把一份关于叶剑英等密谋政变的情况简报批给叶群。

1967 年 6 月，黄永胜批准广州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报送的《关于揪叛徒调查工作的请示》。这个请示报告所附的第一号调查方案即是调查叶剑英 1934 年在江西筠门岭战斗中被俘问题。

军管会负责人给黄永胜、刘兴元的密信

刘兴元密报给黄永胜的关于叶剑英被俘问题材料的密信

黄永胜的亲笔批件

1968 年某月，文年生专案得到线索：叶剑英和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开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黄永胜与江燮元（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在 1968 年 4 月 6 日的谈话记录

关于叶剑英等密谋情况简报

黄永胜把这份简报批给叶群的文件

林彪办公室秘书李春生、保密员李根清的证言

（1980年12月3日下午3时，第二特别审判庭开庭审判黄永胜，伍修权主持审判活动。）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对吴法宪说：赵子珍和余立金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

二、中央领导集体作出关于杨、余、傅问题决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在住处主持会议，讨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

接着，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会议

接着，周恩来与许世友谈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晨一时，周恩来与叶群、吴法宪谈话。

接着，周恩来到江青处开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会议中途通知吴法宪参加会议。

毛泽东见到吴法宪即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

毛泽东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

林彪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或代总参谋长？

毛泽东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

林彪说：黄永胜是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你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

毛泽东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排长，那就要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

对于如何处理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

江青又提出傅崇碧与杨成武关系密切，傅长期以来都在杨直接指挥下工作，况且还有闯钓鱼台的记录，为了防范，最好也动一动。

毛泽东也同意江青的建议。

经过四次讨论，会议通过了两项决定。

经林彪提议，会议决定调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毛泽东、林彪退席后，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五个问题：

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周亲自谈话。

第二，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

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

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

第五，决定在3月23日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彪主席的决定：

一、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温玉成同志为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晚饭后不久，吴法宪来到杨成武家里，当时工作人员正要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却说：“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说完就走了。

12 点半左右，林彪的两个秘书来看看杨代总长的病情如何了。他们执意要见杨，张秘书只好领他们来到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他。

杨成武坐起来，和他们打了招呼。

一个秘书说：“101 对首长的病情很关心，特让我俩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另一个秘书说：“吃过药了吧？”

杨成武说：“谢谢 101，不要紧的。”

两个秘书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钟，吴法宪通知余立金到他家商量事，余立金到吴家后，由杨德中率领的警卫部队带走。

不久，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打电话到杨成武家，声音很是急促：“张秘书，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张秘书立即拨通了杨成武卧室的电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钟，邱会作和李作鹏带领几十个人来到杨成武的家里，带走杨成武。

赵志珍刚推开门想看个究竟，几个人上来就把她扭住了。她愤怒地质问这是干什么？无人回答。全家人像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被

推搡着到了楼下的客厅，就连年近8旬的老太太和只有10来岁的孩子也不例外。赵志珍要去叫杨成武，但把守客厅门口的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恶狠狠地说：“不行！”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着几个人上了楼，闯进杨成武的卧室。由于安眠药的作用，杨成武有点睁不开眼睛，他穿着睡衣，站了起来。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李作鹏站在后面，仍然戴着他那副宽大的墨镜。他身后是手持短枪的士兵。

杨成武问：“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的话筒，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早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杨成武火了：“怎么回事？”

邱会作和李作鹏都站在一旁不动声色，随他们一起来的一个人对杨成武说：“走吧！”

杨成武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从他们闪出的道走出房门。几个士兵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着进厕所。杨成武怒发冲冠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还应该有人性，要有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早上五点左右，周恩来等人与郑维山谈话。

周恩来对郑维山说：杨成武犯了错误，已经撤销代总长的职务，要郑维山与杨成武划清界限，揭发杨成武的错误。

一九六八年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林彪、周恩来等人与傅崇碧谈话。

林彪和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都在小会议室里。

傅崇碧对汪东兴说：大家都是突然被叫来的，都没有吃饭，搞点饭吃吧。汪东兴就叫人搞了一些点心来，大家边吃边聊天。

这时候，总理从小会议室里出来，把傅崇碧叫进去，对他说，你不要激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在里边，没有出来。

傅崇碧心里明白大概有事，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事。

一会儿，林彪来了，总理把座位让给他，自己坐到另外的沙发上去。

林彪紧挨着傅崇碧坐下，林彪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吴法宪同志派飞机，送你到沈阳去。

命令一宣布，总理叫傅崇碧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谈一谈，然后就出去了。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总理进来时天快明了，傅崇碧正和陈锡联吃水果，聊天。总理说赶快弄饭吃。傅崇碧吃了一点。总理问为什么不吃了？傅崇碧说不吃了。总理说什么也搞好了，是不是走？傅崇碧说我回去取东西。总理说，还回不回去？干干脆吧，要什么东西，你写个条，让陈锡联办。傅崇碧说不写。这么急，又不是打仗。总理说还是写一个吧。傅崇碧就写了个条，很简单，说自己调沈阳军区了，调得很急，到了以后，再写信。

走出小会议室，总理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去沈阳，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

总理转过身对陈锡联说：他身体不好，要多照顾他。

然后，总理说，好吧，你们走吧。

走出人民大会堂，秘书和保卫干事都没有了，陈锡联坐在车前面，傅崇碧坐在后面的中间，一边一个夹着他，后面还有三个车。

到了西郊机场，这地方傅崇碧很熟，他说没烟抽，机场的主任就给拿来了烟，还给冲了咖啡。正喝着咖啡，来了个电话，问第一架飞机起了没有？当时傅崇碧不知道第一架飞机是押杨成武的。说起飞了。又问第二架飞机起飞了没有？说没有，快了，正在发动。这第二架飞机就是送傅崇碧到沈阳的。这时，飞行团长进来，对傅崇碧敬了个礼，说首长，飞机发动了。傅崇碧放下刚喝了几口的咖

啡，说不喝了，走。陈锡联说还是喝完吧。喝完咖啡，就上了飞机，四个人押送。临上飞机前，陈锡联把他的大衣塞给了傅崇碧。

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一根烟没有抽完，飞机就降落在沈阳了。

下了飞机，立即上来四五个车。当时傅崇碧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

住处的门口、楼上各一道哨，还给他派了保卫人员。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傅崇碧说先不要走，这屋里什么也没有，给我找几张纸，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当天就没有走，等了一天。信很简单，说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为什么派两道哨？我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杨成武被带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

这里，是林彪办公的地方。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十余人都坐在里面。

林彪见杨成武走进来，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代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民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走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

江青说：“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问题！”

吴法宪说：“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是什么关系？”

陈伯达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说：“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她带头呼起口号来：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杨成武说：“我说几句——”

江青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

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许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参加会议的人，先后离开会议室。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

谈话完毕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一一与杨成武握手告别。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在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林彪的讲话

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象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大不很小，小不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

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

会议决定：

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

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

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

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的卫戍司令。

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

第一点，就是山头主义，要反对。

杨成武他只相信他一小撮的人，同他关系密切的人，而不相信别人。如果照他的一套啊，那我们就要把吴法宪拉掉，就把谢富治拉掉，把许世友拉掉，韩先楚拉掉。逐渐发展起来与他相同地位的这些人，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都会被排挤的。

过去在总参或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譬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帐。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是全面夺权的组成部分，夺总参的权、夺后勤的权、夺空军的权、夺海军的权，以及还有其它些地方，工程兵的权。那一个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是把贺龙这一个篡军、篡党的野心家暴露了，把他的这些爪牙揪出来了，这个还是对的。这些人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来翻天的。

批判了、撤销王力、关锋、戚本禹，这绝不是说二月逆流的这批人可以翻天。当时反对二月逆流是文化革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斗争，是一个正确的斗争。打倒这些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等等，是必要的，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来翻天。

第二点，就是杨成武是政治品质很坏，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

大家以为他是反罗瑞卿的，实际上他是一个罗瑞卿分子，是紧跟罗瑞卿的，当面好象是反对罗瑞卿的，但实际上原来是罗瑞卿的；他参加了反对彭真的斗争，但实际上他是拥护彭真的。在斗争罗瑞卿的时候，他不同意写组织结论，不去提和杨献珍、杨尚昆的关系。所以你看他表面上以为他是反罗的，实际上他在袒护罗。他本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间讲了罗瑞卿问题，可是看了邓小平和彭真的发言是袒护罗瑞卿以后，他要求撤回他的讲话

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个事情本来是杨成武命令，擅自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傅崇碧作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杨成武在这个方面表现了他这种不承认作坏了的事情。

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帐，他说他没有讲。

在总参一方面说不要宣传他，但另一方面在底下布置宣传他。这都是一种两面作法。

他也反对贺龙在空军罢官夺权，可是他自己哪？就在空军罢官夺权。空军里面恰恰没有一个角色是晋察冀的，因此他就拉余立金来夺权，把同余立金的关系搞的很火热，利用男女关系同余立金结合。空军里面有一个秘书搞男女关系，他的老婆就出来告。这个秘书自己就要离婚。这种情况空军采取了措施防止出问题，就把这个秘书隔离起来，本来是好心好意的，为了保护杨成武的名誉，保护他的女儿的名誉。可是杨成武不但不感谢这种好意，反而乘着机会来打击吴法宪，而且要把空军党办里面几个揭出了这个问题的、接受了这个控告的几个人，控告他的丈夫的人的情况向吴法宪讲了，他就要把这几个汇报情况的人打成反革命。坚决地要吴法宪认错，坚决要把这几个人打成反革命，这种作法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完全是欺侮人的，目的就是要吴法宪打倒。他在空军里面就搞侦

察，对吴法宪的一举一动。车子几点钟出去，到了什么地方，几点钟回来，他都侦察。

他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

表面上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毛主席，是拥护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毛主席不忠诚的，对中央文革不忠诚的。并且用这种特务手段来侦察毛主席的行动，侦察江青同志的行动。去年夏天主席要他去北戴河同我谈谈王、关问题，因为我当时身体有点不好，在北戴河住着，可是他不肯去，是经过主席再三催促才去的。所以你别看他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情。过去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领导我们，我们很幸福，引了一句俗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有人就反对这句话。可是杨成武对于这种反对这句话的人采取包庇的态度，他说这个不算什么。

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总理：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江青：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她一方面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主席的领导，全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始终在这个运动中站在最前线。（叶群：江青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的罪责难逃！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杨成武他在表面上看来是没有野心的人，但是实际上呢，他是有野心的。在八届十一全会后不久，杨成武就想把代总长的“代”字把它去掉，他很不舒服这个“代”字，而主席和中央早就看出他

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人选，当时主席说走走看，行不行哪，当时实在是没有把握，再走走看。现在看来是主席看对了，是不行的。可是，他自己缺乏自知之明，还觉得自己很行，还觉得那个“代”字不舒服，还想去掉那个“代”字。在总参宣传和要树立他的绝对的领导，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的提法，就被他进行隔离反省，拿三个人盯梢，盯着一个女同志。表面上看来他是不要名的，可是他争名争的厉害，不归他出名的事情，他也去争一分。譬如说最近不久到上海去搞了一些材料，不归他署名的，他没出过力的，他也把他的名字拿来写上。

还有那个什么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了“人民日报”第二版上，他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当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众呼：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他那文章发表以后他还要发命令，要全国解放军都要学，后来这个命令给吴法宪同志扣了，既然扣了哪，他用电话通知全国都要来学习他那个东西。

第三点就是讲他那篇文章的问题，相对与绝对，真理的问题。

绝对权威这个东西毛主席是不赞成这样提的，这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提的，《人民日报》就宣传开了，大家宣传开了。这种宣传作为对主席信任的态度，一个战士的想法是犹有可说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科学的语言，作为一种哲学的语言，那是不正确的。而杨成武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正确的，这就不对了，这就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了。

周总理的重要讲话

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属于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

他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

杨成武等人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我们在进行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阶段中必

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两条路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

前年，自从毛主席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我们在党内把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等等陆续的揭发出来，也把各地方党政机关、中央政府机关里头一些走资派揭发出来了。在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按照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定，中央文革是作了极其伟大的工作，她带领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中央以“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为代表的，和一些同志、一些人，仍然继续地、坚决地、顽强地、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要想继续执行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要复辟资本主义，借口“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想要保护有一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们发动的“二月逆流”，是要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压制、打击、继续打击红卫兵小将。甚至于提到历史，要为王明路线复辟，直接把矛头指到我们最伟大的、四十年代的我们的整风运动。就是说，二十多年以后，他们要搞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其反动的活动。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维护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

到了去年七、八、九月，出现了形左实右思潮，如“5.16”。还有其它的活动，特别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这些事情，又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了以后，我们中央文革自己把暗藏在内部的一小撮坏分子端出来了，这又是一次丰功伟绩！

今年这一次又把杨成武等人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二月逆流”）公开出来，揭发出来。我们林副主席指出了，我们中央文革坚决的揭发这件事情。

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整个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是会查清楚的。

我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组成部分，成分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说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丰功伟绩。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江青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现在只想谈一谈我对这些两面派、阴谋家、个人野心家的认识过程。我并不是一下子就识破他们，也并不是一贯正确的。

例如刘少奇，他一贯封锁毛主席，其实他是一个四次叛变的大叛徒，大特务，大内奸。我们是有红卫兵小将、无产阶级革命派送了大量的材料，然后又设立专案组，有确凿的证据，有大量的旁证，这是铁证！叛徒、内奸、特务。他那个鬼老婆王光美是一个美国的大特务，战略特务，战略情报特务。

象王、关、戚，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他们原来就是中央文革当时起草小组的时候，是刘、邓他们安插进来的，他们就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黑秀才，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许多事不请示伯达同志，也不请示我，更不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他们封锁，并且把我们架空、架空，使我们和同志们隔离，和小将们隔离，干了许多坏事。他们的罪恶就是我去年九月五号讲的，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想妄图打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妄图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我们把他端出来了。当时，我们为了受蒙蔽的、受迷惑的群众，我们很谨慎地采取了分割政策，我们大家讨论，并且向我们的毛主席请示了。但是王、关，我们分割不开，戚本禹的作法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希望他能够回头，但是不然。到了下半年，戚本禹更猖狂了，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在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摆到台面上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例如去年十一月九号和十一月十二号两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我就是不点名的批评戚本禹的。

又例如，有的人勾结起来，象杨成武之流，口头上说，中央文革怎么样、怎么样。而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欺骗中央文革。又例如，杨成武去年写了一篇什么叫做《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实际上他想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才是一个“一言堂”呢。为了这个问题，我反对过他两次，我是跟他正面的原则问题上进行斗争。发展到今年（几号我忘记了）不得我们的允许，冲到中央文革的住在地区，不得组长、副组长的同意，当时组长请示我们的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他就冲进去了。身为司令，卫戍司令，破坏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目中没有党中央、没有中央文革。昨天我才知道是

杨成武三次指示他进去的，两部车子，当时我就赶过去，我说：“你，卫戍司令，不得我们的批准，是不是来捉人呀？！”我现在才知道，他果然是去捉人去了。这样的事情能够允许吗？！就从那一天我坚决抵制了他以后，傅崇碧就赖账，杨成武就突然间“病了”，一个“病人”天天会客，天天去那儿干两面派的勾当，进而进行夺吴法宪司令员的权，这就是夺空军的权。同时他支持一些受蒙蔽的革命小将来想打倒谢富治同志。谢富治同志跟我一样，可能有缺点、错误，也许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但这是一个很正派的同志，这允许吗？！

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

陈伯达同志的重要讲话

从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起，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关于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起，到现在恰好两年。在这开始以后，我们就取得了几次的伟大胜利：

第一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揭发了彭、罗、陆、杨斗争的伟大胜利。

第二次的伟大胜利，就是打倒刘、邓、陶。

第三次胜利，我们就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把“二月逆流”击溃了。

第四次，我们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几个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

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

在总结这几次大胜利的教训，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教训呢？就是说，还是要防备一些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防备两面派。

杨成武之流也是这样，耍了很多把戏，是一个中等的变色龙，不大不小，但不是那么大，比王、关、戚稍微大一些，他实际上是王、关、戚的后台。（江青同志：他搞窃听、监听，偷盗文件，用特务手法邮检文件。据我们这两天知道，杨成武都有份。）象杨成武这样的人，在政治上用这样或那样耍两面手法，是一个十足的两

面派。杨成武就是对上面欺骗，装成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同时对林副主席，更不用说对毛主席，对中央、中央文革采取封锁的政策，在背后耍阴谋，搞背后活动。象杨成武这样的人，充满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他接触过的人可能会感到这种人有他的特点，正象林副主席讲过的，他是自我吹嘘，以我为核心，唯我主义。

他搞了一篇文章，《大树特树》，这篇文章事实上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这是真的，他在军事单位里，他就说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只改了一个字。

关于这篇文章的发表，我在这里说一下，我也是有错误的，我在这个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杨成武当时把这篇文章交给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时候，放在我那里一个多月，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商量过，谈过的。我们不打算发表他这篇东西。但是他不断催，不断打电话。可是他是代总长呀。使我们相当愁眉苦脸，他看我们没有动，他找戚本禹去了，直接间接地对我们施加压力。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把关的，不发表它。结果还是没有把好关，让他发表了。最近这篇文章不让它突出，放在第二版。这时，他又串通戚本禹，说他的文章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戚本禹又来向我们施加压力，戚本禹又向姚文元同志和我施加压力，说什么“为什么不登这些消息呀！他是代表全世界人民声音的，为什么不登？”我们说，杨成武他怎么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声音呢？他不是比毛主席更高了吗？这一点我们到抵制住了。没有再给他机会（姚文元同志：同志们，那天各报第一版登的都是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杨成武居然公开的施加压力，就是要把他的文章登在第一版，这不是要驾凌于毛主席之上吗？）（江青同志：我昨天还听说戚本禹为这个事，跑到他家里去，代表中央文革向他道歉，他全家送给他勋章。我们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很可笑。（江青同志：是个小丑。）是非常卑鄙齷齪的资产阶级政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变色的小爬虫吧！

康生同志的重要讲话

在 1953 年、1954 年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革命面目；

在 1959 年揭露了彭、黄、张、周的牛鬼蛇神反革命面目；

在文化大革命的预备阶段中间，从1965年月日1月姚文元同志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到1966年6月1日，就揭露出来了彭、罗、陆、杨的反革命面目；

在文化大革命第二个阶段，1966年6月1日以后到1967年“一月风暴”以前，由于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路线彻底揭露出来；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阶段，从“一月革命”以后，又将叛徒陶铸的反革命的面目，将以谭震林为首的、“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及其一伙，揭露了他们的反动逆流；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争取全面胜利阶段中间，毛主席的阳光又将一小撮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队伍中间、是刘邓安置的变色的小爬虫王、关、戚的面目揭露出来；

现在又将阴谋家、两面派杨成武，叛徒余立金，以及傅崇碧他们的两面派面目，反动的面目揭露出来了。

这些胜利的取得，在毛主席和林付主席的指导下面，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因此，我们在这胜利的时候，应当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二月逆流”是1967年二月中旬，一直到三月中旬，政治局的生活会议中间，所发生这样一种反革命的反动逆流。当时是在党中央十一中全会反对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的阶段的时候，在这样的時候，以叛徒谭震林为首的还有几个人跳出来了，他们坚决的支持刘、邓路线，公开地、狂妄地、肆无忌惮地向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付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江青同志：抓“军内一小撮”杨成武是负了重大责任的，在我的批评之下，他曾经假惺惺的写了一个自我批评。他自己身为人民解放军，要破坏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个什么问题？！）他们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推及到二十几年以前的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他们恶毒的攻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而且涉

及到毛主席的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矛头对着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亲密战友林付主席。他们否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的原则，把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污蔑成为“形而上学”。他们污蔑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实际上他就是反对了毛主席对于党、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几十年来的党的政策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的。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保护”干部子弟，实际上他们是完全否定了阶级斗争，完全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完全否定毛主席所讲的我们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依靠解放军、相信解放军，依靠和相信我们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这种阶级路线。他们想迷惑一部份、欺骗一部分人来组织他们的反党集团。否定阶级路线，否定阶级斗争，否定主席的领导，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这样就引起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愤怒，引起中央文革同志的坚决反击。在反击中，谭震林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中间拂袖而去，并且声明，说是要砍脑袋、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全面胜利的时候，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等人，他们不甘心退出舞台，他们还想垂死挣扎，所以，他们的爪牙杨成武跳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姚文元同志的重要讲话

我补充一点，杨成武这一次跳出来，他以前当然就做过很多的坏事，是他指挥傅崇碧冲中央文革所在地受到坚决抵制之后，江青同志对于傅崇碧这一种错误的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作了原则的批评和斗争，这使得杨成武非常紧张，就在第二天，他就突然称病，在背后耍阴谋，妄想夺空军的权，夺中央文革的权，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还反对谢富治同志，反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讲话完后，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周恩来江青康生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周总理：现在宣读命令。

江青同志讲话：

现在有的学生说是要油炸我，绞死我。等到我空了的时候，我就亲自去叫他去油炸，要让他绞死我。

去年二月以黑干将叛徒谭震林为代表跳出来替他们翻案，别有用心的就说什么谁反对余秋里，什么就是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真是颠倒黑白。事实上余秋里是贺龙的心腹，但是主席伟大、宽宏，要一批二保。复辟就搞起来了，而且说他是一贯正确，这对不对？对余秋里要一批二保，这是我们的毛主席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还是要作，但是革命小将就不要上他的当了。

在去年四、五月间又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或者叫极“左”，形“左”实右，它的头面人物叫王力、关锋、戚本禹。有人又企图利用这样的事情来否定中央文革。

在三月八日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的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冲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同志们！这是个什么问题？当场我们坚决抵制了他，严肃地批评了他，那一天以后，杨成武忽然间说：病了。其实他在背后天天开会，天天在那里搞阴谋，要夺空军的权。余立金是个大叛徒，要用余立金夺吴法宪同志的权，（叶群：打倒余立金！）要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的权，夺了一系列的权都被我们识破了。

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付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这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去找一份来，但是又出现了怪事情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后台。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晚上聂元梓同志打电话告急，说是有紧急情况，我们已经很累了，到了拂晓，还是接见了她，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伯达同志和我。我们给她解释了，是我要的，但是底下我们不知道。同时我们也很坦率地向她交了底，就是王、关、戚是爪牙，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搞会不会干扰大方向呀？可是她还是搞了一阵子。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要保她们！（总理：一批二保）。

目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在反动的那方面占优势，要击溃他们！

康生同志讲话：

王力是个什么人呢？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九六二年在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实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信，（口号）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这么说：他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的时候就舒服了，就已经象在亲人家里一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叛徒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善于诱导的作风”，诱导他到反革命的作风。戚本禹说他“对照自己的思想作风和缺点，更加意识到应该努力去改正自己的缺点”，就是要全部投降。

陈伯达同志讲话：

这个大革命已经进行快两年了，经过了几个大的战役，经过了几个大的回合：

第一个大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在这个回合的战斗中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了。

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在这一个回合战斗中，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了！

第三个回合，就是击溃了去年二月所兴起的二月逆流，这是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一些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发动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这个二月逆流击溃了。

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家伙是变色的小爬虫，他们使用各种方法钻到我们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把它挖出来了，把它们挂起来了。

第五个战斗的回合，就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面貌，把它们打倒了，这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把他们打倒了。

周总理讲话：

我相信跟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走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还有一些人是盲目的山头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只要一旦觉悟过来，那就和他们划清界线，承认错误，就会回到我们队伍里来。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好好地改正错误。至于广大的指战员，是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的，不管当年我们的部队是从哪个根据地来的，现在你们还不都是劳动人民子弟兵，是毛主席的队伍，分什么彼此呢！

北京市革委会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指导成立起来的，另外经过去年的一月风暴，上海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后，我们的伟大领袖说，要经过革命代表会议，一个个地成立起来以后，再成立总的，所以成立了四个代表会，工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大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成立了以后，我们四月二十日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江青同志在那个会上讲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那就是把去年中央军委一月的八条、四月的十条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思想，这一点你们大家可能还记得，这样的革命委员会是一种新生的力量，是红色政权，初期总是有些粗糙，容易发生一些错误，出了个别的坏人，这没有什么！好象小孩子刚生出来，总要害点疹子，害点病啊，但是，新生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她要生存下去，成长起来，要健康下去！所以谁要痴心妄想要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搞垮，那是肯定要失败的，我们现在全中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正如刚才江青同志所说的，“五·一”前基本上可以成立起来了，完全成立起来了。

在几个月前就有福建一个战士来了一封信，给杨成武，说你的这个文章，首先题目上就是错误的，毛主席的权威是经过无数的实践、革命奋斗，经过广大人民的智慧，被毛主席集中起来，系统化了，成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人民中，革命人民中，生根了，扎根了。还有什么大树特树的必要呢！这种人为的大树特树，是没有必要的，这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你看一个福建前线的战士，他敢于批评当时的代理参谋长，这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战士是有革命修养的，是学习了毛主席宝书的，熟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这一点应该引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们的骄傲。

同志们！战友们！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所以这样收集的这些材料，就是这些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特务所写的那些材料，诽谤的材料，这些人就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既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一直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么，一九六四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这个反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彭真起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付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你们看一看鲜明的对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一学，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在刚才所说的照陈伯达同志的分析，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斗争当中，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

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付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今年元旦社论，得到毛主席、林付主席批准的五条任务：

第一，好好地来进行学习。我们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提高我们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斗争的水平。

第二，我们就在这个学习班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把全国 29 个省市争取在“五一”前统统地成立革命委员会，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在各个战线上，各个部门都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在应该夺权的地方实现革命三结合。使我们每一个单位都能够把斗批改搞好，实现勤俭节约闹革命。

第三，我们要强调拥军爱民。

第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工人同志，我们的责任很大，不仅要把革命抓好，在革命的原则基础上要联合好，搞好生产，不能缺席，不能旷工，不能搞。我们要反对那些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缺勤呀！旷工呀！要真正的把我们的生产搞得更好。我们相信今年——1968 年北京的生产不管是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也要在全国树立一个榜样。我们的机关、我们的学校都应该搞好斗批改，以后我们更多的人去接近群众、接近工农，投入生产支援工农业，精简机构，真正实现斗批改的成绩。

第五，就是各个单位根据已经有了革命委员会或者革命小组的组织来进行整党，也要整团，整理红卫兵的组织，整理革命的队伍，把坏人清理出去，把积极分子提拔起来担负重要的职务，这样子把我们的队伍搞得更整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凡是经过

锻炼考验的人跟广大的军队代表结合在一起，引起军、干、群的结合，革命的老、中、少的结合，这样子就能够有力量来准备，迎接我们将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九次代表大会！

三、杨、余、傅在关押中

一九六八年三月，杨成武被押送到武汉后，很快转移到湖北孝感，没有多久又被转移到河南。

他的妻子赵志珍和孩子们关押在这里。

杨成武要来了纸笔，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写信：“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对你讲。”

信交上去了，都石沉大海。事后杨成武才知道，他写的20多封信全部被扣押了，并被下令焚毁。但一个人把这些信秘密地收藏起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傅崇碧突然被任命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职务，不让交接，甚至家也没让回，他有牢骚。

总理说还是写一个吧。傅崇碧就写了个条，很简单，说自己调沈阳军区了，调得很急，到了以后，再写信。走出小会议室，

总理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去沈阳，先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起考验。总理转过身对陈锡联说：他身体不好，要多照顾他。然后，总理说，好吧，你们走吧。

走出人民大会堂，秘书和保卫干事都没有了，陈锡联坐在车前面，傅崇碧坐在后面的中间，一边一个夹着他，后面还有三个车。

到了西郊机场，这地方傅崇碧很熟，他说没烟抽，机场的主任就给拿来了烟，还给冲了咖啡。正喝着咖啡，来了个电话，问第一架飞机起了没有？当时傅崇碧不知道第一架飞机是押杨成武的。说起飞了。又问第二架飞机起飞了没有？说没有，快了，正在发动。这第二架飞机就是送傅崇碧到沈阳的。这时，飞行团长进来，对傅崇碧敬了个礼，说首长，飞机发动了。傅崇碧放下刚喝了几口的咖啡，说不喝了，走。陈锡联说还是喝完吧。喝完咖啡，就上了飞机，四个人押送。临上飞机前，陈锡联把他的大衣塞给了傅崇碧。

在飞机上，傅崇碧也不说话，躺在飞机的铺上抽烟。一根烟没有抽完，飞机就降落在沈阳了。下了飞机，立即上来四五个车。当时傅崇碧还是什么都没有想，只是觉得有些不大正常。住处的门口、楼上各一道哨，还给他派了保卫人员。他想下楼，保卫人员说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不要下楼。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被关起来了。送他的飞机要返回北京，傅崇碧说先不要走，这屋里什么也没有，给我找几张纸，我要给中央写封信。飞机当天就没有走，等了一天。信很简单，说为什么这样调动工作？有这样调动的吗？为什么派两道哨？我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错？我可以检讨。你们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提供。

当然，没有任何人再给他讲什么，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囚徒，一关七年。一个加强班30多人看他一个，不到一两个月就换一个地方，大概是怕让人知道。

一九七一年九月，“9·13”事件后，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从捡来的报纸上敏锐感觉到，林彪出事了。给周总理写信，揭发林彪一伙40多条罪行。很快，“中央专案组”派来一个人，说是要向她做调查。她也很认真地和那个人谈了话。

这个人刚走，她却突然神秘地“自杀”了。

四、为“杨、余、傅事件”平反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1972年某月，杨成武的二女儿杨俊生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管她的“专案组”组长缪锡跃把自己的分析告诉杨俊生，并把杨俊生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通过叶剑英转给了毛主席。

缪锡跃自己还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反映了杨成武一家被关押的一些情况。

周总理采取了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一支到开封，一支到滑县，以很快的速度，将杨成武全家人转移出来。杨成武和赵志珍到了山西侯马，孩子们分别转移到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

一九七二年某月，两个陌生的军人径直走进杨成武住的房内。其中一个很客气地对杨成武说：“上级通知，让你们回北京治病。”

“回北京治病？”杨成武问：“这是谁决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奉命来接你们回北京的。”

杨成武对赵志珍说：“好事，咱们要解放啦！”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他们到了北京站。来接他们的车子，直接开到北京白广路的一个招待所，第二天就住进了北京医院。

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汪东兴说，他是奉命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的：

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听到毛泽东的话，杨成武顿时觉得热血直往头上涌。

汪东兴又简单传达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的问题和最后出逃的情况。

杨成武说：“我要向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林彪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先养病，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

说到“杨余傅”，毛泽东说：杨、余、傅都要翻案。

毛泽东接着说：“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杨成武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要见他。

在一个明亮的会客厅里，杨成武看到很是消瘦的周恩来总理走了进来，忙迎上去，只叫了一声总理，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

接着又说：“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总理在谈了杨成武被解放出来的经过后，语气沉痛地说：“有件事本不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杨毅同志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

直到这时，杨成武才知道几个孩子被带走之后，分别关押在河南滑县，进行劳动改造。

周总理安慰杨成武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

周总理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后来，周总理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的文件，要求有关部门妥善处理。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等人在三座门接见了杨成武、王尚荣等人。传达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对他们的工作也谈了些意见，希望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工作。这实际上是对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平反。

一九七四年八月，北京传来了指示，让傅崇碧坐飞机马上回北京。

但是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就由两个干事，一个科长陪同坐特快返回了北京，住在西直门原来给苏联专家盖的房子里，三大间，屋里有电话。傅崇碧没有打电话，七年与人世隔绝，他已经不知道任何一个电话号码了。监护这时还有，但是他不再进屋来。

到北京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孩子来了，给他送东西，说现在事情清楚了。肖克也跟他讲，说不要得罪……

第四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来找傅崇碧，说总理想见他，还派了个大红旗来接。车一直开进北京医院的院里，说到了。来接的人带傅崇碧进了第一道门，又进了第二道门，迎面看见穿着睡衣的总理。

总理紧紧握着傅崇碧的手，对他说：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傅崇碧的眼泪下来了。见到总理，傅崇碧才知道自己是真正出了牢笼了。

总理说不要激动，你受了苦了。你的问题都清楚了，不要着急。

周总理说，八一建军节人没有出来，主席在长沙打电话问了两次，说为什么杨成武、余立金都出来了，傅崇碧没有出来？傅崇碧到哪去了？杨余傅事件搞错了，都要平反，贺龙要平反……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你们一次，除了你们三人，还有肖华、刘志坚。毛主席也要见你们。

傅崇碧这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赶快从沈阳回来。

总理说：这个问题清楚了，你放心，回来先住京西宾馆，把九大文件全部拿给你看，然后检查身体，到北京医院，不要去301。派人把房子整一整，给你派个人派个车。……

总理一把这些事交待完，然后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傅崇碧说：你该休息了。

总理说：不要紧。说你现在还落不了案，人家不让你留在北京，让你到广州去。我跟叶帅说，不要走，就在北京。叶也讲了这个意见。总理说：你回来还是搞卫戍区，主要是整顿。主要力量还是放在北京军区。

傅崇碧说：我搞了一年，关了七年，我不干了。

话是这么说，第二天，傅崇碧就走马上任，担任了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以后又担任了北京军区政委。有人主张换班子，傅崇碧不同意，他一个干部也没有动。他说当时不讲违心话就过不了关，这点我理解。

一九七四年的九月三十日夜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相遇了。他们应邀来参加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傅崇碧说：“一场噩梦。”

余立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杨成武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一九七五年，“解放”了的杨成武，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那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送来了一份文件，这是总理给毛主席的一个报告。

这份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海容、闻生两同志传达主席指示，并看了小平同志向洪文同志报告主席 10 月 20 日嘱咐的几句话，我当坚决执行，决不违反。人事名单，估计 10 月下旬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年干部。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同志改正。周后注 11 月 9 日）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工作和学习。待成熟了，小平可以不兼总参谋长，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都是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看了这封信，杨成武深深感到总理的信任，也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

五、杨成武又一头钻进了政治旋涡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顿。杨成武打心眼里拥护。

一九七六年某月，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在指挥演习时飞机失事，以身殉职。叶剑英等领导人派杨成武和梁必业、张震一起去处理后事。

一九七六年，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时，杨成武是主持工作的副总长。

后来，叶帅被迫“靠边站”了，杨成武照样向他请示。

一九七六年九月某日，聂荣臻元帅把杨成武找了去，对他说，那几个人是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你要告诉叶帅，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聂荣臻还说，他们有特殊身份，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可能要出大事。

当晚，杨成武上了玉泉山，找到了叶剑英，对他说：“叶帅，聂帅有要事转告您。”

叶摆了摆手，说：“出去散步。”

杨成武明白了，叶是担心隔墙有耳。听了杨成武的转告，叶说，我们的想法一样。

那几天里，杨成武往返于几个老师之间，给他们当起了“联络员”。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叶剑英又把杨成武找了去，要他告诉聂荣臻，已经商量妥当，准备马上采取行动。同时叶又叮嘱杨成武：一定要掌握好部队，保证军队不出问题。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杨成武又经历了一次职务的变动

邓小平、聂荣臻、叶剑英约杨成武在三座门谈话。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中央决定你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等形势缓和后再回总参工作。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后，罗瑞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傅、余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

通知指出：1968年3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即“三·二四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捏造杨成武同志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整了江青的黑专案黑材料”，“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说杨成武等同志有“黑后台”。诬陷余立金同志是“叛徒”。

其后，又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五·一六”的黑后台等等。

林彪、“四人帮”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同志，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后果和影响。

通知说：中央已经查明，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

通知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

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致使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平反的决定，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公布，许多受株连和受迫害的同志没有得到平反昭雪和落实党的政策。

通知指出：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有关单位对因“杨余傅事件”受株连的同志，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一九八三年十月，杨成武从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

贰、本节简论

一、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

当时，陈伯达把这个事件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斗争的第五个回合。以后，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时候，是把杨、余、傅勾结王、关、戚作为“五·一六”的后台。

二、“杨、余、傅事件”并不复杂。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参加，讨论杨成武的问题。周恩来说：杨、余、傅的问题是林彪检举的。林彪说：讨论了四次。三月二十二日，作出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职务；余立金关押审查；傅崇碧调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按照林彪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有三点：第一，山头主义；第二，两面派；第三，绝对主义。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说：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

杨、余、傅全部平反，恢复职务。

三、“杨、余、傅事件”的真相至今没有人能说清楚。

所谓“杨、余、傅事件”，林彪在宣布时虽然说了三个问题。

其中关于绝对与相对的关系问题，是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人民日报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九六七年底，毛泽东在批评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说过：主要是陈伯达的问题。

关于山头主义，当时，林彪说：杨成武勾结余立金要夺吴法宪的权；杨成武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

文革前以及文革后，炒得最热的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是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发生的“桃色事件”；另一件是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

作为当事人的吴法宪，从一开始到后来，就对这些说法抱有怀疑。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我曾经冷静地想过，要说杨成武通过余立金要夺我的权，那是缺乏根据的，以此为理由就撤了他的职，太过牵强，也太过严厉。至于逮捕余立金，以至牵连到他的妻子陆力行，那更是不应该的了。这里面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依然不知道。

（第730页）

有人说：文革史研究中有一些较为复杂的事件，不太容易解释清楚。以笔者愚见，“杨余傅事件”就是一个悬案。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官方的一家之言当然不用说了，官方只是将一切罪过往林彪和江青身上一推就行了。史学界之所以解释不清这段历史，关键还在于没有把握住该事件的本质，有些关键的史料未曾披露，而当事人在事后由于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局限性很大，往往推诿或掩饰其中的重要情节，回避了自身的问题，故无法客观地回首往事，致使此一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杨成武事后所写的《杨成武自述》就是典型一例。以笔者的看法，所谓“杨余傅事件”，其实就是“杨成武事件”，余立金和傅崇碧都是陪绑，受到杨成武的牵连。如果史家不能搞清杨成武其人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就无法解释“杨余傅事件”的原委。笔者倾向于认为，杨成

武逐渐倒向江青，在林彪与江青之间脚踩两只船，这才是矛盾产生的根源。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彻底解开“杨余傅事件”之谜。

但是，也有人很勇敢地说：他已经掌握了这件事的奥秘。奥秘之一就是全国刮起了右倾翻案风；奥秘之二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不被无产阶级司令部信任，怀疑为异己。“杨成武、傅崇碧早先在晋察冀工作，被认为是晋察冀山头的。晋察冀的最高首长是聂荣臻，他在1967年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在1968年又补误认为是多中心论者，殃及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原是新四军的，老首长是陈毅。陈毅在1967年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在1968年又为外交部91人大字报拥戴，也就殃及余立金。（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34-243页）

四、说清“杨、余、傅事件”的真相并不难

把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央会议的记录公布出来，问题就全部清楚了。

按照当权者的立场，说清“杨、余、傅事件”的真相，应该是揭露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的一个极好机会。可是，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不仅没有公布有关的会议记录，而且，根本就没有提到“杨、余、傅事件”。好像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呢？！

有两件事值得注意：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南巡，杨成武作为联络员，经常回北京向中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或到上海向毛泽东报告北京的情况、意见。有人说：杨成武看不惯江青一伙所为，每每暗中掣肘。返京后，杨成武把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向几位老师作了传达，但没有告诉林彪。

一九六八年某月，黄永胜把一份关于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开会密谋政变的情况简报批给叶群。

这两件确实发生过。

林彪掌握了这两件情报，他对杨成武看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难道不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吗？

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讨论时，必然会认为：第一件事，杨成武违反了组织纪律，犯了搞山头主义的错误；第二件事，杨成武参与政变活动，是搞两面派。即使是证据不足，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采取措施撤销他们的职务，把军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五、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杨成武又一次卷入了政治旋涡。

在十月政变中杨成武充当了叶剑英、聂荣臻等人之间的联络员，成为掌握、调动部队，作为政变后备力量的主要负责人。

由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说一九六八年杨成武参与了叶剑英等人的政变活动，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杨成武在左右两边如此摇来摆去，也不可能得到邓小平、叶剑英的充分信任。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邓小平、罗瑞卿等人恢复职务以后，他就派到福州军区去了。

2008年6月24日初稿

2011年11月8日修改

第二节 反击右倾翻案风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复旦大学新闻系立新功《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

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上的讲话

郑司令员：

我讲一下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我认为是革委会每个同志都应该有自己的态度，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二月逆流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态度，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们究竟是反对还是不反对，我认为我们革委会中每个同志都要有自己的态度，我很同意今天上面几个同志的发言，为二月逆流翻案，事实上是自毁长城，反对毛主席、反对林付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个人意见坚决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在这个中间，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是这个意见，但是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面前，有人站队站错了，旗帜不鲜明，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立场，检查一下自己站队站对了没有，态度明确不明确，这是对毛主席、对林付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司令部，对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态度问题，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自己鲜明的旗帜，应有自己鲜明的立场态度！

北京市革委会是以谢副总理为首的领导下，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身边的新生红色政权，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的。我个人跟上面同志的看法一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紧跟毛主席的战略布署的，所以，我们应该拥护革委会，支持革委会，树立无产阶级的权威。

傅司令员：

最近掀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这是个大问题。

吴德同志：

有人利用市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

戍区，并把矛头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这是造谣中伤，恶毒攻击？什么“打倒彭真第二”，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向断头台”，……这是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命令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

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

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

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二月逆流主将谭震林翻案，为反革命二月逆流翻案。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的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这时谢副总理说：“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打倒叛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肖华！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打倒王关戚！打倒野心家、两面派杨成武！打倒叛徒余立金！打倒野心家傅崇碧！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文章指出：要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从右的或极“左”的方面来动摇、颠覆革命委员会的阴谋。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潘复生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

他在分析全省阶级斗争形势时指出：全省 65 个县以上革委会，“至少有百分之十几的权不在我们手里。”他提出，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思想”。

潘复生在会议期间，带领与会全体人员，在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召开现场会议，认为哈尔滨市滨江区和平一队是“右倾翻案”的典型，点名批判了几十个人，当场逮捕 23 人，致使百分之八十的区、社干部，百分之六十的大小队干部被撤掉。其中，有的

扣上“漏网走资派”，有的冠以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戴上阶级报复的帽子，有的斥为现行反革命。

一九六八年四月日，中央领导人接见六十九军干部。

陈伯达说：大寨就很好嘛，是毛主席亲自树起来的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山西有人说，要打倒刘格平，打倒“刘未老”，这不对嘛，军队应该站出说话嘛。你们军队不应该支持打倒刘格平的大字报，要告诉李顺达，叫他和陈永贵同志很好合作。山西要搞好大批判。王世英就很坏嘛！

周总理：听说太原开了大会，听说要打倒所谓“刘未老”，打倒陈永贵，围了刘格平，陈永贵，这是错误的。

康生说：打倒刘格平，打倒张日清，都打倒了怎么办？张日清同志回去的时候（指十二月会议）我们本来不让他回去，我们怕他同去增加派性，支一派压一派，我们为了顾全大局，是向他交代过的。

林副主席说：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潘复生在全省发动了“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在全省大抓所谓阶级报复案件。从省革委会到各地，把造反派前一段解放并予以结合的大批干部，以“漏网走资派”的罪名加以重新打倒。全省被揪斗的干部不少于5万人。

一九六八年四月开始，潘复生于4月14日、16日、5月11日、21日，以省革委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四次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材料，称宋是“漏网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王任重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批透批臭。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

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要充份揭露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章指出：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时刻都不要忘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继续发动广大群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的大批判深入地持久地开展下去，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继续发动进攻。要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的妖风。要加强敌情观念，擦亮眼睛，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彻底粉碎他们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罪恶阴谋。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打倒右倾分裂主义，反对两面派。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复旦大学等校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大字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核心组成员、《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串连一些人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右的方面的反扑。最近一个时期，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各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广大无

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右倾翻案风。

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变色龙杨、余、傅的阴沟里刮起来的，是通过他们在河南的代理人刮起来的，是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刮起来的。这股右倾翻案风，在我省刮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要批示。去年二月到七月，河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执行的反动路线说成是“正确的”，说什么“二月黑风不黑”，“去年的二月是革命的二月，红色的二月”。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什么“八月是逆流”。甚至扬言“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

二、对抗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到处拉山头，大搞分裂主义。他们借反派性为名，攻击革命委员会，一句最普遍的口号是：“砸烂派性委员会”，说什么革命委员会对他“无效”。

三、在干部问题上故意制造混乱，抹杀两条路线斗争。

四、借反极“左”思潮为名，行右倾翻案之实。他们口口声声要反极“左”思潮，认为这是河南当前的主要危险。洛阳地区已成立了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公然对抗我们的红色新政权。驻马店不是已经准备成立了吗？！还有一些县和大工厂不是也有了么？！南阳、驻马店、商丘等地区翻案活动也很严重，出现了许多非常反动的传单和谣言。

五、在这股翻案妖风中，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打倒谢富治同志的反革命标语口号，所谓“北京消息”满天飞。中央文革揪出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本来是大好事，但是，他们却借此大作文章，抛出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说谁谁谁是王、关、戚的黑后

台。商丘一个剧团到夏邑演戏，这曲戏名字就叫“王、关、戚批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

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是和戴苏理有关系的。总根子在戴苏理。许多地区揭发，他都插了手。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下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许世友在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我们打垮了敌人从极“左”的方面的进攻以后，当前又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分裂的逆流。有些坏家伙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刻骨仇恨，妄图为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江苏的代理人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叛徒、特务翻案，为黑手翻案，搞保杜、保高活动，公然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故意制造混乱，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经常放阴风，点鬼火，挑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关系，挑拨军队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关系，甚至挑拨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他们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甚至已经改正了的缺点、错误不放，进行恶毒攻击，妄图否定伟大的群众运动，否定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我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展开了揭发、批判和斗争。

戴苏理在进行右倾翻案活动的时候，自鸣得意的是两张“王牌”，一是借口所谓“反对极‘左’思潮”，一是借口所谓“反派性”。

戴苏理口口声声说，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党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反右不反“左”。他到处唆使受他蒙蔽的一部分人和他的同党，借口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省革命委员会，诬蔑纪登奎同志是极“左”思潮的代表。

戴苏理大喊大叫“反派性”，他反的是什么派性呢？他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叫“派性夺权”；把革命委员会，叫“派性委员会”；谁要是一讲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叫“派性大作”；把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叫“派性报纸”。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成了“派性”，把革命造反派说得一无是处。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在阶级社会中，存在不同的阶级。在各个阶级内部，又存在不同的阶层。各个阶级和阶层，在政治斗争中，都会有左、中、右各派的区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激流，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起来，强烈地表现出各自的政治倾向，表现出各自的派性。怎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派性作阶级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只有无产阶级中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部队，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完整地、真正地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才能有最强烈的无产阶级的党性。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党性。

我们一般所说的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党性的斗争。

各个派别，各种派性，都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辨别谁是真正的、完全的革命派，谁是口头“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就必须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说，不仅要看他们的口号和言论，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实际上站在那个阶级一边，执行的是那个阶级的路线，他们的行动对那个阶级有利。

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团结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志，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

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从右的方面，用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或者从形“左”实右即极“左”方面，来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党性或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强表现。

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它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就容易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因此，必须善于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党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

无产阶级先锋队历来反对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反对山头主义，反对宗派主义。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安部侦破“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嫌疑犯的供词中涉及一些中央领导人朱德、陈毅、李富春、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徐向前等。

十二月，公安部根据嫌疑犯供词列出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的名单。

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毛远新以个人名义给潘、汪写的一封信。

信中称：哈尔滨最近又有一些炮轰派个别人在活动，这是不对的。在中央召集两派在京办学习班时，总理考虑炮轰派中军工山下派和哈师院炮轰派是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有贡献。炮轰派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对待省革委会上犯有方向性错误，当时没有明确指出来，中央相信炮轰派广大革命群众，通过毛主席著作和最新指示的学习，能够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加以认识。从北京回来以后，多数炮轰派高举大团结的旗帜，为促进大联合作了很多工作。但是，现在又有个别人搞了一些不应该搞的活动，这是不对的。我建议省革委会找他们谈清楚。现在苏修蠢蠢欲动，大敌当前，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在省革委会的领导下，克服错误，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潘复生得到这封信之后，令办公室广为散发，被一些派性严重的人进一步加以曲解，作为他们整炮轰派的新型重武器。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是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总结丰富的阶级斗争实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阶级内容所作的最深刻的概括。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进一步指明了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作为无产阶级的左翼，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新形势下把革命

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切实地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自己，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热烈欢呼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当前，要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要防止斗志松懈、停滞不前的情绪。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待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善于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从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出发，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顾革命的大局。警惕和揭露阶级敌人利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妄想分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分裂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破坏军民团结的阴谋活动。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决不准许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决不准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发扬无产阶级的坚决彻底革命精神，抓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纪念《通知》发表两周年》

文章指出：要从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出发，更加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要批判来自右的和极“左”的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红色字体是毛泽东审稿时加上的）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湖南“工联”派中的梁春阳、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刘炎生（建湘瓷厂）、余信谦（新华印刷厂）、周国强（市总工会）等联合原“湘江风雷”主要头头叶卫东，根据中

央“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3·30指示”，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宣称华国锋、胡勇、唐忠富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

而唐、胡等则指责梁、尚、叶、周等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站在梁、尚一边的红“3·30”和紧跟唐、胡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原“8·19造反有理军”为主），都派员调查“右倾翻案”的情况，双方一出长沙，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无异议。而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实际上，在一些市县确实存在右倾翻案的问题。由于一些人思想上的派性并未解决，中央“1·24”指示批“省无联”给了他们一个将对立面除之而后快的大好机会，于是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可说是寥如晨星（据说耒阳有），故“1·24”后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源，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说：“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五十三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死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决不能使我们麻痹起来。一小撮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搞翻案：妄想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党内

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翻案，为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翻案。右倾翻案和反右倾翻案，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右倾翻案风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足为怪。我们要坚决粉碎右倾翻案风，开展持久而深入的革命大批判，把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在四川的代理人揭深批透、斗倒斗臭。要加强敌情观念，努力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那些藏在阴暗角落里兴风作浪、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少数的叛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挖出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八年六月初，哈师院和农学院一些人相继在省革委会办公楼内贴出大字报。师院的大字报称范正美是黑龙江省“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炮打“三红”的急先锋、破坏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的变色龙、小爬虫。对宋振业的大字报用语多少显得调子稍低一些，没有扣罪魁祸首的帽子。

此后不久，在师院院内和附近的大街上，“打倒范正美、宋振业”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随处可见。

各个院校炮轰派里，在捍联总的“工作”之下，纷纷出现了“立新功”、“开新字”、“揭老底”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出来杀范正美和其他炮轰派头头的“回马枪”。“打倒范正美”、“把范正美赶出省革委会”的大字块已频频见于街头。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王效禹在山东省各地市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关于形势问题

一个问题是，当前是不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或者叫“老保翻天”？从运动发展的情况来看，有的地区、某些单位，确实是存在着保守势力抬头、革命造反派受压的问题，有的发展的还比较厉害一些。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要犯错误。但是，这只是在大好形势下的一个支流。要是把它扩大了，看成是“老保翻天”、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前夜”，看成是主流，也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是当前有没有极“左”思潮？对于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在反对右倾的时候，作为一种思想来说，脑子一度热

一些，偏激一些，提出几个过“左”的口号，产生一点极“左”情绪，是很难避免的。这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应该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纠正过来。我们说的极“左”势力，是指阶级敌人，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从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很多。我们特别应当看到，经过两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掌权的走资派已经被夺了权，由统治地位变为被统治地位，他们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破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从受压的地位变为当权的地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是当前形势的一个新特点。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不能不经历十分剧烈的反复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对复辟的斗争，会经历一个很长时期。革命委员会逐步巩固、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和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前，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离间和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群众的联系。他们或者大刮右倾翻案黑风，妄图扰乱阶级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或者施放糖衣炮弹，妄图欺骗或腐蚀我们的同志，使革命委员会某些成员脱离群众。

不论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不论是清理阶级队伍，其阶级内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打击极少数阶级敌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滕海清在内蒙古革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一大批政治案件被发现和破获。乌兰夫集团一明一暗的两套班底和“新内人党”的反革命罪恶活动被揭发。由乌兰夫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革命翻案集团被砸烂。披着革命领导干部或革命造

反派外衣的，伪装革命而实际反革命的两面派有的已被挖出。这就粉碎性地打击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特别是牧区，今年一月兴起的划阶级、斗牧主的红色风暴，迅速席卷整个牧区，所到之处，砸烂了乌兰夫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狠地打击了牧区残留的封建和宗教势力，横扫了日本帝国主义、苏蒙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等一切残渣余孽。

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号通告和五月三日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会议纪要要是正确的。

当前阶级敌人的新动向，集中的表现是：千方百计地妄想从根本上破坏和否定伟大的“挖肃”斗争，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翻案，为以乌兰夫为代表的一切反革命势力翻案。

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阶级敌人要弄的反革命新花招，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①阶级敌人从右的和形“左”实右的两个方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同我们迂回斗争。他们常常接过革命的口号，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有时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名，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实。他们接过反对“整群众”的口号，死捂阶级斗争盖子，保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装出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样子，极力扩大打击面，把矛头引向有一般历史问题的或生活作风上有问题的人，以转移视线，乘机溜掉。他们还会采取揪明保暗的办法，把一些次要的人物推出来，牵制我们的主要力量，“舍车马，保将帅”。他们装出一副革命的面孔，残酷打击了一些知情人，甚至杀人灭口，以保住自己。他们还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关系，妄图把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引向民族之间斗争的歧途，等等。这是阶级敌人狗急跳墙，进行垂死挣扎的突出表现，是和我们作合法斗争的主要手段。

②施展各种反革命手法，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大搞右倾分裂活动，妄图分裂革命委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面临灭顶之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和煽动某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派性，施展借刀杀人的毒计。他们捏造领导核心之间的“分歧”，制造革命组织之间“磨擦”，挑拨离间，兴风作浪，抓住小事小非，无限上纲，激化矛盾，造成长期对立，无休止的争论，甚至挑起“内战”，煽

动武斗，把革命群众组织搞臭，以转移视线，在混战中求得生存。他们有的披着革命的外衣，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花言巧语，上窜下跳，左右煽风，挑拨军政之间，军民之间，革命委员会和群众之间，部队和部队之间，群众组织和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极力地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而我们有一些糊涂人，人妖颠倒，是非不分，正在上当。

③阶级敌人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思想，把一些糊涂人推出来替他们说话。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阴风，点鬼火，造谣言，放暗箭，散布流言蜚语，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为了破坏“挖肃”斗争，利用我们某些同志对这场斗争的暂时不理解，恶毒的把这场斗争污蔑为“跟中央唱对台戏”，“打击老造反派”，“支持老保翻天”“复辟资本主义”，等等。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糊涂人，由于右倾思想作怪，也跟着敌人瞎说，一小撮阶级敌人，从他们反革命的需要出发，非常注意社会动向，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狂呼乱叫，蒙蔽和煽动群众，刮起翻案妖风，例如：当揪出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就乘机造谣，乱叫，“×××是杨成武线上的”，“搞挖肃斗争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看不到内蒙革委会的右倾是最大的右倾”。当自治区革委会提出了六条具体政策界限，引导群众打击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时，他们又狂叫，“挖肃斗争大方向错了”，“打击面宽了”，“纠偏了”，“刹车了”，等等，等等。

④施放糖衣炮弹，腐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革命意志。他们有的利用小恩小惠，金钱美女，腐蚀瓦解我们的队伍。有的利用某些同志喜欢奉承的弱点，歌功颂德，肉麻吹捧，设下圈套，使其中计，诱惑他们走上犯错误的道路。还有些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利用他们暂时窃取的权力，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任意挥霍国家的财产，滥发奖金，补助，拉拢部分落后群众为其服务。这种种手段，其目的就是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进行反革命的翻案活动。

⑤用破坏生产的办法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有的散布“搞生产就是反动路线”，“全面停产，就是全面胜利”，极力煽动群众离开生产岗位。他们有的赤膊上阵，制造事故，杀人放火，破坏生产设备，造成停工停产。他们有的诱骗落后群众，投机倒把，退

社单干，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挖社会主义墙脚。有的制造紧张空气，破坏市场供应，利用封建迷信，腐蚀群众，蛊惑人心，以瓦解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半年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深深懂得：要胜利进行“挖肃”斗争，就必须狠反右倾。首先在呼市文艺界兴起了“挖肃”斗争，一举揪出了披着革命领导干部外衣、实则反革命的特务分子特古斯，打了一个前哨战。右倾思想还在顽固地抵抗，污蔑革命群众揪出特古斯是“形左实右”，是“黑手揪红人”等等。今年一月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口号，选择公开包庇坏人的公检法为重点，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首先在呼市开展了“群众专政”，同时在牧区提出了划阶级、斗牧主的战斗任务。一开始就揪出了黑司令官苏修特务王再天，在三月底四月初，乘揪出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之机，向我们举行反扑，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他们恶毒地攻击我们支持“老保翻天”、“压制老造反派”、“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办学习班的形式，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提高革命警惕性坚决同反革命谣言作斗争的通知

最近发现流传着一些谣言，有的是口传的，有的印成了小册子，传单，有的是伪造的文件，讲话材料。例如，被说成是一位负责同志关于“五个回合站队问题”的讲话，就完全是伪造的。这个材料流传甚广，有的人根据这个材料的观点搞重新站队，造成革命队伍的分裂。

一九六八年八月，哈尔滨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了专案组，经院革命委员会认定并由院专案组负责清查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成员有：范正美、穆国兴、任万新、胡云飞（范正美专案由省文革组负责）

一九六八年八月，湖南省革委会派出由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团长、“汽电派”工人为主力的“砸烂旧省委兵团”，进驻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办委的具体权力，并将省委机关干部“永向东”组织彻底击溃。

梁春阳、尚春仁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

与“湘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被整肃，受到严厉的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湘瓷派”的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惩处。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李德生在安徽省革委会紧急会议上关于安庆问题的重要讲话

现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反右”这个革命口号下，大做反革命的文章。他们煞费心地编造了一个反动的“主要矛盾转化论”，胡说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军内掌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矛盾”，他们诬蔑革命委员会是“新的旧秩序”“代替老的旧秩序”，疯狂叫嚷：“揪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安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滚出省革委会”。他们还恶毒的煽动，要解放军的战士“起来造军内一小撮坏头头的反。”他们还利用“支左不支派”在提法上的不够确切，进行大肆攻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支左不支派”突破。并且扬言，要用枪杆子来批判，用战争来批判。他们提出所谓“四反”“一粉碎”。

定远、凤阳地区的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反了；芜湖的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黑风，我们反了；安庆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我们也是反定了。在安庆，确实存在着右倾翻案和右倾分裂两股反动思潮，前一个时期，反对安庆“十条协议”的右倾翻案妖风，和近一个阶段反对安庆两派革命大联合的右倾分裂主义，都比较突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中旬，潘复生借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在省革委扩大会议上，组织对范正美、宋振业的大会批斗。先是在小组会上，宋振业检讨自己犯了罪，而范正美只是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犯有错误，从而激起潘复生的强烈不满。于是连续出了好几期简报，登载各小组批评范正美认识不高、检讨不深。潘复

生在扩大会上连续两次在晚上召开批斗范正美的大会，由宋振业陪斗，

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还没有闭会，潘复生不经请示中央批准，就将范正美和宋振业隔离审查，派人轮流看管，直到1969年5月，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这期间，共组织对范正美的大小批斗会近十次。其中有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省政治委员会、工代会和贫代会成立大会、哈医大以及哈师院师生大会等。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山东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

一九六九年六月某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上开幕式上的讲话

有的人，不学习中央对总的形势的指示，就是要搞什么“反复旧”。

最近，我们发现有的地区在传达、落实“九大”精神的时候受到了干扰，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譬如什么：“反复旧”喽。

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一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有的说：“我们这里已经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了，不需要落实‘九条’‘五条’了。”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六八年三、四月提出反三右一风的背景

1，三月，北京出现了为“二月逆流”、为谭震林翻案的风潮，周恩来以及北京市的领导人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吴德都出来表态反对翻案。

2，三月，出现了杨成武事件，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

3，四月，公安部侦破“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嫌疑犯的供词中涉及一些中央领导人，十二月，公安部根据嫌疑犯供词列出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的名单；这些审讯材料肯定有真有假，结果如何？希望这些材料没有被销毁，给后人一个交代。当时肯定是引起了最高当局的警觉和重视。

4，一些省市发生了针对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事件，如上海复旦大学等校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大字报；河南省有人提出“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砸烂派性委员会”；湖南省有人提出一些县市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老保翻天”等等。

这其中就包含着右倾分裂、右倾翻案、右倾投降等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

从三月到十月，中央查处的重大案件，进展不大，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好把它搁置下来。

一些省市发生的问题虽作了相应的处理。其中的情况又各不相同。

对黑龙江省的“炮轰”省革委会一派，中央作了正确处理，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回去后虽然有少数人继续活动，但多数人都能在

省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共同工作。然而，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对炮轰派的人继续进行打击。

湖南省批评省革委负责人的一派不是搞三右一风而是反对三右一风的，他们的意见确有合理之处，但他们的一些作法又违背了中央布署和政策。对他们的处理，似乎过重了。

四、十一月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山东、湖北、河南等一些省发生的“反复旧”运动，是对反三右一风的延伸，但已经不属于中央发起反三右一风的范畴了。

2011年11月19日初稿

第三节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道县等地发生大规模杀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至五日，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

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委副书记熊炳恩在会上说：“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道县“革联”，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

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红联”集中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

“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当晚，寿雁区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以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为由，当场把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打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晚上，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了地富的女儿钟佩英及她的两个儿子。道县滥杀的序幕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突然各地谣传：“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顿时，人心大乱，形势骤变，道县农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将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判处死刑。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机为所欲为，开展大规模杀人活动。后来，地主家庭成员组织报复，互相残杀。

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组织了一个“反屠杀代表团”，一行13人，进京“告御状”。这些人中，有3位死里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证。其中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这里已有几个死尸了。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跪在薯窖边，只听得一个说吃了晚饭才来杀，一个说杀了才吃吧，另一个不由分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他顺势就倒下薯窖里没有再挨刀了。当时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可怜他边呻吟边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几具死尸身上，爬了出来。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他的情况后，就扶他上了北京。

他们沿途散发传单，在北京呼吁有正义感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湖南屠杀”的简报，呈送给中央负责人。震动了中南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驻湖南47军军长黎原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

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什么“革命派”、“造反派”？乱杀人就是反革命。

黎原返湘后，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47军140师炮兵520团进驻道县后进行军事管制。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10点，一支部队，大约一个加强连，全副武装，成四路纵队，走进道县道江镇街头。

四十七军6950部队奉命进驻道县，制止杀人。解放军来了！制止杀人来了！道江镇居民走出家门，夹道欢迎。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

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的讲话，却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后就杀了15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发生大规模武斗。

“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2人，打伤7人，俘虏360余人，被缴枪支120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

“红联”的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红联”召开400多人的追悼会

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一九六七年八月，零陵军分区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四十七军转发了这份电报：

“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

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清晨，道县上空无雾。一架伊二型军用飞机在道县上空低低飞行，撒下制止杀人的传单。

9月2日，飞机又撒传单一次。各式各样的传单如雪片般飞向~}

~{城镇、山乡和田野。传单上以醒目的大字印着：~}

“禁止杀人！”

“杀人犯法！”

“要文斗，不要武斗！”

“不要群众斗群众！”

有的传单没有解散，成捆成捆地落在地上。

6950部队也分散到农村，开始了艰难的制止杀人的宣传工作。

现在陕西某部队农场担任政委的原6950部队组织股长吴荣华回忆说：“我们到道县后，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工作。特别在农村，遭到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长矛、鸟铳等凶器进行围攻。骂我们是‘刘少奇的部队’，是‘为地富反坏右效劳’，扬言要同我们‘拼到底’。”~}

现为湖南省某粮食局退休干部、原6950部队一营副营长刘富安回忆：“一天中午，听说清塘区一个地方要杀人，团政委孙润清立即派我带二连的一些人赶去制止。到那里时，天已快黑，人也被杀了，尸体摆在一口水井边，几个人手持切西瓜的长刀和猎枪站在村口，堵住我们，经我们再三宣传，才让我们进了村。当晚，我们没有地方住，住进了一个小卖部里。卖主见我们去，马上把能

吃的东西全藏起来，不卖给我们。他解释说，‘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不敢给；谁给了，上面就会抄谁的家，还会掉脑袋。’我们又冷又饿，在小卖部过了一夜。”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革联”将冲入二中的“红联”打死12人，打伤多人

这又激起了“红联”派的愤怒，将仇恨再次转移到农村那些无辜的人身上。这也使得部队制止杀人的工作更加困难。

但是，杀人事件仍在道县及周边地蔓延，这又与当地一些领导干部的糊涂思想和错误对策有关。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华县抓促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下发《关于制止杀人的六条意见》的文件。

全文如下：

一、群众自觉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对他们实行专政的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

二、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被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团结对敌。对某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决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三、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因势利导，不要惊惶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

四、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实际上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解放十七年来一贯不接受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

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

为，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六、混进革命队伍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群众来要，尽量做好说服工作，对地富子女要加强教育，实在说服不了的，群众一定要的，也得给。

这个文件本身说明：这些县级党政军领导人对杀人事件或明或暗地采取了纵容态度。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四十七军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

最近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等县的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特就上述事件，发出以下通告：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坚决制止任何杀人、破坏通讯和交通运输的事件发生。

二、目前道县、江华、江永、东安、南山、零陵等县农村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主谋者，要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三、对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共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以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手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

四、……凡被迫离开本单位的群众、干部一律保证返回原单位参加斗批改，不准以任何借口对其进行围攻，殴斗甚至杀害。对于沿途所设的关卡，要立即撤消，并严禁拦路搜身，保证行人安全和邮电、交通运输畅通。

（此公告可在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张贴）

随后，又增派部队，这样才逐步控制了局面。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道县，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

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四年，零陵地区有关方面对道县杀人事件作过两次处理。

一九七八年冬天，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带领工作组，赴道县调查，写出专题报告。湖南省委批发了五号文件。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视察湖南，专程去零陵，听取了道县杀人的情况，指示：“对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一九八二年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对道县杀人事件作指示：“要严惩办。”

一九八四年五月始，零陵地委先后从地、县抽调了1389名干部，组成文化大革命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

历时二年，做了大量的调查、安置、抚恤、处理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一、对一千多名大队、生产队的杀人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了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等党纪政纪处分。

二、几十名在公社以上范围内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被逮捕，并判有期徒刑如关有志、袁甫礼。

三、对那些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凶手情节特别恶劣者、上级明确制止杀人后仍然成批组织杀人者逮捕法办，追究刑事责任。

四、给数以千计的被害者和被杀者的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以及相应的抚恤金。

二、批判极左思潮，处理“省无联”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天左右，“湘派”中的“高校风雷”等反对省革筹小组

当省革筹小组的名单公布后，“湘派”中的“高校风雷”、“红中会”、“省直联络站”等“，便立即在大街上张贴了反对这个省革筹小组成员名单的大字报，称这个名单是“中国赫鲁晓夫第二搞的”，是“二月镇反黑主帅一手炮制的黑货”，并攻击省革筹小组“是中间派与投机分子联合夺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新形式”、“华国锋滚他妈的蛋！”等等。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齐卫东”、“夺军权”等张贴“打倒周恩来”的反动标语

“红中会”下属组织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战斗队与“夺军权”战斗队（队长杨曦光），分别在大街上张贴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与《誓死揪出周恩来的严重声明》，配合北京“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周活动。

“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反周行动，受到了“工联”派的坚决反对。

“湘江风雷”总部即刻发表了《关于不准炮轰周总理的严重声明》。

公开发声明支持“齐卫东”与“夺军权”反周行动的组织，只有大学与中学红卫兵中的一些人数很少的小组织。

“红中会”只发了一个措辞含糊、立场暧昧的声明。

当“工联”方面一旦出来反击“反周”活动时，“红中会”的其他组织便立即表示了对“齐卫东”与“夺军权”的声援。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由“高校风雷”、“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等25个“湘派”组织公开发表《八·三〇声明》

《八·三〇声明》批评了省革筹小组的人选名单，提出了“誓死揪出‘二月镇反’的黑主帅”的口号，并指责“工联”领导人“修了”、是“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对恢复湖南铁路交通的电话指示

总理办公室秘书周家炳同志来电

黎原同志即转胡勇、叶东初二同志并湖南省筹备小组、铁道部、军管会并告长沙北站“工联”、“湘江风雷”两派负责同志：

九月七日九时黎原同志来电收到，中央对京广线湖南段，铁路运输中断四天极为关切。

现责成湖南省筹备小组、“工联”、“湘江风雷”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立即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八月十日发布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和“九·五”命令，无条件的立即恢复湖南段的铁路交通。

对两派之间的问题，希望根据以下原则通过谈判解决：

一、必须坚决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坚决制止铁路局、站和铁路沿线一切武斗。

二、已经夺取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一律封存，限期收回，不得用于任何一派的武斗。

三、铁路局内两派争论，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能跟局外单位进行相互联系。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视察湖南的指示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开足了政治攻势；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

毛主席说：湘潭的经验很好。

毛主席还说：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起来造反。

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

毛主席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人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

毛主席回忆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些行会思想，怕乡里人返城，那时候入会每个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内战问题时，有人反映有的组织大，认为人多就要以他为中心，

主席说：那也不一定。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抢枪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把枪发给了造反派了嘛。

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武装保护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

主席说：“这也是一条经验。”

谈到极“左”思潮时，

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

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

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

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姓万的（指万达）吗？

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

主席说：等一段嘛。

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

主席说：解放军有五不了（指原来的四不加上不拿枪）。现在四十七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四十七军大军嘛。

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

主席说：大师傅也不是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

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道：那一年我到湘潭，地委有个王治国，现在他在那里？

华国锋汇报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

主席说：为什么要斗的那么厉害呢？我知道他身体不很好嘛，他有高血压。

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到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

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少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作田吗？

（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说：过去搞精简，搞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这证明以后可以精简。）

谈到公检法的问题时，

主席说：过去好象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

谈到干部问题时，

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搞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

主席又说：以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的时候，

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过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湖南红旗军问题时，

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

（张春桥插话：林彪同志去年批过一个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

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时，

主席说：临时领导小组在九、十月份搞起来。

（张春桥插话：江西也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情况很好。）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

主席说：都要作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是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过去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

（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

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

谈到抢枪时，

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就有××万条枪。

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

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主席在视察中的指示

杨成武、张春桥同志说：毛主席最近在视察中，反复讲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大联合问题。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两大派呢！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多作自我批评，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主席反复讲：要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团结，特别是工人内部，上海是大联合的高潮，国庆节前就搞好，大联合过国庆。

二、正确对待干部。

毛主席说：不要搞武斗，批判斗争会要搞文斗，不要搞武斗。犯了错误的检讨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头了，不要侮辱。

主席还说：人家犯了错误就够苦了，你们还要过火，不要好象不武斗一下就不革命。

张春桥同志说：上海斗争陈丕显的时候拍了电视，主席看了。陈讲话时，很多人插话，

主席说：会上要允许本人讲话，允许本人申辩。

陈再道被斗得很厉害，

主席知道后说：不要这样搞。

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主席对站出来的干部很重视。上海局以上的干部站出百分之六十，山本站出来百分之二十，河北站出来的很少，只有百分之几，

主席说：将来还是要大翻案的。对干部，除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做过一些好事嘛！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为什么群众对干部不满呢？主要原因：1、政治原因，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作风原因，因为他们当官作老爷，不平等待人。

三、主席很关心造反派。

主席说：“对造反派也要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年青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

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

目前主要危险是极“左”思潮，当然也要注意右的方面。极“左”表现三个方面：1、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炮轰总理）；2、分裂人民解放军；3、有些地方分裂革命委员会。

反对极“左”了，不要极右了。要加强教育，扩大教育面，不要扩大打击面。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断铁路、断邮电、抢枪支，正好是暴露它。暴露了，才好解决。这是最高指示。长沙一中八个人，要反映情况提出只能给戚本禹同志说，这显然不是青年的问题，而是有人在挑拨，我们不去责怪他们。我要戚本禹同志见见他们，戚本禹同志不见。谢若冰打电话，都说老实话，年青人有点骄，免不了。湖南是很重要的地区，不是主席指示，我能随便说？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反映。革筹小组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是：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梗、胡勇、唐忠富。朱顺祥，有的同志不同意，还可以商量。

革筹小组的组成，除已定的三人外，军队无意见。对万达的意见，向主席报告。万不参加小组，至少让他参加工作。给他亮相和考验的机会。能站出来，就结合。万与张、王不同。推荐新干部，要报告，现在不能回答。“湘江风雷”三人已定（叶卫东、谢若冰、张楚梗）。“工联”，胡勇、唐忠富，对朱顺祥有意见，可另外推选。革筹小组随时可扩大，代表提议地区两派参加，将来做到每派各五名，双方各留二名空额，当前，地区主要是回去把各地搞好。回去报名单来，即可宣布成立。

革筹小组重要，但当前更重要的是文攻武卫指挥部。长沙、株洲交通要畅通。要有秩序。制止乱抢枪。

吴自立这些家伙已经垮了，不要去责备那一方。小将上了当，我们老头子还上当嘛？刘少奇、彭真唱双簧，骗了人嘛！不要去责

备小将。他们七月十八日听蔡爱卿讲话，觉察出了嘛，这是好事、应该欢迎。

长沙、株洲是中心地区，要稳定，无论如何不要打“内战”。

地区代表在长沙多留几天看看，不要成立监督小组。岳阳可搞文攻武卫指挥分部，在省文攻武卫指挥部之下，配合行动。衡阳、株洲也可以搞。中心地区稳下来，下一步是解放湘潭的问题。湘潭现在被坏人挑动，打击造反派。他们枪多，不可怕，进行政治攻势。延吉五座大楼都收回来了，最后两个，进行政治攻势，走出来二千多人，有一千多支枪。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不会怎么样，容易瓦解。他们要打，军队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学射击。

湖南还打算派个调查组去。

回去就成立革筹小组，特别是文攻武卫指挥部，开始办公。

首先，中心地区一稳，再解决湘潭问题。随后，从常德、邵阳向西伸，黔阳可以后推一步。郴州、邵阳推向零陵。主要是两派长期合作，戴利提消灭两派，提得太早。要经过一个友好合作，统一行动，共同对付路线斗争，将来才能矛盾统一，才能使其它十个军分区的造反派占优势。回去后，最关键的几件事：成立革筹小组，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搞好两派合作，逐步解决地区问题。其它是次要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主持长沙政局的 47 军研究收枪问题。

会议认为散失到社会上的枪支两万多支，子弹几千万发。只收回五千多支，子弹 70 万发。其中，工联派上缴 2000 多支，湘江风雷上缴 100 多支，其他组织上交 1400 多支。

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在“东方红总部”举行的有 20 个“湘派”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并确定了“省无联”的《成立公告》，并议定了 10 月 11 日召开“省无联”成立大会。

在《成立公告》上署名名的 20 个组织是：

湘江风雷（以张家政为首的“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

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

湖南红旗军（复员军人组织，领导人为毕建）

长沙农联，
东方红总部，
青年近卫军（中学生、社会青年、青年工人混合组成）
湖南省红工会
省直联络站（省级党政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
长沙财联
长沙虎山行
体委红旗
北区工联
红导弹
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周国辉）
矿冶井冈山公社（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张玉纲）
师院《永卫东》兵团
红中会（长沙中学生造反组织，领导人为孙学申）
红专会
九中《重上井冈山》

其中，“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等，是或成员人数众多、或影响较大的社会性群众造反组织，而“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长沙虎山行，矿冶井冈山公社，九中《重上井冈山》”等，却不过是一些工厂或学校内部的小小组织，在社会上并无多大声望，成员人数有的仅仅只几个人（如九中《重上井冈山》）。

后来，“长沙工人”、“长沙农联”等组织发表声明，不承认签署了《九·三〇声明》，而以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总部也在11月24日发声明，对“省无联”不予承认；“青年近卫军”则干脆又参加了省革筹小组领导的“工代会筹备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郑波等同志交给总理一份目前湖南情况的材料，总理接过材料看到材料上写的湘南几个县乱杀人的情况时，

问：杀了这么多人，准不准确？

答：准确，有这么多。

总理：保守派这么猖狂，你们造反派还不联合起来，我真替你们着急。别的地方，有的是保守派垮了，两派才会打起内战来。你们怎么搞的？湖南还乱的不够呀！

什么怀疑，你们就是互相不信任，互相不服气，就想以我为核心，这是派性。湘南杀这么多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保守派还这么猖狂，常德还没有完全解决吧？湘潭还解决得比较好。高司都回来了，你们还放心？你们还打内战，我真不理解你们是怎么想的！蔡爱卿，中央决定你们回去就要逮捕的，你们回去二十天还是一个半月才逮捕的，还让他活动。三四一事件（八月十日）蔡在工院是确实的，为什么要保他，清清楚楚是坏人。为什么不把蔡抓起来？象这样的黑手，在别的地方早就自己把他抓起来了，你们那里为什么不愿意和他一刀两断呢？

“五·一六”极“左”思潮影响到长沙很深，你们这样是搞不好文化大革命的，你们要上当的。有坏人在挑拨你们，为什么愿意受人家挑拨蒙蔽你们呢？长沙保守派还这样活跃，你们还不联合，我只能说你们不自觉，只能这样说。

吴自立是彭的爪牙，蔡爱卿与吴自立又打得火热。蔡爱卿骗了青年近卫军，将他们经过上海绕弯子送到北京，在北京萧华还接见了。蔡爱卿与吴自立攻守同盟，要夺军权。长沙造反派心理状态没有完全解决。当前提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解决问题，这是极“左”思潮。

许世友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是非常感激的，就是因为这个口号（揪军内一小撮）提错了，到处抓一小撮，广州抓黄永胜、南京抓许世友……湖南抓龙书金，我们说一旦有事，我们还要这些人带兵上战场的，龙书金同志还是要当司令员的。龙书金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打仗是很勇敢的。蔡爱卿这种人才是真正要打倒的。军区内现在搞得很乱，原来我们只叫司、政、后机关搞四大，但是有些基层单位也搞了，战士也有些走了，湖南军区现在完全瘫痪了，

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干校就很好。校内搞四大，校外搞支左，听中央的话，讲政策。工程兵学院就不对头了，你们不要因为他们有些人极“左”，你们就支持他，不让他们外出串连，他就是出去。工程兵学院不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的话怎么行！要他们不要那样介入，他们就是没执行。

高司这个组织能不能存在，不能这么说，不能用强制命令的方式取消，要看你们工作做得怎么样，如果你们采取正确的方针，你扩大了，他就小了。采取压的办法是压不垮的。决不要自封为核心，凡是以我为核心的结果都不能成为核心，都失败。有人提出要以左派为核心，这话听起来很对，但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是左派，别人是“保守派”、“中间派”，都右了、修了。

现在的极“左”思潮方向是不对的，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我们中央常委与文革就是在一起办公的，有事请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有人要用显微镜找中央的空子。还有的把矛头对准解放军，这都是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极“左”思潮，长沙是有他一定市场的，你们应该引起警惕，你们自己起来批判他，自己起来纠正错误，是可以纠正的。我们中央工作的同志有责任提醒你们，你们懂得了，改了就行了。

他们利用宣传的错误到处散布“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和“战争解决问题”，这完全是反动的嘛！武装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打谁？当然这次我们批判极“左”思潮，也不准老保翻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五·一六”极“左”思潮是完全错误的，批判极“左”思潮能说高司就对了吗？张平化就对了吗？不是，还是错的。“二·四”批示是文革起草的，但没叫捉那么多人嘛！不能说你们批判极“左”，你们就“右”了，而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批“左”的。

你们有一些组织发表的九·三〇声明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是极“左”思潮，不能以我为核心，不能以为自己革命，不能自封为坚定的左派，别人都说成“修”了、“右”了。十一号开这么一个会，这就是单方面的嘛！你们这样搞要走向反面，你们开这样的会闹分裂，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省无联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月，红中会长沙一中夺军权一兵（杨曦光）《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

去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思想界比较活跃，但有人写《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重建马列主义小组》《废除官僚机构》及批判现存国家机器，分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文章，就立即遭到了疯狂的围剿。今年四月江青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北京的中学四三派有几个激进分子根据这一思想写了篇《论新思潮》也被一片批判反动思潮的叫声所淹没，可见毛泽东主义这种新思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思想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前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推翻新生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整套理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说明了建立毛泽东主义的政党的萌芽——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必要性。

推翻中国的新生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官僚机构的统治——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纲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林彪接见黎原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

林副主席说，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台有国民党，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

湖南问题很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常常不和平，问题都多。象新疆、西藏，都有问题。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

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这条黑线很长。

有三条黑线：

第一条黑线，是国民党黑线。和平解放的，有××、×××、××、×××的部下。这条黑线是起作用的。

第二条黑线，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也是起作用的。

第三条黑线，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

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运动中暴露暴露是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中钻，如蔡爱卿就是一个。

总理：基层是好的，可以平反，总部不能再恢复，基层可以参加大联合。过去我说调查，是调查原红旗军领导人和北京红旗军的联系。调查不调查，总部都不能恢复。你们明确告诉他们，总部不能恢复。

汇报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

总理：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汇报到“高司”问题。

总理：“高司”不能再成立了。它的基层组织——战斗队，如果承认了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尊重造反派的领导，也可以参加联合。但必须是真正承认了错误。要作好造反派的工作，团结大多数。人家错了，改正就好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黎原在传达林彪和周恩来对湖南指示的大会上的讲话

这股反动的极“左”思潮，分裂和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革命大批判和革命大联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革命的新秩序；极力鼓吹“抓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刮经济主义风，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闹翻案风，让牛鬼蛇神打着“造反”的旗帜，进行阶级报复。极“左”思潮的实质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和极“左”思潮的斗争，其实质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

我们队伍中还有一些同志，对批判极“左”思潮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1. 有的说，现在不应该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

2. 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打击革命小将”，是“想压垮造反派组织”。

3. 有的说，批判极“左”思潮，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狡猾的阶级敌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搞反革命，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猖狂加以反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他硬说是反动路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的，他也说成是反动路线；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方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他硬说这是刘氏反动路线。一句话，就是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硬说成是刘邓反动路线，而加以攻击，打着反对刘邓路线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还造了很多反动舆论，在群众认识上造成了很大混乱，必须澄清。

（一）“革”和“保”的问题。

（二）“反迫害”的问题。

（三）借口反血统论，反对毛主席的阶级论。

目前，在革命群众中，对于抓黑手，揪坏头头，还有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需要加以解决：

①小资产阶级派性。一些人只要派性，不要党性，毫无原则，不讲阶级分析。

②怕自己组织揭出坏头头，揪出黑手，不光彩。

③私心杂念作怪，怕报复，怕“斗不过”，自己吃亏。

④还有些同志认为：“抓坏人，揪黑手，是专政机关的事，是上头的事；我们只管斗走资派”。

⑤有些人耽心在造反派里揪出了黑手和坏头头，会造成“保皇派翻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对四十七军就中央[67]367号通知的请示的回电

一、湖南的高司不同于浙江的红暴，高司的总部不能恢复，要帮助基层组织认识错误，要他们跟造反派搞大联合。

二、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为了更好的搞好大联合，根据上述精神，当前的工作，按原布置不变，要坚定的正确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对于确实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经过认真调查，报军批准。

三、贯彻中央通知，根本的问题是争取、教育、团结能够团结的人，对于与高司同观点的基层组织，应区别对待，对广大群众采取教育团结的政策，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支持他们参加联合，同时下很大的功夫，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造反派，正确处理本单位受蒙蔽的群众，共同搞好大联合、三结合。

四、在做好群众组织工作的同时，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

五、要贯彻中央 12.2 通知，要密切注意动态，警惕敌人从中捣乱，要随时说服群众，就地闹革命，不要随便上访。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湖南省革筹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

1967. 12. 21；中发 [67] 394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并各地方报社：

我们完全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十二月十七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报告的批示，现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希望你们严格遵守执行。

关于毛主席的塑像问题，中央在今年七月十三日已有重要指示，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武装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班领导小组及安徽湖南广东广西等班返省汇报团。

周总理：

现在促进大联合中，又出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是极“左”的，搞分裂；还有一种右的，原来已经瓦解不存在的一些组织要复活，

湖南高司也是这样。我们说，工联和湘江风雷应该联合起来。高司的少数头头跟当时的军区犯了方向错误，送枪对左派群众很大打击，如益阳、常德、湘潭都是。这样跨行业的组织不行，但他在学校、工厂、机关中的基层组织要欢迎他们参加大联合。

不能因中央批语，把过去跟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跨行业的已经垮了的组织，重新复活。当然，下面基层组织可以参加联合。不能上面重新复活，这样复活就等于把去年党、政走资派所组织的保守组织，官办组织都可以恢复了，比如上海的“赤卫队”，北京

的“捍卫团”。（康生：联合不倒旗，是指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指保守组织。）我们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不是把走资派官办的组织复活起来，不是把受省军区方向路线错误影响深的组织复活起来，如果这样做，这不是走向联合，而是走向分裂，这不是推动革命三结合，而是不可能三结合。这点要说清楚，中央是不能同意的。

还有一种是极“左”，搞分裂的，口号极“左”，实际上本质反动。湖南从湘江风雷中分出来一个组织，自称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叫“省无联”。把叶卫东同志排除在外，把总部砸了，叶卫东同志还受伤了，你们知道吗？（答：知道。韦钦讲了一些情况。）你们湖南内部观点不一致，回去汇报还不成熟。谭辅仁同志，你要他们好好考虑一下。（湘派反映批判极“左”面搞宽了）在群众中批判极“左”思想是对的，但到基础群众组织去抓人是不对的，北京搞“五·一六”我们一再强调只抓少数坏头头和后面的黑手，要自己抓，不要别人抓，不要到对立面去抓人，不要扩大化，也不许右派翻天。湖南批判极“左”思潮，抓人，如果扩大了些，应该纠正。“省无联”认为，中央批准的以黎源同志为首的省革筹小组，是“湖南黑三线的反革命三结合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这个口号是反动的，矛头针对中央的。“省无联”还说什么“批判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这怎么说是反动的呢？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们要打倒中央批准的章伯森、梁春阳、胡勇等同志。这是不对的，他们过去支持过造反派，是革命领导干部。你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在北京搞清楚。

你们学习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林国兴同志来了吗？（林：来了。）一开始我就要你们把张家政吸收到学习班来，你们不同意，这是不好的，他是代表一派嘛，张家政这个人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只要他不反对中央、省革筹小组，我们应该欢迎他到学习班学习。湖南班要把张家政接到学习班来。他在北京等了三个月，你们讨论了五十多天还不解决，我说过好多次没有解决，我是有意见的。（众：张家政还在北京，湖南来了十五人要揪他），来了十五个人，你们要去说服他们，在学习班不要揪，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你们先做十五个人的工作。（有人提出，“省无联”也来了几人学习。）“省无联”

只要他们不在长沙搞分裂，他们可以来学习。湖南晚一点等十天再回去，学习好了再回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全体同志的讲话

康生讲话：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今后还要更好。因为形势大好，敌人感觉他们就要死亡了，狗急跳墙，蹦出来了。在北京出现一个××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他们写了一封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恰恰是十月一日出笼，十月三日北京的“五一六”组织“战马悲鸣”翻印了这个文件。“省无联”的纲领把反革命“非常委员会”那封公开信公开化了，具体化了。

“省无联”的纲领，杨曦光的文章，周国辉的讲演，他们自己被迫把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证明林副主席的话非常英明。在林副主席指示以后，刘、邓、陶的爪牙，公开的。隐蔽的都跳出来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自首分子跳出来了。彭德怀、贺龙的爪牙也都跳出来了。而反革命“非常委员会”的党羽，五一六的党羽，就在你们湖南被迫的跳出来了。这是最大的一桩好事，这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有好处。

这个纲领是一个什么纲领呢？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当代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反对世界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这个纲领不仅反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整个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否定了。

“省无联”的行动纲领。

第一条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动，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些反动的理论家，还跟我们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仅仅这一句话就看出他们是恶毒反对毛主席思想的。他们讲：毛主席的思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时代的思想，仅仅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象周国辉讲的，有人揭发的，说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毛主席的思想比起马列主义是比较古老、陈旧，还是落后的，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进一步充实、提高，才能上升到毛主席思想的新时代。

同志们你不要看他的全部，只看这一句话就知道，他们如何恶毒的反对毛泽东思想。

根据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建国十八年来，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走进或走过资本主义道路。”你们看，这些话真是反动透顶，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说成是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因此那些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要推翻他们所谓的特权阶层，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要国民党、资产阶级复辟。他们疯狂的无耻的发表了这样的宣言，不但是污蔑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还假借反对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我们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污蔑成资本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的国家，毛主席领导的党都说成是特权阶层，看成和赫鲁晓夫的党一样。他们这样攻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权，没有刻骨的仇恨才奇怪呢！（众：呼口号……）这里面没有反革命才怪了！这些刘、邓、彭、贺的小娄罗，国民党的小丑，杰出的“学者”，大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由此得出结论：非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非推翻毛主席领导不可。这些话，就是他们反革命理论的根据。从杨曦光的文章里面看出，他们大概也搜集了一部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的东西。

第三部分，他们对我们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估计。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现在才是刚刚开始，过去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改良主义，自从“省无联”出来以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他们又说：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成绩，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权威的树立。同志们，你们不要被这话蒙蔽。毛主席的权威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吗？我们知道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所共知的。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思想权威才树立，他们被自己的话冲昏了头，既然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是改良主义，怎么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主席的思想权威就不能在他们所说的改良主义中树立，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真是语无伦次。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中，各省的革

命委员会和革筹小组都是改良主义，大家知道各省的问题得到解决都是毛主席解决的（众：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他们拐弯抹角的千方百计的蒙蔽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改良主义，各省的问题解决也说成是改良主义，革筹小组的建立也说成是改良主义，这些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这样一说，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是改良主义？！他们就这样来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众：口号）。

第四部分讲到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对湖南问题所作的指示，江青同志十月十二号的指示。根据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才展开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他们还胡说八道：文化革命总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十一月十二日的指示，预示着政治革命的更大风暴。江青同志指出：文化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他们说：文化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数个地区取得胜利。

“纲领”下面接着说：“林副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首先取得文化革命胜利的希望。应该指出，中央前一时对各省、市问题的表态基调是改良主义的。对湖南的新指示是从改良到彻底革命的转折。我们必须认清这个转折，跟上这个转折。”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湖南取得胜利，周国辉特别发挥了这个理论，说林副主席指出在湖南首先取得胜利，这完全是胡扯。

第五部分：“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把现在的省革筹小组打倒，他们上台，恢复国民党的政权，恢复他们的资本主义。所以说省革筹小组个别的打倒不行，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国家机器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某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他们还说：“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这都是错误的。

第六部分，“机会主义思潮在转折关头表现了更大的危险性，在目前由退却向反攻的转折关头。”据说把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叫做战略退却，这是什么意思呢？红卫兵犯了错误，告诉你们赶快退却，但是到十月十二号就进攻了。他们挖空心思歪曲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十月二十四日的指示，歪曲中

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同志的讲话，目的就是一个，要实现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

第七条，“在转折的关头更表现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他们还引了列宁的一段话，什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实际上他们既有反革命的理论，也有反革命的行动。

陈伯达讲话：

这里边有个人叫周国辉，他说：“他们对我们什么都骂了，就是没有敢说我们是大杂烩。”我今天就敢说：“省无联”就是大杂烩，是反革命的大杂烩！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的大杂烩。对这些社会渣滓，没好多话说的，今天这个大会，就是宣布“省无联”彻底破产的大会！（全场热烈鼓掌，呼口号：揪出“省无联”的坏头头，绞死周国辉！）

不要绞死了，让他反省反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他们总是想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把周恩来同志——我们的周总理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总理大笑说：我是新的资产阶级的总后台，这时江青、伯达等中央首长都笑了，台下群众也都笑了。）总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总理，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总理（众：呼口号：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他们是借反对周总理之名称图搞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鲜的，这不是先在湖南出现的，在北京早就出现了。“五·一六”你们知道吗？就是那样的玩艺，卑鄙无耻。这是将要灭亡阶级的垂死挣扎。

我今天宣布：包括“省无联”在内的许多大杂烩的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省无联”一点无产阶级的东西也没有，是反革命的，参加这个大杂烩的所有组织的群众都应该回到本单位、本机关、本学校、本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我们说凡是要革命的人民，就要从你们的组织中把那些坏家伙揪出来，因为他们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把革命的三结合说成是反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他们要搞反革命三结合，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资产阶级反革命的专政，搞地、富、反、坏、右的专政。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不能存在，那只能是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反革命专政。“省无联”企图搞的那个东西，实际就是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

江青讲话：

我建议要把普通的一般的受蒙蔽的群众，同他那个组织的少数的个别的坏人或者是背后的什么老师，什么后台要有区别。（总理：这一点很重要）不要以为凡是参加了“省无联”都成了坏人，如果这样恐怕不妥当。我觉得这个组织的群众是无罪的。有罪的少数坏头头，但头头不一定是坏人，我们如果不区别对待很容易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这点作为建议提出。我的话如果讲错了希望同志们当面批评。

周总理讲话：

我们对“省无联”也是逐渐发现的。去年十月我在武汉，还有郑波以及省革筹小组的其他同志也在，听他们说成立“省无联”这样一个跨行业的组织，中央提出是按部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说，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我们还劝说“湘江风雷”按行业、按部门组织不要跨行业。当时“高司”提出要翻案，我认为“高司”不要再恢复了，基层单位认识错误好的可以联合。当时只是看到这样一个问题。“省无联”还把我的这段话说成是“逆流”。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不管哪一个省都要宣布：不要跨行业的组织。

我对“省无联”的情况知道不多，直到这次郑波同志带来各种观点的人，包括“省无联”和持“省无联”观点的人收到了一些材料，听了几方面的意见，认识才清楚，发现“省无联”的纲领是反动的。象刚才上面几个同志所说的那样是反革命纲领。我觉得省革筹小组对他们不是压得太厉害，而是不够警惕，提的不高。这样的反动东西还公开演说，出报纸，他们的纲领贴在大街上，公布于众！江青同志说得对，既然跳出来就要批判。不要只看到公开出来活动的这些人，对他们幕前幕后的黑手要有足够的认识，既然跳出来了，就坚决批臭。使我们更愤慨的是他们利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十年前的《湘江评论》名字，把发刊词上的几句话也用在上面。这个《湘江评论》怎么能够承认？他已经出了四期，从去年十

一月一日出版到现在已八十多天了，我们才发觉，说明我们落后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刚才康生、伯达同志又对“省无联”的纲领一一加以批驳，他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反毛主席的，反马列主义的。他们的话几乎跟台湾蒋介石、苏联修正主义、美帝国主义差不多，把我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成是毛、林派，这话跟台湾说的、莫斯科说的、美帝国主义说的又有什么区别？说什么他们“省无联”是响当当的毛、林派？

他们要打倒革命委员会，把我们各省的革命委员会也骂了，谢富治同志是北京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同志是上海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骂了，说成是改良主义的产物。真是反动到了极点。这完全是反对江青同志“九·五”讲话。

他们又说要砸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怎么样评价建国十七年来的问题。他们把我们在座的（指中央首长）都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那么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置于何地？我们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领导下的红色政权，只是受到刘、邓的干扰，那不是主流，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有今天。不仅十七年来是如此，五十年来也是如此，从“五·四”运动，毛主席的思想在地球上继承了马列主义以后，在革命斗争中，发芽、成长、壮大起来了，并超过了前人。因为时代发展了嘛，后人总是超过前人的，可是他们还要从现在开始进行串联，同那些少数懂得一点毛泽东思想的人重新建党、建军。这些家伙要建他们的党、建他们的军，建他们的反动理论。他们的文章有个题目叫做“中国向何处去？”（姚文元：中国当然是搞社会主义，怎么讲向何处去？）那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读读就行了。

他们说，要取得革命的真正彻底的胜利，就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以要重新进行阶级分析，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这实际上是他们把毛主席的话加以歪曲。林副主席说，湖南和长沙还没有乱透，“三条黑线”没有全暴露出来。“省无联”借此就否定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省革筹小组，并把其他各省的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都说成是改良主义的，把毛主席领导下的大多数干部说成是新的资产

阶级贵族，要推翻五十年的历史，砸烂旧的国家机器，重新组织国家机构，以此蒙蔽一些群众跟着他们走。我想只要我们把这些情况跟参加“省无联”的讲清楚，大多数人是会退出来的，今天在坐的也有参加“省无联”的组织，你们还会跟他们走下去吗？（参加无联组织的人答：不会！）写这个文章并不是杨曦光的手笔，思想也不是他的，很清楚，幕前幕后有黑手组织，这需要你们回去搞清楚，不要只看到表面这几个人，还有的藏在暗地里，表面上这几个人多数是一时走错了路，说错了话，（康老：这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夺军权”，你们问他向谁夺军权，向林副主席、毛主席夺军权？向人民夺军权？）（江青：用夺军权这样的名字，就是错误的，他们来领导人民解放军，他们来掌握军权，见他的鬼去吧！）

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在六零年才真正在林副主席的领导下，从六零年以后我们的军队才是保卫社会主义的；又说：三分之二的军权没有掌握在林副主席手里。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的林副主席从井冈山起，一直就没有离开部队，指挥着部队。去年是建军四十周年，他们把我们有四十年历史的解放军也否定了。我们提出三相信、三依靠，第二条就讲的是人民解放军，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解放军搞乱。

包括“省无联”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到底是怎么错的，把问题揭露出来，分清是非。参加“省无联”的组织，如“高校风雷”、“一中夺军权”、“矿冶井冈山公社”、“省直联络站”等等，自己组织检查，找出自己组织中的坏人。

湖南产生了一些极“左”思潮，康老说是极反思潮。（康老：是极反思潮。江青：是极右思潮。）实际上是形“左”实右。在你们那里复课闹革命，根本没有搞，你们要知道复课闹革命是当前学校的中心任务，大方向。只有那些极“左”思潮的人才说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现在已经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时候了。你们要促进省革筹小组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促进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的召开。不管是学校、工厂都要回到本单位去，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推动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康生接见湖南省革筹在京成员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核心组的讲话

群众组织叫“夺军权”，毛主席的军权，只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反革命才要夺这个军权。明明是革命群众组织叫“夺军权”，还打出招牌，公开的还有那样多的反动纲领，杨曦光的反动文章，周国辉的反动报告，《湘江评论》一期一期的那样出，非常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受不到严重打击。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什么问题？有的同志说原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伟大的党，为什么在长沙有市场？这样为什么不造成混乱呢？道理的确是总理讲的。革筹小组应该深思一下，四十七军的同志，你们也应该深思一下。我感到革筹小组也好，四十七军也好，面临那样反动的东西，除了这次××（编者注：应指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同志来才看到这样的东西，我们从电报上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这东西很不平常。阶级立场、敌我界线模糊。由于划不清，因此，批判软弱无力。那方面那样的猖狂，如果我们阶级观念不明确，文化大革命怎么能搞好呢？阶级斗争怎么能搞好呢？群众为什么不混乱呢！

但不要走极端，不要随便捉人，要区别对待。省无联内部有老造反派。群众还是受蒙蔽的，应该区别对待，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大家都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争取他，如何团结他。一个办法是因为有老造反派，因为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我们就不敢尖锐地批评他们的反动纲领和行动，又怕“投鼠忌器”，这样手就软了，心就软了，怕把群众赶跑了。这样是否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不是争取群众的办法。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指出他们的纲领、行动的极端反动，使他们猛然醒觉，反戈一击。我们照顾到受蒙蔽，但我们立场不明确，如何促进他们的觉悟？群众和头头要划清楚，不要故意的都去捉人，这方面我们批评了“省无联”，是因为他们犯错误了。现在轮着你们犯错误了。如果是本组织搞的，那允许罗！不必那么急，何必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呢？×××同志耽心也就是这个问题吧！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杨曦光的一封信

一·二四证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只老三，还有比他厉害多的中国最大的党阀，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杨曦光《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办法应该改变》

几天的事变正是在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上深刻地教育了革命人民，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不讲道理，仗势欺人，残酷无情地打击每一颗革命的幼苗。对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估价决不能太低，应当肯定一点，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然是少数，以前我们承认全国各地现在是资产阶级篡权，但是对于中央的情况想得很少，认为那当然是毛主席占优势，忘记了“中央和地方，中央为主”，以前湖南的造反派只仇恨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是一个没有一点反革命理论水平的家伙，刘少奇的倒台只是搞掉了一个慈禧太妃，整个资产阶级在中央的政权没根本触动，刘少奇被揪出是上层人物活动的结果，这一点就很说明问题。敌人还有一整套班子，既然他们是一个阶级，揪出一批人对他们的政权不能起根本的影响。我们曾经说过，要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对中央每一个人用无产阶级的冷静眼光去审查，但是我们从前只审查了周恩来等少数人，其他人的面目因不太清楚就不去仔细考虑了。而这一次，由于湖南革命势力的强大和先进，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一人出面就把革命力量镇压下去，于是，整个中央的负责人几乎都在反革命大镇压时，在湖南人民面前亮相了，革命人民开了眼界，这一次大镇压，使湖南的革命势力从山脚下走到了山坡上，原来我们的敌人不只周恩来，还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有一整套班子。二月份全国规模镇压革命力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更重要的一部份，原来在湖南人民面前是隐蔽的，尤其是康生之流，以其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骗取了不少的善良人们的信任。而这次，这个隐蔽部份也暴露了，先进的革命人民立刻应该从最进的事变去引导中间群众和不觉悟份子，使他们冷静地估计中央政权的情况。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长沙一中“夺军权”钢 812 分队杨曦光刘小兵《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

一·二四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国际工运史上，一种崭新的思潮被苏联修正主义的“共运”在中国的代言人第一次承认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

新思潮在湖南形成一种政治势力构成了对中国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致命威胁。

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康生。冷静地考虑中央机构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教训。毛主席在中央仍然是少数，这就是结论。

敌人把新思潮和省无联联在一起也正说明了新思潮本质上代表着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九六八年二月，“省无联”被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令取缔。

在批“省无联”时发生抓捕打骂、私设公堂、揪斗游街、人格侮辱等种种侵犯人权之行为。

一九六八年二月，张家政、杨曦光等人被捕入狱。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中央领导人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

3月30日，在中央高层接见赴北京汇报的湖南省革筹成员时，

江青说“你们那里‘高司’闹得很凶，完全是右倾翻案风！”

她还说：张平化在东北就是一贯大反林彪同志的，以后又紧跟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张平化这个人可谓至死不悔改。我一想起张平化就恨，想不到张平化这个人这样恶劣，恶劣极了。他的一贯表现说明了他的本质。根据我们的经验，像这样的人，历史上不会没问题。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旬，有人为长沙红中会翻案

“3·30”讲话传达后不久，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红卫兵”（也是“高校风雷”成员）的金胜利，在五一广场贴出大字报，宣称：中学生是湖南造反派的先锋，“红中会”更是先锋中的先锋，“借批省无联镇压造反派”就是从打击红中会开始；而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必须解放“红中会”。与此同时，一中红卫兵余大川、张麓泉也表示了相同观点。为了组织反右倾翻案风的队伍，余大川以一中红造会“3·30”战团为核心，成立了长沙市中学红代会“3·30”联络站（简称红“3·30”），主要吸收“红中

会”、“井冈山”和其他“湘派”红卫兵参加，余大川任一把手，李亚雄、汤建平、吴春林均参与决策。

一九六九年十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省无联”结案

张家政（湘江风雷第二号头头）被判 20 年

宋绍文（省文艺界红造团）判 15 年

毕健（湖南红旗军）判 10 年

杨曦光（红中会）判 10 年

周国辉（高校风雷）判 7 年

张玉纲（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判 3 年

李仲昆（湘江风雷）等人，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监管。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各单位，一大批“省无联”旗号下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以及那些“黑手”，也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押、判刑、批斗。

（1980 年代初，出狱几年后的几名当年的大学生、中学生，就自己因文章因言论而被治罪的问题，先后向省与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要求平反的申诉。胡耀邦批示：省无联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1981 年，根据最高法院的指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省无联”有关人员的案件，撤消了“反革命罪”，除个别人因要对某武斗事件负责而仍须获罪以外，大部分人都宣告无罪。

同时，湖南省委也作出了决定，认为文革中对“省无联”这样的群众造反组织却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是错误的，是不实之词，因此，予以平反，撤消原定性结论。

杨曦光起初得到的改判，是“免于刑事处分”。杨曦光不服，继续申诉。1983 年，湖南高级法院再次复审，改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是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省高级法院的这个改判，在报送省委后，始终没有批复。）

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长沙市工代会召开，“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等工人组织均解散，统一到“长沙工代会”里。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

退周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06；中发〔68〕56号

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名单。

中央热烈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又一次的伟大胜利。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地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层层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地深入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充份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王任重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批透批臭。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要充份揭露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

湖南省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发扬和推广“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所获得的经验。要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经常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进一步展开拥军爱民的运动，民拥军，军爱民，继续巩固军民之间的团结。巩固各部队之间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中央希望：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使革命和生产都获得新的丰收，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五、湖南的反三右一风与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一九六八年四、五月，“工联”派中的梁春阳、尚春仁（省委机关永向东）、刘炎生（建湘瓷厂）、余信谦（新华印刷厂）、周国强（市总工会）等联合原“湘江风雷”主要头头叶卫东，根据中央“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3·30指示”，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宣称华、胡、唐等应对湖南发生的右倾翻案风负责。

而唐、胡等则指责梁、尚、叶、周等搞分裂，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站在梁、尚一边的红“3·30”和紧跟唐、胡的中学红代会领导层（原“8·19造反有理军”为主），都派员调查“右倾翻案”的情况，双方一出长沙，观点就一致，不管到汨罗、醴陵，都对当地右倾翻案严重无异议。而一回到长沙，双方就意见相左，你说我“右倾翻案”，我说你“炮打新生红色政权”。

实际上，在一些市县确实存在右倾翻案的问题。由于一些人思想上的派性并未解决，中央“1·24”指示批“省无联”给了

他们一个将对立面除之而后快的大好机会，于是有“无联”批无联，没无联批湘派，湘派也没有则干脆批工派，反正谁的造反色彩浓就批谁。在县一级无联组织可说是寥如晨星（据说耒阳有），故“1·24”后遭打击的县级群众组织头头，实际都是与“省无联”并无多少瓜葛的造反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源，在省革委会二次全会上说：“右倾翻案不是五十三个县，是九十三个县都有。老保翻天是否五十三个？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如是老保掌权，就是砸掉；如是右倾翻案，是反右倾翻案，是补台，不是拆台。全省右倾翻案是严重的。责任在我自己，接受新事物慢，在北京认识不清，回来以后，在第一次全会上认识还不清，听了几十个县的汇报以后，才大吃一惊。”

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

汝城发生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钢去。

叶卫东对徐、王、郑等人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徐、王、郑等人从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返回涟钢

双方发生发生武斗，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续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通知

1968.07.19；中发[68]111号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泽东七月十八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筹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示，现将湖南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七.三”布告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战略部署。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造成浩大的声势，是分清敌我，团结，教育和保护广大革命群众，彻底孤立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望你们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此种宣传，应当同拥军爱民联系起来，同当地开展对敌斗争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同清理本地本单位的阶级队伍，开展革命大批判等项工作结合起来，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新华社及各分社，应及时把各地宣传“七.三”布告情况及问题发表，登内部的《文化革命动向》，不登报。

一九六八年八月，省革委会派出由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团长、“汽电派”工人为主力的“砸烂旧省委兵团”，进驻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办委的具体权力，并将省委机关干部“永向东”组织彻底击溃。

梁春阳、尚春仁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

与“湘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被整肃，受到严厉的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湘瓷派”的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惩处。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胡勇

1968 年国庆节那天，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被周恩来亲自安排，坐于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左向，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六个位置。是当时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农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中，最靠近毛泽东者。

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召见了胡，并与胡谈话数分钟，问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

后因同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进来了，要见毛泽东，这次谈话才可惜被中断了。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胡勇由华国锋与 47 军一位副政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胡勇、唐忠富等人作为代表参加中共党的“九大”。

本来湖南省党的核心小组已决定、并报送中央，湖南的中共中央委员候选人中，胡勇是作为中央委员内定人选的。

“九大”期间，毛泽东在问到其家乡情况时，得知胡勇已内定为中央委员时说：“我这个老乡（指胡勇），是不是就不做中央委员算了？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

唐忠富当选中央委员。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概要）

毛主席批示：照办。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

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纪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

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份。

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摇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

附件一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1969.12.18）。

附件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查和处理非法印刷品情况的报告。（1969.12.3）

八、湖南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

一九七〇年春，开始进行“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运动

中央也发出了 1970 年的 3、5、6、号三个文文件，提出对被清查对象“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规定杀人由省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

四项内容中，“一打”则是重点。而这“打击反革命”的“现行”清查对象重点，则又是原来参与过造反派活动的头目与骨干分子。军方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与那些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将原保守派骨干作为依靠对象，利用这次“一打三反”，开始对参加过造反的工人、干部、市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清洗。

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即“一打三反”）办公室，

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湖南省与长沙市的所有原造反派的头头与骨干人员，从已是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至区街小厂、街道居委会中的原造反派负责人，全部被整肃，有少数被枪决者，有相当部分被拘捕入狱，其他大部分则统统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开除，进行批斗，并关进所谓“学习班”予以隔离长达数月、甚至近一年时间的“反省”。

当时，《长沙晚报》的一篇社论中，竟连续提出九个“杀”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长沙市在两个月中，一连杀了两批后，第三批待宣判拟枪决的名单，也已发至基层讨论。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在这次宣判大会欲召开的前一天夜晚，突然下令制止了大会的召开。准备参加大会的人，也连夜被通知会议改期。紧接着中央发布了17号文件，以“杀、关、管”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才慢慢冷了下来。

1970年，谢若冰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她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她在四人帮垮台后，没有陷入其他那些当年的造反派战友们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一名电脑工程师的资格。她现在是一家大型电脑软件公司的老总。）

青年近卫军司令谭海清，因一件涉嫌要他负责的、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一件虐杀“俘虏”致死命案，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拘押，关了近十年，后判了七年刑。（出狱后，谭海清便以开饭店谋生。后又开办过公司经商，稍有成就，于1997年去世。）

一九七一年夏天，“清查5·16分子运动”又接踵而来

原造反派成员再次遭到审查、清算、批斗，直至“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才获人身自由。

随后的几年，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就象文革前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一样，在政治上遭到了歧视。

九、湖南的批林整风与“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二年十月，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卜占亚（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一职仍由已调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兼着），因与林彪集团有牵连，被中央撤消一切职务，进行审查。

一九七二年底开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风”运动，便演变为了“批林、批卜”运动。

市“工代会”办公室，渐渐成为造反派们悄悄串连聚会的场所，一些原来有着省或市的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身份的造反派头

头的工人，也不时地出现在这儿，向到场的造反派们传递有关“批林、批卜”的信息，并发布一些秘密行动指令。

大字报也上街了，主题是批判卜占亚与景林，称他们为林彪路线的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一九七三年三月，张平化又被重新派回湖南任省委书记，主持工作。

贴在了市委大楼外墙上一份名为“怎么办？”的长篇论文大字报，当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每天都有几千人围观，并且还得到许多观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报实际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担任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的一份进言，向张反映长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情况，并希望张平化能解决造反派受压的处境。

一九七三年底，闹平反的纪某被法院判了二年刑

长沙市有一些人在争取“要平反”而闹造反，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姓纪的工人，在一家区办工厂工作，是一个老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但是，在造反派头头们的默许下，被公安部门以扰乱社会的罪名逮捕起来了，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山头”。纪某还被法院判了二年刑。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工代会的一些领导人传达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

他说：“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

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强调指出：对于“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研究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提出：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

一九七四年二月，中央任命唐忠富担任中共省委常委，胡勇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

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副书记。

长沙市委、长沙市商业局党委发下文件，对××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或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

一九七四年三月，唐忠富提出：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

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

不久，有人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长沙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这些标语，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覆盖或撕毁。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这些以“穷志诚”名义进行的活动。

一九七四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研究，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作组织准备。

一九七四年八月底，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八条”指示

此后，对原造反派头头平反、提干、入党的活动基本上停止了。

十、湖南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六年春季，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原造反派头头与骨干成员，在中央“批邓反右”运动的指示动员下，以省、市总工会为大本营，发动了向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批判。

一九七六年二月，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陈大为家多次秘密开会，

张厚在会上说：“我看这次不会错，要干一起干，要错错在一起，要打屁股打我的，打老唐的”。

胡勇在会上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猻不散”。

接着，胡勇又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召集开会，他说“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

一九七六年二月，胡勇邵阳的谢智峰、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意识形态上搞赢等于零，我们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

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的讲话，回湖南后进行了广泛传达

他说：“我这回心中有数了。”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卒子，死不回头”。

一九七六年三月，胡勇与唐忠富将邵阳的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召来长沙，由唐忠富传达了江青对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谈话

胡勇接着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把运动搞起来，“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唐忠富向《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李千峰汇报情况

他指出：湖南右倾翻案风严重，“执行邓的东西”，“整班子，批派性”把“新干部”搞下去了，并要李千峰写信给鲁瑛，要求鲁瑛转递材料。

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信，寄给鲁瑛，信中说：省委某些负责人“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叶卫东在省总工会礼堂召开的所谓“新干部座谈会”上说：“张平化是什么人？”“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提出“要同张平化对着干！”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研究工作

建议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组织路线问题”。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唐忠富与叶卫等人在省总工会部署工作

确定由叶卫东和雷志忠带领当时的部分省革委委员，找省委领导汇报。唐忠富说：“要斗字当头，撕下脸皮”，“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要行使权力”，“你们去找省委，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只有内外配合起来了，斗争才有力量”。

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和十二日，叶卫东和雷志忠带领一些人，两次找省委负责人，要求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召开全会。

但遭到省委一些负责人的反对，建议未能实现。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共同策划对抗湖南省委不同意召开“五·二五”大会的指示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促转弯子”万人大会

唐忠富、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以省、市总工会的名义，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了有邵阳等地、市来人参加的“促转弯子”万人大会

大会发表的公开信和批判发言中，指出：省委某些负责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声明要同这些人“坚决斗争到底”。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继续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促转弯子”万人大会，

唐忠富还对来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地、市总工会的负责人说：“你们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把顽固分子的威风打下去”。“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

叶卫东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

在唐忠富等人的影响下，邵阳、衡阳、黔阳等一些地区的运动陆续开展起来。

“六·四”大会后，并组织了二百三十辆汽车上街，进行宣传。

省市总工会还计划在十月十一日再在省委大院召开类似的大会。因发生十月政变而被迫终止。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唐忠富与胡勇指派刘正良等三人去北京直接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

由金祖敏把他们编写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转给了清华大学的领导人迟群，揭露省委一些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胡勇、叶卫东带领一批人到株洲

胡勇、叶卫东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

一九七六年六月底、七月初，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要叶卫东等人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

唐忠富对刘正良、焦佩伟等人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用评他讲话的形式向群众公开”，文章要“按打倒的调子

写”。先后写出了五篇“评张平化六. 二一讲话”，已铅印散发了“一评”。

这些文章指出：张平化、张立宪、万达、于明涛等人是“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其实质就是复辟派专了革命派的政，右派专左派的政，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犯下了新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叶卫东在市总工会召开的省、市工会负责人碰头会上说：“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同意打倒张平化！”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一些人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把矛头指向反击右倾翻案风。

唐忠富指出：这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与张厚、雷志忠策划调了民兵把邵阳来的这些人包围在省委大院。

二十日清晨，唐忠富、张厚等又增调了民兵共达一千多人。唐忠富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

张厚亲临现场，说：“老子不当书记，当农民也要干”。

双方发生武斗，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到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议上，揭露张平化的老底，

他说：“张平化在各个关键时刻，都与毛主席的路线唱对台戏，我们要下决心同他斗争到底。”“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亲自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到北京汇报情况

唐忠富多次对同去的人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让张平化主持湖南工作是不行的，对张平化就是要打倒，打不倒也要赶跑。”

唐忠富在准备的“汇报提纲”中，指出：省委及其负责人“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支持纵容打砸抢”，“大造反革命舆论”。

同时，唐忠富还要求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加紧工作：“你们在家闹得越大，我就在这里越坐得住。”

去前，张厚积极参与策划，并说：“你们到北京后，中央首长接见时，需要我来的话，我也来”。

唐忠富等人上京后，张厚要他们克服困难，耐心等待。

八月十七日，唐忠富、雷志忠来信给张厚等人，信中说：湖南要大搞。要继续抓住张平化不放。张厚看信后表态同意，并将信转交胡勇，要胡看后烧掉。

一九七六年八月中旬，胡勇派陈克昌去北京同唐忠富商量整顿民兵组织的问题。

唐忠富说：“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去年把我们的人赶出未了，现在可以把赶出来的人再组织起来开进去，把领导权夺过来。”

唐忠富为此写了信给张厚和胡勇。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经长沙市委书记张厚同意，朱香桂等人组织一百多人接管长沙市民兵指挥部

张厚确定朱香桂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并责令其负责起草解决民兵指挥部问题的方案。

一九七六年九月，叶卫东提出“对张平化的斗争要升级，要打倒”，

十一、十月政变后对革命派的镇压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唐忠富、胡勇、张厚、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张厚说这是“右派政变”。

唐忠富说：“十·六事件”是“右派政变”。

胡勇在会上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

会上提出“要分别找一些头头通气，要捆紧把子。”还议论过准备“上山打游击”，“要注意上海、辽宁的动向”等等。

会后，唐忠富找叶卫东秘密串连，告知了会议的内容。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受到审查

这些人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少则半年一年，多则数年的审查，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有的被逮捕，大部分的则被关到同样没有自由的单位“学习班”，接受清查。

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叶卫东被正式通知“离职审查”

在离职审查期间，叶卫东仍坚持自己的立场，在室内墙上刻写“尸骨未寒、杀妻杀子”，“右派政变”，“极右政变实可诛”等。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叶卫东被宣布拘留

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叶卫东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胡勇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唐忠富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原长沙市委书记张厚被正式通知逮捕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叶卫东由省人民检察院移交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对叶卫东起诉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胡勇由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移交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对唐忠富起诉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长沙市人民法院对胡勇在进行了公开审理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唐忠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出狱后，他也办过一段实业工厂，1997年病故。）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82)刑一字第2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叶卫东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82)刑一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勇犯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叶卫东不服，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被告人没有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为理由，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一九八二年六月，胡勇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没有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为由，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张厚被移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审查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张厚被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长沙市人民法院起诉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驳回叶卫东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0号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判决。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驳回胡勇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3号判处被告人胡勇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刑事判决。

(出狱后，已过55岁的他，曾办过一段工厂实业，后经商办过公司。)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厚进行了公开审理。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以“被告人张厚身为负责干部，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机，卖身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进行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确认被告人张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考虑到被告人张厚过去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被捕以后，对其所犯罪行有所认识”，判处张厚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一九八四年三月，原省委书记章伯森，被定为“三种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

经数年各种形式的关押审查后，湖南所有各级其他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有一批被定为“三种人”，大部份的档案结论，则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犯有政治错误”，并明令，对这些人一律不准提拔、重用，不能入党，不准进入党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梯队人选……。

贰、本节简论

湖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平化，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湖南的报纸一直没有转载。“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湖南省委积极派出工作组大抓“三家村”、“小邓拓”。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张平化上调中央主管宣传部的工作。长沙发生“八·一九事件”，九月初，张平化主动请求回湖南“请罪、造反”。不久，听到“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风声，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向全省干部作“抓黑鬼”的报告。十月，他又作检讨。以后被中央保护起来。一九七三年，张平化又被派回湖南担任一把手，他又干了不少坏事。十月政变后，张平化被华国锋调到中央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在批“凡是派”中，张平化没有紧跟邓小平，被打入冷宫。以后就再也没有翻身了。据说，他写有回忆录，至今没有见到。不知他在去见马克思前是否有所悔悟？！

二、湖南抓“湘江风雷”的头头，是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的。这个错误当然要由中央文革小组负主要责任。但湖南省军区负责人也难辞其咎。而“高司”派的群众则是受了蒙蔽。大家都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三、湖南道县一九六七年八月发生的大屠杀事件，确是一件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

这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与文化大革命有牵连，但主要并不是因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武斗，更不是革命造反派杀人。这件事的发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极少数坏人利用了当时的特殊条件，煽动起了一些群众的仇怨情绪、无政府主义思潮。

事件发生不久，中央得知情况后即指示四十七军派出部队，长沙等地的革命造反派也派出人员，到当地制止这种违法犯罪的屠杀行为。

有的人企图利用这一事件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徒劳的。

四、湖南的“省无联”和极左派思潮在全国也具有典型性和尖端性。

“省无联”的纲领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

它们的纲领说：

“推翻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他们构成了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砸烂为资产阶级特权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都基本只是资本主义的。”

“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序幕，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政权仍然落在官僚们手中。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

“今年五月以来全国各地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是大规模的政治革命所必然引起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所必须的暴力革命。”

它们所要推翻的所谓“特权阶层”，就是指的我国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它们所要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就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而且它们是要用国内战争、“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

判定这样的纲领是极左思潮、极右思潮、形左实右的思潮，难道说不对吗？

还可以看看海外的民运分子们是怎样赞扬这种思潮的：

“如果认真地阅读一下杨曦光执笔的《中国向何处去》、《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

及相关的〈我们的纲领〉等文，便不难明白：这些文章尽管运用的还都^①是钦定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义，但它的理论分析已形成了一种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意识形态，它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一种全面的反对整个中共体制的激进倾向，尤其是以它为代表的“新思潮”以反对文革中在一月夺权中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的政体形式为直接号召，以“中华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式的新的民主政体为奋斗目标，对处于文革暴风骤雨中的群众运动，会带来极大的煽动性并进而造成不可控制性，最终必将形成对整个中共所代表的制度（不管是“文革派还是“政府派”）的挑战与威胁。”

“透视一下省无联们的理论追求，也不难发现为康生所指责的“极右实质”。当杨曦光们把90%的共产党干部作为一个腐朽的，应当被推翻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把毛泽东及“文革派”夺权后的“革委会”说成是“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时，省无联已完全走到了整个中共制度——包括政府派和文革派——的对立面，这时，尽管幼稚的杨曦光们憧憬的政体只是一种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权，但对中共来说，自然是极端的反革命的，是必然通向多元政治或资产阶级民主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省无联的极“左”思潮给中国文革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璞玉含沙，良莠混杂的思想史料。”

有的人试图把“省无联”与极左思潮分开，把头头们作的报告、写的文章说成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与“省无联”没有关系。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它明明标的是“省无联”的“纲领”、“决定”，怎么能与省无联分开呢？如果说不是由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集体决定的，就不能算是这个组织的东西，那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也并没有发表声明否认这些纲领、决定！

历史条件是不能任意套用的。对当时针对已经变成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国家的政治纲领，教条式地搬用到当时的中国来，就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革命的。

五、一九六八年四、五月湖南开展的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由于看到的材料很少，情况不明。但是，第一，湖南在建立县以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由于夹杂了一个批判省无联，许多地方借

此打击革命造反派，由人武部、保守的一派掌权，黎原承认，这样的县多达五十个左右，几乎点了一半。第二，在反右倾翻案风中，夹杂了资产阶级的派性斗争，原造反派中的掌权派与受压派相互指责：一方说掌权派应该对右倾翻案风负责；另一方说受压派是在反革委会。第三，受压派在反右倾翻案风中采取了一些过火的作法，不是补台而是拆台，甚至挑起武斗。第四，掌权派利用中央反武斗的政策，对受压派实施过重的打击。第五，原省委领导人、亮相干部华国锋等人在支一派、压一派中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六、十月政变后，湖南当局对革命派的镇压，真正做到了“莫须有”。他们把革命干部和群众在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下，开展的各种革命活动，都说成是“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向党组织建议任命某些人担任省委副书记、省委常委，怎么就是“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后来，中央不是也任命了这些人担任省委常委、委员职务吗？

批评某些省委负责人的错误，向中央汇报材料，怎么就是“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难道说赵平化、李平化又成了党的化身？

2011年11月16日修改

第四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群众夺省委走资派的权，遭到朱声达等人的镇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银川市革命造反派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宣布夺了省委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窃踞的宁夏自治区党、政、财、交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宁夏军区发表声明支持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联委会游行，要部队支持他们。

张怀礼提意见出兵支持联委会，朱声达坚决反对，以后几次批评张，要张检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甘春雷讲话，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是假夺权，甘和杨、马关系很密切，没有划清界限。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张怀礼回军区汇报工作，从那天起不叫他去联委会，就断绝了关系。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朱声达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军区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军区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

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

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

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

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

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

无理查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

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擅自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革命造反派，发表了“三·七”声明。

军区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

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一九六七年三月，军区对“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

一九六七年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锋、杨静仁、马玉槐在一九六〇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

军区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进行压制。

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朱声达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二、朱声达等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七年四月以来，军区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一九六七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宁夏军区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竟采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朱声达在军内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一九六七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宁夏军区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康健民到宁夏，朱声达、江对康说：如果中央决定说我们支持错了，我们组织服从，思想不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关于银川新华社事件的指示

五月卅日在银川发生的捣毁宁夏新华分社、抢劫新华分社的机密文件和其他物资，并殴打新华社记者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点政治事件。宁夏自治区军区有责任保护新华分社的正常工作和记者的人身安全。为此，责成宁夏军区负责处理这一事件：

1. 把这次闹事的头头抓起来，审查处理。
2. 把抢走的全部文件和物资负责追回。
3. 由军区负责把这一事件调查清楚，依法论处。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朱声达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

朱声达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市发生了“六·一九”武斗事件，

朱声达等认为是“反革命叛乱”，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

一九六七年六月，“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朱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嘴山、吴忠的经验。

一九六七年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朱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朱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朱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七年，中央在 222 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宁夏军区拒绝检查、处理。

社会上出现了“222 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 222 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军区党委会上，马克传达了冼政委的指示，没有认真讨论，实际上是朱声达没有从思想上转过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朱声达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积极为“筹

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永宁发生“八·八”武斗事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吴忠发生“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惨遭杀害。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派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朱声达竟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三、中央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解决宁夏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宁夏军区在北京办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康生李天焕接见宁夏军区代表时的谈话

康生说：

你们说人家是假夺权，实际上你们是假支持。

你们那一套不是支左，是发武器镇压造反派。你是给群众发枪，让群众打革命造反派。

这个领导小组怎么成立，怎么决定的，还是你独断决定的。你这个领导小组，实际上就是叫执行你的反动路线的人，接你的班，你把你那里看成一个独立王国，不是中央不告诉你们，而是你们拒绝，反抗中央的指示，问题的性质就是这样的。独立师的同志也要检查，难道中央的指示你们一点都不知道，你们的电报转来了，那是朱声达想通过你们压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你可以把副司令软禁起来。

我要求你们三条：一、犯了错误就承认，就改；二、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不要跟着犯下去；三、犯错误，要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公告

一、我们坚定地认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二、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三、朱声达所犯的严重错误，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

四、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公告

一、坚决拥护八月十八日兰州军区公告

二、自即日起，我们宣布收回“二·一一”声明和“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坚决地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

三、我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压制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犯了方向、路线、立场的错误。

四、我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是铸成我们支左方向、路线错误，破坏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五、我们自即日起，撤销对《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的支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

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革联筹）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

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指挥部）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的谈话

康生说：

去吴忠谈判的是那个团？告诉他们谈判的态度不对，他们（指筹备处）是犯错误的，要求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不能与解放军平起平坐，告诉他们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一八六团谈判态度太软弱，我们解放军与他搞重庆谈判是不行的。告诉他们，是犯了错误，不是革命行动。见到他们就说他们是受了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害，教育他们改正错误，不要抵抗中央的指示。（张怀礼：看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好！让他们搞！（此时康老很气愤）如果这样搞性质就变了，就镇压！他们有本事就让他们使，什么本事都使出来。看人武部、朱声达有多大的罪恶。当然还是要做思想工作，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八六团要做大量的政治工作，进行政治攻势，揭露朱声达的问题，大量散发传单，（张怀礼：他们把传单都撕了）不会完全撕的，（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让他打！让他打！不怕打。广大群众是懂道理的，是会接受教育的，还可以派宣传车去。

六十二师前指的王仅说：一八六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他们想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还骂我们……。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独立师二团第一批回去了，第二批没去成。一、三团比较好，比较稳定。吴忠巴塘农场一个连参与了，一个战士还上车检查我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夜，总理亲自给冼恒汉打电话，

总理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洗恒汉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会，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洗恒汉打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

洗恒汉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

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指示主要精神如下：

一、宁夏“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杨、马黑帮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声达之流的黑指示，拒绝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

二、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吴忠革命造反派（吴忠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压垮后，又从永宁、灵武、小坝等地调兵遣将，动用武力，大规模地围攻，镇压青铜峡的革命左派组织（青

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惨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人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三、破坏铁路,切断交通,使北京至兰州的火车,银川至固原的汽车,长期不能通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四、矛头指向解放军,阻拦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围攻解放军驻地,抢夺解放军武器,绑架解放军,明目张胆地向解放军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

五、煽动农民不交公粮,抢劫国家资产和人民群众私人财物。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康生李天焕对宁夏军区及宁夏总指挥部代表的谈话

康生说:

中央、中央文革认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的形势,象宁夏把杨马揪出来了,朱声达的反动路线也被揭露啦,当然还没有揭深透,可以说基本上揭出来了,你们可以看出朱声达反革命的面目,反党反毛主席的丑恶面目,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正在觉醒,军区和独立师的干部、战士已经开始觉醒,朱声达的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暴露之后,很快就陷于土崩瓦解,这就是看出反动路线是怎样见不得太阳。六十二师部队进驻宁夏后,解决了青铜峡的问题。吴忠虽然部队到的晚了,造反派受了些损失,但以后还是进去了,做了很多工作。永宁的问题,只要坚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也会很快解决的。因此,宁夏问题不难解决,形势会很快更加大好起来。

你们在北京不请示中央,做这个做那个,要加以警惕,不要搞宗派,中央正在解决宁夏问题,你们还在那里另搞一套,串连了一千多个单位。

武汉事件后,我们报纸上有个口号是错误的,就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不对。

对筹备处要把头头和群众分开,对那种杀人头头要惩办,对群众要教育要争取,对吴忠反革命头头要逮捕法办,对受蒙蔽的群众要做工作。对永宁人武部要指出他们是错误的,他们的错误主要由朱声达来负,人武部也有责任。

青铜峡的反击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照样办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康生接见宁夏三派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时的讲话

康生说：

宁夏问题，中央解决的步骤是先解决军区问题，军区问题是关键问题，朱声达长期顽固地对抗中央指示，中央绝不允许这样做的。朱声达对中央的手段很恶劣，我们军区的同志也好，群众组织的同志也好，都要揭发。宁夏的问题主要在杨、马。杨、马敢那样，也是有朱支持。朱声达在长时期里，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因此这次开会首先解决军区问题。

宁夏武斗正厉害，特别是吴忠指挥部被围剿，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受到摧残，在这个时候，叫筹备处来开会，是向总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的。总指挥部和筹备处进行武斗，给中央解决宁夏问题造成许多困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康生接见宁夏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总指挥部和三司在银川还有冲突，还有武斗，还有打、砸、抢。

现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七个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就是北京、上海、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青海，市里还有个青岛。另外，有些省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比如说象河南、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内蒙、四川、甘肃这八个地方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在银川，有些县，全面恶毒地向中央攻击，挑拨离间，制造谣言。有的人，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查去了。还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

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

这种人有三种：第一种是敌人、特务。第二种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种，就是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影响的人。

第二个问题，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重要条件，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同那些企图动摇、干扰、瓦解人民解放军的，和他们坚决斗争。

党中央下决心，将六十二师两个团调到银川去，到吴忠去，到青铜峡去，到永宁去。这是毛主席对宁夏人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在宁夏，出现了“打倒洗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

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在会前，我接到了给我的一封信，用筹备处的名义，是宁夏大联合筹备处赴京代表团在六七年九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是对准六十二师，你们把青铜峡事件称做你们的“革命事件”。我还接到永宁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团九月十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同样矛头对准六十二师。

宁夏宁总司、宁三司要特别注意。他们现在，还企图挑拨民族关系，说青铜峡镇压少数民族。在八·八、八·一三吴忠事件以后，固原一带，少数隐蔽的回民中的反动派，暗藏的特务在跃跃欲动，直到六十二师进驻了银川、吴忠、青铜峡、永宁以后，才把那里的局面稳定了。但是今天筹备处的一些坏头头，还向那里集中，向那里去挑拨。这一点，要特别引起警惕。宁夏过去有个反刘格平的民族主义那么一件事，有的同志受过冤枉，受过处分，判过刑，开除过党籍，所以对杨马，以及对这一事件的主持人，抱极大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分清是非，予以平反。这一点，总指挥部的同志们要体贴宁总司、宁三司同志们的心情。当然，我不是说宁总司、宁三司就完全对了，矛头就对准了朱声达，对准杨马了，我也值得深思。总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要实事求是。

第三个问题，从江青同志的讲话中，你们就听到，必须巩固、扩大，发展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绝不能干扰、动摇新生的红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型。

在这里，我向宁三司、宁总司的同志解释一下，原来会议想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朱声达的反动路线问题，第二个是解决指挥部与筹备处的武斗问题。据我们所知，宁总司、宁三司基本上没有参加武斗。因此开始宁总司、宁三司的代表少一些，你们不要从形式上来看。以后照顾了，你们还有意见！你们没有参加武斗，这方面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你们这个组织同当时直接武斗关系不大，所以开始代表少一些，这里希望同志们了解中央的作法，不要误解，很多省都是这样，要消除这个误解。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第一件就是9月26日，主席接见各地军区在北京解决问题的同志，这件事，我们宁夏军区的同志也参加了，包括朱声达同志。

第二件事，就是在这个期间，同志们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节纪念大会。

第三件事，中央10月7号的通知，这是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所作的重要指示。

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么江青靠边站了。散布那些东西，不仅你们宁夏有，到处都有，青海、内蒙、安徽、河南、江苏也有，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就是妄图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使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在九月间，有一个人，有名有姓，到独立师进行反中央的宣传，挑拨、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他们企图把矛头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我们知道永宁县还有人说毛主席受蒙蔽了，江青靠边站了，说中央有黑线。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犯了错误进行翻

案，其实他们不懂得王力、关锋犯的是什么错误，王力、关锋就是反对我和陈伯达的。他们喊，要打倒洗恒汉，要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去。

朵恩华发言，揭发了朱声达、何其仁和筹备处的一些活动情况
军区稽振华、马林，独立师一团团长王友声揭发了朱声达及何其仁和筹备处参谋团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康生第四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向辉宇在会上揭发了朱声达对抗中央领导同志的罪行。

大联筹马生其系统地揭发了大联筹的问题。

康生说：

国庆节前好多代表团发生了争论，河南同志，不是代表，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何运洪，李寿涛也去天安门观礼，武汉也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陈再道、钟汉华等 12 人去天安门观礼，说服也不行。但是，我们还是说服了那些同志，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政策，如果不让去，就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生第五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商金仓就朱声达如何把手伸进大联合筹备处的问题做了揭发。

马子明揭发到张号从贺兰山下来传达了参谋团的停止生产、布置武斗的指示。

张艺系统地揭露了朱声达与反革命修正分子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保护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张元树谈到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五卅事件”、对抗中央 222 号文件；揭发有人造谣说谢副总理说，宁夏和新疆问题很复杂，中央不急于表态。

张德贵揭发朱声达造谣“2·11”声明是经过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批准了的；谈到何其仁策划让筹备处派一个女同志扮做单玉虎的老婆；谈到朱声达策划筹备处派十一人上高级党校去揪张

文林，目的在于打击总指挥部；谈到吴忠人武部、筹备处派大批农民阻挡 8048 部队到吴忠执行支左任务。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康生第六次接见宁夏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筹备处代表陈万福谈了朱声达蒙蔽群众以及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策划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一些情况：筹备处准备把铁路桥梁炸毁，让中央听到响声，知道他们是造反派；用炮打总指挥部的驻地；李剑白说：“你在前面指挥，我当后台”；朱声达派解放军到各单位宣传反对一·二七夺权。

王希年揭发了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吴忠八·一三事件和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罪行：讲到朱声达手段阴险，制造上述事件时不是开会布置，而是在下面密谋策划；筹备处派到各地的高参都用代号不用真名。

62 师后勤部付部长王锦借助《青铜峡反革命事件示意图》详细地揭露了青铜峡反革命叛乱的问题。

洗恒汉同志说：“康老让我讲一讲青铜峡事件的情况。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 62 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 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 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 日早晨 5 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康老插话：“解放军忍

耐到8月28号五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62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我就是讲这一个事，我就讲到这里。”

康老接着说：

“这一点，通过陈万福同志，特别是王希年同志的讲话就更清楚了。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正象冼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8月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应该由杨、马及朱声达的反动路线负责。宁夏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特点，和各地不同，因为筹备处的行动完全是从军区朱声达等人以及杨一木、马信等人直接操纵的，而且是在每个方面都派上去指挥的。象陈万福同志讲的，直接操纵他，做他的后台的李剑白，李是什么人？

（答：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噢，是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还有个叫宋长胜的，（王希年答：是宁夏军区转业干部）噢！宋长胜也是军区刚转业的干部。李剑白讲他是后台，可是他本身还不是筹备处的人。可见在宁夏筹备处里边，许多地方，无论是工人、学生、农民，不仅走资派直接指挥，甚至还派他们的干部直接操纵。甚至筹备处代表团副团长就是青铜峡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做群众组织的代表，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有些是筹备处服务小组（即核心小组）的同志，如马生其，朵恩华，朵恩华搞的是机要通讯，有的是直接指挥青铜峡事件的，如马子明、陈万福、王希年，他们揭发了问题。我们很欢迎。

陶泊表示要向中央低头认罪，交待问题，并谈了朱声达和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的某些活动：朱声达对抗117号文件，（指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朱声达说周总理派人来宁夏秘密调查石嘴山的武斗；何其仁上贺兰山和筹备处各处参谋团策划阴谋；何其仁传达说毛主席有个最新指示是“开快车，要翻车，要勤打招呼”。

康老说：

“这个问题我同同志们讲一下，主席说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主席是讲过的，因为当时还有反对兰州军区，反对张达志和冼恒汉同志的，主席才讲了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你刚才讲的，是中央文革根据主席所讲的，说兰州军区对青海赵永夫的问题的处理，对甘肃詹大南的问题的处理，对宁夏朱声达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没有什么文件。在处理甘肃问题时，文件上有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听取康健民汇报宁夏问题时的讲话

康老几点指示：

一、要深入研究毛主席著作和林付主席的指示。部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领导支左。部队自己，尤其是干部要很好学习。我们文革小组包括周总理在内，实行天天读，每天下午六点到八点。××师和军区要好好掌握，那个地方野战军真正把毛著学好，才能做好支左工作。因为解放军是争取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支柱。宣传毛泽东思想，支左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当前主要学习毛主席三个地区的指示，在全军中进行教育。

二、军队要好好把林付主席“八·九”指示研究一下。对待干部问题，帮助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因此，××师要团结军区、人武部、独立师广大干部和战士，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不要歧视他们，对朱声达错误要批判，但不要整个军区、人武部、独立师都认为有错误，把军区领导与群众，主要干部与一般干部分开。因此，要好好学习“八·九”指示。

三、对群众组织政策要掌握稳。对筹备处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不能压，主席指示已经讲了，要争取教育分化他们。主要问题看到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还有第二个杨、马，主要责任在他们。

四、不断教育群众团体和群众组织，掌握政策。当前部队应去促进大联合。有的以人多以势压人，有的唯我独左，叫他们好好看看毛主席的指示，要各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没有这一条不行。要真正以斗私批修为纲，天天把主席的东西看一看。……有的违背主席指示，要耐心地进行政策教育。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巩固起来，倒旗联合。你们情况不错，开始别要求那么高，一步

一步来。不愿倒旗也可以。联合小组这个形式很好。有些问题摆一下也好。要作自我批评，要联合。抓毛著学习和学习班。有这个基础联合小组可以扩大一点，好像一个协商会议。不赞成的问题摆一下。干部也是一样，大家赞成的就三结合，不赞成的就摆。不要你打我保，你保我打。群众不要有这个思想，一个干部不好，这个组织就垮了。不要受人挑拨。甘春雷即使结合错了，群众组织还是革命组织。以群众为主嘛。群众从这里解放出来。需要增加信心，自己独立思考。你是主体嘛。宁夏这个问题比较深，离了干部不行。

还有工人工作比较落实一些。各地都是工人落实好，工人总是比较先进的。哪个地方工人领导学生就好，哪个地方学生领导工人就差，就出问题。

一、筹备处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不是搞重庆谈判，是受教育。

二、加强宣传，报纸、电台、宣传车，对中央首长关于宁夏问题的谈话、兰州军区公告，要反复宣传，把有线广播搞起来（特别是电台有线广播）。

三、不要抓头头，抓来要放。

四、适当的分发武器，要武装造反派，如果他们对银川进行反扑，坚决自卫。

五、筹备处破坏铁路，康老很生气，把朱声达叫去训一顿。这是反革命事件。

六、第三势力对自己参加谈判的代表数量少，他们很有意见，中央说可以考虑。

七、继续用飞机散发传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以朱声达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

一、追随和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

要对象。但是，我们在朱声达同志的错误领导下，违反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认敌为友，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朱声达同志自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一九六〇年，朱积极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的罪刑活动，充当了迫害大批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帮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马为了保自己，勾结朱声达同志，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扼杀革命。在革命群众起来造杨、马的反的时候，朱却在军内外大肆吹捧杨是“红司令”、“好书记”，欺骗蒙蔽群众。朱还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措施，压制革命群众造杨、马的反。今年二月，军区发表声明，撤销对“一·二七”夺权的支持，朱声达同志还散布说：“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三月又压制广大革命群众揭露汪、杨、马等在一九六〇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并且颠倒黑白，把群众这一革命行动说成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由于朱声达同志长期以来和杨、马互相勾结，同流合污，而党委常委其他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同杨、马划清界限，对朱声达同志的错误没有进行抵制，以致使我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指示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要保护左派”。而朱声达等同志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迫于形势，表示了支持，但是，由于朱声达等同志的立场没有转变，玩弄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夸大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把这次夺权定为“假夺权”、“右派篡权”、“资本主义复辟”。二月十一日，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接着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等单位。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

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组织武装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无理查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朱声达等同志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当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后，朱声达同志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当石嘴山市发生了“六·一九”武斗事件后，朱声达等同志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由于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以及军区党委个别同志的煽动和暗示，有的人武部的某些同志便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的形式发给了“筹备处”，个别县人武部的领导人甚至参与了谋划和指挥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活动。少数坏头头利用这种情况，策动受蒙蔽的群众，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接着又有计划、有组织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中央派往宁夏支左部队，制造了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事件。

在军内朱声达同志也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有些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时，朱声达等同志用种种借口进行压制，以致挑动群众，围斗、殴打一些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在军区内部一度造成了白色恐怖的气氛。

三、顽固坚持错误，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

朱声达同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

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宁夏新华分社被抢事件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宁夏日报》印刷厂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发生严重政治错误的指示中，都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而我们既不认真检查又不严肃处理，朱声达等同志甚至公然表示抗拒。对于在军内外出现的诬蔑中央这一指示的流言蜚语，我们采取了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

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我们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同志竟采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朱声达竟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上述事实说明，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朱声达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军区广大指战员和专职武装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主要应由我们承担。那些受蒙蔽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他们站错了队，也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对我的严重罪过，作如下检讨。

一、同杨静仁、马玉槐相互勾结，保护一小撮走资派

我自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早在一九六零年就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充当了迫害刘格平、王志强、马思义等大批革命干部和很多无辜群众的帮凶，得到了汪锋“司令挂帅，作战有方”的表扬。

对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的迫害，我负有更大的责任。很早我就对他歧视、排挤，企图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因此，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汪锋提出要斗争马思义，我积极支持，把他的一些缺点错误硬往纲上拉，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思义同志较早地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我又指使把他的档案公布于社会，挑起了受蒙

蔽群众对他的气愤，致使在吴忠“八·一三”事件中惨遭杀害，这是我欠下的血债之一。由于我对杨静仁积极追随，一味崇拜，所以杨利用我的弱点，封官许愿，要我担任书记处书记，妄图实现他控制军队，搞个人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竭力吹捧、保护杨、马一小撮走资派，忠实地执行他们的黑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群众炮轰区党委，杨静仁为保他自己，急忙召开黑会，要常委表态。我在会上吹捧杨静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抓阶级斗争好”，“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搞的有成绩”。回军区后，我还向机关干部传播了这些错误论调，并在军内外大讲杨静仁是“红司令”，“好书记”为保杨静仁制造舆论。此后，在兰州军区四干会上，我还极力为杨涂脂抹粉，在西北几个省区部队中造成极坏影响。

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执行杨、马的黑指示，抽调了十七名干部参加了地方工作组；杨、马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把银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帮等四人非法逮捕，交军区看管，要我负责审理，我欣然接受，充当了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帮凶；八月，杨为了阻止革命小将串连，要军区以战备名义控制地方运输车辆，我趁部队调动之机，调动了地方汽车三十六辆，破坏了革命串连；为压制革命群众进城造区党委的反，我还专门布置要农建十三师、军马场、区体委等单位搞正面教育，不要开大会，上街游行；九月，区党委机关瘫痪后，杨、马要军区给他反映情况，我通过派便衣、编简报等方式为杨、马提供了一些整革命群众的黑名单、黑材料，并根据杨的指示，安装了一部军区直通杨静仁的保密电话；马玉槐为逃避革命群众斗争，先后两次到军区机关和部队躲藏，我都进行了保护。更严重的是我按照马玉槐的黑指示，召开了驻宁部队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了针对革命造反派的所谓“防叛”、“防暴”方案，企图镇压革命群众。与此同时，还将军区机关干部、职工编成战斗分队，发了武器，进行了战备演习。

一九六七年二月，军区错误地撤销对“联委会”夺权的支持后，杨静仁当即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以后他又通过“筹备处”向军区转送了反攻倒算的材料，我既未揭批，也未向上报告。三月，

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杨、马在一九六〇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时，我竟错误地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进行压制。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我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后，我不是积极热情地支持左派，而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充当杨、马代理人，继续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支持这次夺权斗争，也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玩弄了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一方面迫于形势假意支持，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大煽阴风。在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我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遂于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联委”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二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在这两个文件中，把斗争矛头直指“联委会”，大肆欺骗煽动群众，狂妄地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这样，就转移了运动大方向，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在社会上出现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反动逆流。为了从根本上扼杀这次夺权，我还决定强行军管了新生的《宁夏日报》社，区、市公安机关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此后，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接着，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提出了打倒“联委会”、“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制发了大量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传单，大造反动舆论；擅自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

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帮助我改正错误，发表了“三·七”声明。这本来是我认错、改错的机会，但我却更错误地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我不仅对“联委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残酷地打击迫害，而且对同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同时，在军内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我的错误时，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同志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在我的错误路线指导和影响下，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同志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在我推行的反动路线影响下，在我的操纵、欺骗、煽动下，“筹备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加剧。今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我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我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因此，当六月十八日吴忠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事件后，我竟给该人武部打电话鼓励他说：“你们搞的不错，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总结一下经验”。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发生武斗后，我错误地认为是“反革命叛乱”，请示兰州军区调一个团进驻该市，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以后，“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我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

总结石嘴山、吴忠的经验。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我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我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三、反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错误

为了纠正军区的错误，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及兰州军区党委多次给予指示，但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公然采取阳奉阴违，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指示。

今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既未调查处理，又未向中央报告。六月五日中央文革打电话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成军区严肃处理。但我极力包庇、袒护“筹备处”，迟迟不作处理。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我不但不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反而以“我们没有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抵制，致使农民进城围斗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尤为严重的是中央在 222 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

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我仍执迷不悟，拒绝检查、处理。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222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222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我又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以电话、口头、文件等方式，多次指出我们在支左中的错误。对于这些指示，我都以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队干部战士和大批受蒙蔽群众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直至八月来京开会时，我还指示何其仁准备材料，妄图说服中央，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中央批准62师进驻银川等地，我还狂妄地说“这是不相信我，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更是明目张胆地同中央对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

毛泽东：照办。

（一）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周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他们的权。

现在，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宁夏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贯彻执行。

（二）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

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

（三）中央派到宁夏支左的 8037 等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四）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活动。

（五）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李天冲、许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陈养山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中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按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报中央批准后参加。

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逐步地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总指挥部”等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宣读中央决定并解释：

第二条中有三点区别：第一点区别，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是所有的同志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同志是反对他们的错误的，如象张怀礼同志就反对这条路线。还有其他的同志。第二点区别，错误的重要责任在朱声达同志，江波同志也有错误，何其仁同志也有错误，决定上面没有写，这就把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和其他人的错误区别开来。第三点区别，朱声达同志是犯

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有他的书面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这个态度是好的，这就是把朱声达同志过去犯错误和现在愿意改正错误加以区别。

第三条，二十一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得很好，主席表扬过。

六十二师是从甘肃调去的，在兰州大军区的指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稳定了宁夏的混乱局面，在宁夏“三支”、“两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

兰州大军区是中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表扬的，他们在支左中是很有成绩的，中央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无论在解决青海问题，无论在解决甘肃问题，无论在解决宁夏问题，无论在解决陕西的问题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支持。洗恒汉同志是兰州大军区的政委。

第四条后，宁夏这个地区是很重要的地区，一方面靠蒙修，一方面靠苏修，还有马家的残余和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希望同志们要提高敌情观念。

第五条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有

康健民同志，兰州军区的副司令员，

张怀礼同志，宁夏军区的副司令员，

徐洪学同志，621师副师长，

王志强同志，地方干部，回族，过去做过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副主席，银川市委书记，在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受到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支持左派。

李天冲同志，六十二师政委，也是支持你们文化大革命，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命令到宁夏去的。

许仲波同志，炮十五师的政委。

乔克广同志，宁夏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

李江烈同志，自治区高级法院的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缺点，后来很快地支持革命派。

丁毅民同志，回族，受了迫害，开除了党籍八年，还坐过三年牢，原来是在山东的，在地方民族主义还有一点。今天，总理、江青同志也在，中央决定恢复你的党籍，不要什么文件了。

陈养山同志，是一个老同志，开始犯了一些错误，后来改正，群众很谅解。

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大致七个席位。

周总理：

同志们首先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急速大办特办，工厂也办，农村也办，机关、学校也办，街道里弄也办。

第二就是开步走，搞革命的大联合。把群众工作做到家，要赶快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现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已有十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十个是江西，后面还有几个，你们要赶上去，更前进一步嘛！

还有一件事是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陈毅对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的谈话

四、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出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宁夏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驻军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宁夏革筹小组成立以来，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发展。

中央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地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高岗、习仲勋、刘澜涛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揭透，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坚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革命委员会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

惕，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节约闹革命，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掌好权，用好权。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加强集体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实行“精兵简政”，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强指挥部，领导宁夏全区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转发“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召开的，研究了固原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及平叛扩大化等问题。

座谈会提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要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中共中央在批转座谈会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单薄，有的甚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因此应当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五、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

《编号 0 0 1 5 6 5》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作了调查并予以平反。

文件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

关于冼恒汉的审查“结论”说：冼恒汉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

贰、本节简论

宁夏的青铜峡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事件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清楚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

张怀礼：看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他们把传单都撕了。

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

六十二师前指的王仅说：一八六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他们想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还骂我们……。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夜，总理亲自给洗恒汉打电话，总理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洗恒汉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会，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洗恒汉打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

洗恒汉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

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

一、宁夏“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杨、马黑帮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声达之流的黑指示，拒绝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

二、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吴忠革命造反派（吴忠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压垮后，又从永宁、灵武、小坝等地调兵遣将，动用武力，大规模地围攻，镇压青铜峡的革命左派组织（青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惨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人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三、破坏铁路，切断交通，使北京至兰州的火车，银川至固原的汽车，长期不能通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四、矛头指向解放军，阻拦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围攻解放军驻地，抢夺解放军武器，绑架解放军，明目张胆地向解放军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

五、煽动农民不交公粮，抢劫国家资产和人民群众私人财物。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康生接见宁夏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在银川，有些县，全面恶毒地向中央攻击，挑拨离间，制造谣言。有的人，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查去了。还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

中央下决心，将六十二师两个团调到银川去，到吴忠去，到青铜峡去，到永宁去。这是毛主席对宁夏人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在宁夏，出现了“打倒冼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

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么江青靠边站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冼恒汉说：“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 62 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 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 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 日早晨 5 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

康老插话：“解放军忍耐到 8 月 28 号五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 62 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

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正象冼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8月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派野战军到宁夏支左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 2，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发生了青铜峡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并策划炸毁青铜峡大坝的事件。
- 3，宁夏支左小组将情况报告兰州军区，兰州军区当即转报中央。
- 4，周恩来亲自复电冼恒汉；要兰州军区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
- 5，兰州军区提出三点意见报中央，康生受周恩来委托复电兰州军区同意他们提出的意见。兰州军区当即通知宁夏支左小组。
- 6，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

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

7，要当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是完全正确的。各种群众组织都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8，事后，对参与这一事件的群众，除极少数杀人、爆炸的坏分子以外，均可不以“反革命叛乱”论处。

9，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 0 0 1 5 6 5）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作了调查并予以平反。这是出于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考虑，是完全错误的。

10，通知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这是他们一贯不敢正视现实，捏造的说法。对青铜峡事件的性质及采取的措施，明明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并经毛泽东同意的。怎么能说“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呢？！关于洗恒汉的审查“结论”说：洗恒汉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则更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2008 年 7 月 22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9 日修改

第五节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本节概述：

一、支持安徽革命群众批判走资派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日，周恩来接见安徽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你们是来控诉安徽省委以李葆华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你们的压力，犯了罪恶，你们的控诉，我们支持你们！

前一些时期，在合肥、蚌埠、芜湖这些地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强调生产，压制革命，现在是既反对革命又破坏生产，并把革命的锋芒推向上，矛盾上交，他要走开，办法是经济主义，矛盾上交。

要按系统岗位组织起来，譬如学生就以学校为单位，如蚌埠商学院以商学院为单位，合肥农学院以合肥农学院为单位，再联合全市。

至今还没有批准任何全国性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组织。我正式宣布有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我们没有承认，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批准。

现在北京有反动组织，最近破获两个，一个冒充为“全国工农兵红色造反夺权总部”；还有一个“红旗军”，在东北哈尔滨有，北京有，湖南有，最近杭州也有，说这组织是毛主席批准的，根本是造谣。这头子是反动的，逮捕了两个头子，刘沙、胡国光。

北京有西城纠察队，其他还有纠察队，思想变坏，打人杀人。逮捕了一些头子，最近这些青年人受人欺骗，组织了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实际上乱窜，下半夜活动，骑摩托车、自行车、喊反动口号，也要把反动头子逮捕，教育群众。在陕西有个“红色恐怖队”，（西安）。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应派军队支持广大革命群众。请酌处。”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根

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作出了五条指示：

（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

（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

（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

（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的批语：

照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决定。

二、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工人联合委员会等革命组织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由于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遭到了“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一司、工人三司、“红卫军”，“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一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夺权的一派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采取补救措施，而是以对待“一·二六”夺权的态度划线，把反对他们夺权的革命组织和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实行镇压。在安徽各地逮捕了一不少人。对逃跑了的人还发了通缉令。

三月十五日一次武斗就打伤对方几十人。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夺权代表时的讲话

从现在起任何地方，任何省份，任何地、县要到北京来捕人，一定要经中央公安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

不能擅自下通缉令，过去下的通缉令应当取消。

不许对持不同意见的实行镇压逮捕，已逮捕的一般应当立即释放。

不准武斗。

不能随便去制造谣言。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

一、中央认为，应立即成立以钱钧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二、军管会要通过各项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起来，把工农业生产、财贸工作和救灾工作管起来。

四、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

五、立即接管新安徽报。

六、“八·二七”、“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工人一司、三司等，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七、合肥的“红卫军”，是与保字号“军总”对立的革命群众组织。但这种组织形式不恰当，应按中央指示办理，这个组织的成员应回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再恢复这个组织。

八、压制“安徽省暨合肥市机关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是错误的。

九、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应该查清。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康生接见安徽各方代表的讲话

康生宣布并解释解释党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决定。

周恩来讲：希望你们回家后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在中央九条的指导下，允许改正错误，真正揭露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

1967.04.01；中发〔67〕117号

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发给你们。这个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性规定，望各地参照执行。

中央强调指出，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军区和各地驻军，无论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地区、机关和单位，或者在没有实行军事管制的地方，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政治挂帅，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保障更好地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特别注意：

第一，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必须经过中央批准。

第二，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第三，一个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证据确凿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犯罪分子，应依法处理。但是，要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在取缔证据确凿的反动组织时，也要把为首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同一般被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不准对群众组织乱加取缔，更不得采取解放初期对待反动党团组织采取登记骨干分子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不应该也不允许要群众上街、挂牌子、贴大标语、开大会请罪。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调群众请罪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第五，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周恩来对安徽造反派的电话指示

周道元：周总理，我是周道元，是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的。

周总理：你们今天一点钟要开会吗？开什么会？

周道元：开万炮齐轰严光，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

周总理：你们的主题和中央的意见不相同了。怎么能把矛头对准严光呢？这个会不开为好。大字报主要应该对准李葆华。对严光同志的大字报可以送到省军区和军管会，不要满街贴。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安徽合肥四月十六日开追悼大会的问题的指示

安徽省合肥市工人一司并请转告各革命组织：

一、你们要在四月十六日召开十万多人的追悼大会，我们认为这样的追悼大会不宜召开，我们不赞成你们开，现在全国正在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转移斗争大方向，请你们立即说服各革命组织，不要举行这样大规模的追悼大会。

二、我们建议：安徽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注意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安徽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葆华，决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

三、安徽两派同意联合贯彻江青九月五日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央首长首次接见安徽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讲话：安徽有一股力量是反对“九条”、“五条”的，有的是不坚决执行的。省军区就有这样的同志。安徽在7月下旬出现了象武汉“百万雄师”那样的反动口号（指打倒王力、康生、揪出后台等口号）。有些军分区必须悬崖勒马，不准再挑起武斗了！

芜湖联总代表汇报了被三筹处打到外地——南京、上海、合肥、武汉、北京等地联总战士和留芜战士人数，总数约十万人。）

三筹处代表：联总骗人，没有十万。

总理：难道你们没有骗人？你那七万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

康老讲话：曹在凤同志、梁守富同志对6408部队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应当向6408部队赔礼道歉。

江青同志讲话：

现在讲一讲形势问题。我们对形势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因为对形势如果孤立起来看，那当然在某些地区个别地方觉得严重，其实不然，形势从全国来看，从历史来看，如果从历史来看，今年同去年这个时候比较，是不是大不相同了！总的说，我觉得形势是大好的，锻炼青年一代，锻炼了小将们，也锻炼了革命干部。安徽目前的情况比去年大好，现在你们比早一个时期更好。现在各省大体上这样。当然个别地方有反复，反复也是正常的现象。此外不平衡，不平衡也是正常现象。总之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对这个要有以下几个好的条件，就是说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来领导，这是重要条件；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配合全国范围的大批判。

我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好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讲，首先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外，还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还有美国特务、苏修特务、日本、国民党特务等等，他总是要破坏的。

（第一个问题是党中央。）目前拿北京来讲，就有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切不可上当。从右的方面，就是今年一二月间有一股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声明，如果谁要和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要还击。我不是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响应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是指那样的情况。我说是这样的文攻武卫，不要抽掉了它的阶级内容，不要离开它的特定环境和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前一段有错误的口号，叫抓军内一小撮。这就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那么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是不是说军内同志没有错误？我不是这个意思。军队的同志错误缺点是有，应当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作自我批评。

第三、谈革命委员会问题，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目前出来的这股歪风除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针对人民解放军，抓一小撮，第三就是针对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更难免混进一点坏人混进去，但他毕竟是个新生的事物，他是在群众的基础上产生的。现在有这么一股风，有的人就要把中央批准的革命委员会全部搞掉，这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挑动吗？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的指示

九月五日晚，康生、江青、的指示传到合肥，全城沸腾，群情激昂，奔走相告，无不欢欣鼓舞，长江路灯火辉煌，鞭炮齐鸣，表示庆贺目前合肥一派大好形势。

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

二、提高警惕，划清界限，揪出自己组织中的黑后台、坏头头。

三、坚决执行“九·五”命令。

四、人民解放军驻皖部队首先加强了两派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康生接见安徽支左部队有关人员讲话

合肥市听到了江青的讲话，当晚两点就轰动起来了，合肥前一个时期武斗很厉害，今后亦可能为大联合作出模范，要求安徽作出全国大联合的模范。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

1967.09.23；中发〔67〕306号

毛主席批示：

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级军管会、各级军区、各革命群众组织：

现将《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九·五”指示》的一个材料转给你们，供你们参考。

实践证明，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一个地方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尽管在具体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分歧，都是可以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

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希望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向安徽省革命群众学习，大力展开拥军爱民的活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九五”命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张贴）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安徽省七地区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

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德生传达康生对安徽省军管领导小组的指示

李德生说：芜湖出现了反对“九条”，矛头对准中央，有的跑到北京来闹，反陶二世等等。前时候，芜湖来的三个人在中国科学院被群众扭送到海淀区公安局。芜湖军分区的同志叫他们把这三个人放了，现在追回一个，还有两个跑了。芜湖的问题，我们不能看成是一个群众问题，这里面有无黑手，坏人操纵。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同志讲话：

在大好形势下当然也有些逆流。特别在安庆、芜湖、蚌埠有，这种反复是正常的，事情有时候是有规律性的反复。但无论如何怎么反复，中央的方针、中央文革的指示，群众会逐渐了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席号召革命大联合嘛，群众是不赞成现在再分几大派，分裂嘛。这个方针是定了，这个方针是不能变的。所以你们安徽的形势，就象主席最近指示的要防止走资派不甘心失败，垂死挣扎罗，想破坏中央的方针，破坏我们的大联合，破坏安徽的大好形势。

两派性质问题，武斗问题，等等问题，如果按着毛主席的新的指示，看起来容易解决的。就是说，除掉派性，除掉宗派观点，容易解决的。因此，同志们还必须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斗私批修。“私”字，一天不斗，一天还要生长的，所以，从斗私批修，大联合中来看问题。

张春桥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说把八条、“十条”合在一起就提出“拥军爱民”，当时我们重视不够，宣传不够。这次重制录音要在全中国放。

我们部队在执行“八条”时过头了，“十条”下来群众回击了我们一下。“六·六通令”下早了一点，时机不成熟。

“五·一六”只有少数黑手，群众是受蒙蔽的。如果通缉“五·一六”就易造成对立，秦化龙也是群众自己揪出来的一个组织的坏头头，也要依靠群众自己去处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廖容标传达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的指示

中央十月廿六日根据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正式作了批示：

同意安徽省军管会作相应的改组，由李德生同志、张文碧同志、李长林同志、宋佩璋同志、林育生同志、李保奇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和安徽省军区一名（暂缺）组成改组的新的军管会。省军管会由李德生同志为主任委员，张文碧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同志为副主任委员。省军管会改组以后，担负着整个安徽省支左任务。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安徽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毛主席一月二十一日指示，严光、宋文同志并没有真正地执行，毛主席要支左，他们是保右，甚至错误地做出决定，要部队不同“八·二七”革命群众一道读主席的语录，一道唱主席的语录歌。他们甚至通知了李葆华，那就是说象他们自己检讨那样，假支持，真保右。象他们检讨那样，从开始一直到这次会议，他们总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的指示对抗、抵制，所以他们就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他们的这种错误影响了各军分区，这种错误影响了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使安徽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从三月份在这开会时，严光同志同彭胜标同志当时对我们、对中央对他们的批评是不满意的。应当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对他们作到严格批评，《九条》上没有点他们的名，没有明显的指出他们的错误，但他们不满意。严光还企图把党中央同军委隔离开，企图找总参谋

部的人告状，可是他们没有实现。从北京一到南京军区就表现不满意。回到安徽他们并不是真正执行《九条》，教育好派，坚决实行。他们实际上挑动群众对抗《九条》，利用夺权派对中央没有批准他们夺权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这样，引起群众分裂，最后武斗时他们发枪。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自己讲过，是死保李葆华，而且还作了镇压革命群众的作战计划。前一个时期镇压“八·二七”，后一个时期镇压炮轰派。省军区也只是一小撮人反对《九条》；实际上反严光、宋文的，从二、三月间，司、政、后干部、战士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反对他们的。在二、三月间，严光、宋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在省军区打击了一大批干部，二、三百名干部。甚至于有的被开除了党籍，有的禁闭起来，有的流放，有的迫使他们退伍，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一律平反。在中央四月一日《五条》中有一条，给被打错了的人平反。《九条》中间也讲了。严光、宋文对抗这个，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平反。

当时为什么要成立军管会呢？就是中央没有批准夺权，成立军管会就是不承认合肥的那个夺权。为什么叫南京军区钱钧同志去主持军管会，这就是严光、宋文不能主持。改组，说明严光、宋文不能参加军管会，所以新改组的军管会就没有他们。十二军在那里就由十二军统一领导，就不用南京军区再派人去了。

派十二军去安徽支左，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文化大革命的极大的关怀。安徽有些地方有人反对十二军，污蔑十二军是“陶二世”派去的。“陶二世”，这是对我的，这是安徽反革命给我安的帽子，这完全是污蔑，是极大的反革命污蔑！敌人、走资派制造谣言在安徽是“集大成”的。当然其他地方也有造谣的，但安徽是突出的，他们甚至竟敢假造林副主席给陈伯达同志的信，假造陈伯达同志复林副主席的信，在阜阳、涡阳散发。在芜湖、蚌埠、安庆，表现很明显，特别是在芜湖。安徽有人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还要炮轰、打倒周总理，还要打倒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我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还有谢富治，谢富治没有到过安徽，还要打倒，你们想想这是革命行动吗？

好派的李文安同志、李胜利同志，都作了自我检讨，炮轰派也作了自我检讨。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宝贵的，这是符合主席要求的。最近有些地方有些反复，这又说明了什么东西？说明去掉派性，增强党性不是开一次会进行一次自我批评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不时时刻掌握毛泽东思想，时刻掌握中央指示，这种派性它还会发作。

周总理讲话：

江青同志九月五日讲话以后，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了高潮。当天晚上双方传回去，各自将自己的黑手和背后操纵人揪出来。我们觉得这是很大的好事，马上把它通报全国。江青同志九月五号讲话录音，不仅在北京开会的各省代表听，而且在全国各机关、企业、单位、工厂、各学校、部队、公社都放了，就是说江青同志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毛主席司令部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我已经说过，是起到过去的中央书记处而且超过中央书记处的职权。江青同志是代表中央讲的话嘛！

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根据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调十二军来主持安徽的支左工作。就在这次你们开会以前，没有一个野战军在安徽为主力，所以这个决定是我们最高统帅、副统帅决定的，直接跟南京大军区商量，不是调一部分，是全部队，也可以说绝大部分转到以安徽为主，住在安徽支左，来负责军管，推动安徽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运动到了这个阶段，工人阶级是主力军，学生虽然起了突击队的作用，现在拿学生的派性强加于工人阶级，那工人阶级就不能接受了。（呼口号）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希望你们其他的地方，大联合要以工人运动为主，先从工人阶级联合作起，因为安徽许多大中城市，许多工矿企业比较多的地方，还有交通运输，不仅有一个淮南，还有马鞍山，有芜湖，有合肥，有蚌埠等等。这些地方大联合都要以工人为主，这就是说学生不去干扰厂矿工人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嘛。这样学生会受到教育。现在学生应当结合工农，首先是工人。

《九条》、《五条》发表以后，我批评过群众准备开群众大会来斗争严光同志，我们说还是背靠背的揭发，可以揭发，可以写大字

报小字报送去，因为那个时候不到这么个条件嘛！他还是军管会副主任，因为群众大会一批，当然不可能继续工作了。现在情况不同，现在眼光来看前进了嘛！严光、宋文两位同志不管在李葆华的时候，过去在曾希圣的时候，和地方关系搞的久，和走资派关系太密切了，他就要犯严重错误，一直坚持反动路线，一直到《九条》以后还没有改，这次要彻底批判，并且改组军管会，改组军区，这是需要的。要钱钧同志来担任军管会主任，军区没有改变。这次不同了，十二军去了，你们又说“十二军算老几”。十二军是我们统帅、副统帅调去的，主持安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部担负起来，所以改组军管会，也要改组军区。这个事情，我们和南京军区许世友、钱钧同志都商量过的，钱钧同志还回南京军区担任他的职务，不存在《九条》有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对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的批示

《安徽省七地区赴京汇报代表团关于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拥军爱民等问题的协议》很好。这是安徽省革命群众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成果，是坚决捍卫和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五条》决定的重要措施。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这个协议。以“斗私，批修”为纲，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安徽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对驻合肥的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的电话指示

（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劝说无效。怎么办？）

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对驻合肥的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的电话指示

（李德生报告：芜湖“三筹处”的四个组织冲击部队，抢走枪支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

以安徽省军管会的名义向这四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4.14；中发〔68〕61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安徽省军管会四月十日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李德生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廖成美、宋佩璋、李任之、杨效椿、徐文成、张秀英（女）、张家云（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安徽省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一开始就积极投入运动，同刘邓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展开尖锐的斗争。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一日毛主席对安徽驻军作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英明指示，三月底四月初，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自批准了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和五条批示。九月前后，康生同志多次接见了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并作了讲话。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对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不仅引导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且指导了全国的革命斗

争。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辉煌成果，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安徽省的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隐藏在安徽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的命运，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和破坏。这一夥阶级敌人或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或散步流言蜚语，放毒箭搞破坏，或钻进并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如此等等，充份暴露其凶狠、恶毒、狡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安徽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英勇的搏斗，深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及其在安徽代理人李葆华、黄岩等的反革命罪行，揪出了一批叛徒、特务、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揭穿了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安徽部队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的各项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狠抓阶级斗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支左不支派，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促进了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中央希望，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刘邓及其在安徽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警惕，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批倒批臭。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

安徽是我国煤炭钢铁、粮食等工农业生产的重要省分，是我国东南水陆交通运输的要道，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工农业生产，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把安徽省建设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安徽省赴京汇报代表团时的讲话

康生讲话：

不要说谁反对我就打倒谁。在安徽的确有个时期，有的不明真相或受蒙蔽的人写过大字报要打倒我。我正式声明不要提这样的口号。对写过大字报的人不要进行攻击，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希望同志们再三转达我这个心愿。我过去的谈话中对个别同志，个别干部，个别解放军指战员作了些批评，对的，同志们就改正，不对的，请同志们谅解，我是出于对同志们的爱护。话可能讲错，讲过了头，请同志们谅解。

许世友讲话：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们要坚决照办！一百个照办！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口号）我们要好好地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同志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复杂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要坚决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谁反对中央军委就打倒谁！我们解放军，不管任何人都不准讲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军委的

话，谁讲就是犯罪。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的一切一切都要听毛主席的话。一句话，就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

周恩来讲话：

现在安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将近两年了，你们经过了许多次英勇奋斗，许多次激烈斗争，取得了今天的胜利。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值得我们欢迎的，值得我们庆贺的。（口号）这个革命委员会是省的，还需要把各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现在有的已经建立了，有的还没有建立，要把各个工厂、学校、机关、人民公社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要建立革命委员会，首先要联合起来，要联合，就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现在全国各省市已经建立了二十个革命委员会了，你们是第二十一位。我想，虽然你们是名列二十一位，希望你们后来居上。后来居上是指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各派群众组织一定要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跨行业的，象伯达同志说的那样是个大杂烩，那样就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前几天，就是四月八日在长沙，在毛主席的故乡宣布成立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就是在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我相信你们是不甘落后的。你们那里跨行业的组织，通俗地说法就是好派和屁派，用外国字就是C、P，现在大联合了，这些派都不能要了，就是象同志们说的，要做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反革命派。（口号）我们要打倒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要建立我们的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

第二件事，你们报告上写的最高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今天又听到了毛主席的最新的解释，我们的革命委员会，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要吸收很多年青的革命造反派，就是无产阶级左派，朝气蓬勃的干将参加，就是说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还要加上一个朝气蓬勃的。我看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可以说是接近朝气蓬勃的。当然还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一点。

你们革命委员会成员一百五十九名，军队很谦虚，退出了一部分，只有二十四名占百分之十五，革命领导干部三十二名占百分之二十，加在一起占百分之三十五，群众代表九十名占百分之五十七，机动十三名占百分之八，如果机动数里面再有群众代表的话，群众代表就超过百分之六十了。群众组织的代表大多数是二十至三十岁的，少数超过四十岁，从整个比例来看，是青年、中年人多，是有朝气的，希望你们的革命委员会在实践中证明是朝气蓬勃的。

第二个比例，是常委中看老中少的比例。二十九名常委中，五十岁以上的有八人，四十岁以上的八人，四十岁以下的十三人，老的不超过六十，绝大多数是中年、青年。从年龄来看，你们的革命委员会也是有朝气的，当然也还是要通过实践来证明。

还有第三个比例，就是在常委中军队也是很谦虚，只占七名，革命领导干部占十名，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名，占绝大多数。新的血液加入革命委员会，说明这个委员会是实现了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你们革命委员会成员年轻的较多，我们很高兴。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本来你们的常委中女同志很少，当然现在也不多。我们中央文革对别的省也提出过增补女同志，但都比较困难。你们安徽省做了模范。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因为她是女同志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也是支持这个意见的。四月八日那天晚上，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李德生，廖成美同志响应很快，立即打电话回去，马上就增补了女同志。现在已有五名女同志，在副主任中有两位女同志。二十个省市都赶不上你们，你们是后来居上。这是值得祝贺的！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只有一位女同志，谢富治同志也在这里嘛！希望你们安徽在抓机动名额中也注意这个问题。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工厂、学校、机关、农村中很多都是很能干，一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到掌权时就把女同志摆在一旁，这是很不公正的。我接触到很多到北京来的女同志，很能干，但是就是选不上，广州、武汉都有这种情况。你们安徽是第一个赶上来的。占人口一半的劳动妇女不论在工厂、学校、机关、农村都是很能干的，做起事来并不比男同志差。在我们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就是模范。我们的比例也少了，在

座的十二同志中只有二位女同志，只占六分之一，这一点你们也可以批评嘛！

总之，要称得起朝气蓬勃，在军、干、群比例中，群众比例要大；在老中少比例中，中少比例要大；在男女的比例中，女同志不要太少，这样才能使革命委员会气象一新。革命就是要培养接班人，老的当然也要，但是中少要多一点好。要有妇女参加，这样才能区别于旧的政权机构。旧的政权机构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扰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干部政策造成的。现在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全面掌权，革命委员会应当是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朝气蓬勃的。毛主席今天特别提醒这件事。你们首先响应了毛主席这一号召，是特别值得称赞的，特别值得庆贺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文章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我们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即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表现。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们才能在革命的原则下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处理安庆芜湖问题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李德生在安徽省革委会紧急会议上关于安庆问题的讲话

现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正在“反右”这个革命口号下，大做反革命的文章。他们煞费心地编造了一个反动的“主要矛盾转化论”，胡说什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军内掌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矛盾”，他们诬蔑革命委员会是“新的旧秩序”“代替老的旧秩序”，疯狂叫嚷：

“揪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安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滚出省革委会”。他们还恶毒的煽动，要解放军的战士“起来造军内一小撮坏头头的反。”他们还利用“支左不支派”在提法上的不够确切，进行大肆攻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支左不支派”突破。并且扬言，要用枪杆子来批判，用战争来批判。他们提出所谓“四反”“一粉碎”。

定远、凤阳地区的右倾翻案妖风，我们反了；芜湖的右倾分裂主义，右倾翻案黑风，我们反了；安庆的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我们也是反定了。在安庆，确实存在着右倾翻案和右倾分裂两股反动思潮，前一个时期，反对安庆“十条协议”的右倾翻案妖风，和近一个阶段反对安庆两派革命大联合的右倾分裂主义，都比较突出。

长期以来，隐藏在安庆地区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不但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舆论，而且欺骗和蒙蔽了一部分群众，组成专业武斗组织，不断挑起武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仓库、银行、商店，炸毁和烧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了国家大量的粮、钱和物资，炸毁价值三百万元的冷库，以及市交际处大楼、专署大楼、交通局大楼、机电大楼等十多处公共建筑物，油粉厂全部烧光。他们还在华阳垦区一次烧毁国家棉花十七万斤，在宿松抢劫国家银行现款十多万元。许多无辜群众被打死打伤，甚至老太婆、儿童也惨遭杀害。

（二）连续不断冲击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物资，杀伤和殴打解放军指战员。今年以来，先后冲击驻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近八十次，抢走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各种装备物资和干战个人衣物。有的连队被抢劫一空。在冲击部队时，还向部队驻地射击、投弹，用石灰渣和小便在战士头上浇，用木棍、家俱往战士头上砸。在部队厨房水缸里拉大便，在干战耳旁、肩上、头顶鸣枪威胁，绑架部队首长，先后共打伤指战员好几百人，打死四人；仅振风塔反革命事件中，一次就打死解放军二人；连给群众运粮的战士也被枪杀在汽车上。更不能容忍的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下达后，七月五日，一小撮阶级敌人还继续煽

动和蒙蔽部分群众，对军营港务局的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的打、砸、抢、抄、冲，抢走全部武器装备和许多物资；他们连救死扶伤的卫生医疗单位也不放过，七月十七日又煽动二百多人，冲、砸、洗劫驻军卫生队。两次共殴打干战二百多人，十四人重伤住院。

(三) 抢劫车船，私设关卡，中断交通、邮电。破坏国防通讯线路，迟迟不能恢复，使军事指挥受到严重影响。

(四) 抗拒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对抗省革委会关于安庆问题的多次指示，围攻、殴打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年“九·五”命令颁发后第五天，两派上交武器的第三天，一小撮阶级敌人煽动和蒙蔽“红造会”部分群众，公然对抗“九·五”命令、“六·六”通令，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将“联委会”打出城外。今年一小撮阶级敌人又煽动和蒙蔽“联委会”部分群众，制造了“一·二〇”武斗流血事件。

现在已经查明安庆两派都进了坏人，插进了黑手。这些坏人、黑手，是上述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的罪魁祸首的一部分。

原安庆专署专员陈振亚，是个腐化堕落、投敌变节分子，是反革命两面派，是伸进群众组织的黑手。他开始打着支持好派的幌子，在“三·一五夺权”后混进“地革会”当了副主任。以后又跳出来，混进“红造会”，接二连三地“写声明”、“发贺电”挑动群众斗群众，上窜下跳，往来于北京、合肥、安庆之间，做了许多坏事，并把黑手伸到各县，多次召集各县当权派开会，唆使他们支持一方，压制一方，挑动群众斗群众。

原安庆市城建局副局长胡成斌，是蜕化变质分子，曾被开除党籍。去年武斗期间，他担任“联委会”的军事顾问，赤膊上阵，策划和指挥武斗。

原安庆市文教局长兼党委书记张强，是伸进“红造会”的黑手。他组织“干联站”，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直接为“红造会”武斗出谋划策。在“红造会”的一次作战会议上，发表书面讲话说：“在军事上加强防御，主动出击，打乱对方的后方，消耗对方的人力、物力、财力”。

原安庆专署工业局副局长陈良玉，是伸进“联委会”的黑手，担任“联委会”的“政治顾问”，并参与调动岳西农民进安庆城搞武斗。

原安庆专署粮食局副局长徐一美，是伸进“红造会”的黑手，是“干联站”的核心人物。他长期坐镇“红造会”总部，出了许多坏主意，竭力鼓吹“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煽动武斗，制造分裂，恶毒污诬制止武斗协议是“马歇尔计划”，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后，还公开喊叫“我就不怕当刘秀山”。

钻进“红造会”的坏头头马兆国，对抗中央关于航运系统与社会上脱勾的指示，担任武斗组织“工总司”的总头目，指挥武斗。在“工总司”私设刑堂，绑架和毒打我解放军干部战士和无辜群众，把一个农民吊起来活活打死。许司令指示，叫安庆两派代表来合肥协商解决安庆问题，马兆国竟威胁说：“谁去枪毙谁！”“七·三”布告下达后，还煽动和指挥“红造会”部分武斗人员，冲击、打砸、抢劫部队卫生队。

恶霸地主的儿子何守平，是钻进“联委会”的坏头头，是武斗组织“捍卫四大兵团”的总指挥。他参与策划和直接指挥“一·二〇”武斗事件，对抗周总理指示和省军管会通令，连续制造了枪杀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并插手几个县的武斗。

刑满释放分子吴洪杰，是钻进“联委会”的坏头头，是武斗组织“捍卫四大兵团”的参谋长。他积极参与策划和组织指挥“一·二〇”武斗，指挥炸毁价值数百万元的冷藏库等大型建筑物。

钻进“红造会”的坏人孙邦志，是叛徒、巫婆的儿子，是漏网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反动诗，侮辱伟大领袖，泡制《公开信》，散布大量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革命委员会，攻击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言论，对抗中央关于军管公检法与社会脱勾的规定，进行反革命串连，到处作黑报告，煽风点火，干了许多坏事。

安庆长期武斗，与混进军队里的个别坏人插手指挥有关系。一个是安庆市前人武部长徐征法，是好派武斗总指挥，这个人一贯腐化堕落。还有一个是安庆军分区科长杜长信，是“红造会”武斗总

指挥，这个人不是个好家伙，很坏。这两个人我们已经决定把他拘留起来，在部队内部进行批斗。

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转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

1968.08.04；中发〔68〕120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现将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安徽芜湖地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疯狂反扑和绝望挣扎，挑动一部分群众，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和十二军党委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分析了形势，采取了有力措施，特别是他们抓住了“七·三”布告作为强大武器，在全省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宣传“七·三”布告，声讨芜湖地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政治攻势，团结，教育和保护了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揭露和孤立了阶级敌人，迅速稳定了该地区的革命局势。

安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它是推动各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迅猛发展的有力武器，对全国各地都有普遍指导意义。只要把“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宣传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同拥军爱民结合起来，持续地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就能使“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收到立竿见影的

贯彻“九大”精神

一九六九年六月某日，李德生在安徽省三代会常委扩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有的人，不学习中央对总的形势的指示，就是要搞什么“反复旧”。

最近，我们发现有的地区在传达、落实“九大”精神的时候受到了干扰，生产也受到了影响。譬如什么：“反复旧”喽。

当然，有的地方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是有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落实政策来解决嘛！但是，有的地方有的人就借这个机会搞“翻案风”，什么一派掌权喽！下放时你少我多喽！这一派那一派喽！这样搞的不好，又可能出现“一风吹”哩！有人说“群众组织没有权”呀，“群众代表是陪衬”呀，有人说，我们还不如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机关人员还可以开个条子，我们连开个条子的权都没有。有的说：“我们这里已经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了，不需要落实‘九条’‘五条’了。”说“九条”是偏听偏信的东西。说当时在北京汇报时一派的人多，材料多，另一派的材料少，中央没有很好的深入了解情况，“是压出来的”有的小道消息说“九条”是康老一个人搞的，所以安徽就出现有人反康老嘛！

现在的整个形势，是不是一个复旧的形势呢？参加“九大”的同志都知道，“九大”结束后，山东的、湖北的，还有贵州的同志都留下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的形势并不是复旧的形势，但就是非要搞什么“反复旧”。

我们认为“复旧”问题是支流问题，是小问题。“反复旧”是背离了当前我们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团结问题，领导班子问题，发挥“三代会”作用问题，当好群众代表问题：“反复旧”问题，以及“三代会”和革委会的关系问题。当然，要有个重点喽！这中间重点问题是团结问题。

贰、本节简论

安徽省革命造反派夺权也很早（一月二十六日），但是他们是一派夺权，而且对反对他们一派夺权的其他革命造反派实行打击，这样，就不可能得到中央的承认。

在全国第一个实行了军管。军区的个别领导人，在实行军管前就犯有与走资派勾结、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管后又继续坚持错误。

而造反派内部也长期武斗不止。

中央又改组军管会，调十二军到安徽支左，担负起三支、两军的任务。

到一九六八年四月才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又发生了什么问题，情况不清楚。

2011年11月20日修改

第六节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解放军支左，造反派内斗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的文章：《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西北光学仪器厂发生二·一〇事件。两派武斗，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

省军区把这一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

造反派认为，这是省军区和驻军负责人搞的一次“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赴京代表的讲话摘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周恩来对西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学的讲话

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总理传达了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致中央办公厅电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

这里不是回族多的地区，却自上而下的成立了回族革命造反司令部。地委统战部最近还向各县统战部发出通知，要各地党组织研究与拟定支持本县革命回民造反的有效措施，并通知各回民聚居区的党委，坚决贯彻执行。我们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不利于按系统、按部门大联合。应怎样对待这样的组织，请速批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来电的批示

各级党委，各军区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

现将陕西安康地委文革办公室来电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注意这个问题。加强民族政策的教育。

毛主席教导我们：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为了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防止坏人利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纠纷，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区都不宜按民族划分单独成立群众组织，也不要以民族名称命名群众组织。已经成立的这种组织，应劝说他们自动解散。可以自愿参加本单位、本系统的其它革命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报道：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的几段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

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对西安交通大学李世英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西安问题的指示陕西省军区：

陕西省军区：

对西北光学仪器厂二·一〇事件，根据国务院调查和陕西省军区反复调查的材料，中央认为是一个破坏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对逮捕的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应该予以教育释放。二·一〇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两个群众组织都应从中吸取教训，在二·一〇事件中犯了破坏国家财产错误的，应该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陕西省军区在处理二·一〇事件中是有错误的，但不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现在平反是对的，不是为“打、砸、抢翻案”，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径跃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相信他们，如对他们有意见，应实事求是地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米脂县武装部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的经验》

陕西米脂县武装部在支左工作中，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后，公开表态支持“一〇一”左派群众组织，但是遭到了“上压，下轰，四面围攻”。在关键时刻，他们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看主流，看本质，看斗争的大方向，坚定不移地支持“一〇一”革命小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被革命群众誉为陕北高原上一面支左红旗。这是很值得参加支左的军队同志，特别是参加支左的人民武装部的同志好好学习的。米脂县武装部帮助“一〇一”进行开门整风，帮助革命小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头脑的做法，也是值得学习的。

陕西省军区认为米脂武装部是支左最好的一个武装部。榆林军分区，有的领导同志也改变了过去的错误看法。这是正确的态度。还没有改变看法的。希望迅速改变过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铜川地区革命造反者大联合总会、铜川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司令部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联委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指示

为了解决铜川的问题，兹决定：

一、由兰空工程部队抽调一个团（二千人）加强铜川支左力量，协同原驻铜川的部队，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坚决贯彻九·五命令，制止武斗，封存收交武器。在执行上述指示时，部队一律徒手，坚持五不（吵不动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出入不带枪），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宣传九·五命令收缴武器，实行革命大联合等。如有人向部队开枪，打死打伤部队的人时，报中央请示处理。

二、由二十一军派得力干部（师以上干部）吸收兰空，铜川市武装部干部参加组成铜川市及渭北煤矿军管会，对市、矿统一实行军管。

三、铜川两派九月二十五日已达成贯彻九·五命令的十项协议，中央已另电加以批转（略有文字修改），希望两派重新签字，坚决贯彻执行，并由军管会监督执行。

四、在两个协议签字前，陕西省军区和二十一军对八·一九公告作公开检讨，宣布撤销该公告。

五、指名抽调原当权派及两派组织的部分负责人到北京学习（编入陕西省军区学习班内）。

六、由军管会召集两派进一步协商，贯彻毛主席最新重要指示，搞革命的联合，抓革命，促生产，尽快把煤炭生产抓上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铜川两派“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

中央认为，铜川地区“铜总会”和“铜总司”在九月二十六日，渭煤系统“红造总”和“联委”在九月二十五日分别签订的

两个“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是很好的，是符合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的重要指示的精神的。希望铜川市和渭煤系统的两大职工群众组织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重新在这两个协议上签字，坚决贯彻执行，并从此开始，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实行整风，促进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陕西军区首长接见西安交大革委会代表的讲话

黄传龙说：

我学得很不好，在8134部队中时也有很多缺点，有的地方解散了群众组织。在耀县我们把耀县统指解散了，首先是交大同学指出了我们的错误。因此，三月二十号解散了统指，四月四日，在十条没下来前彻底平反了。

黄经耀说：

介入以后对西安形势发展的分析是有错误的。尤其是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不正确，如对当时西安出现的打砸抢和“反右倾”的认识是看得过重的。在处理上就有错误，如对2.10事件，1.28事件，军区的5.1剧团，新华书店，抓了些人，对错误的定性都过高了，把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定为反革命事件就错了。

庆华事件，开始把一方打成反革命，支持一方去抓人、游街。以后反过来，说错了，又把另一派抓了一帮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郑州铁路局系统七个单位和西安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批语

中央认为，郑州铁路局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个协议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都很好。这是郑州和西安两个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活学活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斗私，批修”的成果。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铁路运输对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在河南，陕西境内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各级铁路军管会（军管小

组)和当地驻军的协助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夺取革命、生产的双丰收。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革命群众组织,无论是已经联合的(如广州铁路局、柳州铁路系统),或者还没有联合的,中央也号召他们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通过协商,达成类似协议,迅速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就向全国转发郑州铁路局及西安铁路局大联合协议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至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煤炭工业部则派人到各主要煤区协助各矿军管人员举行分批分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在铁路方面,广州、柳州两局已实现初步大联合,郑州局这次来京开会,刘建勋、王新同志也赶来,经过工作,已达成7个协议,西安局受郑州局影响也主动达成大联合协议。为了号召以推动其他14个局(全国共18个局)的大联合,拟了批语,已经文革小碰头会通过。现送上,请主席批示鼓励。

二、中央批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四月二十九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三十五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肖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十一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一年多来，陕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揪出了西北和陕西地区以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为首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摧毁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西北的反革命老巢，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陕部队和陕西军区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指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起了促进的作用。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陕西地区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习仲勋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地区的代理人大叛徒刘澜涛等批倒批臭。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地提高警惕，把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揭露并粉碎国民党残余势

力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推广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良好经验。

中央希望，陕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不断增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陕西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节约闹革命，反对经济主义，防止无产阶级敌人的破坏，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省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省革命委员会要有更大的责任感，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的光荣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陕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陕西省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三、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是极其荒谬的，纯系诬蔑不实之词，由此而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打击和株连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教训是很沉痛的。鉴于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时我们前一个时期在平反“三案”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中，对有关这方面的大部分问题都分别作了纠正，错补划的地主、富农也已改正；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过去在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有必要郑重宣布予以平反昭雪。

一九八〇年一月五日，中央批复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中央组织部转发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

据初步调查，在陕西工作的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员(包括去世的)有六十三人被整。其中有的被打致残，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死后还被声讨、批判。

一、原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工委建立以来，一直是受党中央和陕西省委领导的。据汪锋、周仲英等同志证明，在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中，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就一直有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加强我党对三十八军的工作，党中央和陕西省委先后又增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部。一九三九年三月，陕西省委决定在三十八军成立党的地下工作委员会。党中央对工委工作十分关怀，毛主席和叶剑英同志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曾在延安多次听取工委的汇报，对工委工作的方针、政策、策略以及工作方法，都作过明确指示。

二、工委在原三十八军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工作的。工委根据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着重抓了对旧部队思想作风的政治改造。在连队建立了学习小组，开展了新作风活动，开办训练班、教导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从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积蓄了革命力量；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进国民党军校，毕业后回部队担任排、连、营职务，逐步掌握部队。同时，在中上层军官中，进行了交朋友的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三、工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成效的斗争，及时组织部队起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三十八军极为仇视，千方百计企图消灭这支部队。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大造三十八军“赤化”、赵寿山包庇“异党”的舆论，并指调三十八军中几十名所谓“异党嫌疑”分子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洛阳干训团和西安劳动营受训。工委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一情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正确对策，通过做上层工作和必要的斗争，保护了革命力量。一九四四年三月，蒋介石使用阴谋手段，调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改派蒋的亲信张耀明任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到职后，即着手以其嫡系替换了该军所属十七师连以上军官，凡被他们怀疑为共产党员的营、团干部陆续撤职、关押。在这种形势下，工委及时将暴露了身份的我党地下党员转移出该部队，并报告党中央，请求批准组织三十八军所属部队起义。经中央同意，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十七师在河南洛宁起义；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五十五师在河南巩县起义；同年六月，一七七师一部在河南辉县起义。三十八军的起义，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壮大了革命力量，毛主席、朱总司令曾先后给予嘉勉。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三日，党中央命令三十八军起义部队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指挥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对三十八军我党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给予肯定。一九四五年一月，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我党派往三十八军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周仲英、张西鼎同志时指出：这个部队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地下工委始终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任务去建设部队，同蒋、日进行了艰苦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正确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同孔从周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说：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

一九八一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

贰、本节简论

文化节大革命中，陕西省群众革命活动的材料，收集很少。

一九六八年以后的材料，也没有。

三、中共中央西北局及陕西省委，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前也执行过错误路线。以后，迅速检讨了错误。

四、陕西省军区及驻陕部队，在支左工作中，虽然也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是比较好的。

2008年7月29日初稿

2011年11月20日修改

第七节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沈阳军区支左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二月，沈阳军区几次出动部队，压制了东北局和省委机关、橡胶四厂、有色金属加工厂、一一一厂、四一〇厂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抓了八一红卫军、钢铁造反军、红色工人中一些负责人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两个领导干部，并宣布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戚本禹对沈阳音乐学院两派红卫兵代表的谈话

对劫夫同志我不太了解，但是我想保他一下，这不是我个人意见，我请示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倾向这个意见。

从这几年来看，劫夫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是执行主席文艺方针的。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体会很真实。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六二年末、六三年初。

《女民兵》是三八节出来的。

劫夫不是给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主要看音乐实践，你们可以整个研究一下。他的曲子是豪放的、健康的、革命的、乐观的、鼓舞人们斗志的。

劫夫同志，不要强调这些，要严格要求自己，老干部，许多地方不如小将，要向小将们学习。本应该你率领小将前进，不但没这样，反而落在小将的后面，你的错误要检查。就压制群众这一条就该深刻检查。

批评他不要戴高帽，不要“喷气式”，还要给他创作的机会。回沈阳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要拘留，不要抄家，要让他自由。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陈毅接见辽宁朝鲜归侨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一九六七年二月，21·1联合调查组：《一起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揭露李青等一小撮人的丑恶嘴脸》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沈阳军区派一名负责人参加了“辽联”常务。

中共中央东北局、沈阳军区支持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搞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

但是，在当时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团、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等三个主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没有参加。

原省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够分明，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站出来。

这时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间，辽宁军区对东北局机关派出部队；并抓了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个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整风时，沈阳军区公开地讲了他们的六条错误，对他们有些问题看过了头。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沈阳军区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战斗团总部的某些错误看得过重，向他们提出了“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解决”的要求。

这个期间，沈阳军区还抓了一些人，并同意和支持群众扭送了他们的一些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份，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进一步揭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

沈阳军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沈阳军区对“八·三一”和“辽联”两个群众组织，在思想感情上疏远，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使他们感到有很大的压力。

一九六七年四月间，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等革命组织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

宋任穷听信马明芳、顾卓新、喻屏等人的意见，不同沈阳军区站在一起，东北局书记处作出一个《三点意见》。把那些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群众，宣布为保守组织，并命令他们退出东北局机关。

使东北局和沈阳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分歧公开化，使一部份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更加对立，给军队支左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李富春接见鞍钢赴京代表时说：“王鹤寿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央明确指出，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二、中央召集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委、沈阳市委、沈阳三个群众组织代表到北京办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对鞍钢两派赴京代表的讲话

我们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愿意生产，毁了一个焦炉，要一两年恢复。我就不相信鞍钢工人不先进。我就不相信鞍钢十几万工人不愿生产，一天只炼×××吨铁，但代表在这里开会几个月，而对生产搞得这个样子不痛心，看看这么大一个企业搞成这个样子不痛心。鞍钢都停产，我们是不怕的。问题是你们这样搞完全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完全是违反文化大革命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你们派别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超过了国家的利益吗？个人争面子，不为国家，不为劳动人民的利益。……

你们在原则的基础上为什么不能联合？双方见面完全像个敌人。一年来，你们更往敌我矛盾发展了，这怎么解释？见面就动刀，开了枪，就烧房子，这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是劳动人民建设起来的。现在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你们学习，但先要学习林彪同志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中央文件很多，你们学了，没有用。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希望你们鞍钢生产这面红旗不要倒下去，当然也倒不了，倒了也有人扶起来。焦炉停了，还会有人恢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奇怪的是为什么生产停了，没有人说话，不痛心，听不见工人的声音。

彼此都是阶级兄弟，有的思想激进一些，有的保守一些，但是都是阶级兄弟，为什么不抓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系鞍山的王、赵、罗、钟来批判？把相互之间的小不和要放在次要地位！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李富春接见鞍山鞍钢两派代表讲话
必须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对谁都是一个考验，看谁没有诚意。我们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解放军，这是首先要讲的。如果不把制止武斗恢复生产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总理不接见你们。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凌晨，谢富治付总理亲临北京钢铁学院，
谢付总理说：“还有个王鹤寿也不好斗！”，“你们可以联合起来斗嘛！”，“毛主席说要搞好钢铁，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凌晨，周总理接见湖南代表时，在谈到鞍钢支左问题时说：“王鹤寿不仅是反动路线问题，而且是反党分子，蒙蔽了大量群众，很多人中毒很深。”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陈伯达接见赴东北代表团学生代表，谈到鞍山问题时说：“王鹤寿是老大叛徒，大坏蛋！”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李富春说：“王鹤寿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谢富治说：“王鹤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

一、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把鞍山、鞍钢当做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执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发生严重武斗，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大搞白色恐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生产，对鞍山市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王鹤寿尤甚，他是鞍山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查明他是个自首变节分子，还是个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他是镇压鞍山市和鞍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革命派的罪魁祸首。中央决定撤销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四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王鹤寿实行隔离反省。

二、鞍山市、鞍钢广大革命群众，革命职工，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鞍山市委、鞍钢党委内以王、赵、罗、钟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肃清其流毒。同时，要努力搞好本单位、本企业的斗、批、改，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

三、“鞍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等革命组织，是在对党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搏斗中杀出来的，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应该给予支持。“钢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等群众组织中的广大群众是好的，他们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王、赵、罗、钟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要认清王鹤寿、钟剑平等人的反动本质，与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坚决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革命派与受蒙蔽的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四大”的方法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绝不能用压服和武斗的方法解决。鞍山广大职工群众和大多数干部是要革命的，是热爱毛主席和听毛主席话的，完全可以在斗争的大方向下和大批判中，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只要这样做，都是好的。各革命组织和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纯洁队伍，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破私立公，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四、鞍山市和鞍钢的革命职工、革命干部，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

生产的十条规定，要努力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把革命摆在首位，以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广大革命职工要保卫生产，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保证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发挥运输能力，加强设备维修，财贸部门要努力做好各项供应工作。要节约闹革命，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人力、物力、财力。

五、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公安六条”、“六·六”通令和双方签定的“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坚决制止武斗，严禁打、砸、抢、抓、抄，对现行反革命、杀人凶手、夺枪、破坏生产的坏分子，以及幕后策划者的操纵者，由卫戍司令部依法惩处。加强各种武器管理，民兵武器和其它一切武器，一律交卫戍司令部清点、封存、看管。一切杀人凶器应立即上缴卫戍司令部销毁，今后不得制造、使用。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兴风作浪，混水摸鱼，不许地、富、反、坏、右乱说乱动，否则，严加惩处。坚决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保证社会治安。

六、中央决定成立以三十九军军长张峰、政治委员陈绍昆同志为首的鞍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在军管会下设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分别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财贸工作。军管会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执行“十六条”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鞍山市委、鞍钢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好斗、批、改。要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对各革命群众组织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七、要拥军爱民。鞍山驻军支左工作虽然有某些缺点和错误，但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声讨驻军领导干部是错误的。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坚定地相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热爱解放军，拥护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自觉地支持军管会和军管人员的工作，维护军管会的领导，千万不要听信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坏人的造谣中伤，挑拨离间。解放军要热爱人民群众，相信

群众，依靠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群众学习，遇事同群众商量，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了缺点和错误，立即改正。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军民团结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鞍山市和鞍钢建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奋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市三大派群众组织达成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情况汇报的批示

1967.08.21；中发〔67〕265号

沈阳军区、辽宁军区：

八月十七日电悉：

中央认为，你们对沈阳市三大群众组织就制止武斗，恢复生产问题，进行说服教育，达成协议，做得很好。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耐心地向三大群众组织做政治思想工作，保证《关于立即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的执行。长春情况和沈阳类似。沈阳军区可将你们的来电和《协议书》发给长春驻军和吉林省军区，请他们参照沈阳的做法，进行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康生接见辽宁各地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你们铁道学院把抢过来的枪支弹药、炮等通通封存起来，由警备司令部派人去收行不行？（工总司：可以。接着讲价钱。）讲价钱是不行的，我熟悉你们学院，不要以为中央没办法，非你们学生搞革命？你们再武打，我就解散你们学校，你们对抗的话，我们中央就采取专政措施！（双方吵架）你们为什么这样吵，你们各保一个，后面都有牛鬼蛇神。有两个办法，你们不执行，就用专政的办法缴上来；再不行，解散你们的学校。你们不要以为铁道部没有铁道学院不行，你们背后都有牛鬼蛇神。

人民内部矛盾不要那么敌对，文斗也不要那么紧张嘛！旅大的问题很大，武斗都到码头上去了，损失国家的声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联合起来。

要号召辽（宁）大（学）“八三一”、东（北）工（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等都回来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八条、十条命令是拥军爱民，江青同志在四月二十日的讲话要好好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十六条、工业十条学习，加强纪律性，要把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学学，把红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学一学，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掌握大方向的旗帜，党性要战胜派性，整体利益要高于小团体利益，知识分子结合工农，不要学生指手划脚。去年初期学生是先锋，经过一年了，现在要实现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报纸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你们要好好学习，把沈阳做为中心来解决，辽宁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份以来，沈阳市凶杀、抢劫、袭击事件累累发生，各派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武斗有所回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鞍山市军管会两个报告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十三军、四十军来电的批复

十三军十二月二日来电反映，个旧市“新红河大联合司令部”在彻底砸烂专政机构的错误口号下，派人驻守专政机关，并从监外给犯人送条子，酝酿夺监狱的权。中央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行为，必须立即坚决制止。

四十军十二月二日来电反映，锦州南山监狱红色造反团指使劳改犯人为其制造手榴弹，作为武斗工具。中央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绝对不能容许。

中央除指使昆明军区、沈阳军区，对上述行为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外，希望各地对监狱和劳改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中央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准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

（二）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

（三）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宋任穷同志的书面检讨

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同志们检讨前一段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很不理解，对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很好领会，对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中“修养”的毒较深，所以在十一中全会前，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采取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急急忙忙派工作队，传播刘、邓的“黑三条”、“黑八条”，发表文章，划框子，定调子打击刚刚起来的革命造反派，保护一小撮，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又由于我对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自己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挖的不深，没有很好触及灵魂，以致在贯彻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在对待“炮打司令部”、支持革命派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不是“敢”字当头，仍表现为“怕”字当头。怕群众分裂成两派，怕公开坚决支持革命派，受到围攻，怕省委瘫痪，怕东北局瘫痪，无人负责。一句话，就是怕群众，怕革命，怕革自己的命。由于我执行了错误路线，使一些单位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这是极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再一次地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我才逐步端正态度，开始公开支持革命造反派。但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新阶段，由于认识落后于形势，对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又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路线错误。如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我说服动员军队共同支持了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当时搞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在当时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团、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等三个主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没有参加，原省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够分明，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站出来的情况下，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不是群众运动水到渠成的结果；让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参加进去并当常委，是不对的。事前，我虽然曾向筹备“辽联”发起单位的代表建议推迟召开成立“辽联”的誓师大会，以便

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大联合的工作。但最后我还是同意了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即：先开“辽联”成立誓师大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一个基础；然后经过工作，把暂时尚未参加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地吸收进来，巩固和发展这个大联合。我所以同意这个办法，除了我认为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大联合符合大方向，应当予以支持外，还由于自己也有急于搞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思想，并认为辽大、东工、沈农这三所大学革命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一时也不易消除，先成立起“辽联”，也许会促进他们很快地联合起来，消除“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对辽大八三一，我虽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但对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看过了头（如有一次讲过辽大八三一搞分裂不对的话，并错误地引用了张国涛搞分裂的例子），便误认为其他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也许有利于促进辽大八三一及早地参加到革命大联合的行列里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用压力迫使辽大八三一改正错误后再参加大联合的错误做法，形成了支一派压一派，伤害了以辽大八三一为骨干的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广大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加深了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是极端错误的。我在这里向沈阳八三一派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同时，把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排除在“辽联”之外，没有积极说服沈农革命造反团参加大联合，也是极其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由于我支持“辽联”而没有支持沈阳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使军队跟我犯了错误，其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同时，军队由于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短，情况不了解，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其他错误，也同我向军队介绍情况不够、不准，或者积极建议不够有很大关系。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完全责任。如一九六七年二月间，辽宁军区对东北局机关的出兵，就是我提出的；我还同意抓了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位同志。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

“辽联”成立以后，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省市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则急于筹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而没有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彻底揭开东北局和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尤其是东北局书记处。相反，一九六七年四月间，我对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等革命小将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行动，不但不支持，

还公布了东北局书记处一个极其错误的《三点意见》。后来，中央明确指出，这个《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中央指出这个错误，我才逐步认识到，把那些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芳的革命群众，宣布为保守组织，并命令他们退出东北局机关。这就直接打击了革命群众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的革命积极性，直接起到了保东北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马明芳等人 and 保书记处的作用。效果确实很坏，加深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在一些单位中形成了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使东北局和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分歧公开化，使一部份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更加对立，给军队支左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总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严重影响了大联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这个《三点意见》是我们在北京制定的，不经请示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匆匆忙忙擅自发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原则上都是极其错误的。

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并且以自己有过犯错误的教训自居，自以为是，对军队同志的一些意见，则听不进去。相反，却偏听偏信马明芳、顾卓新、喻屏等人的意见。这样就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站错了队，不是坚定不移地同沈阳军区站在一起，同心协力搞好“三支、两军”工作，而是同马、顾、喻站在一起，搞了一个极端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不是一般错误，而是立场错误。我在搞《三点意见》中起了马、顾、喻所起不到的作用，使许多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比较相信我而支持了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个责任完全应当由我来承担，特别是革命小将、革命群众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点意见》发布后，我们又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做法，积极推行《三点意见》，更是错误的。如对于《三点意见》的形成过程，经过接待工作讲了一些不应该向外讲的话和讲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无非是要人家相信《三点意见》是正确的，让人家来支持《三点意见》。这种作法是恶劣的，后果是很坏的。特别是压制了革命群众

组织“辽革站”。我在这里向“辽革站”的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

当中央指出《三点意见》的错误后，我还想以东北局书记处的名义收回，经过徵求顾、喻的意见，遇到他们抵制收回后，我对执行中央指示，表现得不坚决，拖了较长时间。这是很错误的。在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帮助下，才以我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

在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立场错误，路线错误，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后果是严重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怀和解决沈阳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并对我进行了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使我内心极为不安，心情万分沉重，深深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请罪，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请罪，向沈阳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一切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

总之，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一次大暴露。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

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很好理解、甚至理解错了，因而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曾几次错误地出动部队，压制了东北局和省委机关、橡胶四厂、有色金属加工厂、一一一厂、四一〇厂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抓了八一红卫军、钢铁造反军、红色工人中一些负责人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两个领导干部，曾说过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这是很错误的。

二月中旬，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当时搞革命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我们把它当作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派一名负责同志参加“辽联”常务，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当时东北局、省市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阶级阵线不够分明，同时，在沈阳市影响较大的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工厂的

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参加进来，实际上并未形成沈阳地区革命大联合，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应该给以帮助，而不应该参加所谓筹备三结合的机构。

二、三月份，由于我们对有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和在运动中的贡献看得不够，对他们的某缺点错误看得过重，所以对他们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当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三月份整风时，我们不仅对他们帮助不够，反而公开地讲了他们的六条错误，对他们有些问题看过了头。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战斗团总部的某些错误，我们也看得过重。在三月份整风时，错误地向他们提出了“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解决”的要求。在这个期间，我们还错抓了一些人，并同意和支持群众扭送了他们的一些负责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主流。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在运动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本来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满腔热情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可是我们却对他们采取了上述错误的作法，使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受到了压制，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四月份以后，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进一步揭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对“八·三一”和“辽联”两个群众组织，在思想感情上疏远，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使他们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出之后，我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没有领会，因而跟得不好，结合沈阳地区实际情况贯彻落实不好，在促进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方面，很少关心。我们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迟，检讨晚，改得慢，给沈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中央赴辽宁省调查组、辽宁省军区关于沈阳三派达成“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十条规定”的报告

总理并报伯达、康生、富春、中央文革：

总理最近几次对辽宁问题作了指示以后，沈阳市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尽快地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和各派中一部份极左分子的干扰，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凶杀、抢劫、袭击事件累累发生，各派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武斗有所回升。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强烈要求重申“九·九”协议、彻底收缴武器、制止武斗，迎接革命大联合的高潮。为此，我们组织各派代表通过充份协商，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各派代表一致恳切请求在报请中央审查后生效，以利克服阻力，使之顺利地贯彻执行。现将“十条规定”报告如下，请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沈阳三派“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的联合报告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报告”的批示

1968.01.24；中发〔68〕14号

沈阳军区是中央信任的，他们在过去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从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在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也犯有严重错误。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就已经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因为当时中央决定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三级党委、沈阳、辽宁省两级军区领导干部和沈阳的三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开会，他们的检查就未批发下去。最近，他们对检查又作了修改。这次所作的“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辽宁省地处国防前线，又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中央希望沈阳军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坚持“支左不支派”和“斗私批修”的原则，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思潮的影响。中央并希望沈阳军区积极响应毛主

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广泛接近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加强军民团结，作好“三支”、“两军”工作，在夺取辽宁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沈阳三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十项规定的批示

1968.01.24；中发〔68〕16号

辽宁沈阳三派革命群众组织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经过“斗私，批修”，达成了“关于进一步贯彻‘九·九’协议，彻底制止武斗的十条规定”。这十条规定的达成，是辽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大进步。中央批准这个协议，并希望沈阳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贯彻，坚决执行，保证落实。

辽宁省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又处在国防前线。辽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胜利，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均有重要意义。中央希望辽宁省各地各革命群众组织，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的帮助下，掌握斗争大方向，开展革命大批判，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宋任穷同志书面检讨

1968.01.24；中发〔68〕13号

二、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现在，全省十个市，四个专区和盘锦垦区的各派革命群众组织都已实现了革命大联合，鞍山市，阜新市，锦州专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四十二个县中有四十个县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有二十三个县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有百分之九十点五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沈阳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

占百分之七十九，人数已达百分之八十七，有二百三十九个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纷纷检查自己错误，决心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去年农业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粮，棉征购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工业生产也在逐步上升。

现在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广大革命群众迫切希望省革命委员会早日建立，经过我们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酝酿协商，对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1，省革命委员会拟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除留十四名作机动外，按一百六十一名份配如下：

（一）革命群众代表一百零一名，占百分之六十二。其中：工人代表五十二名，占百分之三十二；贫下中农代表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二；红卫兵代表二十一名，占百分之十三；其他革命群众代表八名，占百分之五。

（二）革命干部代表三十四名，占百分之二十二。

（三）军队代表二十六名，占百分之十六。

在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沈阳市九十四名，占百分之五十八，外市，专六十七名，占百分之四十二。有些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市，地，县，委员暂缺。

2，省革命委员会拟设常委四十五名，除留四名作机动外，暂按四十一名份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名（内工人代表十二人，贫下中农代表三人，红卫兵代表四人，机关干部三人）；革命干部代表十人；军队代表九人。经过协商，建议由陈锡联等三十八名同志担任常委（名单附后），暂缺常委三人（工人一人，革干二人）。

3，建议省革命委员会由陈锡联同志任主任委员，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国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委员（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4，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各组均由革命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组成。

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省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总名额暂定一百五十人左右。原省委，省人委所属机构，除组成精干的业务班子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和监督下进行业务工作外，其余全力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不行使任何权力。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5.08；中发〔68〕70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五月七日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同意设四十五名常委；同意由陈锡联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李伯秋，杨春甫，王良，杨迪，杨弃，毛远新，尉凤英（女），任宝成，王凤恩，刘忠礼，于桂兰（女），张治国，魏礼玲，郝义田，刘盛田等十五名同志任副主任，暂缺工人副主任一名。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光荣诞生的。两年来，辽宁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和帮助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以及他们在东北和辽宁的代理人马明芳，顾卓新，喻屏，周桓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反党联盟的残余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隐藏在党内的形形色色的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辽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央热烈祝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遵照林

副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讲话中所说：“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使自己成为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辽宁是我国的重要工矿基地。辽宁有着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在省革命委员会中工人代表也占很大比例。中央希望，辽宁的工人阶级应充份认识自己的领导责任，在完成革命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中起着带头的模范作用。

目前辽宁各地除鞍山，阜新已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和沈阳即将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外，还有不少重要城市和港口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希望，省革命委员会应积极推动这些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

辽宁省至今还存在着跨行业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希望，辽宁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应积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阶级敌人是决不甘心于失败的，他们必然还要作垂死的挣扎。辽宁处在反帝反修的第一线，省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尤其需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警惕，继续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苏修，美帝，日本，蒋匪的特务和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黑风。为了一致对敌，必须严格区别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反对武斗，反对极“左”思潮，防止阶级敌人的挑拨利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和驻辽部队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工作中的一些错误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不断加强军民之间在革命原则下的团结。沈阳军区和人民解放军要巩固国防，严防以苏联叛徒集团为首的修正主义在边防上的军事挑衅。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

备”的方针，协同东北的兄弟省份，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整个东北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铁路运输计划。

中央希望，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吸取他省先进经验，把辽宁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沈阳军区及辽宁省各方代表时的讲话

周恩来：

同志们，战友们，首先问你们好！庆贺你们！刚才康老读中央批示时讲的话，伯达同志讲的话我都同意。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早在去年八月毛主席就提醒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要推动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早一点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我们想早一点、快一点。但革命斗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像天津、河北就快一些，辽宁是耽误一些时间，今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大家很高兴，但回想一下是不是可以快一点，我过问过辽宁的一些工作，我想如果做的好是可以快一些的。毛主席指定的四个地区，是重要的战略部署，无论是从革命和生产来看，都是这样。为什么辽宁在后头呢？就是斗争的复杂性。你们辛苦了！革委会成立的过程确实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要跟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在东北的代理人斗争，逐步把问题挖深挖透，把受蒙蔽的群众解放出来，擦亮眼睛，跟他们划清界限，同时又要同藏在暗处的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张反党集团作斗争。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的进行破坏，如像杜者衡这些人呀，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受到一些干扰。不仅如此，辽宁的特务呀，内奸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呀，在机关、工厂、学校，他们也在活动。暗藏在机关、工厂、学校、码头广大群众里头，使运动受阻，要一个一个把他们揪出来，不然他就干扰。例如早就知道的叛徒宋黎、特务侯志，他也要干扰一阵。还有坏头头在干扰，例如这次揭发出来的张祥久等人，他们也干扰了我们，如果不等群众觉悟，没有认清就过早处理，容易伤害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所以要等事情成熟了，就容易水

到渠成，迎刃而解。但应该说，在中央工作的也好，在大区工作的也好，也还有些耽搁，拿鞍山来说吧，早就揭发王鹤寿是大叛徒，应该早解决，我们耽误了。比如对宋任穷，中央一再想挽救他，但他不按中央的愿望办。直到现在还不在于文件上点名，给他留下一点生机，一线希望，希望他从死不悔改到改悔，这是毛主席的一贯干部政策。但不是说他的错误就不严重了。本来去年八月份就把地方三级党委、两级军区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请到北京开会，想早一点解决问题，现在九个多月了，中间经过些曲折，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经过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代表们、广大群众取得了经验，取得了教训。解决一个省的问题，不仅对你们、对我们也是学习，成功来得不易呀！所以，现在你们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我们很高兴，庆贺你们明天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经过这样长的时间，辽宁省、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在明天同时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学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步一步按毛主席指示前进的胜利！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既然成立的晚，就应该吸取许多省市的经验。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人数比别的省都多，工人比例数大。现在报告上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五名，留十四名做机动，先按一百六十一名分配，将来各大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后，一百七十五名可能还不够，也可能突破框子。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那时不够了，你们再报告中央，这个暂且不说，就拿现在来说，把革命群众代表比例增大了，工人占五十二名，过了半数，这是好的，这体现了有广大群众代表的新生力量参加革命委员会。当然，也需要军队帮助推动。一年多来，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沈阳地区做了很多工作。不错，他们犯了严重错误，做了检讨，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后还需要把工作做的更好。所以决定他们有二十二名委员、常委九名。还有革命干部十名，并且有一名从黑龙江借来的毛远新同志。当然他要谦虚。你们光借不行，还需要自己省的干部，所以回去要通过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解放一批干部。辽宁是个大省，大的工矿企业这么多，需要很多干部，有经验的干

部，即使犯了错误，只要他们承认错误，认真改正错误，就应该解放出来。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仅仅有军队和群众代表不行。关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毛主席指示的很清楚，人民日报社论也讲了，我不再多说了。

在常委比例上也照顾了这一点，常委原四十五名，留出四名机动，给鞍钢、旅大、抚顺和铁路，这四个单位至少有一个常委，如有的能当副主任就当副主任。其他四十一名，二十二名革命群众代表，也占多数。军队和革命干部十九名。辽宁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需要我们这样做。这是辽宁省一个很急迫的组织任务和政治任务，希望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再从年龄来说，青壮年居多，五十岁以上少数，只有十三个嘛！其他都是五十岁以下，二、三十岁的很多，这是一个好的气象。但有一个缺点，不如陕西、安徽，就是女同志少。沈阳工矿区女工占很大的比例，农村、学校女同志也很多。这一点是旧习惯，破四旧，就要破这个旧习惯，就是有大男子主义，今天在座的男同志代表要注意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提出工代会协议上提出成立工代会要有女代表。毛主席说：“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嘛！希望你们回去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沈阳三个革命群众组织，都作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组织尽管有些错误，有的错误严重些，也是上面少数领导人的问题。如有的组织受东北局、省市委走资派的蒙蔽，群众没有责任；有的组织有少数坏头头，由他们自己解决。像八三一这次自己解决坏头头的问题，自己抓出来，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这是一个胜利，现在说你们“八三么”不会反感了吧？（康生同志：就是怕说“妖”，妖在你们身边你们也不揭发，唐铎是个苏修的大特务，李光灿是反革命分子，他到北京找杨献珍和杨成武的亲信，还说自己是八三一的参谋。你们要特别注意美帝、苏修特务、蒙修特务、日本、国民党特务，你们那里前前后后什么都有，真是五毒俱全哟。还有辽联的柳运光，我认识他，是个坏家伙。）每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各个组织里都可能有坏人，不要只说别的组织里有坏人，自己组织里没有，不要被敌人利用。不要总强调自己一贯正确，唯我独

左，没有那么回事。年青同志犯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按毛主席指示自己揪出来，像八三一这次把张祥久等四人揪出来是好办法。别的组织不要去讽刺、指责人家，要好好整顿自己的队伍，辽联、辽革站都要贯彻这个精神。不要只看人家短处，要看人家的长处，把人家的长处学来，有错误改了就好，不要背包袱，要轻装上阵。你们在这里八、九个月了，毛主席的声音，中央的声音听了很多了，要把这些精神带回去，有极“左”思潮的说你们“右”了，“修”了，你们在北京，在毛主席身边怎么能修了呢？！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怕别人说。八三一来开会的同志在北京解决了内部问题，揭发了张祥久的问题，取得了很大胜利，你们要求一架飞机送回去，所以我同意你们的要求，你们应该把毛主席的声音尽快带回去，不要还认为除了张祥久就选不出头头来了，不要迷信他。

你们三个革命群众组织把沈阳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外市县的事让人家自己搞，不要去干涉人家，不要包办代替。

第三个问题，刚才伯达同志讲了，就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毛主席有两个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工人阶级要带头，应该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组联合起来，这一点我们很高兴的是你们提出回沈阳首先成立工代会、军工代会，也提出了要很快成立大专院校红代会，我希望你们的提议经过省革委会讨论能很快实现，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不按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回本单位搞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就要受到干扰。例如张祥久的问题解决了，沈阳、苏家屯铁路局的问题也解决了。辽宁工人比重这样大，工人阶级更应该起模范作用。不仅沈阳，要拿沈阳的经验去推动旅大、抚顺、本溪、铁路以及其它很快成立革委会的城市。十个工业城市，只有三个成立革命委员会，还有七个没解决，要很快跟着成立。关于组织问题，就要把跨行业组织逐步取消，当然成立很久了，一下子取消有些留恋，但这是斗争的需要。毛主席说：“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第四个问题，就是辽宁、吉林、黑龙江都要加强敌情观念，过去群众组织之间打内战就是敌情观念不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直到日本投降，辽宁就是帝俄、日本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以后国民党来了，还是半殖民地。旅大苏军一九五五年撤出。前后六十年，隐藏下很多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分子，这在东北来说比在别的地方会多些，当然，同整个人民中来比较，只有大海中的几滴水。我们一定要有敌情观念，要把特务呀、内奸呀、反革命分子呀，都揪出来，任何一个单位如果没有敌情观念，就会被敌人钻空子。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问题，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来解决，要共同对敌。军队不仅担任“三支”“两军”任务，而且要保卫国防，有战备任务。我们要非常爱护解放军，即使他们在运动初期犯了错误，只要他们能认识、改正错误，对他们就要更加拥护。这一点我们说，东北的军队他们是听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的话的。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东北地区是全国的关键部分。首先要求铁路局和大连海港要搞好，枢纽不通就直接影响生产。再就是抚顺煤矿搞不起来，鞍钢的生产就上不去。鞍钢上不去，全国的钢也就上不去，不仅是数量，特别是品种的问题。煤、钢上不去，就直接影响机械、化工等上不去，对全国影响就很大。所以说，东北是全国一盘棋的一部分。刚才，康生同志、伯达同志讲了，东北问题毛主席去年七、八月份就有指示，我们抓的晚了一些。现在促成了革命委员会，原来形势就很好，欣欣向荣，现在应该更加面貌一新，你们说北国风光无限好，辽河两岸尽朝晖，我不只辽河两岸，还是松辽平原。辽宁省成立革委会是大喜事。今天参加会的还有吉林的同志，有八三一来京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些同志，你们回去要把毛主席的声音带回去，对中央批示要坚决照办，坚决执行。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

1968.06.18；中发〔68〕98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建立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批示规定，东北农垦总局所属农场，与黑龙江某些省属农场、黑河农建一师、合江农建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汪家道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三、陈锡联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九日，陈锡联王从周在沈阳市工代会上的讲话

陈锡联：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们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我向同志们提出几点建议和要求：

一、要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一个个地揪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进一步揭开工矿企业的阶级斗争盖子。

二、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放手发动群众，把混进党内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彻底摧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社会基础，在对敌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作到最大限度地团结干部和群众，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三、要高举鞍钢宪法的伟大红旗，深揭深批工业战线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把黑十二条批倒批臭，通过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提高阶级斗争观念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反修、防修能力，抵制反革命经济主义、物资刺激、技术挂帅的毒害，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四、在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基础上，搞好工矿企业的斗批改，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工人积极性的规章制度，彻底改革重叠臃肿的管理机构，建立革命和生产的新秩序。

五、要通过革命大批判，进一步发展按系统、按行业的革命大联合争取尽快地成立各级工代会，实现基层单位的革命三结合，建立革命化的领导班子。

六、要用鞍钢宪法统帅生产、指导生产、推动生产，我省工业在全国占很大比重，生产许多极其重要的产品，不仅对全国工业生产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关系到国家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每个工人同志都要作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

社、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情况大体分三类。

一类是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这类班子的成员比较纯，新的血液多，思想先进，核心团结，步伐一致，敢想敢干；作风深入，联系群众，有权威，有号召力；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自觉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积极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狠抓阶级斗争，带头参加革命大批判，积极清理阶级队伍，革命、生产都取得显著成绩。

二类是中间状态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绝大部份成员的出身成份好，历史清楚，他们热爱毛主席，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班子里的新鲜血液少，多半是原班人马，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较深，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觉性不强，思想比较守旧，缺乏创新精神。群众说：“他们基本上是老一套。”

三类是不好的，大体上占百分之十三至十五。这类班子严重不纯，基本上是坏人掌权，打击迫害贫下中农，排斥新生力量，大搞右倾翻案，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和党的方针政策，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从调查的情况看，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领导班子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重点。因此支农部队力量使用上，应当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按照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转发沈阳军区党委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1968.12.07；中发[68]163号

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毛主席批示：“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现将沈阳军区党委会《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的调查报告》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今冬明春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必要的调查和部署。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将农垦部所属东北农垦总局划归沈阳军区的决定

四、沈阳军区、辽宁省委召开批陈整风会议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转发陈锡联同志在沈阳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辽宁省县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5.10；中发[1971]36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军区党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从二月十五日开始，到今天开了二十五天；辽宁省县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今天开了十六天。参加这两个会的同志共四千一百多人。

这两个会，都是批陈整风的会。

到会同志对军区党委常委和辽宁省委常委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批评和意见。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在一起开了交心会，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军区党委常委还要在军区的会议上进行检查。会后，军区和省委都要继续深入进行批陈整风。

一、在同反党分子陈伯达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

1、要认清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2、要深刻认识路线问题的重要，提高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3、要坚决纠正不正之风，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以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作风严重不正。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家长制的“一

言堂”，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是军阀主义，飞扬跋扈，称王称霸。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不走正道走邪道，和陈伯达臭味相投，陈伯达找地盘，李、郑找靠山。这样，他们就必然搞到一起。

4、要坚持斗私批修，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5、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党的团结。

6、要认真看书学习，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二、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问题

1、我们军队的同志，要特别注意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重要指示，认真搞好整风。

2、我们辽宁省的同志，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对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陈整风搞好。

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新华社记者《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

五、十月政变后的镇压活动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

揭批运动进入第三战役。

到去年年末，已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两千四百人，犯严重打砸抢错误的一万五千人。

对几个地区的复查验收过程中，发现还存在种种遗漏。主要表现在：一、有些单位领导班子不纯，抵制清查。二、派性掩护，查不下去。三、隶属关系改变以后，不了了之。四、对调入人员考核不够，使用不当，留下漏洞。

辽宁省委在五月末召开的一次纪委书记和揭批办主任会议上，介绍推广了本溪市复查验收的经验。复查验收以来，全市从各级领导班子里，又清理出打砸抢首恶分子九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七

名；清理出犯有严重打砸抢错误的十七名，其中县级两名、科级十五名。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辽宁省抓清理打砸抢案件的复查验收以防止打砸抢分子占据领导岗位》一文的通报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中共辽宁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辽宁省委组织部和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关于补发集体所有制单位干部职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冤假错案被停发减发工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六、张志新事件

张志新（1930—1975）天津人。女。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

68年的春天，有一个星期天，她是到一个姓闫的女同事家里，想向她借江青文化大革命时候讲话资料。这个姓闫的女同事说张志新你站过来吧，不要站在那一派。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她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那个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理解，比如说江青叶群她们过去是干什么我对她们都不了解。这个姓闫的这个同事，就马上向当时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去汇报这个事情，写成文字了，都写进在档案里头。

1968年5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9月，沈阳市首批二十万知识青年被动员上山下乡。10月，辽宁省五大机关计三万余名机关干部，被送进在盘锦的辽宁省“一〇·五”干校。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也在其中。张志新本来在私底下的言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

首先一开始是弄来就开批斗会了，揪出来就说她反革命，反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同志什么之类都来了，来了以后她当时只知道

这些，白天劳动，晚上审查批判，必须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挖她黑思想，而且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就413专案组。

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张志新关押在沈阳监狱，最开始，她被编入第三大队女监犯人的一个班里，实行集体关押，很快，张志新由于坚持自己的言论，被单独关押。在狱中无数次的坦白交待过程中，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从头至尾没有承认错误。

1970年5月，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张志新“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判张志新死刑。案件经一层层同意，最后报辽宁省委审批。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同意判处张志新死刑，均表示没有异议。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他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

1972年，张志新那个时候已经确实是疯了。林彪事件出来了，监狱里面学习，批林批孔，在外头请人来给犯人做报告，批判林彪，在那个大会上犯人也听了。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候有一个犯人就喊，林彪不是地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张志新起来说，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当时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

由监狱提出的死刑报告经过审批，最后报到辽宁省委。常委会议的纪录，第五个议题就是审议张志新。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是那么疯狂，还是犯罪，让他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整个记录大概60个字，不到100字。

张志新死刑的判决公布之后，沈阳监狱中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指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时年45岁。

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贰、本节简论

一、宋任穷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动动摇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犯过不少错误，但总的来说还算是好的。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他的书面检讨基本上是好的，并经中央转发各地。可惜，十月政变以后，他又一头栽到错误路线一边去了。

二、陈锡联作为沈阳军区的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表现基本上是好的。九大、十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七六年华国锋等人策划十月政变，他就立即倒向政变集团中去了。

三、辽宁省的张志新是一九七九年以后被炒得最火爆的事件。

（一）这个“烈士”是由高层领导精心策划制造地一个假典型

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

1970年5月，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根据张志新在狱中的表现：张志新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进行攻击，并写出了十几万字的材料。其中：

张志新说：“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张志新说：“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张志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 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张志新“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判张志新死刑。辽宁省委没有批准。

1972 年，张志新在批判林彪的大会上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

张志新在监狱里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

由监狱提出的死刑报告经过审批，最后报到辽宁省委批准。

1975 年 4 月 4 日，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

这一切说明：张志新被捕、被判刑、被判死刑，都主要是因为她的“反对毛主席”。

可是，一九七九年，辽宁省委负责人任仲夷为了制造一个反文化大革命的典型，就故意掩盖张志新的“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只说张是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的。

1978 年 1 月，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

1979 年 1 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上张志新事被披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

1979 年 3 月，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写出专题报告。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因为张志新不仅反对林彪、“四人帮”，同时也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

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这些任仲夷是心知肚明的。

对于任仲夷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胡耀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为张志新题词，华国锋就不题（如果张仅仅是反四人帮，这正是华求之不得的；正因为他知道张的主要问题是反对毛主席，所以他才不敢表态）。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对张志新案复审的汇报。省委书记任仲夷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杀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为张志新平反昭雪。

任仲夷在会上说：“张志新案件是件奇冤大案。她的死是非常惨的。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她最后死在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的屠刀之下。我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对她的家属、子女要很好照顾，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彻底肃清。要开追悼大会。要号召党员、革命者向她学习。她是很努力学习的。不学习是讲不出这么多言论的。我们现在搞解放思想，她早就思想解放了。要学习她那种『五不怕』的精神。省委要搞出一个很好的文件，给张志新同志以表扬。这个文件不仅下发，还要向中央上报。”“张志新同志是难得的好典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真够得上一个艺术典型。从我来说，听了觉得心中有愧。文化大革命中，整别人的事我没有干过，但像她那样坚持真理，我还做得不够，值得向她学习。”

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志新现行反革命案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疯狂践踏党的民主生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草菅人命，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造成的一起大冤案，必须彻底平反昭雪。”“张志新同志惨遭杀害，是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阴谋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搞法西斯专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两千多人的大会为她平反昭雪。

1979年7月31日，光明日报经胡耀邦同意发表陈禹山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说：“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

这完全是骗人的谎话。

2005年，陈禹山发表文章承认：其实反对毛泽东才是张志新被杀害的主因。但至今，绝大多数的人们仍未知道这个真相。陈禹山说，当年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时，由于当时社会政治条件的限制，冤案真相尚未全公开。当时全国的报刊报道说，张志新是由于在“文革”中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杀害。事实的真相并非仅仅如此。

这样，在二十五年后，由他们自己的人揭穿了由胡耀邦、任仲夷等人制造的这个假典型。

(二)胡耀邦、任仲夷制造这个假典型的目的是要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政治路线服务

1979年8月，任仲夷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张志新冤案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他说：从张志新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

此案平反，震惊全国。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985年，在张志新“殉难十周年”之际，邓颖超、陆定一、黄火青等中央和原辽宁省委领导等七人题词，予以纪念。

张志新的名字还载入了《辞海》史册，并列入中国共产党“简史”之中。这些人就是要让“她的独特斗争的事迹，在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中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2005年5月，《炎黄春秋》发表原辽宁省委宣传部两位作者写的《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一文，

任仲夷读到此文非常赞赏，将这篇文章推荐给《炎黄春秋》。他在给杜导正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

《炎黄春秋》编者说：现特发表此文，以纪念这位坚持真理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文章赞扬张志新：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和信念。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党性。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

可是，一个高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打倒毛泽东”的人，她究竟具怎样的理想和信念、究竟具有怎样的党性、究竟具有怎样的“大无畏精神”，不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吗？！宣扬这样的理想和信念、这样的党性、这样的“大无畏精神”，究竟是为那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不也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吗？！

（三）张志新案件本身的教训在于：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没有彻底改造旧的公检法，没有认真搞好斗批改。

如果张志新的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主席的错误认识，真的仅仅是在私人谈话中、在学习班的交待思想中说出的，按照毛泽东关于审干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根本就不应该逮捕，更不应该判刑。

张志新在狱中遭受到种种虐待，甚至遭到非常残暴的行为。这些情况说明，旧的剥削压迫阶级统治下的监狱的黑暗传统，仍然深深地遗留在新中国的监狱中。作为党中央在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作为中央政法系统的领导人，彭真、罗瑞卿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而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要摧毁旧的公检法的一个原因。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

到七十年代，辽宁省的监狱仍然存在种种黑暗面，说明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没有彻底改造旧的公检法，没有认真搞好斗批改。

可是，那些借张志新案件攻击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专政”的人，他们做得又怎么样呢？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他们打着清理“帮派体系”的口号，逮捕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的徒刑？杀了多少人？在九十年代，河南省甚至对参加纪念毛泽东活动的群众，都敢逮捕，甚至判刑。震惊全国的“四君子”案件，即是其中的一例。

2008年8月27日初稿

2011年11月21日修改

第七章 推动各省市加速成立革委会的步伐

第一节 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壹、本节概述

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在学校开展军训，狠抓教育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联合，成立“井冈山兵团”。

一九六七年一月至三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分歧，形成了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唐伟为代表的纵队派。团派和纵队派都在井冈山兵团旗下，蒯大富所依赖的嫡系部队是“28团”和“31团”，所以称为“团派”。唐伟在策划成立自己的组织时，他的同伴说“我们与他们针锋相对，他们是‘团’，我们是‘纵’”，遂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纵队”。

前期的四一四串联会，后来的四一四总部，“分部”是以学校的二级行政单位为基础建立的。十一个系就有十一个四一四分部，这十一个系的四一四分部，是四一四的主体，因为学生大部分都在这十一个系里。除此之外，几乎每个二级行政单位都有相应的四一四分部，如200号分部、基础课分部、行政处分部、研究生分部等等。

战团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它是跨越行政单位的具有相同观点的若干战斗组的集合。四一四有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分别代表四一四中的鹰派和鸽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担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和教务长崔雄昆等人一起“亮相”，表示与旧的校党委和陆平彻底决裂，愿意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参加“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北京市一些群众组织召开炮打谢副总理的大会，孙蓬一在大会上发言。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分裂。几个与蒯大富一块造反的头头对蒯大富不满，拉出一部分人正式成立了“414”造反兵团，一把手叫沈如槐。

一九六七年四月底，戴维堤在北航红旗办公室里接到清华“414”一个女头头打来的电话：请北航出面给蒯大富作作工作，劝他以大局为重，高抬贵手，成立革委会时多给“414”几个“议员”名额。

于是戴维堤和韩爱晶等人劝蒯大富，姿态高一点，多给“414”几个名额，赶快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

但蒯大富顽固得很，不听劝告，寸步不让。“414”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是他的回答。

“414”也不甘示弱，发誓要把“井冈山”推倒、踏平，把蒯大富等人送上历史的断头台。

不久，清华园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战火弥漫，乱成了一团。

与此同时，北大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派“井冈山造反兵团”也干了起来，并武斗不止。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陈伯达：

我们教育制度这十七年来有些不错，很有些改革的，有些改革后的经验可以总结一下。还有是不是基本上我们学校没有受到苏联的影响，对不对？（谭：五八年教育革命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那一段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对，那个时候，还搞过革命，后来又没搞下去，停了。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下一代嘛！毛主席告诉我们说教育制度不能再让资产阶级那一套来统治我们学校了，要产生新的教育制度，新的教学制度。

这个教育制度，马列主义还没完全解决，社会主义时代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完全解决了？

教育制度上的改革是根本上的问题。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主席说不但学文，这个文包括很宽，学做工、学做农、学军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学要改革，资产阶级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纲领性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

在当前，对于广大革命师生来说，必须坚持毛主席所指出的青年运动的革命方向，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逐步完成各个学校的斗、批、改的任务，并且把这些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教育领域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校从根本上得到改造；才能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千百万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使我们的学校成为“抗大”那样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和平门中学的讲话

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指示中有这样三句话：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第三句中提到的内容，我们叫五项学习内容。我现在想提出来让同学们注意一下，在军训中不管那个组织，那种观点，你红卫兵也好，你红旗也好，你们到底学得怎样，有那些成绩，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这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传统，也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路线的东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你们应当关心这个问题，应当讲这个问题，应当争论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戚本禹在北京玉渊潭中学的讲话

你们没有高中，毕业后怎么办？办成高中好不好？（鼓掌）没有房子自己盖。有什么困难自己想办法。学制要缩短，不要学那么长，中学六年，不要这么长嘛，大学毕业都成老头儿啦！

（有人说复课闹革命是个大阴谋），复课闹革命怎么是个大阴谋呢？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声音嘛！怎样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学制、教育方法都改革一下。资产阶级的教育也有过革命，戊戌变法时就搞过洋学堂，这是从英美那里来的，后来又从苏联那里学，苏联也是从英美那里学来的，总之一句话，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无产阶级怎么办学校全世界都没有解决。

中学四年就够了，最多五年，初中改变一下，要搞教育革命和解放军同志一起研究，转入本单位斗批改是总方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讲话

毛主席对军训最关心，他把这事当作最重大的事。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戚本禹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谢富治和丁国钰、周景芳来到清华大学接见了两派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聂荣臻肖华谢富治在北京航空学院革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聂荣臻副主席讲话

一年以前，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过去这一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划时代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在七亿人口的大国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亿万革命群众，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向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的猖狂进攻进行总反击，这场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目前正处于决战阶段。

现在，严重的斗争任务还摆在大家面前。在全国解放前夕，在一九四八年底，毛主席曾经向全国军民尖锐地提出“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的问题。全国军民坚决响应了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取得了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当前的文化大革命，也正处于决战阶段。毛主席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号召广大革命群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给我们下的进军令！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盘据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个一个地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了出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深入地开展。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长期以来在各方面散布的流毒，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问题，是有关世界革命的全局问题，是斗争的大方向，是百年大计！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谢富治对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的讲话

二、北京市高校两派斗争加剧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谢富治传达中央给北京红代会的指示

一、红代会的人都不能利用北京名义，跑到各地自作主张，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秩序。在徐州的都应该接到通知后，一天内应当立即回来。红代会要派人去说服。如还不听，可同军队、公安机关协同强制回来。

二、红代会和各大专院校，要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和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立即将我市各院校派往各省、市和北京各单位的同学调回本校。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晚，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

周培源“反戈一击”，参加了“井冈山”。

聂元梓贴出《掌握斗争大方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说要‘抓主要矛盾，狠抓大方向，彻底砸烂刘、邓黑司令部，彻底摧毁旧北京市委。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成立。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新北大北京公社’成立。郭罗基参加组织并在成立会上讲话。

“‘新北大公社联合战斗团’成立。

陈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帮助式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

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由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发起串连，成立了‘六六串连会’。该会发表八点声明，说：‘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像，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决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陈伯达接见北京航空学院师生的讲话

我今天是来谈教学改革，我们怎么来谈教学改革？

过去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从中国封建社会继承来的，教育制度还有从苏联抄来的教育制度，到现在还不多。一百多年，这种教育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关于教育制度问题，毛主席很早就提出来，他很早就探索新的教育制度，这个新的教育制度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教育制度，是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你们要把它具体化，提出方案，我们现在来就向你们学习，教育制度能不能搞好，要靠大家，要靠毛泽东思想。今天就出这个题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北京新四中赤潮：《“四·三”，“四·四”派斗争的意义》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四三战报》编辑部《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新北大》校刊发表哲学系战斗团写的《校文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必须批判》的长文。

文章说，校文革领导人‘实际上插手组织北京市两大派斗争’，加深了‘左派组织之间的分歧对立’；对两派分歧，‘校文革如临大敌，向全校发出的紧急动员令，公然提出‘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这样的对敌斗争口号来鼓动群众。’”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陈伯达接见清华大学师生讲话

请你们研究一下教改的问题，创造一个新的教学制度，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把它具体化，提出一套大体的方案。

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讲话

傅崇碧同志跟我讲，最近大学生好一点，中学生准备你死我活地斗一下。

你们都是两大派吧？“四·三”派、“四·四”派。

你们现在搞武斗这些队伍都要解散，什么“敢死队”、“飞虎队”，不晓得还有什么样“队”。这些队都要不得。

刚才傅崇碧同志给我看了几张图片，小学、中学校破坏得很厉害，桌椅、板凳、窗户等破坏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

一切革命的知识青年，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揭露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的阴谋活动，彻底批判他们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货色，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对于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工作的干部，应该相信他们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团结他们一道干革命，应该协助他们把安置工作做得更好。对于一些犯过错误的干部，要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而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们，否则，就会转移斗争大方向，就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凡是现在还在外地串连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生产。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陈伯达在首都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河南造总看得远战斗队《与清华井冈山兵团414总部同志座谈纪要》

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我认为你们和刘的矛盾是人们内部矛盾。

二七公社，它们是一种极左思潮，它的组织很不纯，在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时，它能起一定作用，但是这种思潮的组织不能成为核心来主导运动。第一，极左的特点，排斥一切，搞集权，也就是以他为核心的政权不可能真正代表工农。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团派思潮就是最明显的一例，掌了权，用坏人去镇压逆流“托派”，排斥一切。结果统一的清华井冈山祇好分成两半，当然最后清华是要联合的。但再联合起来，“核心”就要转移了。党内历史证明极左思潮可以改造利用，而不能掌权，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得到证实了。第二，在河南二七极左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坏的效果。……严格地说由于二七组成很杂，思潮极左，它和其他组织的

矛盾特别是和八大总部的矛盾有一定成分是地富反坏和工农兵的矛盾。目前以二七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是很困难的，在河南人们心中也是很难通过的。於是核心的作用就历史地落到造总头上了。

争当核心的主要是二七和河造总，这决不是一般的山头、风头问题，而是两种思潮的争权。也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思潮和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团结大多数思潮的争权。这是两条路线斗争在造反派内部的反映。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红卫兵小将要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信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聂元梓在北大校文革常委会议上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

聂元梓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和领导能力，照目前这样的形势，下一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根本无法预料，我们都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局面。因此，我要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建议解散校文革，因为它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学校的运动了。聂元梓提议，我们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说明我们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都无法胜任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请求毛主席批准我们自行解散。另外，校文革常委个人自己愿意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话，可以选择参加自己拥护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我自己是不想干了，我要退下来。

聂元梓讲明了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和要求校文革自行解散的意见以后，校文革常委就有人马上提出反对，有人说聂元梓低估了校文革常委的水平和能力，说校文革成立以后，常委们是做了不少工作的。结果。常委们都拥护这种意见，聂元梓要求解散校文革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

过了几天，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的接见会上，在周总理出席的情况下，聂元梓向在座的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成员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的职务，并且提出解散北大校文革的建议。

江青首先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是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就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想干了，这不行！”

周总理和别的人都默认了江青的话，没有发表不同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谢富治在北京钢铁学院的讲话

谢副总理说：“对钢院不了解，来是主要解决武斗问题的，今天（指七月三十一日）你们两个同学讲钢院都打死人了。

在谢副总理的主持下，座谈一直进行到早晨六点多钟，达成了十一点协议。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一战士
《四·一四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

在团派看来，全国性的内战全国性的武装夺权，是不可避免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演变为“武化革命”。

四一四派认为，对因认识问题而犯错误的军区和部队的干部，必须一看二帮，热情地团结和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那种不加分析地，象去年冲击省市委那样去冲击大多数的军区是错误的，“彻底砸烂”“彻底夺权”更是要不得。

现在全国成立的六个革命委员会中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夺权的，又有哪一个是不依靠相当于四一四而使政权稳固的，事实证明团派夺权以后，常常不能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不能正确地对待他们战友和自己的缺点错误，甚至不能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使政权不能稳固，这也是我们和团派的根本分歧所决定的。因此，成为政权的稳固基础的成为大联合的核心的只能是四一四派。

三、北京高校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错误估计形势提出第

三次大串连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去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这种估计对不对呀？

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还有人《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同志的讲话

清华，走了五、六千。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

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康生同志的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的大好形势。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

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有两种估计方法。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认为形势大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 5000 多人，这不好。

康老插话：

有一个内容可以贴大字报，说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串联这是造谣。不要串联了。出去的，找回来。我有错误，我可以检讨，但你们要协助我一下。

昨天京西煤矿武斗，我批评了他们。还死了一个人。你们武斗要解决，但一万吨煤不要搞掉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给建工学院红卫兵一封信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对北京外语学院造反团冲外交部一事的电话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北师大问题的紧急通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00 支队《重炮猛轰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式的人物——陶铸……》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

北京现在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我最近才知道，听说我是“天派”的后台。“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灵。（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所以，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论，臆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帮助你们。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真正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

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

有缺点错误，是爱护还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两派斗争，找一个借口就要给人家颠覆掉，外部还有人。你们不少人参加，蒯大富、韩爱晶你们都到了现场。（江青同志插话：聂元梓也去了，躲在一个地方指挥。）（聂元梓：我没有去。）总理对江青同志讲：这个情况没证实。师大革委会有缺点有错误自己改正嘛，为什么需要外边的人去干涉。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 00 支队周泉纓、杨忌非《炮打篡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袁世凯——评陶铸之流 1967 年 6 月重版的一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

1967.09.23；中发〔67〕304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军区、省军区并转各群众组织：

中央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现转发给你们。

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

附：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对在外地串连的学生作如下决定：

一、除中央特许的少数人以外，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应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北京；

二、北京的学生在外地设立的联络机构，应立即全部撤销；

三、希望各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军区以及各革命群众组织，帮助动员北京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

四、本决定，也适用于到本市农村、工矿企业、机关和学校串连的学生。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周泉纓《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我的第二次检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陈伯达戚本禹接见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部分中学教师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北京部分中学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谢富治接见聂元梓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关于北京大学校文革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红代会集训同学的讲话

前几天，主席有最新指示，要我们开办训练班。这样会有很大好处。

搞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决战，第三年是收尾。现在文化大革命一年半多了，现在基本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垮了。

四、北京市革委举办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讲话

最近以来，有些不怀好意的、甚至恶意的、甚至坏人、甚至走资派挑动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经常有一点哪。这一点我看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思潮，一个是坏人利用这个无政府思潮，你清华已经贴了伯达同志的大字报，听说那个人没有很好处理，怎么处理呀？就那么算了么？我看不行。据说你们清华有一个人去告诉戚本禹，怎么讲了，你们上百人的材料我都整……那一天就抛出那个人的材料，你这是开玩笑吗？这是什么话呢？最近党校出了一件什么事，你们听说了没有？你们消息大概比我灵通。（没听说）都听说了的么，李广文我也不认识这个人，没见过这个人。康生同志经常都是很保护这个人。他翻脸不认人，就贴康生大字报，贴得很恶毒。我听了这件事很生气，肯定是个坏人。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啊，听说我们政法学院也贴了康生大字报，还是那个人的大字报。你在小站搞伯达材料，这个账没清算。现在就这样做呵，这种办法千万不能这样子啊！千万不能上坏人的当啊！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李钟奇传达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吴德与中国人民大学“三红”部分战士谈话

战士：周景芳的态度极不老实，很嚣张，说没有接到你的新指示前，他什么也不说。

吴德：就几条嘛：1，你们根据戚本禹、谢富治指示去执行；2. 你们可以对他进行揭发、批判、质问；3. 谢富治同志、戚本禹同志还讲了一条，他回去还有自由，你们不要限制他的自由。要注意六·六通令。就这么几条嘛，最近“大庆公社”抓了人，那不好，抄林杰的家，中央也要通报。

战士：孙泱之死，你知道吗？

吴德：我接到了你们一个报告，说是死在暖气管上，我也很奇怪，1.3米暖气管怎么能吊死？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医院两派组织的讲话

〔时间：3：25至3：55，地点：人大会场。红卫医院即安定医院。清华井冈山、北医八一八、地院东方红、医大红旗、公安部×局、学部等同志出席。〕

戚本禹同志讲：今天找大家谈谈陈里宁问题，我们作了很多调查，请谢富治同志谈谈。

谢副总理：陈里宁的事我没有好好管，戚本禹管了（戚本禹同志说：开始管了一段）公安部李震管。听说为了陈里宁的事你们医院涉及到你们学校（戚本禹同志：医务界）医务界有很大争论，有的说是响当当的左派，有的说是反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我们过去没好好研究，最近作了些调查，群众组织也作了调查，今天与同志们商量一下，不要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事情妨碍大联合，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争起来没什么意思，可不可以这样肯定，这个人当时写了相当多的材料反对刘少奇，反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刘少奇这件事是对的，不能因反刘少奇把这个人就怎么样，不要把反对刘少奇这点作为这个人犯罪的罪名，因为全党全国都在批判刘少奇。但是这个人同时也有很大错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著作，作了大量的修改错误的批判、攻击（戚本禹同志说：是歪曲）甚至是攻击、歪曲，这是很大的错误（戚本禹同志说：反动的）反动的，这部分分量是少，研究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混乱（李震：逻辑混乱）不管怎么样是错误的。但是从全部过程看，这个人神经不健康，我们没有学过医。你们在坐的有好多学过医，这个人起码在某些时候神经不清，所以他的东西，就不能作正确的判断，因此不能说他是响当当的左派，因为他反刘少奇的同时也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不能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这个人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观察，可以了解。有一点可结论，反对刘少奇是没罪的，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不准许的，这种人不能成为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将来有别的问题审查。如果是精神病要治，有什么问题今后审查，所以争论就没意义，肯定精神不太健康。金大夫，我见你几次（金大夫：两次）揭露这个问题，心是好的，愿望是好

的，后来有了派性，是不是？金大夫（金大夫：是，是有派性）有了派性就不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经验。

今天宣布一下，这个事不要再搞了，这个人交有关单位处理。报告不作了，书不出了，剧不演了（戚本禹：报告五月就停止了）两派不要抓住互相搞。他是精神病，今天是不是达成这个协议，搞提乌烟瘴气，这个人的处理交给我们办，停止争论，停止演剧，停止报告，不能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来讲这件事情是好心，后来有点派性，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把这人交国家机关处理。我讲的清楚吗？

戚本禹同志讲：很清楚！很清楚！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谢富治李钟奇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学习班上的讲话

谢副总理讲话：

今天不是你们请来的，是我自己找得来的。找得来的有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陈伯达同志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复课闹革命哪，好象怎么都响应得不那么热闹了，没有动起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关心这件事情，昨天陈伯达同志去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就问到了这件事情，就是复课闹革命闹了半天也没有搞。所以伯达同志就特别给我打电话，说你明天就去，去跟大学谈一谈。所以我今天就来同同志们谈一谈。有十来个学校，可以不复课，让他去打架，什么钢铁学院啊，什么民族学院啊，什么人大啊，什么第一外语啊，第二外语学院还有工业学院哪，还有什么清华，还有什么北大，总有十来个学校，让他什么时候打够了（众笑）说我们不打了，我们再开学，其余的62个学校52个学校开课，十个学校让他们去打架。

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学习班的问题。学习班，北京市已经知道有数的有六百几十个学习班，有4万多人，实际上可能超过这个数目。几个经验。

这个学习班第一就是要三结合，就是有革命群众的领导人，有解放军，还要有已经站出来的和准备站出来的干部，起骨干作用，核心作用，你没有干部，你差了这一条。

第二点，要集中少数学文件，而且通过这个文件把复课问题解决，而且集中解决问题。

第三、最主要的是解决大联合的是自我批评，各派自我批评，所以干部在里边好得很。那么红卫兵的自我批评，就感动了干部的自我批评，干部的批评又推动了红卫兵的自我批评，所以办得好，都是这样。这个自我批评，大学生最困难。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泉缨《和周泉缨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戚本禹接见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蒯大富同志给谢副总理的信
谢副总理：

我们要求提审反革命小丑周泉缨、杨忌非（均已被捕）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反对伯达同志，中央文革。他们背后有坏干部支持他们。我们准备把这个案彻底搞清楚，但市公安局军管会不同意提审，请求您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蒯大富一封信的批示
可以拉回来批判斗争，但只能文斗，不能打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首都中学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呼吁书——走彻底革命化道路》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关于制止北京外语学院武斗的指示

一、外语学院昨天发生的这场大规模武斗，为什么这股武斗风总是煞不住？要检查形成这次武斗的原因，追究责任。

二、外语学院二派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

三、这些问题的解决靠武斗是不行的，只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李钟奇在中央民族学院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北京钢铁学院武斗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工代会大学红代会的讲话

江青：今天请了大、中学的小将参加，你们提了好多问题，我想你们还是好好听听工人同志发言，有一个条子说“据说要放寒假了，引起很大混乱。”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这是制造混乱，不要上当，还有什么要下厂往外跑，总之，是不想坐下来搞斗批改，要提醒你们现在煤很少，有些学生自己搞煤，用电在屋里做饭吃，这应当吗？一点也不顾全大局，希望你们给这些人说不要这样干，学校问题最近要专门找个时间听听汇报。

内燃机工厂一工人发言说：现在学生还到工厂去串联，去贴大字报，再去可以不可以赶他们？

伯达：可以，是什么学校去的？

工人：农机学院，还有“新人大公社”。

伯达：有礼貌的请他们回学校去，告诉他们，工厂的事，我们自己管，

京棉一厂工人又说：“人大三红”也到我们那里贴大字报去了。

总理：各单位都回本单位搞斗批改。

江青：我们建议学校红卫兵小将不要包办代替工厂的事情，这样搞不好。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时谈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周总理指出：“政法学院有个陈荣金，起初大家都支持他。你知道他到处煽动，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太猖狂了。”

《联指》代表插话：“这家伙到处去夺权，他们还到广西同另一个组织结合夺公安厅的权。”

戚本禹同志说：“政法公社就是到处去夺权。”

周总理接着说：“我们现在已把他（指反革命分子陈荣金——编者）拘留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陈伯达谢富治在清华大学附中的讲话

陈：同学们，我们今天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请问你们看到中共中央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了没有？

第二请问你们对复课闹革命有什么意见？

众：坚决复课闹革命，听毛主席的话，复课闹革命。

陈：那我们就没有话说了！（众：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批判《四一四思潮必胜》

张春桥接见上海文艺出版界代表时说：

我们不能同意那样一些观点，说：“造反派敢冲敢打，敢于打天下、夺天下，但坐天下不行”，不要以为是共向东就这样说，我最早读了一下清华“‘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传单，说“四一四”要坐天下，“四一四”必胜。说上海市革委会也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就是说造反派能打天下，文章很隐晦，看了两遍才看懂，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弱点，但不能说要重新换班，权力重新再分配。我们在掌权中来学习嘛！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谢富治在首都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全国有十四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五、六个也快了。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组织建设组《红卫兵组织条例（草案）》

五、北京高校两派武斗加剧

一九六八年二月底，北京高校只有少数学校成立了革委会，大多数学校还没有实现大联合。所以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将北京主要高校的两派头头集中起来学习，要求他们“斗私批修”，早日实现大联合。

清华500多名干部中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参加了414，占414全部7000人的百分之五。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石油大庆公社谈北京公社利用反余秋里和其他几个副总理，实际是炮打毛主席的司令部时：

江青同志打断他的话，气愤、激动地说：去年二月逆流嘛你们学校起作用了没有？（答：有一些）只有一些吗？二月逆流你们怎么表态的？（答：我们认为有二月逆流。）

总理：你们反击了没有？

姚文元：我没听清楚，你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一遍。

总理：二月逆流嘛，他（指余秋里）犯了二月逆流的错误！该炮轰嘛！

江青：反击二月逆流，炮打谭震林是不对吗？打倒谭震林不能打吗？我还保了他，你们打嘛！你们打得对嘛！有两个展览根本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没有突出毛主席，没有突出林副主席。反击二月逆流你们一直没有表态，我们对这一点是清楚的。二月逆流时，你们是哪一个司令部的？

总理：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应该讲你们自己的错误嘛！

江青：你们一点都不批余秋里，主席对余秋里是一批二保，你们是一再地保，你们倒是一贯正确了？！

总理：应该谈你们自己的错误，从二月份以后。

（大庆公社代表谈“五·一六”问题）

江青：你们已经捞不到什么了，你们还讲什么“五·一六”。我们反“五·一六”的时候，你们倒不知道在哪儿睡觉呢？

总理：别人反击二月逆流时，你们是不赞成的，你们就是错了。

江青：文化大革命两年多了，你们很缺乏自我批评，特别是你，你们一直保，倒成了一贯正确的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的，你们是反对我的，你们口头上讲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实际上炮轰我们的，你们轰吧！胆小鬼才怕轰呢。你们从头到尾保，现在倒一贯正确了？！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是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想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喊：打倒谭震林！）

姚文元：他们想推翻以毛主席、林副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谢富治：二月逆流是想推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我很气愤，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不要有无产阶级的义愤？！（答：要！）一贯保的倒成了一贯正确，你们一点不做自我批评，不听！不听！

陈伯达：你们一贯不正确，你们一贯不正确。

叶群：二月逆流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中央文革。

康老：余秋里搞大庆展览时，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像搞掉，而去买刘少奇的黑照片。

江青：一个石油展览，一个农业展览，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我没去看。

康老：两个展览我都去看了，都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的。

叶群：这些问题都是实际问题，二月逆流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中央文革小组！对待二月逆流的问题，是个大是大非问题。

姚文元：我刚才叫他重复一遍，他不敢重复，有胆量再重复一遍。

江青：你有胆量重复一遍，没有胆量吧！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我希望你们多做自我批评，你是个头头，要把这个意见带回去，让群众帮你检查。

各位首长：完全拥护江青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北京市革委会开会，谢富治在会上讲话说，各级革命委员会都要革命化，为此要先进行整风，各级革委会都要整风，要真正实现“革命化”，市革委会要专门开几天会进行整风（这是当时经党中央提倡的一项活动）。

聂元梓在会上说：我同意谢富治同志的意见，市革委会需要进行整风。但是，要整风，“首先要整谢副总理的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一级一级地从上往下整，先从谢副总理开始。聂对谢富治的主要意见讲了几条。

1，我对谢富治，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谢富治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并不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从资历从职务上来说，都很不错了。但是，他还是紧紧地投靠在江青脚下，投靠在中央文革脚下，别人不用说，在王关戚倒台以前，连对于戚本禹这样的“小字辈”他都是毕恭毕敬。在市革委会讲话，言必称“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一定要紧跟江青同志”，还要一一历数中央文革的成员，不厌其烦地重复道，“康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伯达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王力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关锋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戚本禹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等等。他还宣布，谁要反对哪一个都不行，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中央文革哪一个也不能反，反江青是反革命，反陈伯达是反革命，反王力是反革命，反关锋是反革命，反戚本禹也是反革命...真是令人感到

不堪入耳。当时我们正在同王关戚进行斗争，“除隐患”战斗队的活动，动静很大，听了谢富治这样的讲话，我气得手都直发抖！

2，周景芳在市革委会里搞名堂，我私下里对谢富治讲过好几次周景芳在市革委会中，设立了一个情报小组，各单位都有耳目，背着市革委会秘密调查各单位的运动情况，和群众组织头头的动态，上报中央文革。这么秘密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这个小组里，有一个参加市革委会工作的工人，他不愿意跟着周景芳搞特务活动，就把实情告诉了我。我觉得在是革委会里这样搞是不合法的，就对谢富治讲周景芳搞特务活动。谢富治呢，还为周景芳开脱，说周景芳在北京市革委会做了不少工作，你不要反他，等等。我明明是揭发周景芳，让谢富治这么一说，我是反周景芳了。可是，谢富治这话说过去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西单商场大武斗。一追查原因，是周景芳指挥西单商场武斗，周景芳暴露出来，所以垮台了，这也不是谢富治把他拿掉的。相反地，事情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谢富治也没有把周景芳活动的罪行公布给市革委会的委员们，他自己更是一句检讨的话也没有。这些都促使我对谢富治产生更深刻的认识，认定他就是中央文革江青那一伙的。

3，对于王、关、戚，谢富治的态度同样是全力维护和吹捧他们，以致把北京市革委会变成了王、关、戚及其后台中央文革的一个搞阴谋活动的据点。经我多次向谢富治讲王、关、戚等利用北京市革委会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以后，谢富治仍然一再地为他们做解释和开脱。后来，谢富治不仅将北京市革委会作为他们活动的据点，还想在要求市属各级革命委员会要经过整风实现革命化和制定各级革委会革命化条例的幌子下，变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如北京市革委会一样，成为他们活动的据点。因此我在市革委会会议上讲，制定革命化的条例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实现思想革命化。所以，要整风就要首先整谢副总理的风。

聂元梓说：这样就打乱了他们以革命化的口号下，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这样就引发了会议上的冲突，导致市革委会会议矛头一转，出现集中火力批判我的上述情形。

第二天停止开全体委员会议，开小会批评聂元梓“保守”，“右”，“压制革命派”等等，谭厚兰、王大宾、徐凯(工厂的工人)等相继发言。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一点钟，北京市七个学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南校门，西校门，东校门，西南校门，都是来武斗的学生，都拿着棍棒，成千上万的人。

谢富治、吴德、丁国钰到了北大，他们三个人和聂元梓到学校的广播台讲话。广播台拥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谢富治来了，学生们就闪开一条道，让他们过去。就那样，人都得很难通行。广播台的门已经被外校学生砸开了。谢富治在大喇叭里讲，外校的学生都离开北大，要求北大的学生在校文革、聂元梓的领导下闹革命。他一讲话，外校的学生呼拉一下子都走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北京大学校内的两派打起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到学校来，到现场制止武斗，到井冈山总部去。李钟奇和聂元梓走到井冈山总部占的那座楼，在楼门口，迎面过来三四个人，就向他们动手。李钟奇头上挨了一拳，打出一个包，聂元被一个叫樊能廷的学生用匕首扎伤。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钟奇同志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
新北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你们要立即停止武斗。

新北大公社、井冈山兵团各派五名代表，一、二、三、四、五把手参加，由校文革和解放军领导处理武斗善后一切事宜。时间：今天上午八点；地点：哲学大楼 206 号

此外，全体职工们，同志们：

我今天和聂元梓到现场制止武斗时候，有的人拿匕首直接刺伤了聂元梓同志。这个凶手，希望全校师生员工动员起来，把凶手抓起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李钟奇同志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
新北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武斗是错误的，呼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大家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双方退出武斗现场，恢复正常秩序。

由于井冈山的同志们拒绝按时参加会议，至使今天会议不能进行，这样作法是错误的。

为了制止武斗，我们现在组织、派出了调查组，有宣传队马继荣、王永钢、李乃坚，北京卫戍区军训总指挥部梅谦，市公安局军管会吴保果，校文革王海忱、唐春景等人组成制止武斗调查组，马继荣同志为组长，王海忱、吴保果等同志为副组长。

希望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大群众组织提供方便条件以利制止武斗和武斗的调查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谢富治温玉成李钟奇在北京大学制止武斗的讲话

谢副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刚刚召集了十万人的大会后，北京大学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行为，是直接反抗中央、中央文革的，是不能容忍的！”你们不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以及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斗争聂元梓同志，你们的大方向哪里去了？！这是违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现在，我和温玉成同志代表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宣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研究的文件：

（一）慰问被刺伤的聂元梓同志，慰问一切被打伤的人员、革命群众、革命小将。

（二）井冈山等组织应立即自己交出刺杀、打伤聂元梓同志、李钟奇同志的凶手和后台。

（三）外校来北大参加武斗是完全错误的，应立即撤出，回去作自我批评。

我要补充一句，这一句不在我的记录里：‘如果不听，还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让他们做去，看他们走到哪里去！’”

（四）在校军事人员和支左部队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保护小将，保护群众，保卫国家财产。要求全校各派交出一切凶器，释

放一切被抓人员。全校一切革命群众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原则下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共同对敌。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清华大学百日武斗的第一天，

4 1 4 占领了旧电机馆，

汽车楼是5月14日晚上7时左右占领的，同时占领的还有焊接馆。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四派占领了清华西主楼。团派占领了9 0 0 3大楼，旨在控制四派通往东门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3时，团派手持长矛、大刀等武器的2 0 0多人队伍轮番进攻，东区浴室内的四派守军拼命抵抗。

4时30分许，主楼区的四派1 0 0多人前去增援，与团派阻击队伍在东大操场西边路上相遇。

5时后，四派第一次出动土坦克，掩护6 0余人冲锋增援。

9时许，团派队伍从北、西两边攀梯进攻，把浴室守军逼至浴室二楼屋顶，双方展开拼杀。

在团派攻打东区浴室之际，四派总部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纠集大批人员，攻打团派占据的第一教室楼。……团派守军拼命抵抗，打退四派的多次进攻。

13时许，团派燃起的大火以及经过喊话劝降，最终使浴室守军打着白旗下楼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团派发动进攻不久就占领了东区浴室的一楼，但是，他们无法攻上二楼。因为4 1 4在二楼楼梯焊了一道坚固的铁门，决心固守二楼（东区浴室只有两层）。要占领整个东区浴室必须首先占领屋顶，因此团派很早就架设云梯，向屋顶发动了进攻，企图占领屋顶。

四派守军大部在二楼休息待命，只派几人通宵在浴室屋顶戒备，发现团派进攻，主力自然到屋顶迎敌。

团派对东区浴室发动进攻以后，四派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派出一支队伍包围第一教室楼，实施佯攻。四一四除了投掷砖头、瓦片、燃烧瓶之外，并没有攻入“一教”的行动。

“围魏救赵”不成之后，四派就组织队伍前往东区浴室增援。四派担心在主楼通往东区浴室的路上遭到团派伏击，因而绕了一个大弯子，把队伍集中到学校东北角的高压实验室，在那里建立了基地，然后才开始行动。这个时候大概是8时左右。

出动土坦克时间最早也在10时以后。

一名414战士被团派长矛刺中，出现气胸，有生命危险，东区浴室指挥官与团派代表谈判，团派同意派车将414伤员送医院救治，414守军才放弃东区浴室。

六、“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晚，奉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北京市革委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会议，决定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市革委会负责人和北京603个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决定7月27日上午组成以工人和八三四一部队军管人员为主的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由601个工厂的三万多工人组成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开进清华大学，任务是制止武斗，拆除工事，宣传中央“7.3”布告等文件精神。

宣传队的各级负责人主要由各工厂的军代表担任，总负责人是迟群和谢静宜等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多，手无寸铁、只带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的工宣队的大队人马到达了清华大学的南门、西门和东门，把清华园围得水泄不通。工宣队指挥部要求必须在十一时开进清华园。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声势浩大的行动，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和以沈如槐为首的“四派”头头们事前皆毫无所知，尽管他们之前皆多次要求上面出面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行动，双方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不知道后面的背景，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么多工人包围了清华园肯定是有来头的，肯定是来制止武斗、夺权甚至占领清华大学的，说不定要抓走多少人。一种本能的对立和反抗情绪立即武装了清华大学高智商们的头脑，特别是蒯大富等“团派”的头头们。于是，“团派”作战部长立即带领自己的人马和武器堵住了西门，阻拦工宣队进校。后来由于先攻进了南门的工宣队员冲了过来，强行打开了西门，工宣队大队人马才于中午全部开进了清华园。

这时，力量较弱在武斗中吃过亏的“四派”头头们头脑立即清醒了过来。“蒯大富和团派的末日到了，自己的好运来了。”于是，“4.14”的头头们下令，热烈欢迎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9时左右，工宣队刚刚抵达西主楼的过街楼，414人员迅速搬开路障，引导工宣队进入主楼及其他据点，并在西主楼与工宣队进行谈判；

在工宣队进入主楼的同时，414的武斗人员交出武器，

当时布置藏匿了部分武器，但在下午2、3点左右被围困在科学馆的414人员获救之后，就全部上缴了；

四派和工宣队的领导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谈判，双方就签署了关于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的协议，并于10点半左右公开广播，工宣

队对此深感满意；

工宣队进入414的所有据点，受到414方面的热烈欢迎和积极配合，拆除工事和收缴武器的工作进展顺利；

在工宣队和团派冲突期间，414组织人员给工宣队送饭送水，协助工宣队救治被团派打伤的伤员。

工宣队进校后，立即分成八个团按计划分片包干，很快完成了对两派据点的“分割”和“包围”，并发起了宣传攻势，要求两派

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清除路障及铁丝网、电网等。工宣队以 50 比一的人数优势包围、扣留武斗人员，命令他们“缴械投降”。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十一点 30 分，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派人通知蒯大富（蒯当时不在学校让人转告），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开进清华大学，要蒯大富的“团派”欢迎和支持等等。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午十二时，从北京站接人回来的蒯大富才得知学校发生的情况。头脑发昏的“蒯司令”简单地把数万工人围困、进驻清华园看成了工人的派性行为 and 北京市或中央文革某些人（如谢富治或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黑手操纵的镇压学生运动事件。于是，蒯大富登上了“团派”总部所在的“静斋”的屋顶，大声指责围困在楼下的工人们镇压学生，支一派打一派，质问工人“为什么不去围困“四派”占据的主楼？“并呼吁工人们退出清华园，不要上某些“黑手”的当。接着召开了“团派”头头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井冈山兵团”的生死关头到来了；决定紧急上告市委和中央；命令各据点坚守阵地，拼命抵抗工宣队的“围攻”，誓死保卫“井冈山”，必要时可使用武器。

在清华园内，中午时分已经全部进入清华园的工宣队立即组织队伍进驻已被“团派”占领的科学馆，把馆内人员全部带了出来。工宣队的人马接着进驻礼堂，这时，团派的人引爆了发电地雷，但没有伤人。经过谈判，工宣队被允许进入，查获了“团派”的一些武器、雷管、炸药、长矛和自制枪支等武斗工具。工宣队在接管电厂时，“团派”头头下令开启了电网电闸，阻止工宣队进入电厂。

下午一时多，“团派”作战部长带领队伍用石块、长矛进攻位于“静斋”后门的工宣队，致使许多工人掉进了荷花池（即当年朱自清著名散文《荷塘月色》中的荷塘），并扣押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的汽车司机。下午三时多，40 多名工宣队的工人和军代表先后当了“俘虏”，被“团派”的人关进了“静斋”，遭到了审讯和殴打。随后，这支“团派”的敢死队在清华园的许多地方用长矛和手雷弹等武器进攻和袭击工宣队，致使一百多名工人受伤，仅作战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伤了 7 名工宣队员。

当天下午，“团派”的另一支 60 多人的敢死队在“静斋”、大礼堂等地用手雷弹、长矛、石块、弹弓等驱赶和袭击工宣队，造

成130多人受伤，一名军代表被炸伤，一名老工人被刺成重伤。下午两时左右，被工宣队围困在十、十一、十二号楼内的“团派”人员拼死突围，向工宣队冲击，许多工人被刺伤、炸伤、砸伤，一些工人跳楼摔伤。这期间，第二机床厂副科长王松林、五四一厂工人张旭涛、北京市供电局工人潘志洪三人先后被手雷弹炸死。另外，住在十三号楼的数十名外地造反派和上访人员在“团派”的鼓动支持下，用“团派”提供的武器参与了追赶、攻击工宣队员的活动，并使一些工人受伤。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蒯大富赶到市委告状，质问市委负责人吴德：“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不是好惹的，我们要决一死战，一定要揪出黑手！”而吴德始终不说是伟大领袖的命令。

晚饭后，谢富治、吴德、工宣队负责人同蒯大富见面。谢富治命令蒯大富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据点，并与工宣队负责人立即回清华落实命令。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自午后至深夜，在工宣队占领和“团派”反占领的过程中，“团派”各武斗据点的人员各自为战，向工宣队发起多次冲击。他们贴出大标语“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生做毛主席的红卫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

在双方的争斗中，又有一些工宣队员负了伤，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韩现忠被长矛刺死，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被开枪打死。“井冈山兵团”的骨干精英和亡命之徒们拒不向工宣队投降，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晚八时多，与工宣队代表一起返回清华园的蒯大富被带到了清华园中学，第一次见到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总指挥官迟群等人。经过谈判，达成四条协议：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出武斗地点。双方签字画押后立即执行。

一直到7月30日中午才在解放军部队的“保护”下撤出最后一个据点。

蒯大富按工宣队的要求命令部下们停止武斗、执行协议之后，已近深夜。

27日晚8、9时，蒯还在北京市革委会与率领工宣队的8341部队军人代表之一迟群“谈判”，讨价还价。迟群要蒯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凶手，蒯对前两者表示认可，但坚持不能交出任何人。

到晚上11时多，蒯一人独自回清华，召集尚在抵抗的团派十几位武斗指挥中坚开会，蒯声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决意团派撤出被围困一整天的清华园。做完这些人的说服工作，已是28日凌晨2时多，蒯率团派人员从工宣队未有把守的北门跑了出来，大部分到了北航。

蒯决定向中央反映团派的处境，本来，团派总部工作人员有中央诸要人的绝密电话号码，但蒯此时已与掌握号码的人失去联系，只好跑到体院造反派处要了一台车，开到西单电报大楼向毛泽东等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诸人发了一通电报，声称十万工人血洗清华园（直到此刻，团派也未弄清围攻清华到底有多少人），形势万分危急，特向中央紧急呼救云云。

七、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深夜，毛泽东突然决定召见“五大学生领袖”。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韩爱晶接到中央领导人召见的通知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二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来的电话。刘丰说：“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说：“可以派别人代替我去吗？”

刘丰说：“中央首长要你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我起床，准备纸和笔又打电话给汽车班，请司机到红旗院门口，即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口。

奇怪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次等待中央首长接见与哪次都不同，似乎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见中央首长，而是在进门的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次数已记不清，早就习以为常。如果是重大活动有正式入场券，一般从东侧正门进大会堂，有时还在主席台就坐。至于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接我们，说一声：“来了？”握握手我们进去。在会议厅，比如安徽厅，或福建厅，或江苏厅坐下，等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那么我们先在小客厅里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学生头头，工人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有几十、几百的学生、工人、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起，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种会议是文化革命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流传很多，影响很大的。

可是这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门里等着。

聂元梓、我、谭厚兰、王大宾先后来了，坐下来等着，很自然我们议论起今天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严肃地说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聂元梓说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她白天已打电报给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谢富治副总理出来问：“都来了吗？”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富治后面走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走在前面，挨在谢富治身边。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看我问道：“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也站住了，我说：“没有。”

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卷起来的裤子抹下来。因为天热，我白天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又站起身说：“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跨度太大。我觉得好像一下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

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去。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走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在门口迎我们。我们三步并着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们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都是一些年轻人”。

我们又依次跟其他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还跟黄作珍同志握手说：“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然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我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这是毛主席会见客人，召集中央领导人议事的一个厅室，一个一个沙发围成大半个圆形，沙发旁边有茶几，茶几脚旁有白色搪瓷痰盂。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已经在这里碰头议论了一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在外面走廊口等待的时候。

陪同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有：毛主席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毛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在我们坐定以后，大会堂女服务员给大家分别倒了茶水。

蒯大富是主角，清华找不到蒯大富，这可急坏了北京市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深更半夜，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全市各单位高音喇叭反复广播：

蒯大富同志，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

北航广播站也接到了通知，全院立即响起了寻找蒯大富的广播声。

戴维堤当时正在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听到广播后，立即跑回保卫部所在的“红旗院”，叫醒了蒯大富。

蒯揉着双眼，问：“什么事，什么事？”

快去人大会堂，中央首长找你开会，找了你半天了，全市都在广播找你，快快快！”我急忙告诉他。蒯不情愿地下了床，嘴里直打哈欠。

马上叫了一辆车，送蒯大富去了人民大会堂。

蒯大富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晚了两个多小时。他一进接见大厅，才知道是毛主席亲自召见，满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对着伟大领袖便嚎啕大哭起来。毛泽东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握着“伟大领袖的巨手”哭得死去活来，一边哭，一边叫嚷着要抓“黑手”。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

关于制止北京市大学中的武斗问题

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

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井冈山他们这个作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这个社会影响。

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

蒯大富，你们的行动是不是对抗中央？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革委会开会不算数，只好伸出「黑手」，调动工人制止武斗。武斗这么多天，工人敲锣打鼓来，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大多数学生，脱离你们自己人。说你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对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

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关于北京市大学中的两派斗争问题

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它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作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四·一四（师大）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

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纁，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说没有自由了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四·一四右的。

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窠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

「杀牛、宰猴、火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例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团是省无联式的大杂烩，还要搞反夺权。别的学校也参与了，你（指韩），蒯大富都有份。

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

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

听说天派是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的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用个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

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卿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

北外六·一六领袖刘公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要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玩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关于大学的教育革命问题

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

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

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

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

师范大学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关于今后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问题

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

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蒯大富的检讨

八、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谢富治对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同学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谢富治对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的讲话

现在有几件事，当着两方面说一说：

第一条：清华井冈山和 414 在言论上，行动上要支持宣传队，不得有任何障碍，妨害宣传毛泽东思想（包括广播台使用）。

第二条：清华两派立即停止互相攻击，要把矛头对准刘邓陶、蒋南翔，这一条要立即执行。

第三条：全面落实 7 月 30 日的“六条协议”，（念六条）很好嘛！

第四条：清华两派要主动接触，为革命大联合创造条件。两派首先无条件放回所有被抓的人，除 4 个外全放，今后不准任何人借口抓人，不管 414 的也好，什么人也不能抓，你还抓宣传队，抓就抓我好了。

第五条：清华两派确定联络地点，确定联络人员。这一条很好，是好事情嘛！

第六条：在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积极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

第七条：是我加的两派都如此，接受宣传队的帮助和指导！你不要看不起人家老粗，工人、解放军。你们是大学生，毛主席就支持老粗。毛主席讲大学生要渗点沙子。我不懂，毛主席给我讲的：你大学生是一堆粘土，要加点沙子，渗点老粗，改善你那个团粒结构，就是要渗工人和解放军，我谢富治也是老粗，你又说我那七条，你压工人，你压我就反对。他们发誓不敢赶！你宣传队要体会他的困难，要帮他的正忙。

什么七条、六条，就是一条，支持、欢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是有人反对宣传队就是犯法！

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纪念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因此，红卫兵和一切知识青年都必须拜工人阶级为师，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认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即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当前，学生同志们应当热烈欢迎由工农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努力同工农兵打成一片。

本报七月二十二日编者按中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

是“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大学生，而不是指那些重视工农、愿意向工农学习的大多数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国家不需要轻视工农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反无产阶级的思想都应受到批判。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

“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他回答“要准备什么？”的时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以后），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加写的一段话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

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以后），毛泽东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驻军队院校的批语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

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工人只要管工厂就够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校外的工人参加。”《十六条》说的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难道工人不算“群众”？难道工人阶级不算“自己”？

“工人不懂教育。”某些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这样说。还是收起你那一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架子吧！

“工人不了解学校情况，不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同志，不要着急，工人是会了解的。

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团结、帮助那里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联合大多数群众，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促进那里的斗、批、改。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当前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

一九七〇年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1970.06.05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于春桥同志酌定。

毛泽东六月五日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六七年四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按照中央的部署，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军训，恢复上课，搞好教育革命。

可是经过一年以后，只有少数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教育革命也没有开展起来。一部分学生外出搞串连，一部分学生在校搞武斗，还有一部分学生在家当逍遥派。

二、在中等学校，存在着“四·三”派与“四·四”派的斗争，争论谁是最老的、最革命的造反派。

在大专院校，存在着“天派”与“地派”的斗争，争论是批谢富治还是保谢富治。

三、进入一九六八年五月，北京大学的“新公社”派与“井冈山”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发展到公开武斗，并有外校人员卷入，聂元梓被人刺伤。

四、进入一九六八年五月，清华大学的“团派”与“四一四”派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发展到使用热武器的阵地攻防战。从五月份一直打到七月底，号称“百日武斗”。

五、2004年4月，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在香港出版。沈如槐倒是很老实地承认，自己作为“414”的一把手，派人参与过“揪刘火线”，到过中南海，反过刘少奇、王光美；派人参与过“火烧英代办处”；派人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在学校武斗中，下令部下制造武器——从手雷弹到装甲车；还派人炸毁了高压电线杆，导致清华园和中关村大面积停电；还组织人马抬着尸体在天安门广场游行……

在《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中，沈如槐将414的主要观点作了一个概括，这就是：

- 1、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
- 2、文化革命“部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论”、“收尾论”、“转舵论”、“两小撮论”；
- 3、针对干部的“平黑论”；
- 4、针对群众的“平保论”；
- 5、针对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
- 6、红卫兵小将应该做到“五个正确对待”论、应该主动为革命干部“让贤”论；
- 7、大胆解放和使用干部，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 8、反对冲击军队；
- 9、反对极“左”思潮；
- 10、“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

沈如槐认为：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清华414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做了如下六件大事：

(1)与蒯大富决裂：坚持不懈地批判蒯大富的错误，与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彻底决裂，建立了一个政治纲领明确、组织机构严密的群众组织，打破了蒯大富的一统天下，冒着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的

巨大风险，阻止蒯大富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使其红卫兵专政始终没有披上合法政权的外衣，从而减轻了极“左”派的危害；

(2) 大力解放干部：解放干部促进三结合，这是4 1 4的政治纲领。4 1 4为领导干部取代红卫兵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而大造舆论，在清华为保护和解放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把谭浩强（团委副书记）、罗征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应中（党委常委）、刘冰（党委副书记）四位干部作为典型对象，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解放干部的运动；但是也错误地批斗了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教师；

(3) 坚持反对极“左”：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这是4 1 4的理论旗帜。4 1 4旗帜鲜明地反对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反对打倒一切干部，反对冲击军队；但也犯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和个别人在个别地区“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

(4) 创立四派思潮：与团派就如何评价解放后十七年的中国和清华的党和政权的性质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任务、路线、方针等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刻而又广泛的论战，形成了著名的“四一四思潮”并在清华坚持实践“四一四思潮”；

(5) 反对中央文革：坚决而又讲究策略地反对和抵制中央文革处理清华问题的基本方针，与谢富治、陈伯达、戚本禹等中央文革的大人物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6) 开展武装自卫：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与团派极端分子进行了“百日大武斗”，阻止了蒯大富消灭反对派的图谋，最终与团派同归于尽，并导致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在武斗中犯了炸高压电线杆的错误。

“四·一四”思潮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与中央的路线并不一致，这从它反对中央文革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同时从十月政变后它享受到的政治待遇，也可以看出。

六、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后，北京市大专院校的派斗、武斗，对北京市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影影。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解决北京市大专院校的武斗、派性斗争问题。解决的

办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派工人、解放军战士进驻学校；一条是把已经毕业的学生安排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

这样一来，问题迅速解决了。

有人说：红卫兵运动由此终结了。这个话有些言过其实。红卫兵运动的任务转变了，它的活动形式也必须随着转变，不能老是到社会上去冲冲杀杀。其实，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各种群众组织包括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任务就已经转变为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只是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包括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思想跟不上形势，仍然停留在前一阶段。

七、毛泽东接见后五大领袖的遭遇

聂元梓

1969年11月，下放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第二年夏天回京治病。

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

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

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

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

聂元梓以后在自己的申述中，反复强调她是反对中央文革的，但是，由于她是文革中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因而就不可能得到反文革领导人的赦免。

谭厚兰

1968年10月，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

1970年6月，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

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11月，去世。

王大宾

1968 年 10 月，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1971 年，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 年，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 年，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1985 年秋，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 69 元。

1973 年，王大宾在接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

韩爱晶

1979 年，被捕入狱。

1983 年 6 月，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蒯大富

1968 年 12 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电解工。

1970 年 11 月初，被押回清华受审。

1973 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

1978 年 4 月 19 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

1983 年 3 月，判处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

1987 年 10 月 31 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

五大领袖的遭遇极具代表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将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

2008 年 8 月 16 日初稿

2011 年 11 月 22 日修改

第二节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造反派要求夺省委走资派的权，中央决定对云南实行军管

（一）群众要求会见阎红彦而冲击军区，阎红彦拒绝会见群众而自杀身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张曙光在接待工作会议上说：“花钱可以买接班人”“花钱可以保权”“要钱财政厅拿，要粮粮食厅拿，要布商业厅拿，要物物资局拿……七亿人口吃不垮。”

下午，阎红彦在省委书记处碰头会上说：“李井泉来昆，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绝对保密。”

晚上，李井泉沿成昆线由禄丰潜来昆明，由阎红彦亲自秘密安排，住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李和阎单独密谈，曾说到刘澜涛历史上曾叛变自首，阎红彦如何检讨，军区内部斗争激烈，×××下不了台，处境困难等等。深夜，阎亲自送李井泉飞往上海。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傍晚，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领导到会。

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

阎红彦说：怎么办？要我去，我就去。

赵健民说：我坚决反对你去。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个别人主张去，多数人同意赵的意见，不能去。会议决定拒绝出席。

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

夜十时许，革命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当时群众怀疑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

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岳肖峡假冒“中央冶金部岳局长”前往渡口，秘密转移到楚雄××医院。

当夜，少数南下串连学生提出“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口号，并提出“要大反黄兆琪、刘殷农的右倾”。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有人在社会上大造谣言，把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揪阎红彦说成是“反革命暴动”。

省委地下司令部转至西山，电话通知各地委说：“省委已转入地下”，并就打游击的问题与专县联系。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阎红彦拒绝接见广大革命群众，有的同志提出：还是去参加的好，不要和群众对立下去。赵健民却说“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并叫其它书记常委都不要出面，说红卫兵抓不到人，阎红彦就可以避一避。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成立了“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参加的共有一百零七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二十九人；科处级干部六十五人；一般干部十三人。

八派认为：这个干联站是一派的参谋部，挑动内战、制造分裂、破坏联合、为四清下台干部翻案、保护一小撮走资派。

这个组织于三月十日宣布解散。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

赵健民对其它书记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当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革命群众问他阎红彦的去处，他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

群众气愤要给他戴高帽子，他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慨，给他戴高帽子游了街。赵健民在汽车上拼力反抗，撕毁了六顶纸糊的高帽子。押解的人看他老实，就卡住他的脖子，赵健民就骂这些人是反革命。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四十三医院。

周总理指示叫赵健民转入附属医院，赵拒不执行，并大发脾气说：“让我转到附属医院是个糊涂主意，是谁出的主意？”当有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时，他仍然对抗说：“总理说的也可以商量嘛！”并要挟说：“如果要我转院，我就一出省，二到专县，三回家。”

晚上，王甸在西山地下参谋部对工作人员说：“打游击这件事早一天下决心就好了，就可以多带一些人出来了”，又说：“如果联系中断，我们组织一个战斗队去串连，每人戴袖套，作旗子，这样好活动一些，到地县委去。”

深夜，阎红彦与周兴在小麦雨共商对策，由周兴主持起草，以省委名义又给黄兆琪等“抗议书”，“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夜，就派专人送到军区大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阎红彦设法对付中央和群众

七日早，红卫兵去云南军区找阎红彦，张力雄出来对红卫兵讲：“我拿我的三十八年党龄、政委身份和脑袋保证，阎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上午，阎红彦决定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这一报告由周兴、王腾波动手修改。阎红彦在“报告”中说自己已作了好几次检查，冲军区“是有计划的行动”，夸大赵健民半身麻木，骨折。这报告当天即发往北京。

阎红彦并对下发出指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观察动向。”

省公安厅接着设立了秘密办公室，组织一群人单线联系，使用暗语，汇报情况，每天都向阎、孙等人汇报。

昆明三大群众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举行七万人的游行，路过昆明军区门口，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辩论中心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

傍晚，叶剑英打电话到昆明军区：阎红彦同志在什么地方？他身边有什么人？安全不安全？你们要说服造反派，不要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躲在小麦雨××军区警卫团的阎红彦于清晨一时许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话，

陈伯达在电话中反复指示“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不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极为不满的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等等。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江青在电话中要阎红彦端正态度。

当晚阎红彦给他老婆王腾波留下一份“遗书”后自杀。并在“遗书”上写道：“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清晨，根据有人提供的线索，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即派人前往小麦峪捉拿阎，清晨六时到达小麦峪时，阎红彦已死。

当日，有人在社会上造谣说：“阎红彦被红卫兵打死了”，“阎政委光荣牺牲”。

深夜，张曙光、×××得知阎自杀消息后，分别带了几十人逃到南窑车站，计划立即上山。张曙光还恶毒地说：“我怀疑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共产主义是这样搞法，我要退党，把枪一提，上山打游击。”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中午，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在检阅台召开十万人大会，介绍阎红彦叛党自杀情况，提出要求派代表上北京给中央汇报。

下午，省委书记处召开紧急常委会议。赵健民派他老婆到书记处说：“健民不相信阎政委是自杀”。

赵健民说：他们（指造反派）只能将我压碎，不能把我压扁。我宁可个人牺牲，也要和他们斗到底。并秘密召集一些人到四十三医院泡制一封“控告信”，“控告”桂尤喜、黄兆琪对他的“迫害”。

昆明市委、公安厅等单位还分别由赵增益等人主持开了追悼阎红彦的大会。

“红卫兵总部”公开宣称：“悼念阎红彦”。

深夜，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大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询问情况，支持革命造反派。并同意革命造反派、军区、省委三方面派代表赴京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革命造反派代表十三人及省委书记郭超、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乘专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了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给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电话指示

请告诉周兴、秦基伟二同志并转告云南省委、人委、昆明军区、云南军区：

一、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容许有任何动摇。

二、你们必须坚定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三、你们只有采取这一立场和态度，才能改变你们过去追随阎红彦继续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四、你们现在必须支持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五、你们必须坚决支持昆明市和云南省厂矿、农村、学校、机关中的革命造反派，教育那些过去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保守派和一些不明真相分子，使他们觉悟过来，特别是要把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决定和两个十条草案，以及这次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全面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和新挑衅的一切文件，给他们双方讲清楚，以便促使他们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进行全面进攻。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省委真正改变错误，而不是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六、我希望省委接受我上面所提出的五点建议，并坚决执行，我相信如果这样做，云南省现在的紧张局势，可以随着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扭转过来，走向健康的发展。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昆明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小组谈话纪要

上次说明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特别是云南日报的工人同志对这个问题注意不够，云南日报要学习文汇报，解放日报，你们力量不够，可以争取外援嘛！革命学生可以协助编辑，但主要是靠自己，保守派可以争取一部份，当然不可能全部争取。还是用原来的云南日报，内容面目焕然一新，我打电话给刘殷农同志，叫他们写一个告昆明市，云南省人民书，局面会很快得到扭转，就可以改变面貌，不要怕。

云南还只是初期苗头，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一定时期是会强调经济要求的，用物质利益来毒害工人，你们要坚决反对，反对谁呢？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个，他们会把矛盾上交，保守派要比你们还“左”，提出极“左”的口号，使领导无法答复，然后到北京来，你们赶快回去，戳穿他们的阴谋，揭穿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新反扑，劝阻他们不要上北京来，上北京来也不能解决问题。

比如云南日报，以云南日报的造反派为主，尽一切力量帮助，其它机关也是一样，你们帮他们去造反，把业务搞得更好。北京有个新情况：群众起来，领导不通，一怕躲起来，就象云南省委一样，这样就促使造反派把矛头指向群众，阎红彦回去后，就是不解决问题，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领导躲起来，这样就使造反派把矛头转向群众，找保守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

七日没进入军区，八日阎红彦就搬到西山小麦峪自杀了，可耻的叛徒。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责成省委、军区进行调查，要有新材料要向中央、军区报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

你们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持彻底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我们完全支持你们。

由于你们的革命斗争遭到种种阻挠，你们激于义愤，一时进入昆明军区大院，这完全要由云南省委负责，而不应该责备你们。

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

深夜，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造反派离开昆明军区大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云南各界造反派的讲话

有的地方落后于北京。特别是云南，很落后，路又远，红卫兵去得晚一点。但是红卫兵终于还是到了，震动了。很多地方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云南就是一个。

十一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又主持了十月工作会议各级领导还没有想通，会上揭发了很多问题才逐步想通，其他省的领导都谈了些问题，多数地方有效，而云南有的有认识，有的没有认识，有的根本没有认识。不理解，怕群众，怕革命，怕革到自己头上。所以云南在第一个高潮，第三个阶段没有很好的动起来，就在一月四日发生了这个事件，是在关键问题的表现，是省委仍然顽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

1月4日工人学生开联合造反大会，阎红彦拒绝了，不但省委不支持，阎红彦也不出来，要求省委第一书记出来检讨，这是合理的。既然保守派喊你出来，你出来了，造反派喊你出来，不出来，这是起了支持保字号的作用。叫他出来，他不出来，如果省委是革命的那么就出来嘛！也没有什么。行动证明云南省委怕炮轰，怕革命，怕当小学生。

由于昆明工人、学生进驻昆明军区大院激于义愤唤起阎红彦的震动，可是这一行动使阎红彦更加害怕，看到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还不挺身而出，相反却离开了昆明，躲在西山，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和群众闹对立，让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人学生发生冲突。当时周兴去，没约阎红彦一道去，群众更生气了，所以对峙起来，第一书记不去，仍然是对立。

而另一书记赵健民被同学发现后却坐车想走。反而向群众挑衅，连郭超也说了真话，的确赵健民在宣传车上，在主席像前指手划脚辱骂群众，这是反革命的行动。并说：“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没想到这样的人在群众面前讲这样的话，当然使群众激愤，游了街，戴了高帽子，这样的领导不是上对中央毛主席，下对群众负责。这样的人怎能当领导呢？他不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而是在群众面前搞义气。在游街中受了点伤算得了什么？这么大一股洪流，

这么大大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受了一点伤算得了什么？洪流总要冲击一点泥土，不然会出修正主义。而赵健民不这样想，云南省委也不这样想，相反还跟群众闹对立，呕气，这样的情绪不对头。

就因为六号出了这样事，七号紧急，八号阎红彦躲在西山自杀了，这是北京去的法医证明的。是自杀的，阎红彦是可耻的叛徒，我在这里公开和你们讲，他的死与在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的工友、学生，没有关系，刚才和毛主席汇报过了，有人想用阎红彦的死来压制革命，是根本办不到的！决不允许造谣污蔑，要把罪名强加在革命工友、学生头上那是妄想，同时与昆明保守派也没有关系，他的死是可耻的叛徒。

至于阎红彦尽管他对党有贡献，他不是高岗分子，高岗压迫他，和刘志丹在一起，也不满意李井泉，他和中央谈过，他到云南前，还专门和我谈过，他说李井泉不民主，专断。那么这样立场的人，他的下场为什么和高岗一样，更可耻呢？他之所以走到绝路上，是他自己落后。阎红彦上不做毛主席的学生，下不做群众的学生，中与各级的干部专断，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呢？

现在，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同意云南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派代表到北京来，他们和我畅谈了两次，各方面的问题都考虑到了，他们在北京任务基本完成，明天他们就要回去了。在北京只能解决大方向，具体问题要到本地解决。自己解放自己，问题在本地。我们有一句话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云南省大学生代表的电话记录

总理：今天不是中央和国务院有个电报给你们吗？希望你们按照中央的希望。完全支持了你们，责任完全在于省委。这个电报毛主席、林彪副主席都亲自看了的。我们希望你们跟昆明的同学、工人，说服他们按照这个希望，按照你们大会的决定，今天夜里还是退出离开军区大院。

陆林：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我们今天和主席团有一些分歧。

我们走的时候太乱，说撤就撤，撤了什么也没有，撤得灰溜溜的，那些保守派真是要讥笑我们了！

王旭辉：主席团一天就作了三个决定。最后这个决定……，现在天已经黑了，我们是郊区的，离这个地方几十公里，今天就没有办法撤走。我们是郊区厂矿，根本没有准备，天黑了突然通知撤离，那不是前几天下着雨，我们搭了一些帐篷，现在怎么撤法也不讲，就限昨天24小时以前撤出，这是办不到的。工作中一点准备也没有，大会主席团就是他们说了算，工人的意见他们根本就不听。从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来讲，从我们进来以后，从来没有听说过宣布什么大会主席团的名单。我们都不知道那些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工人有多少，红卫兵小将有多少，我们根本就不晓得。撤了，咋个搞的，一天就作了三个决定，上午说通知撤，结果工人的意见怎么撤，他又不讲，下午又作了一个决定，暂时不撤，但是到了天要黑的时候，又说要在昨天24点以前全部撤出。外边又下着雨，这个情况大会主席团根本不考虑我们工人的死活问题，叫我们郊区的撤了睡在露天坝坝上去？像这样下着雨，有老的，有小的，有的还是家庭妇女，这些在露天坝里怎么睡呢？他们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大会主席团说了算数，工人向他们提出反对意见，他们根本就不接受。

陆林：我们完全撤走，只是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要省委承认错误第一个条件要省委承认错误，第二个条件，要军区给我们平反，第三件事，我们要在军区设立一个联络站。

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兵团黄兆其为首的大多数学生、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听了周总理电话指示后，立即对造反派进行动员：“我们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无条件地、立即撤出军区大院”。黄兆其等带领大部分学生、工人造反派撤离了军区的，名称仍为“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大会联合指挥部（即后来的八派）；

以云南大学炮兵团等少数组织认为：撤出军区大院，就是右倾，“要反右倾”，“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继续坚持进驻军区大院的即云大炮兵团等少数组织重新命名为：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即后来的炮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周兴在省委机关召集省委机关干部及省级机关各厅局负责人开会，传达周总理六点指示，并介绍了阎红彦叛党自杀经过。

（二）军事院校学员及部分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省委机关红旗战斗团会同红卫兵小将组成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打倒孙雨亭首次大会于晚八时在检阅台召开，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各阶层群众约十万人参加了大会。孙雨亭等被揪出来示众。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于下午二时许在检阅台召开。会上，一些群众组织，借大会“没有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说，“斗争孙雨亭大会，大方向错了”，破坏了大会。

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炮派兵分两路：一路夺了省人委扩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

晚上，八二三派召开了十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开进省委机关，当着周兴、赵健民的面宣布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常委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赴京，讨论云南形势，研究对策。

两大派群众组织也分别推派代表赴京。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谢富治接见云南赴京代表小组的讲话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能叫托派，托派是很坏的敌人。

“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中央哪里提过这个口号，报纸上也没有提过。全国也没有这个口号。

关于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在北京也有这么一股风，凡是有当权派参加的造反派，就认为不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可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提出的，他们想挑起造反派内部

起矛盾。关于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在北京也有这么一股风，凡是有当权派参加的造反派，就认为不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走上层路线这个口号可能是当权派和保守派提出的，他们想挑起造反派内部起矛盾。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军委制止昆明各军事学校机关冲击军区的通知

昨天军区军医学校少数人和今天外语学校少数人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人，竟敢煽动群众，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是违抗军委命令的错误行为。昆明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当坚决捍卫和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的八项命令，立即退出后勤大院。如果你们对军区有何要求，可以派少数代表到军区商谈，广大群众应该劝说他们退出后勤大院。好让后勤部门进行备战工作。否则，你们中间的负责人，要对这一行动负责。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请北京的同学都从各地撤回来。你们反映的一月份冲军区问题，提出“革命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问题，所谓反右倾的问题，这些口号都是错误的，我们正在根据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的方针，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相反你们要搞“大乱”。你们这样提，完全是错误的。冲军区也有你们一份，撤出军区你们又要讲条件，这些责任你们怎么能推掉呢？

康生同志讲话：

南下同学到云南煽风点火，成绩很大。这一点要肯定。据军区的领导同志反映，黄兆琪同志也是在高仰义等同志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刚才讲了你们一些缺点，也不要紧，不过是为了冲击你们一下。

在当前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问题上有两个基本问题要注意：

一个所谓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怀疑一切。这种思想在文化革命中，特别是各学校各地方都存在。这是很反动的、很不对的，这

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还有人提出“反上层路线”，这是没有阶级观点的，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正确的阶级路线。不作具体分析是不对的，是达不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目的。

再一个问题是，夺权中怎样“三结合”。怎样进行三结合。一种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建立有广大群众代表，有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所领导的解放军的代表，也有革命的干部代表。这是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主张的三结合，是正确的三结合。所谓革命群众的代表，其中工厂三结合的工人不仅包括新工人，也包括老工人，干部也要分技术干部、一般干部、领导干部。

一定要注意只是“一小撮”。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是坏的，一定要注意只是“一小撮”。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是坏的。不是对所有的当权派都要夺权。（伯达：过去提的普遍夺权，全面夺权，这些口号是错误的！）如果全面夺权，普遍夺权，那么，他们（指李成芳、张子明等军队领导同志）的权你们夺不夺？解放军的权你们夺不夺？如不夺，就不全面，就不普遍了嘛！

再一点，夺权以后，省的名字，中央已有通知，不要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临时权力机构还是用“革命委员会”比较好。有的地方用过“人民公社”这个名字，现在也要改了。上海原来用过，现在也要改了。

还有一点，要和同志们交待一下，即斗争的办法问题。十六条讲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中央的文件历来强调这个问题，但现在各地有些斗争方法不符合十六条，例如戴高帽子、挂黑牌、游街等等，不知云南情况怎么样？有些报纸上登什么“喷气式”挂牌子，这些做法只能脱离群众。（伯达：“砸烂狗头”这些话以后也不要用了。）还有人下跪，是封建主义的做法，毛主席坚决反对的！毛主席说：造反有理。有理就讲理嘛！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搞那些？搞那套，说明你没有理，简直是形左实右！过去用过那些做法的不要再算账了，今后不要再用。

还有一件事要向同志们交待一下，就是关于大字报，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说，大字报有革命的大字报，有反革的大字报。反革命就利用大民主，利用大字报，反对我们，例如“联动”就是。这

是一个一分为二。还有一个一分为二。就是有质量好的大字报，有质量不好的大字报。有的是低级趣味，如现在流行的“砸烂你的狗头”，只是骂人！（伯达：什么混蛋啰！油炸啰！绞死啰！枪毙啰！火烧啰！这些话没有意思！有的还做一个纸人，用火烧掉，多无聊呀！这都说明没有道理，道理不充分，如果是好好调查研究，掌握了材料，掌握了道理，就不会这样干啰！）

另一方面要注意，也有不少是不实事求是的，马路新闻，谣言可多啦！成了传播谣言的工具。危险的是有些青年不喜欢看人民日报，偏偏喜欢看马路新闻，听那些谣言。红卫兵的报纸的确有些好文章，但不能传播谣言。有的还惹了乱子，如说朝鲜政变，越南政变。朝鲜就来信向我们抗议。有的还向我提出抗议，搞到我的头上了。减低了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降低了文化大革命的威信，有些报纸喜欢把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等等，印成照片，画成漫画登在报纸上，直到现在还有人搞。如有一个叫“百丑图”的，印的那么漂亮。这种东西无论省报（《湖北日报》登了）、红卫兵报都不要登。当然更重要的是不要采取这种斗争方式。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谢富治接见云南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康生会见赵健民听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赵健民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指示的。

第二，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

第三，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拥护，现在可不是这样做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

以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为主任；

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张子明、云南军区司令员黎锡福、为副主任；

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等为委员。

康生在北京专门找李成芳、张子明谈话，告诉他们赵健民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他们注意赵的动向。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间，省军管会的负责人参加了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必军委扩大会议。

省军管会负责人返回昆明后，倾向、支持八二三派的态度日趋明朗。这样一来，就必然会压制了炮派。

(三) 昆明地区两大派发生严重武斗，谢富治王力到云南解决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属于八派的昆明市公安局八八红旗战斗队的负责人刘殷农贴出大字报：《昆明市公安局八八战斗队向混入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公子丁荣昌宣战》、《揪出丁荣昌的后台》。

炮派则反对将打倒丁荣昌的大字报张贴街头。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省军管会召开座谈会，周兴、郭超、赵健民等人参加。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炮派在市内检阅台召开了“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并准备会后游行。

八派认为，炮派的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是老保向造反派示威。决定冲击会场。

八派的打算得到省军管会一位副主任和一个联络员的支持。

八派冲击会场，大会中断，双方在广场上、东风路上展开了武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昆明机床厂炮派的群众庆祝成立五·一兵团进行文艺演出。

军医学校的八派组织冲击会场并围困演出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双方陆续调集人员到昆明机床厂，准备武斗。

经省军管会做工作，双方撤离。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军医学校炮派组织开会声讨同校八派组织的罪行。八派组织冲击会场。

地方八派、炮派组织均调集大批人员前去声援。

省军管会派执勤部队三百人赶到现场，隔离双方。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炮派组织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

一直持续到六月三日才结束。

军管会成立四十多天，炮派就把矛头对准李成芳，发表了十四篇评论员文章，公开信等，如《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可忽视》《摧毁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云南的赵永夫揪出来》、《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十四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昆明军区党委的电报

昆明军区党委：

中央和军委对昆明地区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发生严重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引起思想上动荡，极为关切，要求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切实执行以下各点：

（一）对昆明地区两大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

（二）昆明军区处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担负着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援越抗美，保卫国防等艰巨任务。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关于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中，规定昆明军区的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望坚决执行这一规定，机关、部队一律不开展“四大”，任何人都不得揪斗领导干部，保持机关、部队的稳定，院校、文体单位不得同机关、部队串连，一律回到本单位，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三）中央军委信任以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军区机关，部队全体同志要在李成芳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领导下，加强团结，

坚守岗位，遵守纪律，努力工作，很好地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三支两军”，支援越南，保卫国防等一切任务。

（四）对军区副政委张子明，胡荣贵的历史问题，由军委总政治部进行调查，尔后在进行实事求是的处理。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赵健民在省委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

以后他又连续写出两张大字报。

他是云南省委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书记。

一九六七年六月，黄兆其授意涂晓雷、刘浩等人以“三镜观察员”名义，写出《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和《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文章，

揭露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壁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特务的三点（计划）”“在五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后举行军事政变，夺军管会的权。

《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一文指出：“蓄谋已久的五月兵变，正在云南军区五人小组的导演下按原计划进行，同时紧密地配合蒋匪特务的三项计划，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凭着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在云南军区的××号密室里，开始了他们五月兵变的罪恶活动”。提出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李再含给昆明军区党委的一封信

我完全拥护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五月三十日对昆明问题的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据说有怀疑是假的。经我了解，这是确实的，没有半点虚假；又有人说军区党委谎报情况、欺骗中央，是中央不了解情况下所作的指示，这种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这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常用的惯伎，他们常用这一套来欺骗群众，破坏中央的指示，万万不可上当。

“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双方都可能犯有错误，但性质是属于革命造反派犯错误。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解决。建议军区党委召集双

方代表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提高斗争水平。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机构，共同对敌。至于他们本身存在的问题，建议通过整风解决。而不用外部解决的办法。

一九六七年六月，省军管会编辑的《赵健民近况》在军管会常委中传阅

《赵健民近况》第一期中载有：“赵健民说八派不好。”

《赵健民近况》第二期中载有：“赵健民讲云南的走资派就是李成芳和秦基伟两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黄兆其指挥的照妖镜战斗队散发传单，指认赵健民是伸向昆明部队的魔手。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十九日，八派在检阅台召开万人大会，高呼打倒赵健民！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康生王力接见云南两派代表的讲话

康生：

- 1，历史问题也可调查，但不要到街上贴，轻易公布。
- 2，双方面都不赞成打、砸、抢。
- 3，双方都要保证，尤其在云南边境，铁路、公路，无论如何要保持不能断。
- 4，双方达成协议，不要抓人。
- 5，双方保证不要组织农民进城。双方保证不要组织农民进城。
- 6，两个组织无论如何不要抢夺枪支。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谢富治王力在云南两级军区党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王力：

四月二十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根据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在全国形势是一个转折，不再是青海问题、内蒙问题、四川问题……那样的形势了，拥军爱

民是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口号。红卫兵小将没有看到形势变化，所以还扭住什么“赵永夫”、“谭式人物”、“带枪的刘邓路线”。

毛主席再三说凡是站到革命方面反对革命的敌人的，要受到支持。那怕是躲在床底下把他拉出来，他要革命就要他，革两年就不革了也要。这样的话我们听毛主席说过五、六次了。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谢富治李再含接见云南“八·二三”派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谢富治接见驻昆明部队时的讲话

一，搞军管的同志们在目前错综复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要时时刻刻永远掌握斗争大方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线前进，不为那些各种各样的现象所左右这个大方向。无论怎么干扰，也不能离开这个航线。

二，军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没有经验。现在看来，有些地方不能不管，有些地方可以不管，不可不管，不可多管，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地方不该管，应该管的单位是关系国计民生，而左派又不占优势的，影响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单位，如果不是属于国计民生，或者无产阶级革命派已占优势，我们就可以不管，实行军管就是多余的，像省委办公厅实行军管干什么。

三，军管是没有经验的，进入工厂、机关、企业，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支左问题，刚才×××同志讲的好，谁是左派要有一个识别考验的过程，还有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看左派的问题。一个单位，情况可能很复杂，有的一个单位一个左派，有的两个造反派，那里的表态要有非常慎重的态度，要有调查研究的态度，不能随便表态。不表态不等于不支持，因为我们要求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支持，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带到那里去。有些搞不准不一定表态，因为左派不一定要哪个批准，北航红旗哪个批准了，他就是很好的造反派嘛，听说有一个军工厂先去一个宣传队，后又去军事代表，以后又去一个宣传队，又有驻厂的军事代表，他们各支持一方，随便支持，没有经过任何人讨论。我记得北京卫戍区也到了很多工厂，他们很谨慎，在厂内外他们作了很多调查，支持的都经过北京市革委会、工代会、红代会大家讨论大家公认，有争论的放下来再调查，第一批

有十八个厂，有争论的一个，第二批二十个，有争论的两个，他们又去调查。你们去几天，就支持一派，采取不慎重态度，这个问题要由各方面讨论，不能由一个人决定。决定一件事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党中央、中央文革指示去办。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谢富治在昆明部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已经来了六天了。今天这个军队的会议不算，已经开了七次会议了。就是两级军区，两个军，还有个别师，开了七次座谈会。短的三点钟，多的六小时，一共开了七次了，主要是听同志们的意见。两大派开了三次，每次大概也是少的五、六小时，多的八、九小时，主要是听取他们的意见。今天，这个会已经开十二个半小时了，除了一小时吃饭外，整整开了十一个半小时，主要是听你们的意见。

为什么讲这次在两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呢？因为这一个错误是支持了一派，压了一派。

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了。军管会现在还是管多了一点，管死了，不要把这个权都集中了。

目前解决问题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个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

那次两级军区的党委会，很多同志，×××同志，陈康同志，都作了自我批评，张力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那个会议开得很好，主要是李成芳作了自我批评，主要的责任他都担负起来了。但是，第二天就出了传单，就把那个会议的内容传开了，本来那个会议是很好的气氛，可是一出来就糟了。又出得不好，当然也没有什么。今天李成芳又作了检讨，我同意刚才再含同志的估价，欢迎这个批评，欢迎这个自我批评。

既然关键是在两级军区，又特别是大军区要负领导责任，要多负些责任。

犯了错误，作为主导的一方，肯定是昆明军区，李成芳他要负责，但是还有次要的一方，也应该作自我批评，都要有批评（但有主要的），有自我批评，尤其都要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最

重要的。犯了错误，作为主导的一方，肯定是昆明军区，李成芳他要负责，但是还有次要的一方，也应该作自我批评，都要有批评（但有主要的），有自我批评，尤其都要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今天在坐的两个军区、两个军、空军、铁道兵、炮兵、三十七师的同志们，大家都要就地为解决云南问题作出贡献，作出努力。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谢富治王力在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上的讲话

王力讲话：

从今年一月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夺权的阶段，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夺权斗争，有了很大的成绩。从今年一月开始，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个伟大的战略的决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同时，对于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本身也是一个严重的锻炼。这是运动的主流，这是运动的本质。

一、二月间是有一股冲击军队的潮流。一月二十八号，发布了八条命令。这八条命令为了稳定我们的部队。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又没有经验，又加上有这么一个八条，军队的一些领导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是出现了一个在二、三月间把一些革命的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把一些革命的同志打成反革命，是出现了这样一些严重的错误。总结了两段的经验：冲击军队这一方面的经验以及军队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经验，就发布了四月六号的十条。从四月六号以后，全国的形势很快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一些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把形势就看错了，口号也提得不对了，到了四月下旬，还死抓住一个“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一个口号，这就落后于形势了。这一个期间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占主要地位的是我们军队的同志。把他们的错误看重了，甚至于把性质看错了。一定要抓什么赵永夫啰，又是什么永夫什么永夫啰，有的又说是一个又粗又黑的带枪的刘邓路线啰。我们有的一

部份军队的同志就把革命小将的这样一些毛病看得太重了。总而言之，双方都没有理解毛主席提出来的伟大的“拥军爱民”的口号。

所谓云南的问题，主要的就是这么三个问题：军队同地方的关系、军队内部的关系、昆明的以及云南的两大派的关系问题。这样为什么毛主席说相信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能够同志们自己解决呢？就是说同志们这几个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在“拥军爱民”这个伟大口号下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

有的同志批评这次中央解决云南问题是“抹稀泥”的方针。我不赞成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谢富治会见昆明机床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

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谢富治对《云南日报》报社代表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左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虽然是支左中的错误，但是这是原则性、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责任主要在昆明军区，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我们对就地解决云南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二、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两级军区的问题。

三、八二三和炮兵团两大左派的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

四、加强省军管会的领导。建议增补陈康、张力雄二同志为省军管会副主任委员，请中央批准。

五、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既要敢于打击一小撮，也要勇于解放一大片。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

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省

六、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老、中、小三结合的方针，吸收新生力量参加领导工作。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在省军管会负责人主持下，八派和炮派的主要负责人举行谈判。

八派一个下属组织的人冲进谈判会场，打伤炮派的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1967.08.08；中发〔67〕237号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

中央同意你们七月十二日提出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也同意增补陈康，张力雄两同志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央召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进京，说明了中央的批示，并指定陈康主持军管会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黄兆其等人提出“搞军内的问题，要从张力雄开刀。”“揪张力雄应该有专人来抓，成立专门的联络站。”

（四）昆明地区两派的武斗进一步升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昆明海口二九八厂两派组织武斗，死三人，伤十数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指挥的“专揪叛徒战斗队”大量散发传单：

《叛徒赵健民的自白》

《赵健民和黎玉两个叛徒是怎样互相勾结的》

《赵健民是怎样被大军阀韩复榘刀下留情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八派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兵学校的枪支。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炮派到省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八派围攻昆明水泥厂矿山车间双方死九人，伤数十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炮派武装占领五华山（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

赶走军管会的干部。并发表了占领五华山的声明。

赵健民亲自上五华山布防。私设电台、挑起大规模的武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八派在内应下，抢了省体委国防俱乐部的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昆明军区的电报

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并告八·二三和炮兵团的同志们：

据报，最近昆明武斗严重，八·二三和炮兵团双方都向人民解放军夺枪，并互相开枪射击。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双方绝对禁止开枪；

二、双方都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

三、人民解放军一切武器装备物资，任何团体与个人都不得侵犯与抢夺，双方都应在“拥军爱民”的口号下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

四、双方的争执，应在中央既定方针下，协商解决，一定要坚决制止武斗。

（原载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内部资料）》，1968年4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炮派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三五六厂两派武斗，死二十人，伤二百三十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炮派在三五六厂下属组织的配合下，抢三五六厂枪313支、子弹135000发。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签发的给昆明军区的电话指示

周恩来康生江青签发给昆明军区的关于二百号信箱武器问题的电话记录

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十九时三十分。

一、大力宣传毛主席的批示，大力宣传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和中央文革八月二十六日的四点指示，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二、驻军部队由原来的一个营增加到××个连，尽最大努力劝阻。坚决保卫武器。

三、如果劝阻无效，立即抓起头头来。

（来源：云南八·二三《风展红旗》编《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炮派攻占博物馆，双方死八人，伤十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云南省一部分干部成立了“毛泽东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人们称之为“摧资兵团”。

这个组织的大多数是省市两级中上层干部和一些厂矿、学校、企业的支部书记、厂长、经理及地、州、市、县一些观点相同的干部。

这个组织当时在昆明有四千多人；在全省约有万人以上。

这个组织是支持炮派的。

（省革委会成立后，被认为“不是好组织”，成员受到清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九月初，八派又在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内“红大”组织的协助下，抢了步兵学校的班用机枪和半自动步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东川市军管会瘫痪了。

炮派把东川军管会主任、十四军42师师长田大邦，干部刘友义揪到云南省军区礼堂批斗，刘友义同志当场被打，田大邦被连续批斗，因高血压、心脏病而病倒。

东川市武装部长、军管会副主任王若海被炮派推下高楼摔死。

武装部打开武器库，向农民发枪，挑动农民进城制造大规模武斗。

在新村包围矿务局机修下，停水、停电、断绝一切交通、通讯达一月多。

在城区、农村、工厂杀害八派的工人、农民、干部达 200 多人。炮派不准八派收尸，用打冷枪的手段，使收尸群众又被打死、打伤，造成几十俱尸体曝晒一周之久。

由昆明军区参谋长崔健功，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朱家壁组成两级军区制止武斗工作组到东川后，停火交枪，由解放军战士保护八派群众，才把尸体收回掩埋。

一九六七年八月，文山壮族族自治州在军分区、人武部及各级公检法部门的支持下，建立起了“农民革命军”组织，约有十六七万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七日，昆明电机厂两派组织武斗，死六十八人，伤数十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在省军管会的主持下，八派和炮派达成《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两派又达成了《关于停火交枪的补充协议》和《关于严禁打、砸、抢、抄、抓和立即释放被抓人员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陈康、赵健民未得到中央的允许，擅自到北京，要求向中央汇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下旬，赵健民给住在昆明西山省委党校的工役制部队工人联合兵团的负责人、工役第八团的负责人贾玉玺打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月下旬，八派成立“打倒赵健民作战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八派在内应下第二次在省国防俱乐部抢枪。

八派前后两次在省体委国防俱乐部抢走各类枪支一千多支，子弹一百多万发。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上旬，赵健民同原省人委的炮派负责人司以恭通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原省委办公厅主任等人起草了一份《坚决打倒赵健民联合声明》，许多领导干部，包括原省长周兴都在上面签名。

一九六七年九至十一月，炮派在云南大搞“肃薄肃李”，把矛头对准十三军、十四军，大揪军内一小撮，破坏部队稳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云南省军管会《关于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情况简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昆明市粮食局直属库两派发生武斗，死两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八·二三派在昆明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

黄兆其在会上说，赵健民是“三十年代的大叛徒，四十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六十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原省委办公厅主任代表原省长等一批领导干部在会上宣读了《坚决打倒赵健民联合声明》。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炮派第二次到云南军区小麦峪军械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炮派第二次到归化寺民兵武器库抢枪。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十三军、四十军来电的批复

十三军十二月二日来电反映，个旧市“新红河大联合司令部”在彻底砸烂专政机构的错误口号下，派人驻守专政机关，并从监外给犯人送条子，酝酿夺监狱的权。中央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行为，必须立即坚决制止。

中央除指使昆明军区、沈阳军区，对上述行为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外，希望各地对监狱和劳改单位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中央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准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

(二)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

(三)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对昆明军区的指示

请昆明军区转告两派群众组织，都要坚决执行“九·五”命令，都不准抢枪，不能抢档案。要耐心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初，八派第三次在昆明步兵步兵内“红大”组织的配合下，抢了步兵学校的班用机枪、连用机枪和五六式冲锋枪数百支。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八派攻打昆明市公安局消防大队，死一人，损失财产四十二万余元。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李再含接见昆明八·二三战报记者的谈话

原省委×××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阎红彦带了×××、×××。这个人表现很不好，和中央唱反调。其中特别突出的一次，在李井泉主持的一次讨论会上，讨论伯达同志的报告，李井泉在那里鼓动大家说：“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当时云南来说，对伯达同志的报告到处挑毛病，大唱反调。×××过去我也不认识他，这次开会才认识的，这个人就大唱反调，起码看，是严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很好批判他的这些东西，类似×××这种情况的人是不是还有？

赵健民不是主席直接讲的，是中央文革的意图，叫赵健民站出来。这样，谢副总理到云南直接找赵健民谈话，

昨天我听说昆明军区三大机关声明在贵阳街头出现，我立即下令复盖了。在贵阳我们不允许，我们一定要照中央指示办事。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谈，可以向中央反映，军内问题是有原则的。你们两大派要正确处理军内问题。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一些，这段时期，鲁副司令员常跟我联系。对黎锡福、李兆昇同志，我建议送到北京医院治病，保护起来，他们不是属于三反分子、叛徒，不属于这些问题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八派攻击昆明钢铁公司桥头钢厂的炮派，死十七人，伤四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海口三五六厂下发组织协助下，抢三五六厂枪二千零二支，子弹一百八十四万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旬，滇东北炮派联合进攻会泽铅锌矿、以礼河水电站，赶走了军管会的军代表，打死打伤干部、群众，又把八派大批群众关押起来，占领了毛家村电站、会泽、以礼河成了“炮管区”。

随后直逼东川新村，新村八派干部群众于12月17日分两路撤出：一路往昆明，一路往汤丹矿山。

东川炮头李国治制定了进攻东川矿区的计划：“以农村为依托，以民兵为骨干，围攻矿山。围而不攻，将军管会崔保平等和八派骨干逼下金江，一举歼灭”。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八派人员枪杀部队战士一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炮派攻打东风大楼。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炮派在海口三五六厂下发组织协助下，抢三五六厂汽车拖挂二联高射机枪二挺，五六式机枪七十一挺，五八式重机枪七挺身而出，子弹二万五千余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对云南东川矿区问题的指示

东川情况非常危急，两派发生严重武斗，危及工矿安全。东川矿区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必须保护矿区安全，如果破坏矿区就要问罪，劝阻炮兵团停止攻击。

炮兵团李国治等人，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大举进攻东川汤丹矿区，占领东川矿务局机关和军管会驻地。打死支左部队战士2人，坚守矿山的职工2人，打伤多人。

十四军 42 师副师长崔保平及支左干部和支左部队，被逼徒步下金沙江边，冒着漫天鹅毛大雪的掩护，在江边群众的帮助下，连夜渡过金沙江，爬雪山到达四川会东。

从此，东川的军管会及所有的支左干部、战士，和八派观点的干部、群众，都被打出东川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八派攻打预制管厂，死十四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八派攻打驻元宝山的炮派，死十五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炮派攻打云南省建筑安装公司的八派。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八派第四次在昆明步兵步兵内“红大”组织的配合下，抢了步兵学校的枪支弹药。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八派第五次在昆明步兵步兵内“红大”组织的配合下，抢了步兵学校的子弹。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八派开远的下发组织“一三〇”将抢第十三军的部分武器运送到昆明，计有九二步兵炮二门、炮弹二百发，高射机枪一挺，子弹数万发。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八派在小麦峪设伏，打死过路群众十人，伤一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八派攻打云南砖瓦厂，死二十一人，伤多人。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炮派组织大兵团作战，攻打云南汽车修配厂群众组织“一一·三〇”，双方共死六十六人，伤数百人。

（五）中央召集两级军区领导人及两派代表到北京开会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昆明部队赴京开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总理讲话：

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支左不力，抽出来，不插手，作专案处理，像秦基伟一样让他休息，但不能和他们接近的都是一派，一定要把李的问题搞进去，把整个部队搞进去，这是不怀好意，自毁长城。

司、政、后闹得乱轰轰的两次叫张子明、胡荣贵来，群众不放。黎锡福同志受伤，李兆昇同志被打，这样谁能出来劝阻？部队不稳定，谁造成的？打了电话叫军区不要搞四大，这是好意。有人说是大毒草，是把矛头指向群众。

‘把矛头指向野战军，把野战军搞成这个样子。大军区、省军区你们心安吗？十三、十四军过去都是一个兵团吗？司令员是陈庚，陈庚是薄一波的人吗？政委是谢副总理，谢副总理是薄一波的人吗？

康老：说两点，第一点提这样口号，形式上反薄一波，实际上是把薄一波扩大化，扩大影响。另一点，这种提法起瓦解我们解放军的作用，动摇、瓦解我们解放军，是自毁长城，这恰恰是美帝、苏修、蒋匪帮、党内走资派所需要的。怎能用这样的口号反十三、十四军！

云南的两个组织都是跨行业的组织，成份不能很纯，很多人跑出来，很难巩固。我们一直想搞按系统、按行业、归口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梁中玉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部队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下关市八派的“四二〇”组织攻打住在苍山饭店持炮派观点的工役制部队第八团，死七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周恩来对云南郭顺兴事件的批示

总理办公室赵秘书电话转达总理批示：平浪的问题我们报告了总理，

总理同意陈康同志的意见，立即追查限期交出凶手。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昆明军区的电报电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住昆明的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带领七十七人前往下关，途经富民、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南华，于十三日到达下关。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目前住在军区大院的军队开展四大单位的所有人员，应动员他们一律撤出、返回本单位。

力求尽快的把军区机关和省军管会进一步稳定下来，迅速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东川、一平浪、文山、大理、曲靖及其他地方的武斗必须制止。

云南省和昆明市不准有攻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的大字报。

禄丰杀害团副政委郭顺兴的凶手和指挥杀人的头头必须限期交出。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愿意派飞机将双方谈判的代表接来北京签字。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干部电话

两派达成停火协议，昆明已于一月十四日十八时停火。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下关炮派分三路向八派发起攻击，工八团李国贞任副总指挥，工八团有三百多人参加（在下关共有七百人），双方死一百零四人，其中八派七十七人，炮派二十七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七日，昆明、云南两级军区在京开会全体同志的电话

从近日情况来看，武斗并未停止，某些地区继续发生严重武斗，如一平浪、楚雄、下关，曲靖，昆明东郊金马村还发生了严重破坏202次客车事件。从最近情况看，炮派某些组织要特别注意。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的电话电报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九日，下关驻军领导机关向昆明军区党委报告《滇西挺进纵队》问题

报告称：昆明炮派所属工役制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纵队”，于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全副武装，乘坐汽车，由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公里，攻占了禄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副总军代表郭顺兴同志，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通讯枢纽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谍，横冲直撞，到处抓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伤群众多人，仅下关一地已发现尸体二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千余人，并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公开枪毙。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下关的工八团全部人员离开下关去昆明。

一九六八年一月，黄兆其主持编制了一份报告，揭露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反动联盟”，“指挥手下一些亲信，诸如李明（省军区副政委）、丁荣昌、朱家璧、熊奎（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非（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何德庆（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许志奋（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帮，结党营私。”

一九六八年一月，黄兆其、李树林等主持编写“干部情况汇报”，提出“必须打倒”和“进一步审查”的有一百四十七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谢副总理：

为什么武斗这么厉害？二、三号起一直从昆明打到下关，是破坏行为，是犯罪！把军代表、一个团的副政委杀了，到现在不交凶手，又破坏了一平浪煤矿，又砸了盐矿，到下关杀了一百多人，这哪是文化大革命？武斗一个组织最厉害的就是《援越抗美》，王非，何德庆你们机关就是不听话，云南就是不执行十一月十四号决议，王非你派人到部队去串连。

今天叫赵健民来参加会。你出来干了许多坏事，你片面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中央决定，把赵健民监护起来审查，立即执行！

刚才总理给我打了电话，你们（指云南军区）要告诉工八团迅速地停止武斗。周总理说了，他们（指工八团）这是完全违背了文化大革命，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如果立即放下武器，我们还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好的，是革命的，不然就用军队包围起来，强迫交枪。

康生：

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一、二日从昆明出发，四日到禄丰，还带有 1400 件武器去支持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管局的军总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九日占了一平浪，把煤矿破坏了。15 号占了楚雄，14 日在某地抢了 3500 件武器，16、17 号攻占了下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值得严重注意。同时在永平已发现了电台。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领导人根据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与前往堵截的某部相遇，工八团冲破堵截，继续往昆明方向前进。到达一平浪时，由于部队已经把公路截断，工八团住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在京开会的领导同志的电话电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昆明“滇西挺进纵队”问题的文件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三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的首长传达的中央首长指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原省人委办公厅某副主任任等六人将一份“赵健民材料”送中央文革小组

材料说：赵健民是个自首叛变分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罪魁祸首，必须坚决打倒。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参加解决云南问题的炮派代表向在北京的昆明军区负责人报告：

“所指工八团到滇西武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炮派要向中央报告。在未得中央指示前，工八团在原地（一平流）待命。”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五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告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鲁瑞林等从北京飞回昆明，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武装围剿。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晚，执行围剿任务的部队受命向在一平浪甘海资矿区的工八团快速推进，缩小包围圈。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

“滇西挺进队”在滇西的所作所为，是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滇西挺进队”所有人员，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撤除工事，交出抢夺的一切军用物资。

以上各条，希望你们立即执行。否则，我们将采取严厉的专政措施。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十分，部队攻占甘海资矿区。

工八团坏头头坚持不肯放下武器，撤除工事，并首先开枪，部队当即自卫还击。

在这次围剿中，打死工八团一百八十四人，煤矿职工家属五十九人。工八团四百八十人被抓。

一九六八年一月，在黄兆其的主持下，“八·二三”派成立了一个“打赵作战部”，“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有“叛徒二十八人，走资派二十三人，国民党伪军官、特务七人”等，制定了对“赵健民周围的要整，赵的外面的也同样要整”、“狠打、痛打、打死”的方针和部署。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央关于云南鸡街、铅厂、雨过铺事件的指示一、关于鸡街、铅厂、雨过铺发生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严重政治事件。

二、必须交出鸡街、铅厂、雨过铺三个地方伏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坏头头，而且要主要的头头。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中央为了解决云南问题，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持学习班的是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谭辅仁。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谢富治吴法宪关于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省两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谢副总理：

你们定了“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恢复交通、邮电”两个协议。

工八团的一部分人，在滇西成立了什么“滇西挺进纵队”，云南的军队根据中央的指示，要他们交枪，交出坏头头，进行训练，他们没有很好听从，他们后来抵抗，先行开枪，后来双方伤亡很多人，军队也伤亡了一些人。

康生：

八派有个李成芳，炮派有个赵健民。受他们利用，现在觉悟了，达成了协议。赵健民就是要两面派的典型，那天，我们指出他挑动群众斗群众，蹲在北京遥控指挥，他矢口否认，要他签字，他说用党籍保证。把笔记一看，正是他在北京指挥。赵健民一九三六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赵健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现在已经成立十四个革命委员会，广东很快就成为第十五个，吉林第十六个。

最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江西省军区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有一个批示。这个批示今天已经发给同志们了。这个批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写的。他讲，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有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和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了错误帮助他们改正。但是，另一方面支左工作中有成绩又应当宣扬他们的成绩。

江青：

我们的主席是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但是在你们那儿，有武斗，有的地方斗的还不轻。武斗不能算好事，因为伤害了人，损坏了国家财产，不能算好事。但也可以变成好事。

第一，如果你们搞了革命大联合，就是不打不相识。

第二，青年人就非常喜欢枪，拿了枪，放两下，也是个锻炼。你们来自祖国的边疆，要是将来有什么战争，你们也锻炼了一下。

第三，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假如你走过了头，就是说走到对立面去了，如果不是在人民内部矛盾里头超出人民内部矛盾，那就要剿匪！你们是乌合之众，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我们一声令下，我相信人民解放军是听毛主席命令的。你们想想看，你们的枪就成了火柴棍了嘛。没有枪想枪，有了枪怕人家抢，第三步送回去吧！大体上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武斗是很坏的事情，不应该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嘛。为什么一定要拿枪，有的拿机关枪，有的地方拿高射炮，一万五千多发炮弹，对着天空咚咚咚的打了一万五千多发，我心里一直不舒服。

现在既然达成了协议，就要遵守双方的诺言，不要再搞武斗了，你们再搞武斗，就会成为过街耗子，人人喊打。因为人民群众不能很好的安心生产。你老想打，哪有那么多子弹，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因为搞得人民不安生，我想小将和革命群众，目的都不是如此，都是为了革命，我刚才听说背后有两个坏人，挑拨你们，你们上了当。甚至还有说的到中央来就修了，说这话是反革命。到毛主席这里来，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来，反而说你们修了，这是挑拨，是造谣，是对中央不尊重，是污蔑。

周总理：你们回去后：

第一个任务，回去都要很好的执行协议，还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把仇恨集中到他们身上去，把革命群众、革命战士联合在一起。

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动员更多的人到北京来学习。

第三，我们人民解放军处在边防，现在，十三军、十四军都有了自我批评，我们相信昆明军区、云南军区也会有很好的书面自我批评。部队搞“四大”的，要按正确的原则。

过去的当权派有的靠边站了，象阎红彦、叛徒赵健民这样的人，应该彻底批判。要经过群众的大联合才能解放领导干部，解放一大片，批判一小撮。否则革命三结合就无从谈起。

云南有个广播发射台，因为武斗，分成两派，停止了广播，使毛主席的声音在海外、东南亚、西亚、北非都听不到了。这那里是革命行动，是破坏行动。从今天达成协议起，再不准有这种行动，这是土匪行动，是反革命行动，那就不许可。你们看到“2·6”命令了吗？（即指1968年2月6日发的“中发(68)26号文件”）只要破坏国家设备和财产，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用“二·六”命令采取行动。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八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云南省军管会的电报

关于贯彻落实“协议”中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昆明军区云南军区在京开会首长给云南省军管会的电报

文山地区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已于二月十日下午达成停火、交枪协议，并举行签字仪式，签字后两派一起游行，互相祝贺，互相赠送毛主席像章，气氛很好，现正为全面实现协议积极努力。

最近，东川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业已达成了停火、交枪协议。下关等地的革命群众组织，也正在积极准备谈判和交枪，放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罗元发与昆明两大派在京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罗元发副司令员电话指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云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达成的“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和“关于恢复交通，保证邮电畅通”二个协议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在文山州支持的负责人向中央报告：“农民革命军”是官办组织、军事化组织、武斗主力。

一九六八年三月，刘殷农等又揭露赵健民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军区政委张力雄结成“反革命联盟”、“屠杀革命群众”，“网罗一批特务、叛徒、走资派黑爪牙”，是“国民党代理人”，对这批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

同期，刘殷农又揭露省委书记、常委刘明辉、孙雨亭、高治国以及赵增益等和一批厅局领导干部分别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敌对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了云南参加军以上会议的同志

三、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陈康等传达中央首长对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的指示

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五·一”前全国一片红，各省都要建立革命委员会，我们不能落后，要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阻力，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力争在“五·一”以前把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如果跟得很不紧，不照顾大局，就要犯大错误。

要把主要矛头对准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和本地区的代理人，在西南要特别注意对邓小平、贺龙、李井泉、阎红彦进行彻底的批判。李成芳、赵健民是两派共同的敌人，把他们揭发出来，是两派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日，巧家县人民武装部某副部长和红派头头决定，从农村调集三千三百五十人进县城。

县贫总常委扩大会议、县武装部政工会决定：用各区武装部的枪武装红派；把对立派跳得凶的干掉几个。

这一时期，全县共杀二百七十七人（其中五类分子五十三人）。其中，

大寨区：杀十四人；

蒙姑区：杀四十一人。

十月三十一日，巧家县革委会成立。开展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

十二月二十五日，县革委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号召外流人员回家。

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县革委会又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外流人员返回。这时外流人员已达三万二千五百多人。

全县共批斗干部、群众二千四百三十八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学习班中的八派和炮派签订大联合协议。

两派在让不让张力雄签字的问题上发生争执。

谭辅仁对黄兆其说：你放心，我谭辅仁到昆明以后，一定和你们八二三派一起把张力雄的问题搞清楚。

谭辅仁对李毅说：我告诉你们，张力雄百分之一百进不了革委会，你不要在那里搞。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任命谭辅仁为昆明军区党委书记。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黄兆其、安炬祥、胡文龙等写了一份《紧急报告》，

揭露省委书记高治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省商业厅厅长侯良辅、省轻工厅厅长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并提出要“立即逮捕”。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陈康、周兴到学习班参加学习，他们各自去对立派的宿舍作检查。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日，黄兆其、刘农将《赵健民反革命集团执行国民党计划，镇压造反派》的报告，送中央。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二十五日，曲靖地区的八派群众组织，连续向中央、云南领导机关报告：

林山（原曲靖地委书记）、唐荣生、乔文锦（原曲靖军分区正、副政治委员）之流，在赵、张的支持下，疯狂地执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计划，策划组织了滇东北挺进纵队。中央着手解决云南问题后，又组织了滇东北游击军的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八派的打赵作战部和省委机关联合总部将《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的调查报告》送中央。

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谭辅仁在云南学习班全体大会上的讲话

他说：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云南和全国一样，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增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现在全省范围内正在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的流毒。总的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

云南今天以前的这个形势，的确搞得很复杂、很乱。当然，我们不怕乱。这种形势的造成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增派以及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另外还有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挑起来的。云南的问题乱得差不多了。有些人说，还要乱。我说，我们也不怕。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在云南的那些增派要乱，让他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怕不怕呢？不怕。因为有野战军在那个地方。

一条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另一条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中央的精神，在那里支一派、压一派，武装一派、消灭一派。这个问题，是在针锋相对斗争的。按后一条做了的，方针就错了，一错百错。过去在这个问题上错，从上到下错了，这就把整个云南搞乱了。

不要把坏人当做好人，也不要把好人当做坏人。今天以前，有个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糊里糊涂，把坏人当做好人；把好人当

做坏人，这是很危险的。这里讲了几个人了，讲了赵健民，这个人问题很大。还有一个叫张力雄，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

昆明的问题，云南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一次嘛，解决了，谁是谁非，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10；中发〔68〕128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八月六日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谭甫仁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黄兆其、李毅、徐学惠（女）、段宝珍（女）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名额（产业工人、贫下中农各一人），待以后增补。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谭震林、李井泉、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建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是人民解放军驻云南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巨大成就。这一伟大胜利宣告了云南地区阶级敌人复辟活动和垂死挣扎的彻底破产。

中央希望，从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胜利诞生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做到：

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云南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充份认识到云南地处祖国边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缅甸、印度和泰国反动派

斗争的西南屏障，是援越抗美斗争的前哨，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全省军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巩固边防。

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和毛主席的“七·一八”批示，大造声势，坚决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迅速猛醒过来，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交出武器，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对于犯有中央指出的那些反革命罪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依法惩办，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动员广大革命群众，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遵守毛主席的号召，把一些跨行业的组织引向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组的革命大联合的轨道，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大力宣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最新指示，彻底粉碎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科技路线，坚决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知识分子要坚决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节约闹革命，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防止阶级敌人从中破坏捣乱，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伟大方针，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建设，掌好权，用好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云南省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云南省十四个厂矿企业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国防、冶金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代表共三百三十人，由鲁瑞林任团长。

会议历时五个月，主要解决这两个系统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

会议中有三十五人被批斗，返回原单位后又有六十人被批斗，其中三十九人被打伤致残。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谭辅仁主持会议，通过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履更猛烈的进攻！》的决议。

四、“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一九六八年八月以后，省革委会在全省发动“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云南日报发表《搞好斗批改，掀起革命生产新高潮》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昆明军区对省公检法实行第二次军管。

十一月十八日，省公检法学习班正式组成开学，至一九七零年五月结束。

审查结果：

站错队的五百二十八人；写检讨的三百多人；被批斗的二百一十九人；重点审查的一百五十人；按敌我矛盾审查的六十四人。

审查过程：

打伤的六十多人；疯癫的九人；自杀的八人。

审查结果：

清除出党的二十五人；留党察看的二十四人；取消或延长预备期限的十八人；

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四人；犯有各种政治错误的二十五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五人；受团纪或行政处分的十人；逮捕的三人。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云南日报发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敌人》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日报发表《彻底清算刘少奇的滔天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涂晓雷、张培智、刘浩编写了《“彻底清算赵健民之流罪行”》的文章，并联名在《云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赵健民等在“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所谓“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成为“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

云南日报还发表了《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授意，由涂晓雷等人写了题为《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彻底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滔天罪行》的文章，在《云南日报》发表，

文章指出：赵健民等人“为了达到翻案复辟的目的，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就是他们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根据省革委决定，开办省级机关学习班。

十二月十二日正式开学，共有学员七百三十九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一百六十九人；处级干部二百五十三人；一般干部一百六十九人。其中有：

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高治国、郭超、薛滔、吴作民

原副省长刘披云

原省革委常委、委员张恩璞、张兴华、李文进、刘鑫、吴生敏、鲁大洲何正廷。

其中；

有三十七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恶霸分子；

有二十二人被开除党籍；

有三人被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有十七人被监护；一人被拘留；一人逮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云南日报发表《打倒二月逆流急先锋赵健民》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云南日报发表《大叛徒赵健民是云南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胡延观（笔名胡立群）、刘殷农、林敬荣（笔名林叶）联合在《云南日报》上发表题为《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文章，揭露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三十年代就摇尾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分子，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云南“经过苦心经营，确实组织了一套黑班底”，“这个黑班底的核心就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内奸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旬，玉溪地区召开党代会，批斗了刘世杰、鲜文富、普朝柱、王连增等人。

十二月二十九日，地区召开大型批斗会，四百多名站错队的干部和群众跪满台上。

据统计：全地区揪斗干部、群众二万七千九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七百多人，打死带死一千零八十九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日报发表《不准赵健民颠倒历史——彻底清算赵健民反军乱军的滔天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日报发表《更紧密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云南日报发表《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的社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底，省革委会研究组整理、编印了十多期《云南是非大批判材料》，共约三四十万字，发致全省各大系统。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九年五月，红河洲所属十三个县市，十二个州属单位，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分清路线是非，共批斗了五万四千三百二十四人，占全洲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属敌我矛盾性质的二万三千四百零八人：

叛徒：四百三十九人；

特务：九百人；

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三百二十六人；

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二万零七十四人；

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千九百七十五人。

到九月底，全州批斗的人数上升到六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省革委会召开第七次全体扩大会议

中心内容是划清云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

清查的重点事件有：

《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

《滇西挺进纵队》；

《滇东北游击军》；

《摧资兵团》；

《中上层干部联络站》。

结合事件批判重点人物，计有：阎红彦、陈康、赵健民、张力雄、林亮、候良辅等。

这次会议选举了出席九大的代表。选举中陈康落选。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云南省革委，指出：云南省的九大代表应包括陈康同志在内。陈的代表性，毛主席早有指示，望你们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同意将陈康同志补选为云南省九大代表。后，陈康当选为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刘殷农在昆明市级机关学习班大会上提出要进一步追查“滇挺”、“地下银行”、“地下公检法”，“左派政府”等。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在省冶金局职工大会上说：“大叛徒赵健民、张力雄、陈康这些人从政治上，舆论上、经济上、军事上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网罗、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建立地下公、检、法，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

他还说：赵健民“在云南进行武装夺权”，“东边是滇东北游击队，西边是滇西挺进纵队，滇南是滇南挺进纵队”，“整个计划是东游、西挺，控制个旧，搞乱东川，夺取下关，会战昆明”。

一九六九年一月，滇南支左负责人到文山州的八个县作报告，他说：

农民军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力军，是受坏人操纵的坏组织、反动组织、反革命组织，头头要投案自首。

凡是军分区、军管会、人民武装部批准建立的革委会，都是赵健民在文山地区的代理机构，推行了武装夺权的一部分，要一律推倒重新建立。

文山把崔正三（军分区司令员）、张度人（军分区政委）揪出来，红线、黑线就清楚了。

一月十二日，滇南支左负责人在文山万人大会上说：

今天会后要行动起来。群众要注意，革委会要注意，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可以。打，可以。但不要把他們打死。

我们在中央首长的支持下，把滇西挺进队消灭了。我就是消灭滇挺的头头。后来，社会上有人骂鲁副司令员是鲁屠夫，骂我是刽子手，我说，我就是杀反革命的刽子手。

三月，文山州革委会主办了《文山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展览》。

派出大批“35 人纠察队”、“工人宣传队”、“群众专政小组”，到工矿企业、农村捅马蜂窝。

文山州八个县，从县委书记到大队支部书记全被打倒的有两个县；被打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六个县。

共举办各种类型学习班二万二千六百四十九期。

在清查“农民革命军”中：

有六万二千五百六十八人被捆绑毒打；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受伤致残；五百三十四人被打死逼死；

有一万九千多人被立案审查；七千六百六十四人被定为“九种人”；五千二百五十二人被判刑；其中，死刑二百六十八人（实际杀掉六人）；死缓刑一百二十四人；无期徒刑一百八十八人；有期徒刑一千六百人；监外执行三千零七十二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江川县革委会举办干部、群众一百二十六人学习班，清查“滇挺游击军江川农民革命造反军”案。

清理中，批斗三万二千零三人；划为农革军分子三万九千二百三十四人；列为农革军骨干分子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其中：生活上管干部五人；地区管干部五十七人；县管干部一百一十二人；军队干部十九人。）

一九六九年一月至三月，新平县革委会清查“特务组”案，

该案认定：以县人民武装部长华定周为首，县公安局长何国运、县长李章明、县人民武装部副政治委员毕成、县人民武装部秘书叶定忠、县人民武装部政工科长刘通怀都是特务组成员。

在清查过程中，打死杨芳洲（手工业管理局工人）、覃淑贞（县医院工作人员、毕成的妻子）、杨家发（戛洒区副区长）等人。

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滇东北的二十多个县、市、区和一些省直属单位，开展以清查东游为主体的运动。

一九六九年二月某日至十二日，曲靖地区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会。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清查东游反革命组织。

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东游案牵连被审查的干部群众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我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一九七零年七月八日，昆明召开万人大会，公审“袭击 202 旅客列车反革命事件”案

清查过程中打死一人，自杀一人，牵连一百多人。

最后判决：

李长年、周明忠为现行反革命、破坏铁路交通、武装抢劫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谢光亮为同案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孙智鹏为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李家寿为主犯，判处死缓刑。

李海清为主犯，判处无期徒刑。

四、建立政治边防，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谭辅仁在省党代会上作总结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召集昆明军区领导人到北京研究政治边防问题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转发《昆明军区关于加强昆明地区边防斗争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三日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革委会召开建设政治边防会议

四月八日，向中央报告了会议情况：

会后，这项工作在全省铺开。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次在边疆地区搞政治边防，共揪出九种人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二人，揪出反动地司、头人八千一百一十五人。

这次搞补划阶级成份，据保山、临沧、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红河等十个地州市的部分县统计，原定为贫下中农而被升为地主、富农成份的有七千六百零五户。也有部分地主、富农分子降为劳动人民。

在重划阶级成份的同时，共抄家三万零六百二十户，抄家财物广大读者价值一千多万元。

在这个过程中，德宏州有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一人外流到缅甸；红河州有二百五十户、一千三百一十一人外流到越南。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日，林彪接见四川、云南、贵州负责人时的重要指示

一九七零年十月，中央任命周兴为省革委会主任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七日，谭辅仁遭暗杀

五、批林整风、批林批孔

一九七一年六月，中央军委任命王必成为昆明军区司令员（1979年）

一九七一年六月，中央任命周兴为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收到李德生转来的一份云南傣族、苗族情况调查报告

这个报告谈到，在少数民族地区补划阶级成份时产生了副作用。

周恩来在这一天致信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类情形，极为严重，已觉察到这类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的严重性。有关情况拟在政治局会议上认真讨论一次，并派人到有关地区与当地党委和军队党委联合进行调查核实。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指示

1971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对新疆、云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划分阶级成份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指示：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六日，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举办的干部学习班

参加学习的，军队系统有八百四十一人，地方系统有一千零一十人，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一人。

这次学习班传达了中央四号文件，对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开展了大批判。

学习开始时，周兴代表省委和军区党委宣读了中央四号文件，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纲领。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王必成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

要批判林彪一伙对我省边疆工作的捣乱和破坏。他们大讲什么“政治边防”，实际上是贩卖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边疆经济建设，妄图把边疆搞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周恩来在昆明对周兴说：“昆明有个划线站队问题，你们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一九七三年八月，周恩来在召开十大期间，对周兴说：“云南的划线站队问题纠正了没有？开了十大了，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

一九七三年八月，陈锡廉对周兴说：

“云南来京上访的和来信申诉的，主要是千你们搞了划线站队，在军队和地方的干部、群众中都压了一派。这是谭辅仁搞的，他已经死了，你们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

周兴回到昆明后，两次召昆明市委书记黎伟到他家，要求黎伟带头在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一九七三年十月至一九七四年二月，昆明市逐步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云南全省，特别是昆明，出现了新的动向，形成了三大派：

“齐向阳”：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是原来的八派，是划线站队中的“正确路线代表”，是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掌权的人物。这一派从上到下掌握着各级党委的批林批孔办公室和民兵指挥部。组成的“八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志联络，上下配合。他们在批林批孔中的方针是：狠批

翻文化大革命案，层层揪复辟势力，解决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先后发动了三大战役：打蔡、马、雷、董（蔡顺礼时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马杰三时任昆明军区指挥部主任，雷高远时任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董占林时任第十一军军长）战役，打王必成（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战役，打陈康（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战役。

“大批判”：以杨树先为首，杨曾是八派的第二号人物，有名的武斗司令。这一派认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对权力分配不公，对他们的这些造反有功的人没有分配给应有的权力。他们认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造反派同复辟势力的矛盾，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三大口号：反复辟、反回潮、反倒退。他们认为，掌握了实权的人物在搞复辟，在云南就是我们过去保过的人，有的还是我们过去的战友，这些人已经成了既得利益的维护者，有的成了新走资派。他们指的就是黄兆其、刘殷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某某等人。

“反潮流”：以李毅、方向东为首，是原来的炮派。在划线站队中受到压制。这一派提出：批判谭辅仁，批判划线站队；为落实政策而斗争；为云南受害的人民伸冤。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同黄兆其编写《这是为什么》一文，

揭露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提出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

同时又同黄兆其等向江青、王洪文写信揭露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同商量，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于无声处听惊雷》、《谁是刽子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说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说昆明军区司令

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并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的帮凶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提出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揭发了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和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布置刘玉净、童永昌、陆元明、陈伟、胡世康、何文忠等人收集整理和编写了《岳永喜克己复礼言行录》，布置刘玉净等人将此材料在文山地区进行传播、散发。

一九七四年四月，何立宽布置童永昌、刘玉净等人在文山以单位或支部的名义对岳永喜进行批判，提出：“对岳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

在此期间，何立宽、胡玉珍确定了批判砚山县委书记贾齐帮。

一九七四年三至五月，黄兆其、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商量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第二个战役打王必成，第三个战役打陈康。在全省掀起“打王”、“打陈”，层层揪“复辟势力”。

一九七四年六至七月，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等人，在近日楼昆明百货商店、西山华亭寺等处商量，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根据“提、补、纳、调”方针，调整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班子。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和可以影响做工作的都应积极解决”，能提一个算一个，解决一家算一家”。

一九七四年，刘光兴与黄兆其、刘殷农相配合，在楚雄地区大量翻印、散发传单、材料、发动打倒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

同时，在楚雄州医院等处多次召开串连会，要依靠老造反“揪”三派人物”（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

在刘光兴的指挥下，批判了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楚雄州委党校书记任永（原楚雄地委副书记）、和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等领导干部，

刘光兴与李国梁、赵××商议，提出一个二十余人名单、要把其中十八人安排到州属部份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

六、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云南

一九七五年初，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将云南三大派的六个头头调到北京，限令他们在二月十一日春节之前“倒旗脱钩削山头”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九日，中央召集云南省委常委和昆明军区省委常委等三十二人到北京，举行两个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领导干部的资产阶级派性，统一认识，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

最后形成云发【1975】26号文件。

会后，中央对干部进行了调动，将部分军队在地方上任职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将部分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调离云南。

将三大派的头头组织到北京、包头、大寨去参观、学习、劳动。

一九七五年十月，中央任命贾启允为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涂晓雷多次向中央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

他把贾启允提供的邓小平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的话向中央汇报。这个重要材料，被《红旗》杂志社的“池恒”等编写文章采纳。

一九七六年一月，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等人写出大字报《云南问题宣言》，提出：云南贯彻26号文件“造成一种贯彻修正主义纳的气氛”；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一九七六年一月，刘光兴召集吴向忠、陶国培、王朝明、唐联学等人商议，向王洪文写信和向北京派来云南的记者汇报：楚雄州、县领导干部“私设王洪文专案”、“带头怂恿中伤王洪文副主席”、“肆意在群众大会和党委会上散布政治谣言，疯狂攻击丑化党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大搞大粪战术。用谣言发动群众”等等，信中涉及的干部有余活力、高仕良等二十四人，其中县以上领导干部十六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涂晓雷执笔并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编写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指出：“一批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做法不亚于波旁王朝的复辟，袁世凯之称帝，保王党之嚣张，还乡团之反扑”。提出：“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省委是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土皇帝’”，“现存的省委必须改体”，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一九七六年二月，胡延观将王洪文在中央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供给黄兆其。

王洪文在这次讲话中，批评云南省委一九七五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的很厉害”，“省委反派性，搞带职下放，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是迫害新干部，打击新生力量的一根棍子”。

一九七六年二月，刘殷农说：“我在市委斗，你们要在外面斗”，“抓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不是三个人的问题”，“是镇压造反派”。

刘还在常委会上多次提出抓三个人“路线错了，政策错了，方法错了，连时间也是错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刘殷农亲自编写了向省、市委发出“宣战”的公开信。提出“要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作战”。要把一九七五年整顿中“撤、停、免、调，抓”的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组织上恢复工作”。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刘光兴支持禄丰的张乃贤等人找到楚雄州委书记余活力，要求释放罪犯李国荣、李清明。

二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在州委大会议室对张乃贤等人说：“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支持”、“对走资派就是要敢斗，不能手软。”

二月二十七日，张乃贤等人与州委书记余活力、州公安局长戴学钦一同到昆明要求省委释放李国荣、李清明。

一九七六年三月，胡延观又向黄兆其提供了一九七五年省委贯彻二十六号文件的情况：邓小平接见了贾启允、王必成、刘明辉、刘志坚四人后，“刘明辉就大刮右倾翻案风，搞大调整，把年轻干部大批的搞下去”，“郭超伙同万里在铁路局刮右倾翻案风’。

胡延观还对黄兆其说：“省委一九七五年为阎红彦，赵健民翻案”。

胡又让黄兆其到省委办公厅机要室看了省委领导人同赵健民两次谈话的机密简报，并作了摘抄。

胡延观还将省委领导人对中央打招呼会议的讨论情况提供给黄兆其。

一九七六年三月初，在省委决定召开地书会议的前夕，黄兆其、刘殷农、朱克家等提出：“靠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一定要调整、改组”；要“扩大会议规模”，把一九七五年被“撤、免、停、调和下放”的地、局一级“新干部”请来参加地书会议，并要尽快恢复他们的职务。

在会上，沈炳章带头发言，金奕旦等人表示支持。

刘殷农说：邓小平是“梯也尔式的人物”。

张奎林、徐宝兴组织带领建委系统五百余人到会上揪斗省委副书记黎韦和高治国等领导干部，

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杨建祥等人组织了二、三百人的“告状团”、“上访团”，进驻省委领导机关，揪斗省、地、州党委领导干部。

会议期间，黄兆其、刘殷农还主持拟制向中央发出揭发省委的电报，提出要“改组省委”，另组“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涂晓雷亲笔加上“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

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通过斗争才参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刘光兴在黄兆其、刘殷农拟制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与黄兆其、刘殷农要求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

这个电报有一百多人签名。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丁正中、陆元明、陈伟等人带领州委大小汽车五部及州委副书记罗运通，组织了一百余人赴昆告状。

四月八日，丁正中等人组织了二十余人的告状团第二次到昆明。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晓雷执笔编写了《敦促刘明辉转弯书》的文章。

一九七六年二至八月，黄兆其、刘殷农要求释放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同时，黄兆其还支持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释放陈克发、杨运昌等十三名在押人。

在黄兆其等人支持下，十三个地、州、市先后共放出一百二十四人。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何立宽与黄培根、陆元明、丁正中、陈伟、马昭、任怀灿、童永昌等人，在丁正中和童永昌家多次策划，形成了以何立宽为首的“核心”，确定了打倒原文山州

委副书记王民、文山县委书记杨铎、副书记项朝光；批判原州委副书记王槩、罗运通的计划。

文山地区从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多次开展对王民、王槩、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人的批判。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将一九七五年中央调整省委领导班子的情况，省委向中央报告省级机关和地委常委以上干部排队情况，以及省委关于对阎红彦、赵健民“问题”的研究意见等，编写在会议第四十七期简报上。在“简报”中还反映了与会者的一些意见；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确实已经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刘明辉等几位常委“搞阴谋诡计”、搞“核心中的核心”，是“超级省委”。省委贯彻(75)26号文件，是“整广大干部和群众”，是“镇压造反派”。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六年四月上旬，“昆明地区部份群众准备于四月八日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认为，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省委是幕后指挥。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材料送到清华大学交吴炜煜转报江青等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四日、黄兆其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黄兆其先后五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揭露省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提出要“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

一九七六年四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林敬荣等六人到清华大学等处联系，报送揭露省委的材料，要求尽快解决“云南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涂晓雷化名王正名、沈炳章化名朱永红，携带“昆明未遂四·八反革命事件等材料，到北京汇报情况。涂当即受到接待人吴炜煜（人民日报记者）的表扬说：“你们云南揭邓是比较早的，象那句典型话（邓小平的一句话）就是从你们寄

给的材料中发现的，我们就用了，你的那封信写得很好”，“我们感谢你们，你们支持了全国运动”。接着吴炜煜对涂晓雷说：“这次运动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整个社会要来个飞跃”，“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作够”等等。

一九七六年四月底，胡延观在省级机关批判大会上发表演讲，揭露省委“以整顿为纲，把领导班子中的青年干部统统打下去”，“把有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三要翻案的所谓‘老家伙’重新扶上台，实行领导班子大调整、大改组、大换班。

他的演讲稿被徐宝兴等人大量翻印散发。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黄兆其、杨玉荣、刘浩林敬荣等人开会，对省委理论讨论会制定了五条方针：①要揭发省委假批邓的阴谋；②要戳穿搞纯学术讨论的骗局；③要发动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从里面作斗争；④会内会外配合；⑤争取把这个会开成揭批省委内“走资派”的会。

林敬荣将上述内容写成大字报，在理论讨论会上张贴。

一九七六年三至九月，黄兆其、刘殷农、胡延观等人多次对省委常委进行“分析排队”，制定了“靠、打、拉、烧”的方针

在此期间，黄兆其还直接指挥曲靖、玉溪、大理、红河、文山、昭通，思茅、保山、东川等十三个地、州、市和部份省级机关、厂矿的活动。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公开贴出打倒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和大标语，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这一活动，但徐、胡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

十九日下午，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一起到胡延观家，共同商讨追查“后台”，胡延观揭发王必成、黎韦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

二十四日晚，胡延观和黄兆其一起将王必成、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的情况报告公安机关，要求追查。

一九七六年五月，以何立宽为首的帮派核心成员多次进行策划，责成陈伟编写了《文山地区触目惊心的右倾翻案风》的材料，分别送给《人民日报》驻云南的记者以及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安炬祥等人。并指派陆元明向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炬祥诬告文山州、县主要领导干部，图谋将州委副书记王民、王桀赶走，把支持帮派的李凤萼、苏复调回文山，恢复郭明进文山县委书记职务。

一九七六年五月，六月，何立宽、陆元明、童永昌等人支持在押犯家属两次进驻州委机关，经过十七昼夜谈判。州委释放了在押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

一九七六年六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林敬荣等六人到清华大学等处联系，报送揭露省委的材料，要求尽快解决“云南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胡延观把云南省一些党政机关领导班子瘫痪和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口授给去北京的林敬荣，转报给了迟群。迟群收到“报告”后，对吴炜煜说：“象这样的情况很重要，你遇到了及时转给我。”林敬荣接受了吴炜煜关于“云南问题，象一个要穿透了的脓包一样，是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了”的意见。回昆后分别向胡延观、黄兆其等人作了汇报。

一九七六年六月，昆明市党干会议前，刘殷农提出要“按翻一、两个”，“换掉一批人”，要“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

会后，刘殷农亲自编写了“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的文章，向楚雄、西双版纳和文山的邱立峰、马正全、何立宽等人传授。

一九七六年六月下旬，胡延观知道了中央关于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第二天就把这一机密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并要黄兆其“注意斗争策略”。

黄兆其等人得到这一情况后，于七月中旬和八月初两次在杨慰农家开会，提出“要抓紧解决恢复职务的问题，争取多一个算一个，然后回本单位斗”。“要抓紧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地解决一些组织问题”。对省委领导“不能拿掉几个，也要争取分是非时棒棒打重一点”。

一九七六年六、七月间，刘光兴多次说“抓人是右倾翻案风中抓的，路线错了，先放出来再说”。在刘光兴支持下，一九七六年全楚雄州释放 18 人。在释放时，出现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迎送。

一九七六年八月，黄兆其要昆明铁路局的郭弟元、徐洪文等批斗了省委副书记郭超。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日，何立宽指派陆元明等人到昆明，将由其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恶果的报告》分别送给朱克家、黄兆其、安炬祥等人。并由陈伟将这份材料寄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

在这份材料中，揭发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桀：“有勾结土匪，出卖同志的严重历史问题”。揭发原州委副书记李铎“有叛徒嫌疑”等等。报告中揭发文山州、县十三名党委常委“大刮右倾翻案风，执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将八名州委常委，五名县委正、副书记“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批斗”。

一九七六年八月，刘光兴明确提出：“要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打不倒也要赶跑”；“要把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一次大痛击。”；“要有一批新生力量担任一把手”，“付(永昌)、白(光)回楚”。

石林会议前刘光兴与邱立峰、李国樑等人策划，在石林州委常委会会议上要“定一、两个走资派”、要“形成一个纪要”。

在石林会议期间，刘光兴、柯平、吴向忠等人向常委会提出：定州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任永为“走资派”，要形成会议纪要。

八月八日，楚雄召开州委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会内会外，大造革命舆论，在楚雄城写出了“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等标语。

八月九日，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批判州委书记余活力。

刘光兴要求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永昌参加会议。

八月二十日，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把付永昌(已调离楚雄的军队干部)白光(已调离楚雄的原州委副书记)调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个“决议”。

八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带领二十多人到昆明，要求省委批准他们的两个“决议”。

一九七六年八月，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明确提出：“要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打不倒也要赶跑”；“要把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一次大痛击。”；“要有一批新生力量担任一把手”，“付(永昌)、白(光)回楚”。

石林会议前刘光兴与邱立峰、李国樑等人策划，在石林州委常委会会议上要“定一、两个走资派”、要“形成一个纪要”。

在石林会议期间，刘光兴、柯平、吴向忠等人向常委会提出：定州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任永为“走资派”，要形成会议纪要。

八月八日，楚雄召开州委扩大会议

会议期间，会内会外，大造革命舆论，在楚雄城写出了“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等标语。

八月九日，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批判州委书记余活力。

刘光兴要求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永昌参加会议。

八月二十日，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把付永昌(已调离楚雄的军队干部)白光(已调离楚雄的原州委副书记)调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个“决议”。

八月二十一日，刘光兴带领二十多人到昆明，要求省委批准他们的两个“决议”。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涂晓雷写信给文化部于会咏、刘庆棠提出要求改组云南省委。

九月中旬，涂晓雷和林敬荣到连云巷向《人民日报》“记者”谢荣镇面谈了改组云南省委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九月，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说：“余活力犯走资派错误，不能主持毛主席追悼会或致悼词”，“我主持追悼会，普贵忠致悼词，以后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黄兆其要涂晓雷、林敬荣写了一份“改组省委”的计划和名单交给到云南来的“记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两晚上，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徐宝兴等人在杨慰农家开会，按照黄兆其与胡延观事先的商量，提出了对“五大书记坚决打(倒)”，“但重点应该转向王必成、黎(韦)”的方针。并提出了改组省委领导班子的方案。

会后，黄兆其把他们策划的方案告诉了胡延观，胡表示赞同。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由涂晓雷、林敬荣执笔写成“报告”，胡延观看后表示同意。经黄兆其审阅。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方案送交谢荣镇，郭剑峰转报上去。在这份改组省委的方案中，要求中央派一个在云南军内外有影响和熟悉云南情况的中央委员(指昆明军区原某副司令员)来当省委第一书记；要黄兆其、朱克家等人进省委领导班子。

一九七六年九月，省委决定拘留楚雄州禄丰县“八·二五”事件的现场指挥李成滇、普文荣。

刘光兴在执行拘留普文荣时，亲自参加为普文荣举行的“告别酒会”并流着眼泪说：“用我的手抓自己的战友真是痛心”，“我希望你们在家的要团结战斗”。

在拘留李成滇前夕，刘光兴向禄丰的唐联学等人说：“你们这次欢送造反派头头可以多来点人，搞得热闹一些，来了可以批斗余活力”。

十月十二日，唐联学等人给李成滇戴上大红花，出动一百多人，坐汽车，呼喊“热烈欢送战友李成滇奔赴新的战场”、“为革命坐牢光荣”等口号送到楚雄。

当天下午批判了州委书记余活力。

七、十月政变后的应变活动

一九七六年十月，组成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的六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沈炳章)的秘密指挥机构，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份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志联络，上下配合。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黄兆其得知逮捕四个领导人的消息，十三日、十六日，两次召开有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参加的会议。

黄兆其认为这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

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

并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策动军内 XX× 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选择楚雄等地为基地；由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分头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志“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中午，何立宽得知消息后，认为是“右派政变”，希望发表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希望国内爆发“革命”。

十月十三日，何立宽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动向和行动计划。

十月十三日，何立宽向任怀灿、童永昌等人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即将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了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同时参与分析了有关部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起义的方案，确定要搞“云贵联合”。安排了黄兆其与某副司令面谈的时间地点。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涂晓雷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电报，暗示沈“到南京采购货物”，迅速返昆。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刘殷农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国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人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向楚雄的柯平、安且康、杨跃才、杜勇，文山的任怀灿、马昭等人，传达了准备武装叛乱的计划，要他们“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到时间就到那里打游击，并要任、马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准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与军队许梅康等人联络的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作了汇报，同时又进一步策划了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

刘殷农派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起义的动向，

黄兆其给省交通局张贤忠、煤管局金奕旦、海口三五六厂刘志宏等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准备武装斗争。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凌晨四点，任怀灿、马昭从昆明返回文山，立即向何立宽转告了刘殷农“粉碎四人帮是真的，走资派可能趁机翻案报复，我们要坚持斗争，要是真的干起来，要依靠民兵和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要与部队取得联系，争取部队支持；现在要作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意见后，何立宽即与任怀灿、马昭、李玉芬、李传田、丁行红、蒋绍明、杨和昌等人，先后在李传田及其家中，策划了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地点选择在文山老君山；医药由李玉芬准备；车辆、汽油由蒋绍明、杨和昌准备，收发报机和报务员由余相德准备和物色，地图（除将丁行红原准备的十一张军用地图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又从李传田处拿到文山州地图和云南公路图各两份），武器弹药的准备（除将向李传田等人搞到的左轮手枪和七六五手枪及子弹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十月十三日和十九日，又分别从丁行红处搞得五四式手枪一支、子弹二十三发、军用手榴弹四枚。十七日、十九日，何立宽又要任怀灿、马昭到文山驻军找×政委、×副政委要武器弹药。）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楚雄州委副书记刘光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

十月十五日下午，刘光兴在州医院李国樑家召集邱立峰、赵文鼎、安且康、李国樑等人开会，认为逮捕“四人帮”是“右派政变”。

刘光兴决定派柯平、安且康连夜上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联系。

十月十六日上午九时，柯平等人在刘殷农家找到黄兆其、刘殷农、黄对柯说：“形势可能有大反复，要准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黄走后，刘殷农具体向柯平，安且康布置，要楚雄地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

们的基地”。刘殷农还表示“对楚雄寄予希望”并要求“要有转入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

十六日下午柯平等人赶回楚雄，当晚刘光兴在柯平家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安且康、邱立峰等人密谋策划武装叛乱。柯平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后，刘光兴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搞武装斗争是有条件的，文的武的我们都要准备”。“要做好思想准备，重上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当议论到武器问题时，刘光兴说：“只要分区有人参加，枪支不成问题”。

十七、十八日，刘光兴分别向州水电局吕××，楚雄县陶国培“打招呼”。要陶国培“先派几个人进哨区掌握情况”。

十月十八日，晚，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樑办公室内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樑策划武装行动计划。

刘光兴说：“各县搞各县的力量太分散，为了便于集中指挥，要分东西两片”。会上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四个县，大约有三千人左右，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大约有二千人左右，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并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共同策划“改变策略”，组织第二套指挥班子。还由涂晓雷等写作了所谓揭批“四人帮”罪行《提纲》、《春城魔影》、《周兴是怎样死的？》等文章和传单。

八、十月政变后的翻案镇压活动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为解决云南问题，召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十八人到北京开会

会议结束时向中央写了报告。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批转“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中央任命安平生为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9年12月）

同时任命陈丕显为云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张铨秀为省委副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前被错误处理案件中有关工资待遇问题给云南省委纪委的批复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刘明辉为省长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关于云南地下党、“边纵”若干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查报告》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

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对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批示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日，中央组织部印发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的通知(节录)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黄兆其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黄兆其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据载：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黄兆其被公安人员带着与赵健民在贵阳市宾馆相见。黄兆其告诉赵健民：“您是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点名的，是康生要我们搞您的材料，当时，我们八派的几个负责人可以随时去中央文革汇报工作，主要是向康生汇报。又说：我不知道划线站队中死了那么多人。我害了您，害了云南人民，也害了我自己。赵健民说：文革，是全国人民一声灾难，云南是重灾区。您，我，都应该根据各自的情况吸取教训。)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刘殷农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刘殷农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涂晓雷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涂晓雷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胡延观反革命案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胡延观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刘光兴反革命案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刘光兴有期徒刑拾贰年，剥夺政治权利叁年。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何立宽反革命案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判处被告人何立宽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本庭认为：原审认定上诉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上述罪恶有大量物证，书证在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程序完备，应予认定。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和拒不认罪的表现，应予严惩。原审考虑到

上诉人犯罪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予以从轻判处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上诉人在其全部犯罪事实面前声称无罪，表示对原判永远不服，甚至反诬原审违反法律程序，对其诬陷等等，纯属坚持“四人帮”反动立场，掩盖其反革命野心，应予驳回。据此，特依法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九、受迫[害群众的申诉活动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日，思茅市林进良等十六人的公开信：《云南“揭批查”运动中的特大冤案》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受批判斗争的就有 150 万人（约为文革中参加这个群众组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 15 万人，抓捕判刑和劳教的约五万余人。县团以上干部为 7549 人。

思茅地区景东县为例，全县被批斗人数为 3100 多人，被打伤致残的 1000 多人。从县到生产队撤换干部 1000 多人，抓捕 125 人，由公安、警察、专案组将受审人员五花大绑押到 14 个公社巡回游斗 108 人，正式判刑 53 人，在批斗大会上活活打死 4 人，残酷折磨致死 9 人。

思茅是行署所在地，文革中只不过是普洱县辖区的一个镇，人口不足二万。当时一口气就抓了 103 人，判刑 52 人，逼死 8 人。

普洱县小学教师罗廷祖，被普洱县常委会用 55 个字，以反革命罪判了 6 年刑，出狱后，不给落户，成了没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

白恩培在《云南现代简历》的序言中声称，“云南不存在冤、假、错案”，“全省只判了 24 个人”。

鲁瑞林将军是你们认定的黑后台，还捏造了一个一·二四假案陷害他，可中央认为是假案，为他平了反。

朱克家你们认定的是这个“体系”的首席代表，目前重新入了党，在恩洪煤矿任部门经理。

广大的工人、农民、法官、老红军、老干部，他们早就对此事有过公平的定论，对省委某些人枉法弄权倒行逆施行为早已深恶痛绝。

50年代原云南省委副书记马继孔写了一本《紫苑随笔》有这样一段话：“组织了几万干部，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一个真帮派体系也查不到，查了15年却伤害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执行的是‘党内分裂向后看’。”他们对上不听招呼，听了传达拒不执行，对下，对伤害的同志，又封锁消息，也不平反，直至今天。

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将军在《西南三十年》中写道：“云南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根深蒂固，热衷于搞派性的人，在口头上并不承认自己有派性，但在具体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了……就必然在揭批查中发挥其破坏性和影响作用……”

景洪县小勐养农场×××党委书记，在解决揭、批、查蒙冤坐牢释放回来安置就业的人员会上讲：过去我有派性，抓你们时巴不得枪毙，才解心头之恨，现在看来错了，司法上的事，我无权解决，现在回来了，同等工龄，别人拿多少，给你们拿多少。

思茅地区主管政法的×××副书记，1998年当听完受害人×××陈述当时揭、批、查时阴风熠熠、杀气腾腾的状况后，感叹道，这真是“山高皇帝远啊。”“神仙打架百姓遭殃。”不几天他就为这个受害者签发了改判文书。

×××民警，她负责监控×××受害者，2004年8月15日将这个受害者送去了水果、月饼，见面后讲道：×大爷，我也知道你是受冤枉的，人家上面叫我来看着你，请你理解，出了什么事，我们的饭碗也会丢的啊！

思茅地区原组织部副部长，当时运动办公室负责人×××，一天与受害人×××不期而遇，他深切地握着手说：这些年你受苦啦，那时人家李德云（组织部长）想抓谁，就抓谁，哪个还敢说个“不”字，就连张文英（地委书记）也讲，老史啊全区凡公社以上一派观点的已经抓了2000多人了，这样搞下去，以后怎么交待！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李树林等三〇四人关于请求撤销违法违宪的《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办发[2001]11号文件》的报告

云南揭批查受清理审查进限制人身自由的“学习班”批斗的150多万人；受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处理的15万多人；被判刑入狱的5万多人，判处死刑2人，审查期间捆绑吊打、刑讯逼供，被打死，逼死的千余人。

昆明市寻甸县 13 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全部以“四人帮”帮派骨干篡党夺权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狱，两个农民生产队长也以篡党夺权反革命罪判刑七年。全县判了一百多人。

云南揭批查抓“四人帮帮派骨干”，工厂抓到班组的“工人四人帮”农村抓到生产队的“农民四人帮”。昆钢车间抓“四人帮”，还要“三男一女”，连一名军嫂也抓上凑数。

处在高黎贡山里的腾冲县桥头生产大队，揪出了“农民四人帮”，分别是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生产队长和大队信用社会计。回民马天祥以“阴谋篡夺大队党支部领导权”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 14 年，妻子被逼疯，女儿被拐卖，家破人亡。

玉溪市江川县的民政局干部杨秀杰，是参加解放战争，多次立功的老干部，罗庆明是江川一中的体育老师，是西藏平叛立功的转业干部，两人被定为“帮派后台”，发动全县签名，“要求枪毙杨秀杰，罗庆明”，采取不签名不记工分，不分口粮的手段，造成“民愤极大”假象，被玉溪市中院判处死刑，不给上诉，于 1978 年 9 月枪杀，还不给家属判决书，不准家属收尸至今尸骨无存。

昆明市禄劝县屏山镇两名革委会副主任被审查批斗，一名被判刑。生产队长 23 人被关押，数百名干部社员被捆绑吊打。更为荒唐的是，凡被批斗者，人人罚款 100 元，由县委副书记罗应祥带着民兵挨家挨户收罚款。

云南揭批查枉法滥判无辜，五万多份判决书，五万多人的政治生命和血泪，是铁的事实，云南省委向党中央和公众宣布和云南党史记载，云南揭批查判刑只有 24 人，欺上瞒下。三十一年来不准申诉，不给生活出路，有的农民出狱后，不给落户，不分土地……云南的揭批查运动制造了云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错案。

二〇〇八年三月七日，李树林等关于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 26 年来拒不贯彻执行中发[1982]9 号文件——为解决我们的生存权，致全国“两会”的公开信

以安平生、王必成为书记的云南省委，违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把一大批衷心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的决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农民，打成“‘四人

邦’云南邦派体系”，作为敌我矛盾，动用专政工具判刑处罚，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严重的法律后果。

云南揭批查运动自 1976 年末到 1983 年，计：被不准上诉名为处死实为谋杀 2 人；被判处刑罚入狱 5 万多人；受党纪、政纪、行政开除公职处理 15 万余人，受审查、批斗的 150 多万人，审查期间被打死、逼死千余人。其面之广，其数之巨，堪称全国之最！

各省传达贯彻中发[1982]9 号文件的消息，云南省委再次下令，再用刑罚镇压的手段，对付私议传播该文件的人。

原云南省交通厅的张显忠、傅觉悟，原昆明市委宣传部的王海泉、昆钢的董时汉，×××的家属陈建英等，都因偷偷传播中发[1982]9 号文件精神，被以“现行反革命”、“泄密”等罪名抓捕入狱。全省在同一时期，因同一问题被抓捕的都是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竟达千余人。这些人被关押的时间，最短的三个月，最长的达三年多。云天化的钱厚源因传播了该文件精神，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年徒刑，其高大的身躯被压弯投入囹圄，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保山地区干部滕少清，根据中发[1982]9 号文件的精神，结合保山地区在揭批查中违法、违纪的实际，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按理说，这是共产党员的权力，是《宪法》保障、党章允许的合法行为。但云南省委受不了了，怎么能容忍自己辖下的问题，被捅到中央去呢？于是，他们派公安厅的张××和省纪委的贾××，冒充是“中央调查组”找滕少清调查落实所反映的问题，滕欣喜若狂，将时任保山领导搞揭批查违法、违纪的问题一一汇报。滕少清哪里知道，这次谈话成了他“攻击”领导的“交待”证据。因此，1982 年 11 月 2 日，滕少清被以“反革命罪”宣布逮捕。《云南日报》为此还在头版发了专讯：“坚持邦派立场，攻击清查工作，诬告陷害领导，保山地区邦派残余分子滕少清被依法逮捕”，并配发短评——《保持应有的警惕》。滕少清在狱中受尽折磨，当局采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逼供、诱供、指供。保山地区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对其起诉，由于没有任何“反革命”证据。只要有权，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滕少清最终还是于 1983 年 4 月 28 日，以“诬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判决书为“（1983）保地法判字第 04 号”。

十、对赵健民的审查问题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央决定对赵健民监护审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赵健民被关押在北京西半壁店卫戍区看守所，

写出《呈谢副总理并报敬爱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并党中央并总理、伯达、江青同志并康老并中央》央的申诉信。

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赵健民被转移到交通部干部学校。

八月十五日（云南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赵健民回顾自己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赵健民最初认识“左”的的偏向，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后，赵健民经过认真的思索和调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赵健民认为，从全省农村和城市的情况来看，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变成次要矛盾。对于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赵健民反对不切实际的求大求快、急燥冒进……

一九五七年赵健民对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感到很不理解。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赵健民读了一遍，不禁暗暗吃惊，心想怎么全翻了个。他明显感觉到，文章表现出一种“左”的倾向。

一九五八年夏季，赵健民成了在这一运动中成为主要对象，被作为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总代表。批判的重点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冒进。降职为济南钢铁厂副厂长、党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严酷的事实，使赵健民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失误。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报告和讲话，使赵健民颇为振奋。

八届十全会后，赵健民与一位熟人交谈时，不无忧心忡忡地说：光讲阶级斗争，生产搞不好，也不能团结蛰分之九十五以上。“

赵健民认为：文革初期，不久呈现出来的怀疑一切、横扫一切、打倒一切、不要法律、不要政策的无政府局面，使他感到理论与实际相背离。阎红彦之死，赵健民本想中央能表示个正确态度，但中央不但没有态度，反要省委转变立场支持造反派。赵健民认为，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到处煽动闹事，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把整个社会推到了内战的境地。赵健民觉得，这是拿国家当儿戏。

这时，赵健民结合自己的经历思索着：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共和国，为什么会走到到这个地步？

结论是明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全党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那么，为什么“左”倾错误得不到纠正？赵健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民主和法制。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会命令正式逮捕赵健民，转至秦城监狱。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九日，赵健民被押回昆明，进入云南省第三监狱。

一九七一年三月，赵健民被转到省第二监狱。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赵健民写十八万言的申诉书，他认为自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作和斗争，在历史被捕问题上是一个政治坚定的，能以生命作条件捍卫党的利益的；在1968年3月1日同康老的谈话是爱护党的事业关心党的利益的。

关于赵健民的历史问题

1932年11月，赵健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5月，赵健民担任济南简易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济南北区巡视员。

1933年7月2日，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此后，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中共中央失掉了联系。

1934年5月，赵健民建议成立成立中共济南市委，赵健民任书记。

1935 年冬，赵健民与莱芜党组织负责人刘仲莹商定，组建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委员会。赵健民任代理书记。

1935 年冬，赵健民与中共北方局代表、直鲁豫特委书记黎玉接上了关系。

1936 年 5 月 1 日，新的山东省委建立，黎玉为书记，赵健民为组织部长兼济南委书记。

1936 年 9 月 27 日，赵健民被捕。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1937 年 10 月，山东省高等法院以停止羁押的名义，将赵健民等人释放。

1957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赵健民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我们认为：赵健民同志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坚持独立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党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文革中审查的历史问题：

其一，供出了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周宝祥

湖南一个老同志证明：赵健民在敌人审讯中供出的周宝祥是省委书记黎玉的化名。

但黎玉本人否认用过这个化名。

其二，供出了寿张乡师党支部书记王福昌

在审讯时，敌人搜查出赵健民打给王福昌的电报底稿，王福昌被捕。

但敌人并未问过他担任支部书记的事。

其三，供出了莱芜县委负责人刘盛玉

叛徒方春荣证明：赵健民到过刘盛玉的家，赵健民没有否认。这是否就是供出？

其四，供出了共产党员刘嘉典

审讯时赵健民说：自己入党的介绍人是刘嘉典。

实际介绍人是姚仲明，刘嘉典是他联系的党员（此人叛徒方春荣熟悉）。

这算不算供出？

其五，1937年1月3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意见书》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57年审查赵健民历史问题时认为：“意见书是一份事实有真有假，可以作种种解释的敌伪档案材料。”

这样的材料是否可以作为依据？

一九七三年二月三日，赵健民第一次接见亲属。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赵健民提出了迅速结案的四条要求。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云发1974第83号）上报中央

意见列举了赵健民的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1936年在济南被捕叛变

第二，积极追随刘少奇、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第三，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结论为：赵健民是罪大恶极的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中央撤销赵健民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清除出党，依法严惩。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赵健民分别给康生和中共云南省委写信，要求尽快作出结论。

一九七五年九月，复查组负责人将云南省委上报中央的意见给赵健民看。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赵健民被释放回家。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

维持一九五七年中央组织部审查结论。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对赵健民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上报中央。

同意省委组织部的报告。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中共云南省委发文件为赵健民平反。

贰、本节简论

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拒绝会见群众而自杀身亡

关于阎红彦自杀的问题，过程很简单：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傍晚，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省委领导到会。

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

阎红彦说：怎么办？要我去，我就去。

越健民说：我坚决反对你去。你是第一书记不能去。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个别人主张去，多数人同意越的意见，不能去。会议决定拒绝出席。

会后书记处成员、常委及省委各部委负责人纷纷下乡躲避。

夜十时许，革命群众激于义愤，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要阎红彦出来见群众(当时群众怀疑阎红彦躲在昆明军区)。

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雨××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岳肖峡假冒“中央冶金部岳局长”前往渡口，秘密转移到楚雄××医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有人在社会上大造谣言，把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揪阎红彦说成是“反革命暴动”。

省委地下司令部转至西山，电话通知各地委说：“省委已转入地下”，并就打游击的问题与专县联系。同时，在省公安厅、省委一号宿舍等处设立了若干“联络站”、“联络点”，并指定了联系人和联络办法。

阎红彦拒绝接见广大革命群众，有的同志提出：还是去参加的好，不要和群众对立下去。赵健民却说“现在在压力下屈服出去，等于投降。”并叫其它书记常委都不要出面，说红卫兵抓不到人，阎红彦就可以避一避。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

深夜，阎红彦与周兴在小麦雨共商对策，由周兴主持起草，以省委名义又给黄兆琪等“抗议书”，“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当夜，就派专人送到军区大院。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早，红卫兵去云南军区找阎红彦，张力雄出来对红卫兵讲：“我拿我的三十八年党龄、政委身份和脑袋保证，阎政委不在我们云南军区及其所属单位。”

上午，阎红彦决定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这一报告由周兴、王腾波动手修改。阎红彦在“报告”中说自己已作了好几次检查，冲军区“是有计划的行动”。这报告当天即发往北京。

阎红彦并对下发出指示：“能活动就活动，不能活动就隐蔽起来，保存实力，观察动向。”

省公安厅接着设立了秘密办公室，组织一群人单线联系，使用暗语，汇报情况，每天都向阎、孙等人汇报。

昆明三大群众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举行七万人的游行，路过昆明军区门口，向革命造反派示威。

昆明街上掀起大辩论的热潮。辩论中心是：“该不该进驻军区大院”，“该不该给赵健民戴高帽子游街”。

傍晚，叶剑英打电话到昆明军区：阎红彦同志在什么地方？他身边有什么人？安全不安全？你们要说服造反派，不要抄阎红彦同志的家。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躲在小麦雨××军区警卫团的阎红彦于清晨一时许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话，

陈伯达在电话中反复指示“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

那么值钱？你不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极为不满的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等等。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江青在电话中要阎红彦端正态度。

当晚阎红彦给他老婆王腾波留下一份“遗书”后自杀。并在“遗书”上写道：“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对阎红彦自杀问题，当时的中央是怎么结论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给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电话指示

请告诉周兴、秦基伟二同志并转告云南省委、人委、昆明军区、云南军区：

一、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不容许有任何动摇。

二、你们必须坚定地、彻底地批判过去云南省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阎红彦自杀

七日没进入军区，八日阎红彦就搬到西山小麦峪自杀了，可耻的叛徒。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现在公开给你们讲，这与进入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毫无关系，对保守派的工人、学生也没有关系。

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件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造反派要继续调查是可以的，有新材料就上报中央，同时我们责成省委、军区进行调查，要有新材料要向中央、军区报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接见云南各界造反派的讲话

1月4日工人学生开联合造反大会，阎红彦拒绝了，不但省委不支持，阎红彦也不出来，要求省委第一书记出来检讨，这是合理的。既然保守派喊你出来，你出来了，造反派喊你出来，不出来，这是起了支持保字号的作用。叫他出来，他不出来，如果省委是革命的那么就出来嘛！也没有什么。行动证明云南省委怕炮轰，怕革命，怕当小学生。

由于昆明工人、学生进驻昆明军区大院激于义愤唤起阎红彦的震动，可是这一行动使阎红彦更加害怕，看到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还不挺身而出，相反却离开了昆明，躲在西山，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和群众闹对立，让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人学生发生冲突。当时周兴去，没约阎红彦一道去，群众更生气了，所以对峙起来，第一书记不去，仍然是对立。

而另一书记赵健民被同学发现后却坐车想走。反而向群众挑衅，连郭超也说了真话，的确赵健民在宣传车上，在主席像前指手划脚辱骂群众，这是反革命的行动。并说：“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没想到这样的人在群众面前讲这样的话，当然使群众激愤，游了街，戴了高帽子，这样的领导不是上对中央毛主席，下对群众负责。这样的人怎能当领导呢？他不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而是在群众面前搞义气。在游街中受了点伤算得了什么？这么一大股洪流，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受了一点伤算得了什么？洪流总要冲击一点泥土，不然会出修正主义。而赵健民不这样想，云南省委也不这样想，相反还跟群众闹对立，呕气，这样的情绪不对头。

就因为六号出了这样事，七号紧急，八号阎红彦躲在西山自杀了，这是北京去的法医证明的。是自杀的，阎红彦是可耻的叛徒，我在这里公开和你们讲，他的死与在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的工友、学生，没有关系，刚才和毛主席汇报过了，有人想用阎红彦的

死来压制革命，是根本办不到的！决不允许造谣污蔑，要把罪名强加在革命工友、学生头上那是妄想，同时与昆明保守派也没有关系，他的死是可耻的叛徒。

至于阎红彦尽管他对党有贡献，他不是高岗分子，高岗压迫他，和刘志丹在一起，也不满意李井泉，他和中央谈过，他到云南前，还专门和我谈过，他说李井泉不民主，专断。那么这样立场的人，他的下场为什么和高岗一样，更可耻呢？他之所以走到绝路上，是他自己落后。阎红彦上不做毛主席的学生，下不做群众的学生，中与各级的干部专断，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呢？

周恩来的讲话除了“可耻的叛徒”这顶帽子可以不戴之外，其它内容应该说都是正确的。

阎红彦自杀问题的要害，就是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了对抗的态度、对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了对抗的立场。在下挤上压的境遇中，他不愿意悔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在他看来，这叫做“以死抗争”；在革命群众来说，这叫做“死不悔改”。

二，关于中央监护审查赵健民

中央为什么要作出这个决定呢？

1，关于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

这个决定是康生个人作出的，还是中央集体作出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军区和云南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康老：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变分子，混在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特务云南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指美蒋）的计划。你上次来北京，几次写信找我谈话，你那次谈话，我向中央反映了，你那次谈话，是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

谢副总理：中央决定，把赵健民监护起来审查，立即执行！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省两派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

赵健民就是要两面派的典型，那天，我们指出他挑动群众斗群众，蹲在北京遥控指挥，他矢口否认，要他签字，他说用党籍保证。把笔记一看，正是他在北京指挥。赵健民一九三六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赵健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周总理：

过去的当权派有的靠边站了，象阎红彦、叛徒赵健民这样的人，应该彻底批判。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赵建民之流进行英勇斗争的伟大成果，

这些材料说明：当时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是中央的决定，而不是康生个人决定。

2，关于赵健民建国前的历史问题

审查赵健民建国前的历史问题，1937年1月3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意见书》，是一份关键材料。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1957年审查赵健民历史问题时认为：“意见书是一份事实有真有假，可以作种种解释的敌伪档案材料。”

一九五七年的中央组织部，采纳了他们认为是“真”的事实，作出了有利于赵健民的“解释”，从而得出了赵健民“坚持革命”结论。

一九六八年的专案组，采纳了原中组部认为是“假”的材料，作出了不利于赵健民的解释，从而得出了赵健民“叛变”的结论。

经过六年多的反复查证，关于赵健民被捕的一些问题仍然找不到有力的肯定或否定的证明。因此，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云南省委上报中央的《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中央没有批复。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云南省委解除对赵健民的监护，释放回家。

3，关于赵健民在建国后文革前的政治立场问题

根据《赵健民冤案》一书的记载：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云南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赵健民回顾自己在建国后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赵健民最初认识“左”的的偏向，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召开前后，赵健民经过认真的思索和调查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于社会主要矛盾，赵健民认为，从全省农村和城市的情况来看，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阶级矛盾变成次要矛盾。对于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赵健民反对不切实际的求大求快、急燥冒进……

一九五七年赵健民对毛泽东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感到很不理解。毛泽东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赵健民读了一遍，不禁暗暗吃惊，心想怎么全番了个。他明显感觉到，文章表现出一种“左”的倾向。

一九五八年夏季，赵健民成了在这一运动中成为主要对象，被作为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总代表。批判的重点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冒进。降职为济南钢铁厂副厂长、党委第二书记。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严酷的事实，使赵健民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失误。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报告和讲话，使赵健民颇为振奋。

八届十全会后，赵健民与一位熟人交谈时，不无忧心忡忡地说：光讲阶级斗争，生产搞不好，也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按照赵健民自己的说法，他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采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是抱着抵触、甚至反对的立场。

4、关于赵健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

(1) 文化大革命初期，赵健民执行了反动路线对抗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健民就紧随阎红彦执行刘少奇的打击一片的反动路线。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革命群众起来批判云南省委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赵健民采取了极为恶劣的对抗态度。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中午十一时许，进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部分革命群众，到省委书记处办公大楼找阎红彦。

赵健民对其它书记说：“你们都走，我一个人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当天赵健民被红卫兵揪到军区。革命群众问他阎红彦的去处，他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

群众气愤要给他戴高帽子，他说：“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激起了革命群众的愤慨，给他戴高帽子游了街。赵健民在汽车上拼力反抗，撕毁了六顶纸糊的高帽子。押解的人看他不老实，就卡住他的脖子，赵健民就骂这些人是反革命。

赵健民被戴高帽子游街后，住在四十三医院。

周总理指示叫赵健民转入附属医院，赵拒不执行，并大发脾气说：“让我转到附属医院是个糊涂主意，是谁出的主意？”当有的同志告诉他这是周总理的指示时，他仍然对抗说：“总理说的也可以商量嘛！”并要挟说：“如果要我转院，我就一出省，二到专县，三回家。”

赵健民认为：文革初期，不久呈现出来的怀疑一切、横扫一切、打倒一切、不要法律、不要政策的无政府局面，他认为，中央指导文革的理论与实际相背离。

阎红彦之死，赵健民本想中央能够转变态度，但中央不但没有转变态度，反要省委转变立场支持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康生会见赵健民听取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意见

赵健民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市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指示的。

第二，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

第三，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拥护，现在可不是这样做的。

（2）云南省军管会成立以后，赵健民支持炮派“揪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

康生在北京专门找李成芳、张子明谈话，告诉他们赵健民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他们注意赵的动向。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炮派组织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一直持续到六月三日才结束。

军管会成立四十多天，炮派就把矛头对准李成芳，发表了十四篇评论员文章，公开信等，如《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可忽视》《摧毁反革命第二道防线》、《把云南的赵永夫揪出来》、《千万不要忘记“枪杆子”和“印把子”》。

一九六七年五月，赵健民在省委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云南省委内阶级斗争的盖子》以后他又连续写出两张大字报。

他成了云南省委第一个站出来“造反”的书记。他在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抗中采取了支持炮派的立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在谢富治、王力的指导帮助下，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上报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中提出：原

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央召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进京，说明了中央的八·八批示，并指定陈康主持军管会的工作。赵健民在军管会中负责抓生产方面的工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炮派武装占领五华山（军管会生产指挥组办公地）

赶走军管会的干部。并发表了占领五华山的声明。

赵健民亲自上五华山布防。私设电台、挑起大规模的武斗。

（3）在云南省两派大规模武斗中，赵健民私自到北京遥控云南炮派

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陈康、赵健民未得到中央的允许，擅自到北京，要求向中央汇报。

赵健民认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到处煽动闹事，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把整个社会推到了内战的境地。赵健民觉得，这是拿国家当儿戏。

一九六七年十月下旬，赵健民给住在昆明西山省委党校的工役制部队工人联合兵团的负责人、工役第八团的负责人贾玉玺打电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上旬，赵健民同原省人委的炮派负责人司以恭通电话。

一九六七年九至十一月，炮派在云南大搞“肃薄肃李”，把矛头对准十三军、十四军，大揪军内一小撮。

综上所述，赵健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先是执行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反对革命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一九六七六年五月以后，他以为有机可乘，迅速改变颜色，打出支持造反的旗号，实际上支持一派“揪军内一小撮”；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他支持一派，挑动大规模武斗。

（5）赵健民在监护中的表现

在监护中，赵健民提出：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共和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赵健民的结论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全党在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那么，为什么“左”倾错误得不到纠正？

赵健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民主和法制。

综合以上情况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赵健民的政治思想、立场，属于党内的修正主义右派。对他进行监护审查是必要的。

第三，关于谭辅仁和他搞的“划线站队”以及他的死

谭辅仁到云南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开始他就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实际上他是利用八派打击炮派，以此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形成自己的一派势力。

谭辅仁在云南执行了中央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的决定；经过中央同意，他又在边疆地区搞了建立政治边防、在少数民族地区搞了重划阶级成分。在这些工作中，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划线站队。问题在于：他所谓的“划线”并不是真正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去划线，而是以拥护或反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去划线，这就必然会走偏方向，没有打击到真正的敌人，而打击了一部分我们自己的干部和基本群众，激化了社会矛盾。

谭辅仁的被暗杀，是社会阶级斗争激化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自己造成的恶果。谭辅仁作为一位守卫边疆的大军区的领导人，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被暗杀，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第一例。这其中的教训值得深深地吸取。

第四，关于造反派中对立的两派互相来回打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昆明八·二三“井冈山”战斗团、云大炮兵团等革命造反派，积极起来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与云南省大学生代表的通电话，要求进驻军区大院的群众撤离。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兵团黄兆其为首的大多数学生、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听了周总理电话指示后，立即对造反派进行动员：“我们听周总理的话，按周总理的指示办事，无条件地、立即撤出军区大院”。黄兆其等带领大部分学生、工人造反派撤离了军区的。以云南大学炮兵团等组织认为：撤出军区大院，就是右倾，“要反右倾”，“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继续坚持进驻军区大院。这样一来两派开始产生分歧。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于下午二时许在检阅台召开。会上，一些群众组织，说大会“没有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斗争孙雨亭大会，大方向错了”，破坏了大会。

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三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组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炮派兵分两路：一路夺了省人委扩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

晚上，八二三派召开了十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开进省委机关，当着周兴、赵健民的面宣布夺权。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批准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

省军管会主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李成芳返回昆明后，倾向、支持八二三派的态度日趋明朗。

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璧、省委书记赵健民等则支持炮派。

由于李成芳是省军管会的主任，有他的支持，这一时期，八派占优势，炮派受到一定程度地压制。

一九六七年六月，谢富治王力到昆明处理云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上报中央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意见承认：四月下旬以来，我们没有理解和跟上毛主席提出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错误地分析了形势，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昆明地区两大左派，支持了一方，压制了一方，支持是对的，压制了是错误的，在对待炮兵团的问题上，听不进部队内部的不同意见，甚至对云南省军区持有正确意见的少数同志实行压制。这些错误，激化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矛盾，混淆了矛盾的性质，偏离了斗争的大方向。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

中央同意你们七月十二日提出的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也同意增补陈康，张力雄两同志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

与此同时，原军管委员会主任李成芳调走，改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主持军管会的工作。

由此以后，陈康、张力雄、赵健民等支持炮派，鲁瑞林、周兴等支持八派，两派之间发生严重武斗的局面，逐渐形成。

在这一段时期，由于有陈康、张力雄所代表的昆明军区、云南军区的支持，炮派占优势，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央调集云南军方、地方及群众组织的代表到北京谈判，解决问题。

一九六八年一月，由于炮派派所属工八团进军滇西，在下关挑起大规模武斗，打死打伤数百人，然后又进军昆明，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数次下令，要求工八团停止前进、交出武器。工八团违抗命令，中央下令派部队包围，强迫放下武器。虽然造成较大伤亡，这也只能是咎由自取。

一九六八年二月，云南省军区、各军分区和人武部，均发枪给炮派农民，并组织农民武装包围城市。大规模武斗不断发生。

这样一来，炮派及其支持者受到中央的批评就比较多。中央认为，解决云南的问题，首先还是要解决领导的问题。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央任命谭辅仁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六八年八月，云南革命委员会成立，谭辅仁任主任。

谭辅仁到云南后，支持、依靠八派，大搞划线站队，清查的主要对象是炮派的各级骨干以及支持他们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这又使得炮派的干部、群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种错误的倾向，一直延续到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谭辅仁被杀。

一九七一年以后，周兴、王必成主政，由于谭辅仁主政时期，周兴本人涉及较深，他没有解决谭辅仁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大搞整顿，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主要干部调到北京开会，并调动了其中一些人的工作，还把三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调到外地学习、劳动。这时，无论是八派的还炮派的，都成了“坏头头”。

从现象上看，是八派与炮派之间“翻烧饼”；八派起来了，压炮派；炮派起来了，压八派；八派又起来了，又压炮派；炮派又起来了，又压八派。

从本质上看，是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那里作怪，甚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那里作怪。一部分群众，尤其是一部分群众组织的头头，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带着私心，有的是图谋私利，甚至是为了维护自己特权和地位，总是要搞唯我独尊，以我划线，支持一派，压迫一派，挑起群众斗群众。

第五，关于十月政变以后大规模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一九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后，安平生、王必成执行中央关于清查“帮派体系骨干”的指示，依靠原炮派的干部和群众，把原八派的干部和群众作为主要清查对象，波及全省一百五十万人，将云南5万多干部、工人、农民，打成了“四人邦云南邦派体系骨干”而判刑入狱。

这个问题的情况，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充分地揭露出来。据现在反映的情况来看，云南省是搞得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把隐瞒了三十多年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地揭露出来。当然，最终地解决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

2008年8月3日初稿

2011年11月25日修改

第三节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一些人冲击军事机关，福州部队在处理中发生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福州部队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有人冲击大会、妄图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冲击军事指挥机关，

要韩先楚承认冲司令部，夺积极分子大会的领导权是革命行动，弄了韩先楚两天两夜。

毛泽东说：“韩先楚同志这样很好，坐着汽车去接见。”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有人乱抓军队干部进行斗争，实行体罚，侮辱人格等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我们遵照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

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厦门取消了十六个组织，

泉州、厦门、福州的表态

一些地方出现“拥护解放军，炮打韩先楚”的标语口号。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陈伯达给韩先楚的电报，电报说：“刚才我们得知：二月九日福州出现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两张传单。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韩先楚可以炮打’等等，这些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韩先楚同志和福州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或者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

福建省、福州市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尖锐激烈的搏斗，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英勇地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新贡献。

这个反扑的特点是：拚命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福州军区党委开会，搞了《纪要》

康生说“这个好吧。你们纠正了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福州召开声讨大会，

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

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

联合总部仅参加2·7大会也被解散。当时2·11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福州军区作出决议：把“一·二六”事件看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

二、中央着手处理福建问题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与福建省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总理：按那四点：（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马上打电报给全省所有的县。（扬成武：还有江西的）1·26被打成右派

统统放出来，写检查书的停止，检查一律交还本人烧掉，这一些都是工作组搞的，我们不要搞。

总理：刚才四点再加二点。

(1) 在 1·26 事件及 2·7 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刚才（递条）有两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见允许嘛。

(2) 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俘虏还不搜腰包呢？何况同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听取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等汇报谈福建问题

首都三司福州联络站、新北大校文革福州联络站、哈军工鬼见愁战斗队代表联合发言：坚决要求为所谓“一·二六”反革命事件平反。重申“一·二六”几十名革命造反派学生要求首长接见，大方向是正确的。提出姜观、王（全）泉金绝不是现行反革命，如果摆不出证据，必须立即释放。目前福建根本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总理的六点指示。

科技大一同学发表了反对意见，坚持认为“一·二六”是逆流。

总理说“说‘一·二六’是反革命逆流这是错误的”。我不是已经发了六点指示吗？给革命组织平反，那就是下结论。就是定性了嘛！

罗源、诏安、惠安、东山岛、永春、吾江、仙游等地区的代表都以血泪的遭遇控诉了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的迫害。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

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福州军区党委和韩先楚同志最近表示，用“一·二六事件”作为划分左派和右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不妥当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

最近，他还向驻福建部队发出指示：除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尽速放出被押人员，从速为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平反”。中央认为，韩先楚同志采取这个措施是好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欢迎韩先楚同志的这些表示和措施。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

总理：根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研究，解释关于福建问题提十点意见。

韩先楚：

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首都南下和福建的革命派战友们：我们军区在前段时期处理支左问题上有缺点，有错误，使福建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影响，使一些造反派革命小将受到某些委屈。中央、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花了不少时间亲自处理，十分忙还要来作政治思想工作，这使我们十分不安，在这里我表示完全拥护总理的讲话，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十条决定。

我们的主要错误有三点：

1. 对“1·26”事件看得过重，要求肃清影响，消除流毒，揪幕后策划者，实际上使“1·26”成了左右派的分界线，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了空子，使革命小将受到打击。

2. 错抓了一些人和解散了一些组织，我们仓促上阵，有的调研不够，处理不慎，控制不严，有少数人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人事上的关系，这样就错解散了一些组织，错抓了一些人，在这重大的政策上犯了错误。

3. 机械地搬用归口大联合，削弱了造反派，使保守派乘机抬头。

以上三个问题，使造反派受到了打击和压制。

三结合问题上，现在看来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充分揭开，左派还未大联合就搞，是操之过急。

总理：

最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委任韩先楚为福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三、福建两派群众组织继续进行武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陈伯达与福建省双方谈判代表的谈话

八·二九控诉说：他们围攻我们，他们有四千人围攻我们，我们在楼上只有四百人，刚才通电话时，他们还在进攻，占领了三楼，还放毒气，还准备放火，用抢来的棉被、棉衣放火，冲击时他们用小口径步枪配合，我们大部分被小口径步枪打伤，伤势很重，有的穿过肺部、心脏，他们还挖了三个洞，准备用炸药爆炸，我们重伤有二百多人。现在已断水、断粮。我们战友二天二夜没有吃了，天天被挂牌游街和强奸。

革造会代表说：八·二九那边说他们现在想复课闹革命，但厦大、华大、林学院、二师院又来了不少人。我们已经放了人，他们不放。

伯达同志讲：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是错误的，是反动的，“过得硬”（泉州）是反动组织，要他们解散，没有人武部，“过得硬”是搞不起来的，军分区、人武部搞“过得硬”是过不硬的，是反动的，给工分、给饭吃把农民糊里糊涂调进来还不知道干什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凌晨一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一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我们双方在北京达成第一个协议：双方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立即停止武斗，立即释放全部抓的人员。必须在八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时以前释放完毕。望我们立即执行。其他问题在继续协商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九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二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我们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二个协议：放人后，“革造会”在三小时以内撤出华侨大厦及其周围的全部人员，回到原地。原驻华侨大厦的“八·二九”等八个总部在半个月以内全部撤离华侨大厦，另迁较为朴素的新址。

“八·二九”等组织原驻的其他楼厦应按照艰苦朴素的原则，自

行调整。“革造会”原驻的楼厦，也应该按照艰苦朴素的原则自行调整。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凌晨五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三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三个协议：

坚决执行中央七月十三日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双方坚决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经进城的应立即动员返回原村。必须绝对禁止任何人、任何机关，利用任何借口，或者利用所谓“老区”的名义动员农民进城。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幕后策划者，应担负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不得借口进城，已经进城的，都必须尽快返回原地，抓革命，促生产。

福州、诏安、厦门、泉州、崇安、晋江、福清、仙游、建阳、建瓯、南平、宁德和全省各县市已经进城的农民，省军管会、军分区、人武部负责动员他们立即返回原村。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上午七时，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第四个协议

根据周总理、陈伯达同志指示，双方在北京经过协商达成第四个协议，双方保证在全省各地做到：

1、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抓、打、搜、拘留不同观点的群众，砸、抢、抄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

2、在协议达成三天后停止使用广播车，撤销在街头上的广播站。

3、不得撕毁、涂改、复盖不同观点的大字报、标语。不准搞一言堂，保证“四大”。

4、互不围攻，各方自动拆除武斗工事（包括街头的制高点）。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国务院给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一九六五年毕业生定级问题的复电

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八月六日来电收悉。现答复如下：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国务院关于一九六五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暂缓定级问题的通知是指一九六五年暑期毕业生，不包括一九六五年暑期以前的毕业生。

一九六五年暑期毕业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目前是否定级的问题，国务院正责成有关方面进行研究，将另行通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

谁动员农民进城就是破坏协议，就是犯罪。人民解放军的枪不能夺。凡事要三思，任何一派都不能轻举妄动，千万不能做这两件事：一不能动员农民进城，二不能夺解放军的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晚，陈伯达接见福建代表谈制止调动农民进城

现在我有一个请求，请求你们回去做一个事情，就是不要动员农民进城，农民已进城的要他们回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四个协议”

同意福建省赴京汇报团双方达成的四个协议。双方应该严格遵守协议，付之实施。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就厦门某海军基地十艘军舰武器被抢一事给陈伯达的指示

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部队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一日，陈伯达接见厦门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陈伯达：

禁止继续挑动农民进城武斗，这是很重要的。你们看是不是？现在到处都有人动员农民进城，很有可能是军区、人武部或保守派搞的。

(代表汇报厦门保守派“革联”和公安局老保下乡发动农民进城情况)

没有人发动农民跑进城才怪，发动农民进城一定有人组织，是公安局、人武部、军分区搞的。厦门就是公安局搞的，公安局要悬崖勒马。叫农民进城武斗，不做工，拿工分(代表：封锁海堤的农民还给钱，给三餐干饭，让他们抢劫集美侨校的侨生仓库。)这是对革命犯罪，对党犯罪，是反动的活动。

他们发枪给保守派是一种罪恶的活动，是什么左派？是保守派，是真正的假“左”派！有人是在玩弄权术，不能弄玩这些权术，这是玩火，玩火必自焚，这是破坏国防，破坏人民解放军的名誉，发枪给这些保守派是培养一批带枪的流氓，后患无穷。

(代表汇报8月19日凌晨三时到现在刘、李、田赤膊上阵，在瓷厂，“革联”和驻军对我“促联”开枪扫射。其中革联瓷厂“新红军”在8·2事件中也充当打手，扔出手榴弹，炸伤我八·二九公社负责人邓志国同志等)

福建这个协议(有关制止农民进城，反对武装老保)原来我还以为是比较好的，但厦门就这样干起来。这是违反群众的希望，群众希望他们不要武斗，他们违反了中央、毛主席的希望、毛主席的政策。

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二日，陈伯达接见厦门无产阶级革命派(促联)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

韩先楚：我身体不好，正在治疗，对家里的事情不了解，请同志们谅解。我们没有彻底走群众路线，没有和地方领导干部很好商量，所以很多工作做不好，平反工作，制止农民进城，制止夺枪，要下最大决心，用最快的速度去办。我们前一个阶段在支左工作中犯严重缺点错误，准备向大家作检查，先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汇报了，中央文革福建组提了意见，修改稿子，过一两天可送给在京的福建同志征求群众意见。我们敢于在群众面前承认错误，修正错误，错了就改。这场文化革命是伟大的深刻的革命，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慢，改正也较慢，给福建运动带来损失，对不起中央和广大群众，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们愿意改进错误，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坚决制止武斗，制止农民进城，制止保守派杀害革命派，把散发的枪枝收回，挑动农民进城的，送枪给保守派的，一定要严加惩处，我们一定能把福建文化大革命搞好。

伯达同志：韩先楚同志的表示是好的，我们欢迎。福建军区的检讨可以发给大家讨论，大家满意了就可发表，韩先楚听了昨天情况，他表示制止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违背中央，荒谬的调动农民进城的反动行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陈伯达第六次接见福建双方代表时的指示

福建的枪大量在保守那里，是送的。造反派也有，但很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造反派，夺枪主要是保守组织送枪给保守组织，送枪给农民。造反派和解放军团结在一起，保守派就垮了。

寿安支左就搞得很好，对保守组织，你们要会懂得做工作、分化瓦解，对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抓，让其组织自己抓。你如果一抓；坏人就在煽动，一煽动他们就团结了，团结起来对付你们。

要争取多数群众，最大限度孤立坏人，其中可能有反革命，不然为什么要破坏国防，夺舰艇的武器，没有坏人操纵不会这样干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前面有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你们要有敌情观念。内部也有敌情问题，但不要互相猜疑，到处疑神疑鬼就不好了。杀人、放火的就很可疑，开机船追舰艇是很可疑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和福建双方代表告别讲话

四、福建有人继续冲击军区，要打倒韩先楚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在北京革命委员会会议上，

陈伯达同志说：“有人说，中央文革委托到福州抓军内一小撮，打倒‘韩再道’这是有政治目的的”。

周总理说：“现在福州、广州、沈阳很紧张，对野战军司令员动不动要打倒，在福建搞什么‘韩再道’，还要揪‘闽老谭’”，总理说“一定有坏人插手，不然，很难使人相信。”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陈伯达杨成武接见福建代表时的讲话

伯达同志说：你们福建还是很乱，你们双方都要负责任，特别是革造会要负主要责任。

杨成武同志说：冲军区是错误的。总理要我在一日六时挂电话给福州军区。要找皮定钧，找不到，找到廖海光。因为昨天有二百个人冲到军区去抢枪。（革造会说没有这回事，他们是要求皮定钧接见。但旁边有个中央联络员证明有这回事。）还把韩先楚同志家的东西也抢走了，还拿走二个秘密的军事文件。中央打电话，主要是要追回两个文件，不准拍照，不准抄写。你们要求皮定钧接见，总理有三点指示：

（一）可以接见。现在皮定钧是最后一个指挥员，因为韩先楚病了，在北京。如果你们要揪，就要犯严重错误。

（二）你们现在喊出“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我们不能接受。韩先楚同志有错误，要帮助，不能打倒。你们要揪军队一小撮，这是错误的。

（三）告诉皮定钧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要中央调查组跟革造会说清楚：他们可能上美蒋的当，也可能上地富反坏右的当。现在所有抢的枪要封存。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伯达同志接见福建两派时说：“打倒韩先楚，中央不接受。韩先楚同志是打不倒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搞解放军，这里就有鬼嘛！”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总理陈伯达对福建问题的指示

福州市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并北京红代会在福州的同学、以及南昌“大联筹”，武汉“三钢”，“三新”在福州的人员并抄送福州军区、省军管会、中央调查组、八·二九总司令部：（以上均请福州军区转）

福州军区是福建前线三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担负着很重要的战备任务。你们随意进驻其指挥机关，这种行动是极其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接见福建革造会联络站负责人讲话

周恩来：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全国就到处揪陈再道，这是对我们伟大军队的污蔑！革造会要听中央的话，要拥护那个八条。

你们要顾全大局，不要动摇军队，不要自毁长城，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时候了，今天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说今后再夺枪就是反革命行动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八·二九”总司，“革造会”，厦门“革联”、“促联”。

伯达同志讲：韩先楚是前线指挥官，你们以后会晓得，打倒他是不对的，回去要做好工作，要与韩先楚同志合作。‘打倒韩先楚’是政治上犯错误”。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周总理说“现在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广州揪黄永胜，福州要揪韩先楚，南京要揪许世友，沈阳要揪陈锡联，他们是老将军……”，这是对伟大的军队的诬蔑。”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中央首长接见“革造会”、“军造会”时，（“军造会”是非法组织）总理说：“福建要把矛头对准叶飞，全国对准刘、邓、陶。你们不对准叶飞，打倒韩先楚，台湾在广播了，你们要警惕，敌人欢迎的事总不是好的事。”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接见时，问了韩先楚同志身体怎么样……，

毛泽东说：你是打不倒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周恩来对福州军区请示电报的批文

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

一九六七年十月五日，周恩来陈伯达接见福建革造会负责人时的讲话

周恩来：

我们有错误是宣传上，今年红旗十二期社论强调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

军区犯方向路线错误，要有个认识过程。

第三次出去串联，帮倒忙，好多是这样，福州也是这样。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部分军队代表讲话

伯达同志说：“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指挥官，人民解放军在福建前线的指挥官，担负着很重大的任务，保卫着祖国。”“打倒韩先楚的口号根本要不得，根本错误，中央是反对的。听懂了没有？”

周总理讲：“‘九·三’指示不是说明了吗？搞两面派这是刘少奇的作风，彭、罗、陆、杨的作风，在福建你们把斗争矛头指向韩先楚，放着叶飞不管，福建的走资派是叶飞，中央的决议里都点了名嘛！你们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韩先楚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是早就讲了吗？不管怎么，韩先楚中央是保定了。”

康生同志说：“中央就是要保韩先楚，保定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首长接见福州军区和福建省革造会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军造会”与“四·二〇”有没有关系？

军造会：没有。我们和四·二〇在打倒韩先楚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某些做法上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我认为福建乱的根子是韩先楚。

总理：照你的意见，把韩先楚撤掉，问题就解决了？最高司令部没有同意，我本来不准备说这个话。广东好，福建差；浙江好，江苏差；山东好，河北差，辽宁也差。辽宁早就来了，我们还没见他们，非要把他们解决好不行。等了一年半了，现在是应该解决问题的的时候了，所以请你们来，趁热打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关于勒令福州《北京》刊物停刊的通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福建班全体同志时，

陈伯达同志说：“我是支持韩先楚同志的，因为毛主席支持韩先楚同志，党中央支持韩先楚同志。韩先楚同志是福建前线的指挥官，你们不保，不支持，是什么意思？只有台湾高兴。蒋介石高兴。”

吴法宪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陈伯达同志是保韩先楚的，你们要打倒，你们不是说，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你们这样做，是听毛主席的话吗？”

五、中央批准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在中央学习班时，毛主席接见，毛主席说：韩先楚同志，你不是会打仗吗？你同他们打一仗。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毛主席接见六大区的军队代表，

主席又讲：韩先楚同志，拥护你的那一派没有问题了吧？你们要做好反对你们的那一派群众工作。对造反派和对军队不同。

一九六八年八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说：韩先楚同志来了没有？福建不是很复杂吗？后来不是韩先楚同志做了工作，问题就解决了吗？你们的报告很好（指成立革委会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14；中发〔68〕132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批准福州军区党委八月十四日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的名单，同意韩先楚同志担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皮定钧等十一个同志担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教育革命中，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中，都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

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必须把这件事抓好，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韩先楚在福建县以上革命委员会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去年十一月实现全省（除金门外）一片红，到现在，基层单位也绝大部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进入龙岩地区执行任务的部队，广泛宣传了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的政策，举办了八百多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军事行动的配合下，兰汉华、赖祖雄、张震东等坏人操纵的武装集团已被摧毁。

军区党委一月初开了支左工作紧急会议后，问题比较多的地方，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但有的地区转得还不快。

根据一些单位摸底的情况，县、社、队的班子状况，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占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中间的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差的占百分之十几。公社、大队和一些基层单位问题比较多一些。

这些班子的问题，主要是：搞资产阶级派性，一派的人掌权。“和事佬”、“逍遥派”当家。原班人马上台，照旧的一套办事。还有的班子是坏人掌权，镇压革命造反派。

现在，支左单位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还有问题。比如：一个地区有若干单位，各个单位分工包干一些系统，都有自己的支左办，派出支左人员各成系统，工作上各有一套部署，口径也不一致。部队支左系统向下布置的工作，革命委员会不知道，革命委员会布置的工作贯彻不下去，形成各抓一条线，各有一套做法，多套马车，很多中心，搞分散主义，实际上革命委员会架了空。

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晚，韩先楚皮定均在福州军区、福建省革委会支左和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皮定均讲话：

一、韩司令到军区，是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坚决同叶飞作斗争。

二、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突出表现出来，在党内军内就更加复杂了。

四、怎样把这一次会议贯彻好？

七、毛泽东接见韩先楚等人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南昌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的谈话

（毛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陈独秀搞分裂，有 81 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叶飞来信的批语
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八、十月政变后对革命群众的镇压

一九八一年《人民司法》第1期刊登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文章《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的冤假错案也不少》福州、厦门两市中级法院和建瓯、沙县、三明、龙海、莆田、平潭等七个县(市)法院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的反革命案件98件。发现确有问题的93件，占94.3%。其中属于无罪的67件，占检查案件总数68.36%。应免于刑事处分的2件，占2.05%。定性不准或量刑畸重，应予减轻刑罚的21件，占21.4%。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3件，占3.06%。

如福州市中级法院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判处反革命案件22件，经复查应宣告无罪的17件，占77%，应改性减刑的4件，占18%；能维持原判的只有1件，占5%。

厦门市中级法院判处反革命案件9件，经复查全部有问题，其中应宣告无罪的7件。

龙海县法院判处反革命案件12件，有10件是错案，2件事实不清，需要重新调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李庆霖被隔离审查，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李庆霖正式被捕入狱。

一九七九年，李庆霖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后，李庆霖在崇安县监狱里管理图书室，播放广播、出版墙报。

连续两次减刑，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

贰、本节简论

福建省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同其他省的情况大致相同。

一、首先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执行错误路线，压制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

二、其次是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支左中犯错误，过重地打击了冲击军事机关的革命群众。

三、然后是群众组织的一些头头犯错误，他们冲击军队，提出要揪军内的一小撮、打倒韩先楚。

四、福建处在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前线，情况特别复杂，形势比较紧张。在这样的环境下，正确处理与部队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尤其重要。然而，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缺乏这样的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只知道一味地蛮干。这就是教训。

2008年9月3日初稿

2011年11月26日修改

第四节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抵制广西军区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广西军区砸了“工总”总部，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后来，并有取缔这个组织的想法。

一九六七年三月间，广西军区对“广西红卫兵总部”[下称“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下称“八·三一”]、医学院“闯”野战兵团[下称“闯”]等学生组织，在贯彻“归口闹革命”时，督促他们撤销了在校外的总部，并在物质方面给了他们一些限制，一度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广西军区开始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首先召开了机关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而没有事先同“红总”、“八·三一”、“闯”等造反派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进行工作。

有些造反派认为军区是扶植保守势力，“抬”韦国清出来。

广西军区对这种说法很反感。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旬，伍晋南到群众中去支持造反派。

广西军区没有表示欢迎和支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日报》事件的电报

(1) 进驻报社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同学们，你们立即退出报社，保证报纸正常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利。

(2) 要维护军管小组、革命组织，要支持军队对报社军管工作，军管小组成员要做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搞好报纸。

(3) 有意见可以和军管小组商量解决，不要采取静坐，强拉军管小组辩论的方法，应保持军管小组正常工作。

(4)对某篇文章有意见,可以进行批判,也可以在报上讨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我们今天主要是听两派代表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知书》,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今晚接见,主要解决紧急问题。柳州国际列车停运。我等了你们五天,你们不听,你们不觉悟,把派别斗争搞到列车上去了。

(并送传单给总理看,内容是:毛主席在接见越南代表时,越南同志问到韦国清同志的问题时,主席说:韦国清同志是好同志、好党员,是我们司令部的人,请你们放心。)

总理:主席是说过的,越南同志对韦国清同志是很尊重的,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是有功劳的。对韦国清站出来的问题中央是要支持。韦国清同志在越南有威望,有功,这是事实。你们把他斗来斗去,上了人家的当!他有错误是要检查的,韦国清同志也准备回去检查,我们要给他创造条件嘛!这次到北京来就是要创造条件嘛!

你们冲击军管就是不对。军区支持韦国清同志过急了,个别同志工作方法有缺点毛病,你们可以提意见,进行批评。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周恩来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军区调查,自十三日起有武斗,西大“革联”、“工总”、二中“赤卫军”三、四千人围攻一中,支持一中的也来了三、四千人,军训团的解放军被打伤了几人,孔竹被斗争,军区宣传车被砸坏一

辆，双方伤三百多人、没有六六粉熏防空洞的事，现武斗已基本停止。

《解放军报》记者王荔报告：十三日打起来，发生武斗，汽油烧被子的事，记者进不了现场，无法了解，挖眼睛的事没发现，确实被打四百多人，伤一百多。

《红旗》杂志记者报告：武斗确是十三日发生，情况与上差不多。

总理：第一，这边（指联指）你们劝说开了列车是对的，但一定要说是伍晋南策划还没有调查清楚，若调查清了，要处理的，但是，他们冲击报社，还打了贺电，这完全不对嘛！

第二，武斗问题，我们打电话给军区，要立即制止，广西是前线。

康老：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主席讲“三结合”“三依靠”，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没有解放军，就不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军区，野战军可能有些缺点错误，但是你们（指“四·二二”）这一派从来未讲过解放军一句好话。

总理：伍晋南，我最后警告你，再插手铁路、插手军区问题，我就要隔离你们。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康生同志：贺希明是一九二九年被捕的，后来到国民党当高级军官，是桂系的，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霍泛是不是党员搞不清楚，是个叛徒。你们要和他们划清界线，这是对抗性的矛盾。当然，他们坏不等于你们坏。你们是受蒙蔽的。

总理：桂林“老多”过去是出名的嘛，“四·二二”是造反派嘛。你们造反的早，觉悟的晚。又指“联指”说：你们造反的晚，觉悟的早。

中央首长还对“四·二二”代表说：你们要帮助伍晋南同贺希明他们划清界线。

二、广西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戚本禹给广西军区的电话指示

〔时间：晨7：30〕

通知航运工总（广西“四·二二”），19日在金鸡车站附近抢走了9023个军内列车炮弹，应如数交还广西军区。如不交还，中央文革就要在北京公布这种错误行动，并进行批判。

并转告两大派，要顾全大局，今后一律不能抢夺援越抗美物资，任何一派抢夺援越抗美物资，中央文革就要公布这种错误行动，并进行批判。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谈话纪要

总理说：

“联指”越搞越不象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

“四·二二”拦军车截了援越军火。

“联指”抢了三千八百条枪，“四·二二”抢了四千八百多条，“四·二二”的枪比“联指”多，但“联指”的弹药比“四·二二”多。这样，内战势必越打越大。双方要停止打内战，武器封存，回原单位，占的地方退出。

七月份双方达成十条协议，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很高兴，说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可是被破坏了。南宁打的最凶，（联指）要多负点责任。

“工总”恢复。熊一军、丁友仪马上释放。

军区过去是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军区要支持你们（指“四·二二”）你们是造反派，军区要端正态度，积极支持你们，也帮助他们（指“联指”）。军区认识有很大提高，愿意检查错误，很好。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提出一小撮的口号，主要是指党内，对军队不能用这个口号。伍晋南同志你说对不对？（伍晋南答：对！）如果不是这样，就要犯错误。军区支持你们，但不能助

长你们的错误。你们对韦过火了，对贺、霍上当了。你们决不能因为军区支左，知道你们造反精神旺的地方，又反过来压“联指”。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韦国清同志并不认为你们打了他，而改变对你们的态度，但你们不要以为打了他，他才支持你们。不能乱打。

你们（联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能抹煞的，支韦是可以的，打倒贺、霍是对的。但不能压人家。压人家就不对。你们对的都会给予肯定，错的要指出。

广西军区要教育各个分区改正错误。

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这些机关长期受彭、罗的影响，即使今天造了反，有些方法和作风还不对头，甚至挑拨是非，搞小动作，有的甚至搞特务活动。所以，这次运动中，政法部门必须深入地进行斗批改，要真造反，要认识到这些作风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广西两派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广西军区关于撤消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的公告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广西军区关于恢复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名誉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说：

现在讲三条：一、相信解放军，铁路马上由解放军全线接管，沿途武装巡逻；二、希望桂林老多站出来，参加护路工作，和解放军站在一起，按九·五命令办事，一字一句的执行，不要按派别观点，袒护一方，不能认为与四·二二观点相同就好，观点不同的就是坏的，这不是党性，是派性，铁路沿线要播送江青九月五日讲话录音；三、领导干部（伍晋南、安平生）换个地方住，小将们不要受他们影响，要独立思考。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广西两派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柳州铁路局两派《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韦国清《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运动开始，由于我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包办代替，限制和压制了群众。工作组派不出那么多，就把一部分已经搞起来的单位暂停下来，大大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搞三个“横扫”（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中，我没有明确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结果是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许多敢想、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群众，遭到围攻和压制，不少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受到委屈和迫害。我感到非常痛心，并再一次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桂林，对挑动工农群众围攻革命小将的两个市委书记，在请示中央、中南局后，撤了他们的职。但我只限于组织处理，没有真正提高到方向路线错误来认识，更没有检查区党委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担责任，吸取教训。对待敢想、敢闯、敢于向区党委、市委的错误开火的革命小将，我在思想感情上，不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肯定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支持他们起来革命造反，而是把他们的某些缺点看得严重了一些，加之我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阶级分析，看他们是否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而是片面听取汇报，就极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我提出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我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宣传“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把矛头指

向头一天上街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使革命小将又一次遭到围攻。特别严重是，当我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除了提出把师院民兵枪枝的机针拆掉外，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

九月八日下午，桂林，南宁，北京一些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要求迅速解决桂林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但是由于我对绝食思想上有反感，没有立即接见他们，只派了当时后补书记霍泛等人去。次日上午，我前往接见时，革命小将比较激动，社会上却谣传我被打重伤住院了，并出现了很多捉拿凶手和赶走南下串连队的标语和大字报。对这件事，有些小将要我发表书面声明，澄清事实真相，我只是在九、十日两天，分别开干部会和工厂、学校、机关职工群众代表会，口头说明情况，没有及时发表书面声明；同时我在讲话中只限于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积极赞扬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充分肯定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以消除当时出现的指责革命小将的一些舆论和错误做法。因而，在桂林、南宁等城市均发生了围攻南下串连队的情况；有几个县城还开了声讨“桂林老多”的会议或游行，使革命小将受到压制和打击。

在处理三江问题上，由于我不是站在到三江参加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民族学院革命小将一边，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对压制文化大革命，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有关领导干部只是当作违法乱纪来处理，因而我在九月廿三日提出了解决三江问题的六条意见，态度很暧昧，和稀泥，实际上是迁就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压制打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革命小将，继续犯方向路线错误。十一月底，民院小将再次来广西，区党委和我承认了错误，重新作了处理，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

在南宁市的支左工作中，支持了一派，压制了另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影响了各军分区和各市、县人武部，给南宁以及整个广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曲折和严重损失。现在回顾

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南宁“四·二二”造反派的想法有错误，压制了“四·二二”，特别是在砸“工总”总部的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

当时我们认为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支持了他们。但对造反大军成员“工总”中成分不纯的现象看得过重，是不是造反派有所怀疑，特别是当他们在夺权以后，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遭到社会的指责时，更加动摇。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于三月一日错误地砸了“工总”总部，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后来，并有取缔这个组织的想法。

对造反大军中的“广西红卫兵总部”[下称“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下称“八·三一”]、医学院“闯”野战兵团[下称“闯”]等学生组织，我们早在二月就承表态支持过，但没有给予坚决支持。没有很好的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巩固内部，团结大多数，发展壮大组织。三月间，在贯彻“归口闹革命”时，我们没有从分析形势入手，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执行中央指示，而是操之过急，简单生硬，没有很好走群众路线，督促他们撤销了在校外的总部，并在物质方面给了他们一些限制，一度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

三月下旬，我们开始做韦国清同志站出来的工作。当时，由于我们工作做急了些，对情况判断不准，以为机关干部阻力大，首先召开了机关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而没有先同“红总”、“八·三一”、“闯”等造反派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进行工作。因而，有些造反派即认为军区是扶植保守势力，“抬”韦国清出来。我们对这种说法很反感。以为我们支持韦国清同志是对的，而没有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检查改进我们的工作。四月中旬，伍晋南同志到群众中去，支持造反派，我们没有表示欢迎和支持。

五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我们对两大派的态度，凡符合大方向的革命行动都支持。我们的错误是，对反对韦国清同志的“四·二二”，接近少支持少，实际没有给与支持。严重的是，一段时间未给予承认这个组织。因此，对他们的一些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且在政治上压制了他们。突出的表现在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

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和六月二日发出的《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错误地指责了他们，给他们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压力，起了压制造反派的恶劣作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广西两派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周恩来对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的谈话

总理说：

你们联合了，还提什么以谁为核心？我多次讲过了，“以我为核心”这种提法是愚蠢的，可笑得很。

怎样才能看出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呢？就要看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三句话。

提出什么应该以“左派为核心”说自己是左派，所以就要以我为核心，你一定要说自己是左派。

挑起武斗。第一是走资派，账要算在走资派身上。第二是有坏人挑动，第三我们思想上受到社会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

最近主席批了个文件，对牛鬼蛇神的定义加了几个字，牛鬼蛇神是指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样就可以避免打击面过宽，18年总不能说一个也没有改造好。另外还有敌特，这称第二类。

为文化大革命流了血死了人是值得的。解放战争三年夺取全国胜利，抗美援朝三年多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这次是过社会主义关，三年才过了一年半，免不了流点血，这是为文化大革命出了力。

不要因为打击“五·一六”的极左思潮，就变成右的老保翻天，以批判极左思潮来推动革命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的批语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认为，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十一月八日签订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广西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和当地驻军以及各群众组织应广为散发和宣传这个协议，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贯彻执行。中央高兴地看到，广西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柳州铁路局已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希望广西两派群众组织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毛主席批示：照办。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过一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改正，这种态度是好的。

韦国清同志在过去长期斗争中是有成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些错误，只要能够改正，就很好。中央同意韦国清同志的检查，希望韦国清同志今后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斗私、批修，把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总理说：

关于革筹小组，军区方面，军区两个，欧致富、还有个新来的那位，魏什么（黄永胜：魏右铸。）空七军一位……，地方干部有韦国清、安平生，再加个伍晋南，由韦国清同志负责。先把革筹小组搞起来，伍晋南一个人，你们怕什么，要经过一段过渡嘛！

代表：目前我们在四个专区发现有反动传单。（递上反动传单给总理）总理看后交戚本禹同志，戚本禹同志说，这是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捣乱。

代表：我们还发现有秘密电台，有一个“解放军之声”（黄永胜同志证实说，军区是发现有秘密电台。）

总理详细地询问和记录了电台的情况，严肃的说：电台问题要认真追究。

总理：现在广西是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目前解决广西两派问题的关键是成立革筹小组，革筹小组主要就是干部问题。

今天下午黄永胜同志和你们谈了四个多小时，现在又谈了两个小时，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毛主席批示：已阅，照办。

一、中央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次，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这个检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经批准，并且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示“照办”。

安平生、伍晋南两同志在运动中也有错误，他们都做了初步检查，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三同志的联名检讨，表示愿意改正他们的错误。中央同意他们这个检讨。

中央希望广西军区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等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二、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已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并亲自批示：“照

办”。两派签订的《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也好。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些协议。希望广西军区、当地驻军和广大群众组织切实贯彻执行。目前广西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一些对贯彻执行两派协议不力或根本没有贯彻执行协议的地区，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执行协议。

三、广西处在援越抗美的前线，越南人民把广西称作是他们最可靠的后方。广西“四·二二”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拥军爱民，大力支持军区 and 当地驻军，做好“支左”和援越抗美工作。两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特务的破坏活动。

四、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洪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正确地对待干部。要对干部队伍作阶级分析，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犯了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能作深刻的自我检查，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贯彻执行两派协议，革命群众就应当团结他们，帮助他们站出来革命。今后各革命群众组织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要认真学习 and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把广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恩来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三、中央决定后两派武斗加剧

四、两派武斗发展到抢劫援越武器弹药，清查“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

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玉林“4·22”数百人到玉林军分区门口，召开“反围剿、反迫害、反屠杀”大会，并静坐六天六夜。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灵山“革联”控诉团200多人第二次到首府南宁广西军区控诉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行，控诉团静坐广西军区政治部大楼前数天不走。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玉林地区“联指”组织2000多人，配备步枪800多支，轻重机枪26挺，冲锋枪407支，各种炮八门，手枪164支，以及自制坦克一辆，攻打“4·22”州佩据点，包围两天后，攻下据点，抓获“4·22”13人，全部枪杀，在围攻时“联指”死八人，“4·22”死五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筑物——万花楼被炸毁，炸毁民房72间，吃去国家粮食14000多斤，肉类8800多斤，耗费国家资金20000多元。

一九六八年二月九日，融安“造反大军”强渡融江，攻占融安“联指”驻地的东圩、铜鼓桥和直属粮库。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联指”攻打柳州地区融安县的铜鼓桥。

2月9日融安事件发生后，融安“联指”派人向“地专联司”告急求援，经“地专联司”和“柳州联指”联系，“柳州联指”决定由“工交兵团”出兵支持，由“地专联司”负责组织各县民兵配合行动。

12日“地专联司”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苏一民，胡文治代表“地专联司”随往融安配合“工交兵团”行动。

14日“工交兵团”和“地专联司”象州“联指”武斗人员300多人，由蒙治恒、张麦生、苏一民、胡文治等带领分乘13辆汽车赴融安，配合融安“联指”。

16日凌晨一时攻打东圩、铜鼓桥，武斗持续到当天下午5时才停火。双方对打死5人……炸毁民房一户一间，烧毁民房5户九间，厨房3间，牛栏1间。

“联指”方面抓获“俘虏”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杀害。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大新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县区村抓促领导以及厂矿武装部长、民兵营长会议。会议是武装部长周永山、政委韩奇主持，传达区革筹小组领导人的讲话，研究布置做好成立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周永山在闭幕时讲，

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自县抓促会议结束到县革委成立的17天内，全县杀239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柳州铁路局工机联“4·22”《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1968年3月31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

一九六八年二月，《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

一九六八年二月，合浦县县城及各公社先后召开批斗大会，刮起了一股乱杀人的歪风，至5月间，全县被杀和被迫害致死961人”。（《合浦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页）

一九六八年三月上旬，宜山县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联指”联合罗城、都安等县“联指”数千人围攻“造反大军”据点。8日“造反大军”的群众近万人，从城里走出时，在东片、西片被杀害多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630多人，仅3月18日的一天发生31起杀人案件，杀害102人。

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46人，造成16户无男人，9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黄正健、蒙加丰为妻。

各社、队普遍出现乱杀人事件，至年底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1651人”。（《天等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专区共杀人2000左右，其中灵

山县杀了1000多人，（注，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一些大队民兵营、治保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到处鼓吹杀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94人。

（对天等、崇左县杀人问题，在7月5日的专区革委会上，南宁军分区司令员兼南宁专区革委会副主任熊光武说：“天等县是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置，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是好的。”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特别表扬天等县也实现一片红，号召各县“向天等学习，迅速实现一片红。”由于专区革委对天等以“杀人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的态度，致使全专区杀人更为严重。）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12批用枪棍、锄手段打死无辜群众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10个月的婴儿）有13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杀害者财物。

一九六八年三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4·22”围剿。“4·22”派被杀110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3·24”事件。

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声称：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

一九六八年四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4·22”部份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4·22”，此

次共杀害30户（全屯46户）杀死56人，烧毁民房44户133间（全屯140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4·22”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4·22”不满，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圈，“4·22”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4·13”事件。

事件后贵县“联指”以“4·22”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4·22”的方案，提出刮“12级台风”（大屠杀）。一是围攻炸毁“4·22”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10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4·13”后的一个月，将关押的全部枪杀，在贵县城区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230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38人，斗死90多人。

据统计，全县5、6月份有2129人被斗、打或被杀死”（《贵港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22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得三元赏钱，三个晚上共杀22人（其中杀绝五户）。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894元，有帐可查，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3066.41元，全部被吃喝完。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五日，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4月13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4月14日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4月15日）杀24人，4月16日又杀52人。

从4月5日至五月6日杀56户92人（其中15户被杀绝，1户17人被杀13人），黄芝珍等（大队治保主任是这次大屠杀

的主谋共刮死者财物2701.27元(内改嫁证明费218元,设卡哨搜人身4151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1016.40元),大米769斤。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4·22”“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90多人,将12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发生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177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40%。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二十九日,玉林专区革委会召开全专区政工会议,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副主任军分区副政委孙景芳,副主任蒋昌永分别在会上讲话,会议中心内容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击退二月逆流”刮“十二级台风”(大屠杀)会议与18日公检法军管会会议一样,是乱杀人事件。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11个公社155个大队,有154个大队布置杀人,全县共杀害1229人。

由于专区革委会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份是在刮“12级台风”中被杀害的。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广西驻军8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和民兵一起开赴宁明县的上石公社,对宁明“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

5月1日打下“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上石农总”被定为反动组织,有4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各种徒刑的达22人,有4人判劳改关押在途中死亡,在围剿和批斗中打死和逼死108人。

(1980年,南宁地区中级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此案调查组,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制定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东西,不知道把这么多人判处“死刑”的“证据”是什么。)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广西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后，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今天为止，全区共杀18000多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4·22”“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竞等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10000多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收走了120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卫兵团”（4·22）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600人并请贵县“联指”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97人毁掉房屋67间价值37900元；共有37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26600多元。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1人，副团长3人，政治部主任3人，经济部长1人，支队长4人，联络站负责人共63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

风街（广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同时，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下达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中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当前该案工作重心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拂晓，柳州“造反大军”（4·22）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4·22”被围剿。

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5600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800多人的“4·22”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50多天时间，从5月24日开始到7月8日结束。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42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桂林“联指”的“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2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35人，致伤致死75人。

（7月14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侯永成、唐桥生等24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侯霉、李江、

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三日，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在县城广场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亦称万人对敌斗争大会）。有县、区、公社、生产队干部8998人参加，错误批斗150多人，其中死59人。

之后，乱杀人风遍及全县，致死全县1389名干部群众无辜死亡”。（《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了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其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指”派的自称）立即行动起来，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广西各地区、县以至农村中清查反团的概况：

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团”的有5213人，厅级干部1人，县级干部23人；

百色地区仅仅那坡县一个县就逼出“反团”40名“团长”；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11天打死338人；

整个河池地区被打逼死7864人；

钦州地区7个县市打死、逼死、失踪人数达10,420人；

在柳州地区柳江县，打死了所谓“反团”分子以后，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众。仅防城县的一个黄竹塘大队，就因为“反共救国团”案而“捆绑吊打致死6人，被迫自杀17人（救活13人），暗杀3人，外逃1人，重

伤21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防城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据《武鸣县志》记载：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因为公告编造了“反共救国团”狂叫“杀贫农”的纲领，二十年前的贫农被煽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在会上当场被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及其亲属。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

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

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

整个武鸣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约两千五百人，其中“农村居民二一七六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及其部份亲属一千八百多人。”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至32页）。

另外，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份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军人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1300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县革委、人武部头头XXX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74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逼出一个“反共救国团武鸣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国内职工1337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221人被抓捕，202人被关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了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1967年“11月中旬，石寨区武装部长在县召开的会议上，介绍古兆乡所谓破获‘反共救国军’组织，和实行‘群众专政’

的经验，全县乱杀人的恶果由此开始。此后，全县有738人无辜被打死”（《容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页）。

（这个“反团”案到1983年已彻底平反，证明是个冤假错案。）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九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二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

6月19日下午王德堂在“积代会”上作总结报告，直接策划煽动县工代会主任韦德带领一伙凶手拉赵永禧等三十多干部，教师和学生上街游斗。赵永禧等11人当场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伤残。

20日上午王德堂决定“积代会”延期一天，他向“积代会”布置杀人，公社回去后要狠抓积极斗争这个纲，决不能心慈手软。于是“积代会”后全县屠杀全面展开。

王德堂在文革期间，还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6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至八月，河池地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成高潮，各县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全地区十个县共斗、打、逼死7864人，其中凤山、宜山、巴马、罗城、都安5个县害死千人以上。凤山县打死1300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为区、地之冠，被关押毒打数万人。

四、落实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成立广西壮族

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毛泽东批示：照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但是，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份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朝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

中央相信，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西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破产。广西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诞生。

一九六八年七月九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七·三”布告传单90000多份。驻南宁柳州部队组织51个宣传队，南宁市有5000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660个学习班，有五万多人参加。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3万人大会欢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着广西军区负责人宣布谢王岗、袁家柯为国民党大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发表讲话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揭发，谢王岗、袁家柯是三反分子、走资派……。”

驻桂空军派出飞机在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贺县、融安、等市县以及铁路沿线大量散发“七·三布告”。所有的口径都是“四二二”是违反“七·三布告”的“阶级敌人”，除此以外，没有别人去抢解放军的装备，没有别人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这些现行反革命都在“四二二”那里，必须坚决“镇压”。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至八月三日，《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社论：《坚决执行，誓死捍卫》、《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等。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区革筹，广西军区负责人贯彻“七·三”布告发表讲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15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

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南宁市革委，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广西军区8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杀了33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中午12时，南宁市“四二二”一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遭到猛烈炮轰，一朵朵烟云腾起，百货大楼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浓浓的黑烟，大楼东侧象{瘫痪的碉堡，楼前的朝阳路，坑坑洼洼。大楼正西北边是朝阳广场，广场中间已被两尺多高的野草所遮盖，野草之中躺伏着军区和“联指”的炮手……。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这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认为是“阶级成份特别复杂”，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特务牛鬼蛇神的聚居点”。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解放虽已二十多年，他们赖以栖身的仍是这些小瓦房。今天，他们刚刚吃过午饭，许多人随即听到“呼呼”的炮弹头与空气磨擦声，还不及收回脚，巨大的声浪已把他抛上房顶，屋上的瓦片也被气浪震得粉碎，火像着了魔似的把房子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

人们听到轰轰的炮声，接着是的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锋枪声。“四二二”的广播喇叭被炸哑了，南宁市上空只剩下“联指之声”还在广播：“‘四二二’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撼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18点55分至约点30分，解放路的土匪们竟敢向我敬爱的解放军开枪开炮，把炮打到广西军区大院内，致使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件事被广西军区报告给了中央。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六日，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

16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七日，解放军6977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4·22”农总，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140多支，尔后又抓捕80多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广西军区、革筹小组在向中央报告：南宁市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民房起火，是“四二二”纵火焚烧居民房屋，据此要求派解放军对“阶级敌人”采取强制措施……。

南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缉令抓的“反团”骨干，都是“四二二”派的，全南宁市有3，547人被列为“反团”分子（全是“四二二”观点的群众）。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南宁“警司”发布告《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信》。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采取的措施是，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广西日报》刊登的“誓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说：“谢王岗和蒋匪特务组织里应外合，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情报站……在担任钦州地委组织部长期期间：利用职权安插了大批的特务、叛徒、地主恶霸、资本家在党政机关工作……”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9时至12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凌晨4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7月19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18日上午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4·22”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市“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7月21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不是对讨论“洛满告急”后问题，而是讨论几县“联指”联合武装围剿福塘“4·22”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25日动手。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柳江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刘柏生任副总指挥、人武部副部长韦熙年、蒋传璞任副总指挥。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任参谋长，柳江县原县长梁水生任后勤部长，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王有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宜等。

7月24日凌晨4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份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4·22”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联指”3000多人搜山围村，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份撤离福塘，留下部份武装人员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120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开支现金100400多元，粮食53583斤。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毛主席批示：照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的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陕西省同全国一样，正显示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西北和陕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

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

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

四，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

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

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地驻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向受蒙蔽的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启发他们自觉地起来揭发检举坏人。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在处理这类事件时，要注意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把屡教不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同犯错误的群众区别开来。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在发生反革命事件时，要充份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坚决保护国家财产和维护革命秩序。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革命干部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同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

康生说：听说广西党校有个教员叫朱仁的，朱仁在座吗？（这时区党校“红浪”的朱仁站起来。）

总理：你是“四·二二”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四·二二”？（朱答：现在的“四·二二”。）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四·二二”吗？熊一军是不是你们一起的？

康生：你是什么地方的人？（朱答：广西柳城县）家里是什么成份？（答：中农）你在党校做什么？（答：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哪里学的？（答：东北师大）什么时候毕业的？（答：六零年）毕业后呢？（答：到广西党校）

康生：你什么时候来的？（答：四月二十一日来的）

总理：你是“控诉团”的？（答：我们是汇报团）你们出来时叫汇报团，现在叫“控诉团”了，你跟熊一军在一起吗？（答：没有见过）怪事！你们四月份来的，熊一军也来了嘛！

接着，总理、伯达、康生问：你们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在哪里开的？谁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华谁去了？

朱仁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全国“造反派”总部。在会上有人谈到当前是两个司令部斗争。

曹东峰（西大“革联”）参加了这个会议。桂林“造反大军”有个人参加了半天。

总理：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

总理：（生气地站起来对刘振林）我问你们，你们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对不对？（永胜：还成立了“接管监狱领导小组”。）你们组织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那里是劳改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把军队的枪都抢了。你们“老多”要改个样子，不是去年那样了，今年变了，性质要变了，你们已经走到边缘了，快掉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第一，你们要承认错误，要向中央文革写出检讨；第二，今天就搬回去！第三，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一定要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那里有十年以上徒刑的劳改犯，有×千犯人，你们占领监狱是造谁的反？

（当桂林“造反大军”刘天偿谈到桂林市被农民包围和在机场挨打的问题时。）

总理：打人是错误的，“联指”已经写了检讨，态度是诚恳的。农民进城问题，军队劝他们回去，“联指”也劝他们回去。

温玉成：你们的所谓汇报团，在北京做了很多坏事。冲京西宾馆，再三劝说不听，打烂玻璃，打伤战士，派战士把你们送到和平里，你们把战士也打伤了，现在这个战士还在医院。你们说在和平里开了一次会，实际开了几次会造了很多谣。桂林“造反大军”的去了，你们开欢迎大会。到处串联，散布谣言。

黄永胜：你们讲：“别人来宾馆顶多两个小时就走了，我们呆了四十八个小时”；还说“坚持就是胜利！”

总理：梧州的火，“四·二二”要负主要责任，而且这种办法不仅在梧州，在柳州、南宁也都有发生。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

康生：（对苏振国）我问你，杀人、放火、抢援越物资的是不是反革命，镇压这些人叫不叫迫害？对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你到底怎么样对待？怎么样处理？（苏答：回去调查……）不能等回去，就要在这里处理。（苏：我们没抢援越物资）

总理、康生同时说：你们都是“造反大军”。

康生说：梧州搞成那个样子，你们怎么能看得下去，怎么能对得起群众？要让全国人民知道会怎么愤恨！

（苏振国：广西反革命两面派蒙蔽群众，……）

富治：这就是你们在北京贴大字报的口气，你们这就是反对“七·三”布告。

总理：“七·三”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立即停止武斗，交还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抢夺的援越抗美物资。

（当西大“革联”曹东峰说“四·二二”常委龙智铭等人是被开除的，不能代表“四·二二”时）

总理：你能代表“四·二二”吗？你是什么“四·二二”？我们请的“四·二二”的三十个代表为什么都不来？

法宪：南宁放火就是你们放的。

总理：房子烧了那么多，就是你们“四·二二”烧的。

法宪：七月二十一日，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不是你（指曹东峰）指挥的？

永胜：百货大楼是你们占的，火不是你们放的是谁放的？

（当曹东峰讲到“四·二二”的群众在他们一边，不在龙智铭等人一边时）

永胜：你这个话就不对，你们杀人、放火、抢东西就叫有群众，他们就没有群众？！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群众！

总理：“七·三”布告是镇压反革命的，你们说是“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你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你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七·三”布告宣战。你想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你们还这样搞！当然韦国清同志不是没有错误，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错误，检讨了嘛，你们都看到了嘛，有文字为证嘛！你贴出这样的标语不感到问题严重吗？

总理：你（对曹东峰）给石怀宇写封信，叫他把“四·二二”三十个人劝好，两天之内叫他们到北京来解决问题，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了。我给你们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温玉成：你们（对朱仁、曹东峰）这些头头阻碍解放军战士到和平里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从明天起你们就要停止这种活动，不能阻止！

总理：朱仁要负主要责任。你不是学生，你是个教员，是出谋划策的人，又参加了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现在桂林、柳州的都来了，就是南宁“四·二二”的三十个人不来，还继续放火、封锁邕江大桥。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通，这是马上要办的。给你们三十个代表不少了，不执行“七·三”布告就不能代表。

（朱仁说他们在和平里的人思想很混乱）

康生：不是他们思想混乱，主要是你们头头的思想混乱。你们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你们是站在阴沟里的黑司令部的路线上的。

总理：你们回去要好好传达这次会议精神，一定要把你们这六百多人的活动、串联黑会都写出来。

（朱仁：谢谢中央首长的关怀）

总理：现在讲柳州问题。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多久？（柳铁“工机联”王反修：马上通车）。你叫王反修？

（总理站起来）你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这个反修，要真正反修。

你是学生出身，你不是王反修，是忘记了反修，是忘反修！你要承认，我们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七·三”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键过不去！你们是不是把抢去的援越弹药分了？

（王反修：“工机联”抢四千多箱，其他是“造反大军”抢的。）

你们全在柳江南岸，占的据点很多。

（王反修：我们请罪。）

总理：你们同“钢联指”能不能够合作？“钢联指”来了吗？

（“钢联指”张坚答：可以解决。但我们安全没有保证。）

你们（对王反修说）的黑老板还在不在后面指挥？你不是张炎的“秘书”吗？你要说实话。你们能不能保证双方不阻挡通车？

（王说从来没有阻挡过。）

怎能说从来没有阻挡呢！

（张坚：他们放脱轨器。）

对！只差五十秒钟，若不是解放军抢救，火车就要出事啦！

（王辩解说：只是一个学生放的，他不懂事。）

什么不懂事！这是反革命事件！

总理：（对柳州“造反大军”白鉴平）我向你，你们参加抢援越弹药，不能交出来吗？你们抢了一万一千八百箱，这不是小事！还有廖伟然，你们能在很短的时间交回吧！今天是二十五号了，你们要在一、两天通通交回来，你们明明知道是援越物资的列车嘛！一万一千多箱弹药，你们把火车拉到冷冻厂去，怎么分的，难道不知道？！

总理：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

总理：现在谈桂林问题。

（刘振林报告说：我们进占监狱的人，保证在今天下午三点钟以前撤出。）

总理：桂林“联指”曹铁军、李年生，你们也要保证，打电话回去。“造反大军”保证从监狱撤出，“联指”保证在“造反大军”撤出时不要打他们，双方保证。

（当“造反大军”提出“联指”抢了六千多条枪支问题时）
有没有这件事？

（“联指”李年生答：有这件事）

你们承认有这件事，就把枪送回去。有错误要像刚才检讨打人那样，检讨了就很好嘛！

（刘振林提出“联指”不在协议上签字。）

你们一派起草的他们当然不干。一四一师韩更同志、分区景伯承同志，你们两人与他们双方一起，搞一个协议。

你们（指景伯承）支一派压一派，检查没有？（景：已检讨。）

总理：景伯承是有亲一派疏一派的。你们（指一四一师、桂林军分区）双方都有不对的地方，你们两位（指韩、景）一个是一四一师的，一个是军分区的，要把桂林的问题好好解决。不只是解决桂林市的问题，还要解决好铁路沿线、全专区的问题，铁路的从冷水滩到永福。大概桂林市的问题，“老多”要多负一些责任；城外的问题，“联指”多负一些责任。

（当“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有一万多条枪时）

总理：（问一四一师韩更同志）“老多”手里有多少支枪？（韩答：不知道。）

永胜：你们一四一师送给“老多”枪，还说不知道？

总理：今天是二十五日，要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包括韩更，景伯承两位，都要保证。进城的农民要回去。（“联指”提出“造反大军”收留了很多外省人员）刘天偿你们“造反大军”也有农民进城吗？有没有外省人员流入桂林市？（刘答：一个也没有。）（韩更：有）你说没有，一四一师都承认了嘛。农民由部队劝他们回乡生产。外省人员由你们“造反大军”负责劝他们同去。你同意不同意？（刘答：同意）你们回去达成全面协议，要有效的保证铁路畅通，不要农民进城。

（当“联指”提出“造反大军”反对革命委员会时）

你们“老多”过去不是一向要支持桂林市革委会的吗？怎么也反对啦！这些问题，都要在协议上解决。

总理：革命委员会是要支持的，已经双方协商，上报批准，是合法机构，这是原则问题。但不能说革命委员会就不会做错事，有错改了就好，可以批评帮助嘛！但是，有人提出要打倒革委会，推翻革委会，是不行的！农民要人（指流窜到城市的坏人）是合理的，但是应该通过军队，不能抢，不能破坏城市的革命秩序。至于“造反大军”吸收了一些成份复杂的人，由他们自己清理。“联指”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对他们冷淡，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嘛！当然，不能把过去反对过革委会作为前提。应该肯定地说“七·三”布告中，“四·二二”、“造反大军”包括“老多”方面的错误大。特别是中断铁路运输，放火烧那么多房子，严重得很！“七·三”布告发布后，还在北京说很多黑话，贴不少黑标语。尽管错误严重，允许改正。“联指”也不能压他们。曹东峰在北京干了那么多错事，我们还叫他写信回去，准许他改，将功折罪。刚才王反修不是认罪了嘛！也要看他们能不能认罪！

（当刘振林说到他们正在清理阶级队伍，还揪出了杨德华时）

总理说：对呀！杨德华是你们保的嘛！杨德华是要揪的！

总理：广西无论如何一派掌权是不行的，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如果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还要推迟，再推迟就会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哪个省也没闹到你们那样！快两个月没有通车了，再不通还行呀！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要赶快通车。哪个违犯就要犯错误。对齐齐哈尔的司机那样对待就是反革命罪行。

不管哪一方抢解放军的武器弹药，都要迅速交回。再放火不行，双方抓的人都要放，劝进城的农民回去，铁路要达成协议。广西七月底要实现毛主席的批示，如果你们诚心跟坏人走，那是另外问题。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南宁联指再次攻打百货大楼，使用了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土坦克发射上去的

炸药包，大楼东北面墙彻底崩塌，二、三楼再次被大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机关宿舍全部中弹起火燃烧。

经过半个月炮火的摧残，解放路、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上国街，新华街、永宁街、和乐街等只剩下了断壁残垣。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在宾阳县，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人。在军队革委会主任王建勋（6949部队副师长）、副主任王贵增（县人武部副政委）的直接指挥下，打死所谓的“阶级敌人”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人民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人，农村居民3441人，致使176户全家灭绝。

一九六八年七月，博白县“在贯彻‘七三’布告过程中，全县各地不断发生乱抓、乱关、乱打、乱杀人的事件，到9月底为止，全县被打死的干部群众共337名。”在整个文革中，该县非正常死亡者达千人。（《博白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18页）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扶绥县落实中共中央‘七三’布告，县革命委员会……层层召开现场会，揪斗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500多人，致伤残多人，后果严重”。（《扶绥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一九六八年七月，平果县，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全县被乱杀的715人，……被迫害至死的216人”。（《平果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1页）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15时，联指开始对“四二二”派占据的展览馆发动武装大围剿。

据官方1990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围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X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112页）

经过一阵猛烈炮击后，战斗从晚上打到8月1日8点，耗费高射炮弹690发，机关枪子弹1000多发，冲锋枪、步枪子弹17000多发，终于消灭展览馆主要火力点。“联指”和军队冲进去共抓获“俘虏”473人，打死23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检讨说：“我们对新‘四二二’所属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器’，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日，军区某些负责人命令6912、6966、6936部队和南宁、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四二二”的解放路据点，那里的12条街道被打成一片废墟…。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南宁地面上的围剿基本结束，打死反对派人员1470人，抓获“俘虏”6445人和居民2500人。

事后，“联指”用翻斗车搬运尸体，运到二塘煤矿丢下废矿坑680具，就近火化694具，在朝阳沟掩埋75具。

从解放路俘出的人员在中途被打死的有52人，其中有一批“俘虏”路经“广州照相馆”门前时，26人遭军队枪杀。

据不完全统计，到8日为止，抓获“俘虏”9845人，先后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其中关在区看守所的265人、区交通学校的711人、南宁幼师的441人，都被列入“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反共救国团”的“要犯”“首犯”。

被“俘虏”的人员，交给各县拉回去“处理”7012人，其中被打死的有2324人，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有246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被解放军炮火轰毁的街巷有33条，各种房子2820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分社，10000多户，50000万多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价值6000万元以上(同上，第115—116页)。

一九六八年，横县，乱打乱杀中“被无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一千多人”。（《横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一九六八年，阳朔县，“全县文革中打死六百三十九人”。（《阳朔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页）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

社论说：这些“阶级敌人”在农村呆不下去，纷纷跑到各大中城市。因此，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行动起来，把“阶级敌人”投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桂林市“八·二零”事件

68年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主持会议，

广西军区的吴华，桂林市武装部长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桂林市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决“4·22”桂林“老多”据点。

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景伯承，在步校主持召开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参加了会议并讲话：“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乾淨”。

8月18日，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代表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到桂林，在301部队驻地开核心会议，紧急布置军事行动，宣读解释“八·二零”公告。魏佑铸说“八·二零”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联指”，镇压的是“4·22”桂林“老多”。

8月19日在104部队驻地景伯承、慕石起主持召开12县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布置了“八·二零”行动。

8月20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名义和桂林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市革委会以“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编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配备精良武器。“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民兵，其它“联指”成员以及反戈

一击的原“造反大军”部份成员共一万多人，组编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一错误行动中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8月29日陈秉德号召刮12级台风，30日全市大游斗。8月20日开始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了一个多月。

9月4日的一次游斗中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向着被游斗的对象连续开枪射击7发子弹打死6人（此人74年入党任大队支书，大队长）。

据桂林市革委会68年向区革委汇报：“八·二零”到“九·二零”一个月打死90多人。据处遗办统计“八·二零”至年底杀死160人，批斗死，游斗死94人，自杀91人，总计345人，超过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20日前武斗中死人267人的30%。至于各单位私立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延续的更长。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柳州军分区调动8县两矿一郊的“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的“四二二”据点，打死146人，共用去现金10万4千多元，吃去粮食5万多斤。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八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死84000多人。其中：

宾阳县死3951人。

贵县死3138人。其中国家干部及职工263人，教师156人，学生47人，居民106人，农民1311人，其它1255人。

临桂县死2051人，其中国家干部326人。

灵山县死3222人，其中有三个公社杀人均在500人以上，287个大队都发生乱杀人事件。

桂林市死1128人，其中：干部、工人556人，全市冤、假、错案11522起。

天等县死1 6 5 1人。上思县杀1 7 0 1人，占当时全县人口1. 3 3 %。

钦州地区7个县市失踪1 0 3 5 9人。

玉林地区杀1 0 1 5 6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 08. 20；中发〔68〕134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热烈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广西地处祖国的南疆，是援越抗美的前哨。居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曾经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隐藏了一批特务，叛徒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长期以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和他在广西的代理人的反革命面目，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中央同意由韦国清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欧致富等十二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三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一系列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广泛更深入地宣传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大造革命声势，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引导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认真作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其他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要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要及时地识破和粉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切阴谋诡计。要进一步批判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各种表现。

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充份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军内团结和军政团结。认真落实毛主席“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指示。

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事业，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要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作好援越抗美工作。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歼灭敢于来犯的美蒋匪帮，巩固边防，保卫祖国。

中央相信：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定能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化，精兵简政，联系群众，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把广西壮族自治区精神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上思县革委会张贴“剿匪”布告。布告说：“凡窝匪，通匪，济匪者与匪同罪。”要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挖黑窝、拔钉子的清匪运动。”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会上宣布：“谁跟山上土匪有联系，一律枪毙！”这样一场指鹿为马、玉石俱焚的大屠杀，终于落到了“4·22”派和持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身上，给他们冠以“通匪，济匪，窝匪”之罪名，“与枯那反革命事件”有关者通通与匪同罪，大抓大捕1671人，惨遭杀害973人，其中国家干部149人，特别严重的是枯那大队被冤杀了61名无辜的平民百姓。

5月17日，上思县革委会常委、人武部长、公检法军管主任段振邦召开各公社领导、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以民兵“枪换肩”为名布置收缴“4·22”中民兵的枪支，装备“联指”。枯那大队“联指”民兵营长梁国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划收缴“4·22”派民兵的枪支，大队治保主任宁协利拒不交枪给“联指”并开枪打死李巨才。

事件发生后，段振邦向钦州军分区谎报说，5月27日发现枯那大队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装伏击我民兵，疯狂向我民兵开枪射击……（见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68）军营字第10号“五月份主要敌社情况及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保卫组”《情况反映》第七期）段振邦在谎报“匪情”的同时，派副部长韩刚生率“联指”武装民兵200多人开赴枯那“剿匪”，一无所获。

7月9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营弄清了事情真相，向自治区报告了实情“枯那大队并未发现土匪”。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议保卫组相应于7月25日《情况反映》第十期中，明确更正道，“我组织印的《情况反映》第七期通报上思发现土匪活动，情况经查实没有土匪活动……”澄清了事件。

段振邦于8月16日又向钦州军分区报告请示广西军区，军区命令：“要搞掉他！”于是县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挥部，段振邦和驻军营长承以负责“剿匪”。钦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伊铭前来坐镇“剿匪”。调动本县“联指”民兵和钦州东兴县“联指”民兵及部队共1000多人包围上思“匪区”，设卡搜山，沿户清查，伏击聚歼。结果，依然没有发现一个土匪。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有极其伟大的战略意义，为我们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指出了根本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区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广西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220师，独立一，二师，空七军，二零分部，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的电报。

下面这一部份具体数字，是今天经由民间调查而获得的，可供参考：

灵山县被打死3200多人；

都安县被打死441人；

开鸣县被打死698人；

宾阳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3681人；

上林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1906人；

蒙山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 8 5 0 余人，其中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私刑致死 6 0 3 人；

百色地区被打死 1 0 7 3 人；

河池地区被打死 7 0 0 0 多人，其中有五个县被打死千人以上。

据官方县志的记载，文化革命中广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尤其是在 1 9 6 8 年韦国清等人下令的对反对派“四二二”的“刮十二级台风”中的死者远远高于其它各省。

五、“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案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第一号文件：《宣言》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第二号文件：《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的信

七、十月政变后对革命革命干部和群众的镇压

一九八三年，原“联指”头头担任省革委会领导职务的人均遭镇压：

颜景堂（广西大学学生，1973 年任自治区共青团委书记），

邓文光（区建一公司工人，1973 年任区总工会副主任）

李家海（南宁橡胶厂间指导员，1973 年任区总工会副主任），

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干部，后升任区党委常委）

先后被判刑或开除党籍。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广西文革资料，暂时还没有收集到。

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都曾经犯过方向路线错误，比较其它省来说，属于一般。

二、广西的革命群众组织很早就起来批判省委的错误，它们是有贡献的。

三、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由于广西军区支持“联指”，压制“工总”，革命群众组织分裂为“四·二二”和“联指”两大派。并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发生武斗。这以后一段时间，“联指”派搞武斗比较主动。

四、由于中央反复做工作，韦国清、广西军区都检查了自己的错误，群众组织双方达成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的协议，中央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作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成立了广西革筹小组。这时，广西的形势是很好的。

五、一九六八年一月以后，两派武斗、乱杀无辜、清查反团轮番上演并不断升级：

1，一、二月份，玉林、灵山、融安等地发生武斗，由于“联指”派有人武部的支持，处于强势；“四·二二”处于弱势。一般称之为“围剿”与“反围剿”。

2，二月下旬，一些县开始发生乱杀现象：

二月二十八日，大新县武装部长周永山提出：为迎接县革委会的成立，对不守法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实行专政，不要心慈手软，会议后实行所谓群众专政，自县抓促会议结束到县革委成立的17天内，全县杀239人。

二月，合浦县县城及各公社先后召开批斗大会，刮起了一股乱杀人的歪风，至5月间，全县被杀和被迫害致死961人”。

三月十六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县武装部长马政华强调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每个乡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在马政华等人的多次布置和组织策划下，从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杀害630多人，仅3月18日的一天发生31起杀人案件，杀害102人。祥元乡两起杀人事件，共杀46人，造成16户无男人，9户灭绝。死者农会冲的女儿，被凶手黄正建等人轮奸后强迫嫁给凶手农朝丰。死者农朝权、农良宁的妻子被强嫁给凶手

黄正健、蒙加丰为妻。各社、队普遍出现乱杀人事件，至年底全县被打死、迫害致死1651人”。

三月十八日，钦州地区公检法军管会给军分区的情况反映（3月5日至12日全专区共杀人2000左右，其中灵山县杀了1000多人，（注，这时在钦州地区上思县、防城县、灵山县等已杀人成风，一些大队民兵营、治保主任、公社武装部长到处鼓吹杀人）

三月十九日，崇左县武装部政委马风池到天等县，参加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代表大会。崇左县负责人张洪恩讲话说“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结果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就杀死94人。

三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二十二日，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覃锡明（原乡长）等分12批用枪棍、锄手段打死无辜群众40人，（其中未成年的12人，还有双目失明老妇人，未满10个月的婴儿）有13户男性全被杀光，杀后洗劫被杀害者财物。

四月十五日，浦北县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22人，规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补助五角钱，三个民兵负责杀一个人，得三元赏钱，三个晚上共杀22人（其中杀绝五户）。杀人前进行搜刮，没收家产，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过“双打”委员会批准（“双打”即打击现行反革命，投机倒把）。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二十四人改嫁时被大队，生产队征税费和两女出嫁费共894元，有帐可查，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钱物3066.41元，全部被吃喝完。

四月十五日，北通公社十专学大队在4月13日听了地区革委主任王晓峰电话会议的讲话后，4月14日召开大队及革委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于第二天（4月15日）杀24人，4月16日又杀52人。从4月5日至五月6日杀56户92人（其中15户被杀绝，1户17人被杀13人），黄芝珍等（大队治保主任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谋共刮死者财物2701.27元（内改嫁证明费218元，设卡哨搜人身4151元，收生产队上交杀人费1016.40元），大米769斤。

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陆川县部署“十二级台风”，掀起了杀人的新高潮，全县11个公社155个大队，有154个大队布置杀人，全县共杀害1229人。由于专区革委会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全专区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份是在刮“12级台风”中被杀害的。

六月十五日，罗成么佬族自治县，“在县城广场召开‘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亦称万人对敌斗争大会）。有县、区、公社、生产队干部8998人参加，错误批斗150多人，其中死59人。之后，乱杀人风遍及全县，致死全县1389名干部群众无辜死亡”。

3，四月份，各地革筹小组、联指更明确地把矛头指向“四·二二”。

三月下旬，陆川县“联指”在武装部支持下，策划对“4·22”围剿。“4·22”派被杀110人，受牵连审查一万多人，原县委书记周履光等八人被集体枪杀后，用炸药毁尸。后称“3·24”事件。

四月九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声称：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

四月上旬，巴马瑶族自治县，“4·22”部份人从县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县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羌圩公社武装部长卢金珊，副部长黄正业，已圩大队革委会主任覃德强等人为首，组织民兵和“联指”数百人武装围剿少数派“4·22”，此次共杀害30户（全屯46户）杀死56人，烧毁民房44户133间（全屯140间）估计财产损失约七万多元。

四月十三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名单中，由于把“联指”头头当作“4·22”代表参加革委会，引起“4·22”不满，说革委会是县人武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孩刘小圈，“4·22”抬刘小圈尸体冲击大会主席台，撕毁大会横额，砸烂县革委会牌子，这就是贵县“4·13”事件。事件后贵

县“联指”以“4·22”破坏红色政权为由，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研究镇压“4·22”的方案，提出刮“12级台风”（大屠杀）。一是围攻炸毁“4·22”据点，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在10天时间里，捕了数百人，除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从“4·13”后的一个月，将关押的全部枪杀，在贵县城区被杀害和迫害致死的230多人。各公社效法县城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召开大会搞示范杀人。公开杀害群众38人，斗死90多人。据统计，全县5、6月份有2129人被斗、打或被杀死”

四月二十一日，龙州县“联指”和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的干部武装包围“4·22”“工总”工商联据点，“俘虏”90多人，将12人作为坏头头枪杀。事件开始发生时，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不同意攻打，但县革委会主任常玉善坚持要打，攻打之后杀了一批人，南宁地区不作处理。结果致使该县继续杀人，从四月至六月共打死杀死177人，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的40%。

四月三十日，广西驻军8个连的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和民兵一起开赴宁明县的上石公社，对宁明“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5月1日打下“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上石农总”被定为反动组织，有4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判各种徒刑的达22人，有4人判劳改关押在途中死亡，在围剿和批斗中打死和逼死108人。（1980年，南宁地区中级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此案调查组，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制定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的东西，不知道把这么多人判处“死刑”的“证据”是什么。）

五月三日，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

但杀人行动并没有停止，一直延续到五月中旬。

五月十一日，广西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后，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今天为止，全区共杀18000多人。

五月十二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通过所属的“沥血兵”搞“禽兽展览”（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押在“联指”总指挥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厅长）、张祖贵（原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4·22”“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子竞等二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尔后广西“联指”搞“禽兽”展览遍及全区，受害者达10000多人。

五月十三日，武宣县“联指”攻打“造反大军”（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红卫兵团”（造反大军）抓获桐岭公社“联指”梁达坚，并收走了120多元钱和一些衣物，数日后“红卫兵团”（4·22）释放了梁达坚而未退钱物，“联指”总部就以“武宣县贫下中农指挥部”名义调集600人并请贵县“联指”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对“造反大军”的北楼、北街、武宣小学据点，执行武装包围，打死97人毁掉房屋67间价值37900元；共有37户被抄家，抄去财物价值26600多元。

五月二十四日，地处钟山县的平桂矿务局“4·22”被围剿。

贺县、钟山、富川、昭平县和梧州地市“联指”，在人武部和革委会的策动下，调集5600多人到平桂围剿只有800多人的“4·22”派群众。这场围剿持续50多天时间，从5月24日开始到7月8日结束。

五月底至六月上旬，柳州“联指”为了配合“大部队”进攻柳州“造反大军”，“联指”的“保卫部”梁国开、周继才、覃绍昌等骨干研究决定，提前处理关押在柳州市礼堂，不同观点的“审查对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边杀害，共杀害有名单的42人，有的被铁丝捆绑手脚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边集体枪杀。杨兰生、杨岩生两兄弟漂流到远处上岸。而杨岩生上岸后不久，又被重新抓获，拉到河边再次杀害，尸体推下河里。

六月十二日，桂林“联指”的“桂保总”在桂林南站对面东方红饭店语录牌楼建立的一个专门关押人的“看守所”内，先后关押了2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35人，致伤致死75人。（7

月14日中午前来参加桂林围剿“造反大军”的平乐县武斗人员伍学强、林海、廖昌辉、候永成、唐桥生等24人，冲上“看守所”楼上将被关押的桂林针织厂职工唐跃武和候霉、李江、白先德、马震鹏、秦恩深等12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对面树林里集体枪杀。）

七月十七日，解放军6977部队武装歼灭融安县“4·22”农总，俘虏120多人，打死多人，缴获枪支140多支，尔后又抓捕80多人。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4点，忻城、来宾、武宣、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等八县和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郊区“联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造反大军”。

7月19日，柳江郊区县洛满区革委会发出“洛满告急”，宣称18日上午有100多个全副武装的“4·22”暴徒包围凤山公社“联指”纠察队。呼吁柳州，河池地区各县“联指”和柳州地市“联指”派出武装支持，围歼“暴徒”。当天柳州地市“联指”发出“关于洛满区“7·18”反革命事件的严重声明”。

7月21日柳江县革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不是对讨论“洛满告急”后问题，而是讨论几县“联指”联合武装围剿福塘“4·22”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25日动手。会后县革委将攻打福塘的决定向军分区请示。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攻打，并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郊、一厂“联指”武装联合攻打福塘，并成立“剿匪”指挥部。柳江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宋吉月任总指挥、县革委副主任刘柏生任副总指挥、人武部副部长韦熙年、蒋传璞任副总指挥。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廷国任参谋长，柳江县原县长梁水生任后勤部长，指挥部领导成员有王有余、蔡立志、刘云虎、谢遵宜等。

7月24日凌晨4点，宋吉月命令：兵分三路，对福塘进行总攻击。然而，当时从柳州逃到福塘避难的柳州造反大军四、五十人（大部份是柳钢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离福塘了，只有当地“4·22”观点的农民五、六十人。在“复位”包围后，分别逃上单华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处深山里）。“联指”3000多人搜山围村，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经过几天围剿后，各县“联指”大部份撤离福塘，留下部份武装人员

继续清剿“残匪”。在清剿中又枪杀打死120多个农民，柳江县“保卫队”韦德金在良上村见一妇女背着一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韦德金又补了一枪，妇人含冤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见妈妈被打死后，放声大哭嚎叫，韦德金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联指”联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开支现金100400多元，粮食53583斤。

4，杀四类份子、杀“四·二二”都不名正言顺了，又提出了一个新名目：侦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

五月十七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1人，副团长3人，政治部主任3人，经济部长1人，支队长4人，联络站负责人共63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派的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

同时，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下达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中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当前该案工作重心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

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的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其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

（“联指”派的自称）立即行动起来，以“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

广西各地区、县以至农村中清查反团的概况：

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团”的有5 2 1 3人，厅级干部1人，县级干部2 3人；

百色地区仅仅那坡县一个县就逼出“反团”4 0名“团长”；

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1 1天打死3 3 8人；

整个河池地区被打逼死7 8 6 4人；

钦州地区7个县市打死、逼死、失踪人数达1 0，4 2 0人；

在柳州地区柳江县，打死了所谓“反团”分子以后，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众。仅防城县的一个黄竹塘大队，就因为“反共救国团”案而“捆绑吊打致死6人，被迫自杀1 7人（救活1 3人），暗杀3人，外逃1人，重伤2 1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

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鸣县各公社陆续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共救国团”。因为公告编造了“反共救国团”狂叫“杀贫农”的纲领，二十年前的贫农被煽动起来杀二十年前的地主富农。在会上当场被打死的及会后被迫自杀的多达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及其亲属。

武鸣县的一个公社，在赶集时将六十多人押到墟场，一字排开，用铁锤逐一砸开脑门。

相邻一个公社，将四十多名“反”字号押到集上，全部用乱棍打死。

武鸣县“自开声讨会至追查结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

整个武鸣县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约两千五百人，其中“农村居民二一七六人”，而非正常死亡的“农村居民”中，“四类分子及其部份亲属一千八百多人。”

武鸣县华侨农场有两三万人，大部份是华侨，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员，受到武装部军人的屠杀。武鸣华侨农场13000人集体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保障归侨人身安全。当时的县革委、人武部头头XXX调动民兵在双桥乡拦截，当场抓捕74人，归侨崔光荣当天被枪杀。后来逼出一个“反共救国团武鸣华侨农场支队”，并宣布上京告状是反革命事件。归侨和国内职工1337人被列为审查、斗争对象，其中有221人被抓捕，202人被关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户人家被抄。驻扎当地的野战军有些部队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个连去缴了县武装部的械，才止住屠杀。

这个“反团”案到1983年已平反，是个冤假错案。

5，七月，南宁市又发生两派大规模武斗

七月十五日，中午12时，南宁市“四二二”一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据点遭到猛烈炮轰，一朵朵烟云腾起，百货大楼所有的窗口都吐出浓浓的黑烟，大楼东侧象{瘫塌的碉堡，楼前的朝阳路，坑坑洼洼。大楼正西北边是朝阳广场，广场中间已被两尺多高的野草所遮盖，野草之中躺伏着军区和“联指”的炮手……。百货大楼的南边是中华街和解放路，这是南宁市旧城的主要街道，多数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这些重重叠叠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认为是“阶级成份特别复杂”，是“反共救国团的老巢”、“特务牛鬼蛇神的聚居点”。其实，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贫穷的老百姓、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解放虽已二十多年，他们赖以栖身的仍是这些小瓦房。今天，他们刚刚吃过午饭，许多人随即听到“呼呼”的炮弹头与空气磨擦声，还不及收回脚，巨大的声浪已把他抛上房顶，屋上的瓦片也被气浪震得粉碎，火像着了魔似的把房子噼噼叭叭地燃烧起来。

人们听到轰轰的炮声，接着是的机关枪扫射声，还有步枪，冲锋枪声。“四二二”的广播喇叭被炸哑了，南宁市上空只剩下“联指之声”还在广播：“‘四二二’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我‘联指’战士，手段野蛮，罪恶滔天，今天他们又制造了一起震憾天下的血案……今天下午18点55分至约点30分，解放路的土匪们

竟敢向我敬爱的解放军开枪开炮，把炮打到广西军区大院内，致使我解放军多人伤亡，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种件事被广西军区报告给了中央。

七月十六日，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天资路、上国街、博爱街、冒出滚滚的浓烟。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指示他们要“掩护群众救火”。

七月十八日，广西军区、革筹小组在向中央报告：南宁市解放路、民生路、上国街、博爱街等民房起火，是“四二二”纵火焚烧居民房屋，据此要求派解放军对“阶级敌人”采取强制措施……。

七月十九日，南宁“警司”发布告《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的报告中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还向中央呈上了《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的报告》，称由于着火地区都在“四二二”的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采取的措施是，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9日至12点，军队和“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对准百货大楼开炮，大楼二、三楼起火燃烧。

南宁市的几条街道被焚毁，两派相互指责，从实际情况来看，军队和联指开了炮，“四·二二”也有个别坏头头叫人放了火。

六、在两派武斗中，“四·二二”也犯了严重错误。

1，破坏广西两派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柳州铁路局两派《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一九六八年二月，柳州铁路局工机联“4·22”《红卫兵战报》发表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作者肖晋云，因写作此文，1968年3月31日在柳州被官方逮捕），号召反对缴枪。

2，破坏铁路交通，不能恢复通车：“七·三”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柳州这个关键过不去！在铁道上放脱轨器，只差五十秒钟，若不是解放军抢救，火车就要出事（王反修辩解：只是一个学生放的，他不懂事。）

3, 抢劫援越物资, 拒不送还; 五月二十一日, 拂晓, 柳州“造反大军”(4·22)头头白鉴平、廖伟严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王反修、李振岭为了对付“联指”的武装围剿, 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五三八”列车调度段抢援越军列八个车皮的武装弹药, 一万一千多箱弹药, 把火车拉到冷冻厂去。王反修、李振岭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了收条。把抢去的援越弹药分了: “工机联”抢四千多箱, 其他是“造反大军”抢的。

4, 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 部队, 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5, 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 拒不执行, 继续顽抗;

6, 梧州的火, “四·二二”要负主要责任, 而且这种办法不仅在梧州, 在柳州、南宁也都有发生。七月二十一日, 在民生路一带烧了一千多间房子。七月二十五日, 南宁“四·二二”的三十个人不来北京开会, 还继续放火、封锁邕江大桥。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 都说是受压的, 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

7, 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那里有十年以上徒刑的劳改犯, 有×千犯人), 成立“接管监狱领导小组”。

8, 参加并主持了五月在北京举行的所谓全国造反派会议。朱仁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 说有十几个省, 三十多人参加。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全国“造反派”总部。在会上有人谈到当前是两个司令部斗争。

9, 汇报团在北京冲京西宾馆, 再三劝说不听, 打烂玻璃, 打伤战士, 还讲: “别人来宾馆顶多两个小时就走了, 我们呆了四十八个小时”; 还说“坚持就是胜利!”把送到和平里的战士也打伤了。

七、广西的问题, 韦国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 六八年以后广西的武斗, 实质上是掌权的人武部和联指对“四·二二”派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 在一些地方, 确实存在右倾翻案的问题。虽然没有证据说明, 这些行动都是韦国清布置策划的, 但他也没有与这种错误行动作斗争。

第二，广西的乱杀无辜，都是在县级领导机关统一指挥下进行的，全国第一。区革筹、广西军区面对灵山、合浦、东兴、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从三月开始，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才向个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的电报。区革筹、广西军区实际起到了包庇纵容的作用。

第三，韦国清制造了所谓“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同时，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全区各级革委会下达的题目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广西区革筹、广西军区发布了关于破获“反团”的公告。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召开3万人大会欢呼“七·三布告”的公布，接着广西军区负责人宣布谢王岗、袁家柯为国民党大特务、假党员、走资派等。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发表讲话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小将揭发，谢王岗、袁家柯是三反分子、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15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七·三”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了道路。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南宁警备司令部发出通缉令抓的“反团”骨干，都是“四二二”派的，全南宁市有3，547人被列为“反团”分子（全是“四二二”观点的群众）。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广西日报》刊登的“誓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说：“谢王岗和蒋匪特务组织里应外合，发展特务组织，建立特务情报站……在担任钦州地委组织部长期间：利用职权安插了大批的特务、叛徒、地主恶霸、资本家在党政机关工作……”

八、广西的问题，中央也有许多失察的地方：广西的武斗，中央始终认为是两派斗争，实质上六八年以后是掌权的人武部和联指对“四·二二”派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广西的乱杀无辜，中央没有严察和严惩；韦国清上报的“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中央也偏听偏信，周恩来在七·二五会议上还说：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造成了严重后果。

九、有人说：广西两大派“四次闹到周恩来总理那里，要周总理公断谁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一第二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两派相安无事。第三次接见两派代表，周总理说广西造反派是革命群众组织。”“一九六八年夏，周总理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

也有人指出上述说法不准确：在“七二五”讲话中，并无直接宣布广西“四二二”派为“反革命组织”的明确结论。不过，通篇讲话中，确实充满了对“四二二”派的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代表讲话中少有的。确实给人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之感。这样一些讲话传达下去，当然就会被认定是周恩来宣布“四二二是反革命组织”了。

其实，周恩来的七·二五讲话非常明确：

革命委员会是要支持的，已经双方协商，上报批准，是合法机构，这是原则问题。但不能说革命委员会就不会做错事，有错改了就好，可以批评帮助嘛！但是，有人提出要打倒革委会，推翻革委会，是不行的！农民要人（指流窜到城市的坏人）是合理的，但是应该通过军队，不能抢，不能破坏城市的革命秩序。至于“造反大军”吸收了一些成份复杂的人，由他们自己清理。“联指”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对他们冷淡，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嘛！当然，不能把过去反对过革委会作为前提。应该肯定地说“七·三”布告中，“四·二二”、“造反大军”包括“老多”方面的错误大。特别是中断铁路运输，放火烧那么多房子，严重得很！“七·三”布告发

布后，还在北京说很多黑话，贴不少黑标语。尽管错误严重，允许改正。“联指”也不能压他们。曹东峰在北京干了那么多错事，我们还叫他写信回去，准许他改，将功折罪。刚才王反修不是认罪了嘛！也要看他们能不能认罪！

“尽管错误严重，允许改正。”“准许他改，将功折罪。”这里既没有宣布广西造反派为反革命组织。也不可能被认定是周恩来宣布“四二二是反革命组织”。至于有些人，歪曲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硬要把“四二二”派打成反革命组织，或者有些人借机挑拨“四·二二”派与党中央的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十、在广西，还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保党反派委员会”。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还不清楚。从它发出的“宣言”、“意见”来看，它的后面似乎有“高人”指点，以保卫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为名，把矛头直接指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两个出现在一九六八年的材料，可以说是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决议”的先声。

据说，这个案件在一九六八年就告破了，详情不得而知。后来肯定又平反了吧！

2008年5月9日初稿

2011年11月29日修改

第五节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造总”等群众组织宣布夺权并与军区关系日益紧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造总”等群众组织在拉萨市开大会，宣布夺权。

西藏军区支持。群众代表在发言中有一些攻击军区的言论。军区参加会议人员退出会场。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

说，“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认为张国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群众因不明真相，动荡很大，军区机关一部分干部和驻拉萨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混乱。此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为此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毛泽东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

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造总”等群众组织冲藏南军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给西藏军区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首都赴藏革命造反总部、首都三司驻藏联络站、北航红旗赴藏小分队从拉萨发给中央文革的电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文革给拉萨革命派的电报

（1）中央军委二月十二日给西藏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意见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同志作些工作。

（2）中央文革小组欢迎你们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捍卫和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联合夺权的伟大方针。你们要同张国华同志和西藏军区革命领导同志合作使西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不走弯路。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拉萨市召开西藏自治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这次大会不准“造总”等群众组织参加。

二、陈明义在大会上的讲话

在当前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农奴主、农奴主代理人 and 地富反坏右、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而“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内的一小撮反坏分子同他们勾结起来，并成立所谓“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等反动组织，欺骗、拉拢、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要阴谋，放暗箭，造谣惑众，颠倒黑白，制造混乱，妄图变天。他们要造无产阶级的反，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妄图实行资产阶级和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复辟。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拼命地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对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实行白色恐怖；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疯狂地咒骂、污蔑我边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开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一再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公开叫嚷要夺军权，甚至扬言要“血洗高原城”，“要与军区干到底”！他们极其恶毒地挑拨军民关系和民族关系，甚至分化瓦解部队，煽动部队“调转枪口”“反戈一击”，妄图搞垮边防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拚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反对“三结合”联合夺权的正确方针；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生产，破坏国家财产，顽固地抗拒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西藏军区接管地方已集中的武器、弹药的命令；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抗拒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反对军区对西藏日报社等单位实行军事接管。这些都是绝大的错误，原则的错误，大方向的错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破坏战备工作、影响国防巩固的错误。一句话，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一股反革命逆流。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的战士和广大革命群众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毛主席的“五·七”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一万三千多革命工人、农民、“农奴戟”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汇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负责人吕义山出席了大会。

“大联指”负责人郭铎之在会上讲话。

西藏军区政治部负责人阴法唐在大会上的讲话：一年来在农副业生产、工业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仅开荒面积就比去年耕地面积增长一倍以上，播种面积也增长一倍以上，这是一个大跃进，为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了一份力量。

三、中央着手解决西藏武斗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制止西藏武斗的五项指示”

一、会议听取两派情况的全面汇报以后，中央认为：造总、大联指均定为群众组织，以便实现大批判、大联合。两派的性质暂不下文字的东西。

二、拉萨各派组织，必须马上停止武斗，不准调农牧民进城，立即恢复交通运输，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工作，认真学习中央文件、江青等同志讲话和报纸的社论，这些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

三、要防止挑拨离间，调拨民族关系。

四、报纸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声音的。

五、如何做得好，这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的考验，还有一点要向造总同志传达的，“专打”不能定为群众组织、中央认为它是有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西藏军区任荣等人时的指示

一、拉萨两派均定为革命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批判、大联合；

二、拉萨各派组织必须马上停止武斗，不准调农民，牧民进城。凡是已经调进城的，立即劝说他们回去；

三、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工作，立即恢复交通运输，保证交通畅通；

四、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搞破坏，挑拨民族关系、军民关系，不要上敌人的当；

五、立即出《西藏日报》电讯版，报纸要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这是天经地义的，《西藏日报》应立即出版，谁不这样做，就是对抗中央。

四、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周恩来对西藏自治区军管会的指示

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十日前要送上。西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概不超过十五号，应准备和四川同时成立。周仁山不能结合。

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张国华接见西藏两派代表的讲话
错了坚决改，要彻底平反。

在西藏有王其梅，历史上还有范明，还有惠毅然，这是走资派嘛！还有周仁山嘛！也要批倒批臭。

总的精神，西藏最迟十号要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送上去。

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张国华接见西藏“造总”代表时的讲话

“造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在西藏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贡献的。

“一月风暴”夺权，这大方向是对的，但条件不成熟。军区支持你们夺权，大方向也是对的。

军区与“造总”的关系，本来是好的，军区二月五日支持你们，但那个会开得不好，军区不应退出会场。在那会上群众有过头语言，过头语言不少，还有错误做法，那是不对的。军区对你们提出了是对的，你们应吸取教训。从这以后，你们和军区的关系就紧张了。你们以后又冲击军区，是两次吧！对冲击军区，军区看得过重了这也不好。

二月逆流。从西藏讲是王其梅、周仁山、惠毅然，甚至还有那一小撮。军区抓了你们的人那是不对的，

关于“专打”，中央表示了态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负责同志批了“专打”土皇帝，土皇帝指我，我并不把这看成什么了不起的事，这问题说清了就行，以后不要再讲了。

西藏是在支左要作中犯了错误。三月份军区主动去和你们改善关系。

对于平反问题，军区搞得不彻底，平晚了，“四·一”指示下来就应赶快平反，而平得不彻底的可以弥补吗。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八日，陈明义对西藏“大联指”代表的讲话

西藏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明，“大联指”是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尤其是揪出了周仁山，立了一大功，为西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们过去对同志们揪周仁山积极支持不够。去年七、八、九月把“大联指”内定为偏保组织我负主要责任。对“大联指”同志们思想上、精神上都有挫伤，我作检查，是我私字作怪，关键时刻没有顶住。

西藏经过揭发、批判，阶级阵线基本上清楚了，作为西藏这样复杂的地方，还有许多工作要作，把几方面的敌人要搞清楚。

（一）十几年来，对范、白反党集团批的不够，他们的阴魂不散，几次政治斗争都有翻案。余孽还在。

（二）平措旺杰搞的东藏民青，这个窝子是国民党、帝国主义搞起来的，过去没搞清没定，现在看面很大。

（三）已被打倒的农奴主阶级达赖、班禅集团还在心不死，他们有同主子在国外的，也有在西藏的。拉鲁的老婆也公然跳出来活动。

4、很多工作要研究，你们姿态高，今后要很好的团结“造总”的同志。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中央首长对西藏问题的指示

要注意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动向、动态。国外是大敌当前，边防可能出点事。

西藏两大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都是对的。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各大组织里都有坏人，要发动群众自己抓，清理阶级队伍。要发展巩固大联合。

要立即制止武斗，停止打内战，恢复交通运输。西藏日报要联合出版，赶快出报纸，要传达中央指示。

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西藏军区给西藏“造总”的公开信

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警备区部队，为了给驻财经大院驻军运送给养，保证驻军正常的战备工作，于上午进入该院。革命群众本应协助我们搞好这一工作，但该院的“造总”下属群众在少数坏人的挑拨下，对我部队开枪打手榴弹，打伤我干战数名，并毒打抓走我警备区司令员石板樵同志，还抓走我干战数名，我们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应立即放回石板樵同志和被抓走的我干部战士，并要立即交出凶手。

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西藏军区给西藏“造总”的第二封公开信

我们在今日十六时二十五分发出致你部的公开信，经西藏军区、西藏自治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反复播送，并以电话反复通知，想你们早已收听到了。可是截至现在为止，仍未见你们将非法抓去的拉萨警备区司令员石板樵同志和其他指战员送回。我们再次敦促你部立即送回石板樵同志和被抓走的干部战士，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并交出向我武装进攻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

近日来，我财经大院、大昭寺、西郊等地驻军遭到阶级敌人挑拨下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围攻、辱骂、殴打，有的断粮、断水，甚至向我部队开枪射击。到现在为止，已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二十多名，抓走数名。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关于立即停止西藏地区武斗的协议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立即停止武斗协议”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8.28；中发〔68〕136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由曾雍雅同志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十三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二名副主任，以后增补。

五、“大联指”一些人抵制革命委员会、不支持军区改正错误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西藏地区文化大革命应该注意的问题

“大联指”的某些同志不尊重革委会的领导，不参加革委会召集的会议是错误的，希望“大联指”的这些同志顾全大局，立即改正，否则要犯更大的错误。

不得冲击部队和指挥机关、拦截军车、抢夺武器和部队物资等。

西藏军区的“平反公告”和对大昭寺事件的处理是军区纠正自己过去支一派压一派错误，“大联指”应该支持军区纠正错误。

中央决定，将现在成都办的西藏军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调到北京来办。

六、实现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共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实现西藏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请示报告》

报告提出要在 1971 年实现全自治区人民公社化，同时结合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牧区补划阶级成份，在农区调整阶级政策。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

中共中央《指示》认为，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已经出现，要求西藏的各级党组织依靠贫下中农牧，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

牧主和富农富牧阶级的剥削制度，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

《指示》原则同意《请示报告》所提出的西藏地区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公社化，并对若干具体问题作出政策规定。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七、西藏的批林整风运动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五日，中共中央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会议目的是解决西藏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会后，西藏自治区负责人任荣等6人向中央写出《关于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批发西藏自治区、军区党委《关于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的报告》

其后，西藏自治区、军区党委分别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9月8日批示及西藏自治区6位负责人写给中央的报告。

全区组织6,000多名干部下乡，贯彻中央批示和自治区扩大会议精神。

八、十月政变后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遭到摧残

一九八〇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严重破坏，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遭受了苦难。

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时

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指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垄断集团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广大黑人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毛主席这个论断，完全不能适用于我国解放后的民族关系），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如果进藏干部和解放军在帮助藏族人民完成社会改革以后，以“恩人”和当然的“领导者”自居，不努力培养本地干部并帮助他们真正当家做主和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巩固祖国各民族的民主平等团结统一），轻率地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说成是阶级斗争，那末我们就不但不能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必然要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

重新审订全区经济建设规划，对发展农、牧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调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在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家庭副业等一系列问题上纠正各种“左”的偏向，落实党的农牧业、财贸、文教、民族、宗教、统战等各项政策。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包括宗教政策）受了很大摧残，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之间又产生了相当的隔阂。

本通知的基本精神，同样适用于全国其他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县。

贰、本节简论

一、西藏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在革命群众破四旧的活动，触动了喇嘛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可惜，这方面的具体情况缺乏资料。

二、革命群众组织分为两派：一派与军区合作，另一派与军区对立。对立的一派中有一些人成立了“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把矛头直接指向军区的负责人（张国华）。这当然得不到军区和中央的支持。军区相应地实行了支一派压一派的政策，因而犯了错误。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西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西藏的各级党组织依靠贫下中农牧，联合中农牧，消灭农奴主、牧主和富

农富牧阶级的剥削制度，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2008年9月9日初稿

2011年11月30日修改

第六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新疆各族群众奋起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关于《新疆日报》报社事件的电报

一、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参加武斗的双方，要立即停止武斗。

二、新疆日报社为军管单位，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去冲，也不要查封，进入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要立即退出报社。

三、新疆日报的问题，由新疆军区组织双方代表通过协商解决。报纸出版如有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批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给新疆大学的指示

〔新疆大学“红三连”要召开“五·二七”民族大会。周总理发出紧急指示〕

立即研究说服不要开这个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新疆两派全体在京代表《关于坚决执行总理五月二十六日指示的联合紧急决定》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三三五部队关于红三连召开民族大会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新疆医学院大血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畜牧厅大血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为制止乌鲁木齐市武斗给新疆军区的指示

一、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由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个人，要拿你们是问！

二、给南梁地区送面粉。

新疆三促调集兵力，准备于七月二十八日夜全面包围新大、八农、新工等，企图一举打平三新。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夜，军区给红二司打电话，称：

（1）从晚十时至凌晨六时全市戒严；

（2）给新大“星火燎原”送面粉；

（3）恢复两派关于制止武斗的谈判。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关于新疆奎屯农校武斗事件的电报

据报告，农七师农校发生严重武斗，红战团于今日攻占了红旗兵团三百余人所固守的大楼，人员下落、伤亡情况不明，请你立即指定专人，对此事进行妥善处理。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给新疆“红二司”电话指示

你们这几个月的运动总的来说还是好的喽！这几个月我也没有管你们，也没有给区党委打电话，主要是考验你们了。目前是大联合、大批判、不要派性压倒党性了，不要走过了头，我需要提醒你们。……

你们的战友有的受了伤，有的被打死，军队做过了火。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处理这件事，要惩办凶手。……

对边境地带不能去了，有些地方是秘密的了，不能去了，是前哨。我讲的是阿尔泰，伊犁。伊犁有个副司令员，几个月没有工作了。同志，你们去的太远了，那是苏修的边界，一定要处理好，不能去，就是不能去！……

十月一日的国庆节，任何地方只能是由毛主席任命的军区司令员，政委主持，不能由你们红二司主持，你们也不能做新疆第一领导人嘛！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二八”惨案。

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周恩来关于召开国庆大会等问题给新疆的指示

- 一，都不要在人民广场开会；
- 二，新疆军区，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七三三五部队自己开；
- 三，红二司在南门体育场开；
- 四，工农革委会等自己找地方开。

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周恩来关于新疆喀什问题给七三三五部队的指示

“喀什地处边疆，是反修斗争前哨，必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要坚决贯彻《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当地的公路交通不允许任何人阻碍破坏，谁要设路卡、路障、破坏交通，要对该组织负责人查处。……你（指孟昭远同志）就代表我们中央监督他们双方执行。”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给喀什问题调查团来电指示要点

- 一、无条件开放交通，以前没有下命令，这次要给你们下命令；
- 二、八野、四野的武器立即收交，群众组织的武器由自己统一封存，今后喀什由七三三五部队负责监督；
- 三、到晨六时（北京时间）将工事全部拆除，并向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同志汇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关于哈密问题的指示

“总理指示，委托七三三五部队驻哈密××航校派出部队监督哈密铁联，红联（三促观点）于十月十四日已达成的四项协议的执行，保证哈密站运输畅通。”

“总理指示：哈密车辆厂，××厂两个工厂和工务段和机务段只能在厂内闹革命，不准到铁路线上去串连，不准在工作时间辩论，不要影响铁路运输。

总理指示：今后不准任何人向铁路上打枪打炮，这是违背国法的。维护交通安全这是当前国家的最大利益。”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对参加全国铁路会议代表的谈话中关于西北的部分

总理说：“哈密最近又有问题，车又不通了，这是怎么回事？乌鲁木齐的来了没有？”

申汇报：“这次会议，军管会没有通知我们，后来我们知道了，在七三三五部队帮助下才来到北京。我们局从五月份以来，为了抓造反派，截车、停车、罢工极为频繁。……我们在元月份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夺了我局党、政、财、文大权。三月二十日军管后宣布夺权无效，抓‘一撮反革命’，把我们压下去。后来军管会搞了第一线生产指挥部，由十五人组成，我们这一派无一人参加，从而把多一半的广大群众排除在外，剥夺了我们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运输。我们感到十分痛心！”

总理激动地说：“二司在很多地方是少数，你们（指局军管会、铁联总）在很多方面压他们。压是不行的！”

申接着汇报说：“目前乌鲁木齐武斗仍在加剧，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我局二司观点的职工有一千多人被迫在外地，不能回局参加生产。从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十七日，仅我们铁路职工就被打死七人，重伤残废近三十人，轻伤近百人。”

这时总理又关怀地问：“这些人现在什么地方？”

申答：“在外地，北京、西安、兰州、嘉峪关、哈密、乌鲁木齐。”

总理问：“你们组织有多少人？”

申答：“我们局在西北各省都有任务，五省都有我们组织的人，在新疆境内有四，五千人。”

总理听完后对苏静说：“乌鲁木齐局两派都不要走，留下来解决问题。”

最后总理说：“铁路是关键的企业，今年只剩下两个月了，任务很重，运输抓不上来，要影响整个建设。你们要搞大联合，办好毛主席著作学习班。过春节以后，再把全路的同志们找来学习一次‘斗私批修’，再看看情况。”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周恩来接见铁路系统在京学习代表时有关新疆问题讲话

总理说：哈密的情况我知道。新疆的问题我知道。你们铁路受地方影响，地方受军队影响严重啊！部队新疆军区和空军对立，兵团介入地方，解决新疆问题，首先要解决部队的问题，要“釜底抽薪”，“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左齐传达周恩来对新疆的指示

总理说：如果再让王恩茂上台，就等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取得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左齐谈中央文革对打倒王恩茂的意见

一、关于王恩茂，他（指中央文革同志）是用比较的方法来说的，王恩茂和上海的陈丕显比，与河南的何运洪比，与陈再道比，比的结果是王恩茂比这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恩茂两面三刀，阳奉阴违，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顽固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滔天罪行。王恩茂必须打倒！这两天中央文革另一个同志也对我说，如果王恩茂不打倒就意味着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新疆的胜利。

二、打倒有几种倒法，一种是象刘邓那样，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一种是撤职，降低使用。另一种是调离，这都算是打倒嘛！后两种叫做圈外打倒，圈内处理。

三、王恩茂是新疆党的最大的走资派，是刘、邓在新疆的代理人，在自治区就是要打倒王恩茂、昌×才之流，在兵团就是要打倒王恩茂、张仲瀚，在新疆军区就是要打倒王恩茂、张希钦。王恩茂是自治区、军区、兵团党内走资派的总根子。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关于武光问题给新疆红二司的指示

总理说：北航的同学不但没有揭发，反而把武光保护起来了。现在已经由北京的专政机关把武光逮捕了。

新疆的红二司作为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对自己内部的坏人应当杀一枪，自己应动手把他揪出来罗，把黑手揪出来。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关于逮捕依敏诺夫给新疆红二司的指示

立即把依敏诺夫逮捕，押送军区看管。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周恩来接见铁路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讲话中有关新疆问题指示

听说你们协议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武器上交给谁的问题，刚才我和铁道部军管会还有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室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新疆的问题我比较了解，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情。新疆军区嘛，主要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新疆军区出两名代表，空九军出两名代表，红二司（指铁造司）出两名代表，一、三司（指铁联总）出两名代表，共八人组成查封、收交、保管武器小组。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关于新疆铁路两派在京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并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贺电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邱会作对新疆军区党委及建设兵团党委的三点指示

〔这是元月二十七日邱会作部长在王恩茂和张希钦作完第二次检查后，对新疆军区党委、兵团党委、7335 部队党委所作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周恩来关于新疆红二司抄赛福鼎家等问题的指示

总理指示说：红二司这样做是不对的。

拿走的东西都要立即一律交还，今后不能再犯。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周恩来就限期收回被抢武器对新疆军区的指示

总理说：

三促最近抢枪很凶，让郭鹏同志对三促做工作，所抢的武器要限期收回，全部交回，否则要通报全国。一通报，他们就要垮台。

请军区出面谈。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中央首长接见新疆建设兵团在京负责同志时的指示

总理：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主席看的材料比我们多，主席从头到尾把情况告诉我们。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生产兵团成份不纯，石河子就是有陶峙岳的人在里边，有张仲瀚的人，去的劳改犯多，有盲流，情况复杂，边境还闹事，对保卫边疆不利，才决定军管，这是主席告诉的，所以才起草了二月十一日的文件（十二条）。是你们（指丁裴等）起草的，我修改的，中央文革讨论的，主席、林副主席审定的。王、关、戚想插手，我说，这地方不一样，与青海不同。他们（指王、关、戚）经过北航红旗、红二司、王兵弄了不少材料。不然，石河子还会闹起来。你们（指孔、杜、曾、朱等四同志）不清楚，张仲瀚统治了那么多年，他在干部中搞小恩小惠。你们好象觉得对另派压得很厉害。兵团和军队一样，在本单位搞，不能和地方一样，不能到处串连。

总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短时间的，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反动路线。“十二条”是毛主席批准的。（朱：我们坚决执行“十二条”。）是啊！“十二条”是有具体规定的。工厂、农场不要进行串连，值班连队不搞“四大”，医院、学校是搞“四大”的。“八野”要解散，我给丁盛同志说过。“八野”回去时开了一个欢迎会，登了报（指六七年二月原“八野”代表由京返乌市时），我批评过他（丁）。“八野”他们有错误，但大方向是对的嘛！王恩茂同志参加这次会议（指兵团去年三月二十八日成立文革大会）招了麻烦。当时，我研究好了。分三个梯队回去，第一是军区，第二是兵团，最后剩下王恩茂、赛福鼎同志，叫他（指王恩茂）回去先到红二司去，他没有这样做，我批评了他。兵团参加了地方武斗不好。但王兵那派不对，长期住在外边，王兵他们回学校没有？小将不要过多责备，但错误应指出。

总理：文化革命已经两年了，绝对的保守组织没有了，像产业军那样的组织没有了，现在的群众组织里边都有左、中、右。生产兵团的“八野”在石河子问题上是在对的方面的。王兵这一派

还没有完全割开，他们支持红二司是对的，但也有错误。不管对哪个造反派，不指出错误，就会唯我独左。

总理：只有共同对敌，才能搞大联合。两个革命群众组织，只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才能搞大联合。斗争的方向一定要对准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的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共同的基础，共同的敌人，是打击对象。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联合，不然是假联合。

总理：兵团还有张仲瀚的余孽。在四月十一日后，我问了王震、张仲瀚怎么样？他讲：张仲瀚近几年变质了。他还讲了句公道话。我说张仲瀚是大地主，是阶级本质决定的。另外加上陶峙岳的余党，再加上盲流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还有劳改犯，这都是张仲瀚的社会基础，不作这个阶级分析，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兵团×××万人，要作阶级分析。陶峙岳有×万人，还有家属，有地位，有影响劳改犯人，他们也有家属，盲流××万人，有×万多人（多数是好的），有些人（因）本地生活困难一些就住外跑，真正贫下中农是爱土地的，跑去的人混进一部分地、富、反、坏、右分子。动员的上海、武汉、天津支边青年，上海尽量把工人子弟留下，把资本家的子女送去，从上海来讲，是对的，但你们那里增加了负担。当然，对支边青年要一分为二。

总理：新疆与苏联接壤。不能说一点地方民族主义没有。石河子问题发生后，主席三次说：再不能给新疆送劳改犯了。要不是“十二条”，石河子还会乱的，不管犯什么错误，整张仲瀚是对的，幸亏去年在这里开了二十多天张仲瀚的会。叶剑英不管他有什么错误，说什么错话，办了什么错事，但他协助处理兵团的问题是对的。不要光看到高楼大厦，但职工去了没有地方住，住地窝子。张仲瀚把石河子搞得很大，我一去就否定了，叫他分散。他搞石河子大城市计划，你们回去查一查，图还有，要搞几十万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

一、

我们兵团党委常委在运动中也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表现在：一九六六年“九·三”参加了围攻革命小将，压制

了不同观点的群众；一九六七年七月间介入了地方武斗。在其它日常工作上也有缺点错误。对这些错误必须严肃对待，吸取教训，认真改正。

二、

张仲瀚、武光及其党羽操纵和蒙蔽部份群众，猖狂地反对《十二条》，成立“批判《十二条》委员会”，污蔑《十二条》是“大毒草”，是“反革命纲领”，追查指定《十二条》的“幕后人”，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这股反革命妖风，兵团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给予了有力回击。对那些由于认识原因而违背《十二条》的错误行为，也进行了批评教育。

三、

石河子“一·二六”事件，是张仲瀚、武光及其余孽血腥镇压兵团原“八野”、“联总”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反夺权的反革命事件。

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仲瀚、武光及其黑后台的操纵下，二团的“工造团”，污蔑这一事件是“武装镇压‘造反派’”、“‘一·二六’事件定性没定案”，“石河子的案我们翻定了”。这是明目张胆地跑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四、

兵团各级（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是领导兵团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它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已发挥了很大作用。对那些攻击“文革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派性文革”，以及“砸烂文革”、“踢开文革”等错误言行都要进行批评教育和坚决斗争。

五、

他们操纵“xxx”死死抓住兵团党委一些错误不放，并大肆造谣，无限上纲，恶毒攻击，污蔑兵团党委“系统地、全套地、持久地、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了没有张仲瀚的张仲瀚路线”，诽谤兵团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大倒退”，等等。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立即全面、彻底制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协议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立即制止武斗、上交武器协议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对新疆两派在京部份代表的指示

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文元、富治、永胜、法宪、叶群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新疆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部分代表，军内和兵团的代表也参加了接见。

总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同志，早想见见大家，因为大家来这么久了。由于你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没有学好。不能听小道消息，那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不能坐在一起谈了。这个我们有经验，所以今年就没有采取接见的办法，虽然见面少，但报纸上有毛主席的指示，社论，文章，标题都表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你们都看到了。你们两派来了四个多月了，看得应该很清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有五分之四，二十四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剩下了最后五个。这五个都是边疆地区，都有敌人的挑动，受敌人的影响，就联合不起来，敌人在那里高兴。台湾蒋介石就说，福建搞不起来。你们那里苏修就说，新疆搞不起来，印度反动派说西藏搞不起来，缅甸反动派说云南搞不起来，美帝国主义说广西搞不起来。我们能让敌人高兴吗？能让敌人高兴吗？还是刚才那位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有自豪感，我们是伟大的民族，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举世无双的，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有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多了，正如伯达同志讲的，我们应当学到一些本事了。胡乱闯、胡大乱、张大炮你们三个同志，我们都见过了，搞了两年多了，总应当增加不少的知识。你们造反派敢于批判王恩茂的错误，革命精神是好的，但是你们也有些错误，比如说康老讲了伊敏诺夫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苏修留下的特务，你们受过他的蒙蔽，他挑动抓赛福鼎同志，你们还抄赛福鼎同志的家。

总理：赛福鼎同志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斯大林时期他与苏联合作，搞“三区革命”，解放后站在中

国共产党一边，与苏修、叛徒、特务作斗争，把伊敏诺夫、包尔汉揭发出来，你们应当支持赛福鼎同志，你们反而上了伊敏诺夫的当。已处理了。

总理：你们在那里敌情是严重的，没有把敌情观念带来，苏修在边境上对新疆有一个强大的广播电台，我们正在作工作，想办法压倒它，这是思想仗，他们靠修正主义，我们靠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切都要靠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列主义，我们最近得到一些消息，看了你们一些材料，现在你们快要回去，要把毛主席指示带回去，可是你们还没有把毛主席最高指示学好。毛主席接见了没有？（答：还没有）你们正在等待主席的接见。兵团王兵与三司是一道战斗过的，也算是你们的战友，现在察觉他做了很多坏事，今天他没有来罗！兵团党委意见我们要研究罗！王兵是前车之鉴。当时，我们知道他是保张仲瀚的，受张的影响，我们打算挽救他，想把他和张仲瀚的那些打手、部长们分开，现在看来不行罗！如果在兵团问题上犯了错误，那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罗！你们在石河子问题上犯了错误，那是受了他的影响。与自己一起战斗过的。总是会有分化，开始是革命的，以后有的人就蜕化，叛变了，后退了。阶级斗争规律就是这样，自己要警惕，要抓大的。现在，我们要促进你们，很好地执行中央文革批示，实现革命大联合。你要在“六·二二”批示的基础上，双方要主动。特别是三促人数多，要主动，你们抢了枪应当上交，即使是对方交的少，自己也要做模范。你们交了，他们还会打你吗。

二、大联合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新疆两派大联合协议的批示

照发

毛泽东

新疆地区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七月二十八日签订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很好。望坚决贯彻执行，以促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新疆代表团的指示总理：

只有自己揭自己的底，才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样就会走向团结。

军区龙司令员是班长，就应该维护人民解放军，不能再喊什么保王兵啦。当然，这是个别人，个别组织啦。这样，不管那派都要批评，犯了错误有几种人，有的犯了严重错误，是要改的，只有死不悔改的就打倒。要改的就帮嘛！

王恩茂还没有走到敌我矛盾，但错误是严重的。刚才说是与刘、邓、贺龙、习仲勋，叛徒是有区别的，是要改的。要允许给他机会嘛！

军区是巩固的嘛！回去会想通的，是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对毛主席的指示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军队是听号令的，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新疆敌人主要来自苏修、蒙修、想挑拨、破坏、但挑拨不了。广大群众是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何况有××万产业工人，只要经过教育一切都不怕的。回去后，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在新疆是没有区别的。生产建设兵团也是起了作用的，基本方向是对的。（略一段）

同志们，大局要看清，主要的来自修正主义、民族败类、民族分裂、里通外国分子、反动派、美帝属于一类。内部还有反动军官、暗藏特务、要作工作，要肃清，清理阶级队伍。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要挖出来嘛！加以清理。这是我们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的，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不要忘记这么三条黑线，双方都要抓出来。要抓住大的，不要抓住小的不放，把三条黑线忘记了。要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因此，回去——今天三十号了，你们回去不睡觉搞他两天死不了，搞大联合，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搞大联合，怎么把各个工厂联合起来。地方，如塔城、伊犁、都要做工作。不然白纸黑字，达成了实现不了。不能口是心非，理

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也是二心。王恩茂犯了错误，江青同志批评他，他还对你们讲了，没瞒你们，因此他这个检查不打算公开发表，一发表，说不定苏修拿去。王恩茂还不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要在新疆工作。

三、中央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新疆军区党委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我们经过与各方面充分协商和党委集体讨论，现将革命委员会组成的具体意见报告如下：

一、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名额定为一百五十名，除留预备名额二十名外，暂按一百三十名分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八十三名（内工人代表三十九名，贫下中农、贫苦牧民代表二十二名，学生代表二十二名），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八；革命领导干部二十五名，占百分之十九点二；军队代表二十二名，占百分之十六点九。在目前已选出的委员中，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三十，妇女占百分之十。

二、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四十三人组成，除留预备名额六名外，暂按三十七名分配，其中革命群众代表十七名（暂缺一），革命领导干部十名（暂缺三名），军队代表十名。

三、革委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十二人。建议龙书金同志为主任，王恩茂、赛福鼎、郭鹏、裴周玉、李全春、杨立业、胡良才、孜牙、吴巨轮等九名同志为副主任（暂缺三名待补）。

四、革委会的工作机构，设办事组、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工作人员暂订为一百二十名左右。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9.01；中发〔68〕137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名单，批准由龙书金同志任主任，王恩茂，赛福鼎等九位同志任副主任，另缺副主任三人待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新疆代表团的指示

江青同志宣读中央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总理讲话：

现在讲一下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第二个问题，就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首先就要实现归口闹革命，迎接斗、批、改的新高潮。

第三个问题：就是民族团结，军民团结。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给新疆自治区党委的电报

赛福鼎同志前几年在工作中确有严重错误，但最近几年有改正，有进步。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同志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的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民族团结，防止苏联修正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挑拨利用。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关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决议的批示

四、关于新疆的几项改革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指示

1971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对新疆、云南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划分阶级成份问题的请示报告作出指示。原则同意两个省、区在没有划过阶级成份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参照西藏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的原则和政策划分阶级成份。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新疆在反修防修斗争中前进——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报送了《关于改革兵团体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改变兵团体制的会议，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的《报告》，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兵团所属各企事业单位、农牧场，划归地方统一领导。

五、政变后的若干改变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国务院批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的报告，提出 1970 年在牧区划定的阶级成份应予推倒，不予承认。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

一九八一年二月，王震视察新疆后，提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

邓小平在建议上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贰、本节简论

新疆地处边疆，情况十分复杂，中央处理新疆问题非常慎重。

二、对领导干部的处理有一个认识过程，从一时一事来看，不一定准确，如武光问题。历史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

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开始审查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谢良、杨之华、刘护平、李云扬、吉合同志等一百多人，于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后自首叛变问题。

康生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这些人不仅是集体欺骗，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这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潜伏、欺骗党，有计划地搞内奸”。这个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不仅毫无根据地把这一大批革命同志打成了叛徒，而且把矛头指向曾代表党中央营救这批同志出狱的周恩来同志。

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一方面把有关这些同志在狱中对敌英勇斗争的证据材料不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大搞逼供信，制造假材料。在审查中，他们采取法西斯手段，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迫害，致使马明方、杨之华等二十多位同志含冤而死，不少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对“新疆马明方案”（也称“四三专案”）进行了调查核实。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将中央专案三办《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以中办发[1975]10号文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遵照办理。

十月政变后，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四日，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称：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一起冤案。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为篡党夺权，推行极左路线，捏造罪名，颠倒是非等等，也是为了借机生事，把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

2008年9月15日初稿

2011年12月2日修改

第八章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第一节 全国山河一片红

壹、本节概述

一、中央有关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方针政策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毛泽东对夺权问题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至十九日，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的批语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通知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毛泽东召开的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及附件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修改规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几个问题的批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地方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领导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三月，毛泽东关于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二、中央批准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及中央报刊

社论

1，上海市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的《紧急通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2，山西省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格平任主任。

3，贵州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造反派统一组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省市大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西南的春雷》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4，黑龙江省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5，山东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

6，北京市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7，青海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青海高原的凯歌》

8，内蒙古自治区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滕海清高锦明传达中央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9，天津市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

10，江西省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1，甘肃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报道：甘肃广大军民热烈欢呼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把甘肃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春风已到玉门关——热烈欢呼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2，河南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3，河北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4，湖北省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5，广东省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6，吉林省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热烈祝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7，江苏省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8，浙江省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19，湖南省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0，宁夏回族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21，安徽省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2，陕西省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热烈欢呼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3，辽宁省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4, 四川省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5, 云南省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6, 福建省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7,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28, 西藏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三、庆祝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江青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

回忆这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经过多少惊涛骇浪，追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终于把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粉碎了。

我们不要忘记了革命的青年、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初期，在革命的中期，都建立了丰功伟绩。在现在有少数个别小将犯了这种或者那种错误，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正。就是有个别单位，有什么武斗，那也很滑稽的。当然是坏事情，脱离了广大的群众，也脱离自己本单位的群众，这不是好事，我们反对。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就是取得了经验教训，锻炼了革命小将，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七月二十七号，工人阶级主力军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人民解放军做后盾。红卫兵小将和一切愿意革命的教职员工应该欢迎，服从领导。不允许少数个别坏人刁难，要把这些坏人破坏斗、批、改的家伙揪出来。

但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要好好地保护红卫兵小将。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因此，我建议你们也要好好地学习本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这一篇按语。这篇按语是代表了我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的。

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多的，斗、批、改，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很多的。我们还会遇上许多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东西。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戒骄，戒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胜利前进！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

自从去年一月上海工人阶级首创夺取走资派的权的“一月风暴”到现在，整整的二十个月了。现在我们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了。这可以说，我们终于在这二十个月反复的斗争中，粉碎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

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鼓掌）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

同时，我们大家也要紧紧地记住，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以外还有一个台湾省没有解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好地迎接我们现在掀起的斗、批、改的新高潮，彻底地把那些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和他们在各地、各单位的代理人斗臭、斗倒，并且要在我们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组织形式下，清理各个单位的阶级队伍，把那些坏人揪出来。要继续地批判一切反动的思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一些反动的学术权威、技术权威，等等。要精简我们各单位的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精简的人员到基层去，到生产中去。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号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我们应该号召全国的革命人民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所以，现在开始组织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时以人民解放军为后盾，有配合地进入到各学校去，促进那个地方没有联合起来的革命大联合，同各学校、各单位的学生、教职员工中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领导那个里头的斗、批、改。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把自己逐步地、不断地锻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一个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只有一条路线，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要按照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把美帝、苏修的一切反革命谣言击得粉碎，使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痴心妄想化为泡影。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显示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亿万革命群众的无比威力，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

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仗。各级革命委员会，一定要狠抓斗、批、改，并在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使革委会发挥更大的革命威力，得到巩固和发展。

贰、本节简论

一、一九六八年九月初，全国各省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了，标志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第一阶段、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胜利果实之一，是批判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胜利果实之二，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了它在各省市的代理人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

胜利果实之三，是广大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复辟、反腐败的教育。

胜利果实之四，是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大民主、大造反的锻炼。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是经过党的领导和伟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才取得的。

革命动力之一，是有一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正确路线以及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是最根本的。

革命动力之二，是具有极高革命热情的广大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起了先锋作用，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集体农民是革命的强大后盾。

革命动力之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保卫力量。没有解放军的支持和保卫，要开展这样大的民主运动是不可能的。

革命动力之四，是广大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经过革命群众运动的考验，先后参加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行列，并在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是经过冲破各种阻力才取得的。

阻力之一，是各种反动势力的活动，如一些反动残余分子混入各种造反组织，打着“造反”的旗号，进行各种打、砸、抢活动，迫害、杀戮干部和群众，甚至企图乘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阻力之二，是右倾翻案势力的活动，如“联动”活动、二月逆流、杨成武翻案活动等等。

阻力之三，是左倾盲动势力的活动，如“五·一六兵团”的反周活动、“揪军内一小撮”活动、“反复旧”活动等等。

阻力之四，是各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干扰，如山头主义。

四、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和党中央的部署，在取得第一战役的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下一步任务就是要在各单位深入进行斗批改。

那种认为，第一战役取得胜利了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那种认为，由各种群众组织在社会上跨行业地自由串联、到处冲击领导机关、各种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进行武斗、枪战的活动停止了，就等于是群众运动结束了、红卫兵运动走下政治舞台了。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

2008年9月15日初稿

2011年12月2日修改

第二节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壹、本节概述

一、整顿党的组织，征求修改党章意见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姚文元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九大”问题

什么时候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都希望早开，多数主张在明年上半年，至迟不超过明年秋天。

代表怎么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的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认为不一定。他们说：“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的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面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可以先从中央开始，开全国党代大会，有一个纲领，然后才开各级党代会，比较有利”。“毛主席说过，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不在名称，而在实质”。还有些同志提出：“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开人大，可以和九大同时开，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红卫兵说：“要多一些工人和红卫兵代表列席大会”。“最好能吸收一批工人和红卫兵入党”。

王明选不选？“刘、邓、陶”选不选？彭、罗、陆、杨选不选？一致说不选。“王明已经是苏联人了，还能选个苏修特务？”“叛徒都不能选，这是一条大原则。”“刘少奇是叛徒，要进一步批透，清除出去！”也有人说：“恐怕毛主席还是要保留几个反面教员的那就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不要太多，并且先要批透。”对刘的情况，大家比较了解，对邓有些人不很了解。

党的领导机关怎么办？许多同志的意见是：可以参考革委会的形式，把党、政、军统一起来，革委会中有党的核心，执行市委会的职权。好处是一元化，容易联系群众，减少层次，有利于有力地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有一种意见是：将来过渡到正式权力机构，还要分市委、市人委，不然开人代会有困难，由于忙于政务而忽略党务，有的人无处安排。

很多同志主张：在已建立革委会的地方，应当有一个党的领导核心，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可以吸收入党和经常参加党的核心会议。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的通知

1967. 10. 21；中发〔67〕322号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并且指示张春桥、姚文元两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此件可发给连队党支部和地方相应的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刺、哇刺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个派一千

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

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

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象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注：这是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戚本禹记录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生谈准备中共“九大”新党纲

当前是大好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主席很及时地提出了党的问题。党的问题有二，一是关于九大问题，一是整顿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问题。

准备九大和整顿党的组织是分不开的，和大批判、斗批改也是分不开的。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九大最好的准备，最好的整党，对干部也是最好的审查。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去准备九大，整顿组织也不是孤立的。整党是文化大革命中主席提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

征求意见的方式是主席发扬了最大的民主。把“九大”如何公开交给群众讨论，吸收群众的意见，和过去准备大会不同，这样可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使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我们的党，关心我们的大会。各地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不要受过去旧的框框的约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设想这个问题。

“九大”是不是没有准备，开得过早？好象有些地方还乱着，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有些地方还没有整顿党的组织，我看事情不是这样。整个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九大”最好的准备，历次大会也没有这么好的准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扩大会议上谈准备九大党章草稿

十一月二十三日晚）中央要求上海搞一个九大党章草稿。我们考虑准备这样搞：

一、成立一个党章修改小组，十个人左右组成一个组，由这十人负责修改。这项工作由我（即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徐景贤同志三人负责，今天就开始工作。

二、现在革命委员会抽调二百多人，在修改小组的领导下，分别到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连队、商店、街道等单位进行调查，组成四十多个调查组，与那里的群众相结合成立一个修改小组，这四十个修改小组要拿出四十个九大党章修改的方案。总纲和党章从头到尾都要修改。

三、修改小组不派人去，由三军、工总司、红代会自己选择一个单位，在那里发动群众，修改党章。

当前要抓住“九大”准备工作，无论如何不要把修改党章孤立起来，要与当前斗争结合起来，要与恢复党组织生活结合起来，

这是不容易的，有斗争，有人会从“左”，从右的方面来干扰，有些人就不要恢复党组织生活，也有些党员尾巴翘得高高的，怎么样，搞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还要听我的。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对北京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

党的生活恢复以后，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不能马上行使领导，等到吸收一些造反派参加党以后，才能起领导作用。它不能领导革命委员会，只是教育党员，辅助革命委员会的作用。

对党员有三种情况：

(1) 叛徒、特务、坚持错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开除，肯定开除。在过渡时期挂着，不是活挂，是死挂，走资派认识错误的可以给出路，但不能再做领导工作。

(2) 历史问题弄不清楚的，暂时不让过组织生活，弄清了就可以过了，但有问题的就死挂了。

(3) 不起作用的党员，不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连一个群众都不如，不够条件的要劝说出党。可以暂时参加组织生活。

成立临时党支部，可以吸收党员。由党员核心和军管会讨论批准，党员讨论通过以后，经过全体群众讨论通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修改党章小组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

中央《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下达后，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共产党员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一致认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远见，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许多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农村都进行了热烈的座谈和讨论。现将征询的第一批反映通报如下，望各地继续征求意见，上报中央：

（一）大家提出，“九大”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总结历史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修改党纲，党章，整顿和纯洁党的组织；选举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委员会。

许多同志迫切希望，召开“九大”前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出版两条路线斗争史的纲要；修增出版新的《毛主席语录》，把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要指示补上，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二）要以毛泽东思想建党和修改党章党纲，彻底批判和肃清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流毒。“八大”的党纲，党章和刘邓在“八大”的报告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没有体现时代的特点，存在着许多修正主义观点，必须彻底加以批判。“九大”的新党纲、党章，一定要突出毛泽东思想，一定要贯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红线，一定要充分反映毛主席在党的建设方面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九大”应该成为党的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有些同志建议中央现在就成立新党纲、党章起草委员会，在“九大”召开前，把党纲党章草案发给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讨论。

（三）建议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我们党从建立以来，一直就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规模更加壮阔，斗争更加深入，意义更加重大。“九大”要大讲特讲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并加以总结。要编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材料，要编印毛主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用以教育党员和干部，帮助大家正确了解党的历史，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了解毛主席在我党建设上的

伟大光辉作用。有的同志建议中央作出新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代替有错误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四）建议整顿党的组织，改革领导机构，以保证党的纯洁性，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成为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有的同志说：“恢复党组织”的口号不妥，“改造党组织”的口号也不妥，叫“整顿党组织”比较合适。整顿党组织的工作，有的建议“九大”以前进行，可以同为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有的认为等“九大”开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再进行整顿较好。

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应当根据中央指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组织生活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要作自我批评。要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审查党员，为召开“九大”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讨论中普遍建议，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应当发展一批，清洗一批。把那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优秀工人、贫下中农、革命战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吸收入党，以增加党的新血液。把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绝隐患。

不少同志很关心共青团的问题，希望“九大”就此作出决定。

（五）建议用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要老、中、少三结合，名额应比“八大”多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才能的新生力量应选入中央委员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再当中央委员。如果中央委员会要留“反面教员”的话，第一，“只能很少很少”，第二，必须是“认罪好改造好的”。

“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王明之流绝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政治局特别是常委中，不能有反面教员”。同志

们表示，要不要留反面教员，毛主席会考虑，我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

（六）关于“九大”开会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这样，明年国庆节上天安门的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提出如形势发展快，可以明年上半年开。

（七）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规模要大，人数要多，“开个万人大会，坐满人大大会堂”。代表中要体现三个“三结合”，即：军队、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老、中、少三结合。要多选一些部队、工人、贫下中农和红卫兵的代表参加大会。

刘、邓、陶、彭、贺、彭、罗、陆、杨能不能选为代表？一致认为不能选。“要让这些人当代表，下面百分之百通不过”。“对这些人不是选不选他们当代表的问题，而是讨论对他们进行处理，把他们清除出党的问题”。王明是特务、叛国分子、死不悔改，不仅不能当代表，而且应开除党籍、国籍。

代表产生的办法，多数同志主张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各方协商的方法产生。中央了解的，由中央提名，交下面讨论通过；中央不很清楚的可与地方协商，上下结合，内外结合产生；部队系统由于党的生活一直保持正常，仍可采取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有一条原则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一定要选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党员当代表。

（八）关于大会的开法，多数同志认为采取由上往下开的办法较好。先开“九大”，制定新党纲、党章，再开各级党代表大会，这样，“上面有纲领，下面有方向”，“可以保证地方党代表大会的质量”。

（九）大家提出，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党和国家相同的机构可以合并。层次重迭、人浮于事的现象必须改变。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机构一定要精干，这样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反修防修，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北京红代会成员时的讲话

江青讲话

同志们讲，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一点，我认为也是水平高的。因为，如果不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搞清楚，怎样整党建党，怎样解决党群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

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

康生讲话：

第一，恢复和整顿党组织要走群众路线的。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二，恢复什么党，建什么党？党员大多数是好的，健康的，可能有少数会翘尾巴，要作好思想工作，要办学习班，抓活思想，抓斗私批修，要结合起来搞。

三、什么人可以恢复，什么人不可以恢复，或者暂时不可以恢复？如主席指示所说的，特务、叛徒、匪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决不可恢复，如果怀疑历史有问题的，要缓一下，了解清楚了再说。

四、什么人可以入党？恢复与发展必须结合起来。

五、党组到底和革委会关系是什么？有人说要突出领导，大多数人说要过渡。

六、恢复了干什么？恢复了也要搞斗私批修，搞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斗批改，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逐渐过党的生活。不能变成刘少奇黑修养的，听话的，要成为真正有革命朝气的队伍。

七、红卫兵与共青团的关系，有人认为工人农民中红卫兵少，或者根本没有，主张恢复团。红卫兵有的说可以存在，有的说可以不存在了。

所有这些问题，请你们讨论，本着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讨论一下，搞个报告。

周总理讲话：

我们有些不安的是，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与工人接触大大少于大中学生。第一张大字报出来时，学生起来快，需要学生点火一下。后来工人起来了。到打硬仗，搞大批判了，因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行了。大中小学的来了，要好好向工人学习。

大联合问题，要斗私批修，制止武斗，封存武器，这样就要考验你们是否是真正造反派。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可以联合，但都需要从学习开始，首先要斗私批修。北京现在工厂走在前面了。文化大革命是政治革命，工人应起带头领导作用。在学生方面，我们花了好多精力，就是慢，不是说学生没进步，红卫兵我支持你们，应好好向工人学习，只有靠本单位群众，才能搞好。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现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发下，望你们征求意见，并于元旦以前将意见报告中央，以便再作修改。

（发至县团级）

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党中央《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下达后，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映很激烈。一致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一指示非常及时，非常英明，是对广大党员的最大爱护和关怀，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一）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问题

同志们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绝不是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老一套。而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来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把我党建设成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所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原则。

（二）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的思想工作问题

在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党员和非党员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志的思想教育工作。同志们建议：

(1) 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觉悟，解决思想问题。

(2) 广泛发动群众讨论，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改善党群关系，彻底打消党员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怕党员报复的思想。(3) 有的党员犯了错误，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

(三) 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条件，范围和政策界限问题

具备什么条件的单位才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多数同志认为，根据中央指示，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那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1) “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2) 对有叛徒、特务嫌疑而未作结论的，绝大多数同志意见也应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待问题查清后，再考虑是否恢复。

(3) 凡是犯有严重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革命群众意见很大的党员，在他尚未承认错误，尚未向革命群众检讨并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以前，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吸收新党员的条件是什么：

综合大家的主要建议如下：

(1) 建议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为根据吸收新党员，注意阶级成份，但也要看思想政治表现，看是否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2) 根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运动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以吸收入党。

(3) 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特别要注意吸收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要彻底批判“驯服工具论”，彻底批判吸收党员只根据什么“听话”、“生产好”、“业务好”等等，而不重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革命大节的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4) 目前有一批预备党员未转正，有的够条件已超过预备期的可以转正。

清除党员根据什么原则：

(1) 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统统清除出党。

(2) 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3) 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或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

(4) 长期作预备党员不够转正条件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5) 有些单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根据群众要求开除了一些党员，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开除出去，不符上述条件的，经过教育，并取得革命群众谅解的，应恢复其党籍。

(四) 关于建立党的核心小组问题

关于党的组织领导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在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来领导；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核心小组必须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充分酝酿，反复协商的办法产生，并报上级审批。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在展开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纲党章的运动。他们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以三种形式结合进行：(1) 组织了市一级的修改小组；(2) 分别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公社、连队、街道选择一批点，组织了几十个群众性的修改小组，为市的修改小组提供参考性的修改稿；(3) 市一级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驻沪三军自己选择一批基层单位，展开修改党纲党章的讨论，广泛听取和集中群众意见。

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通过修改党纲党章的热烈讨论，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破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有力地推动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成为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的思想基础。

中央认为：凡条件可能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区，都应参照上海的经验，组织党纲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集中群众意见，提出关于修改党纲党章的方案，并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以前将修改草案上报中央。目前还不可能全面进行这项工作的地区，也可组织一些力量作重点调查研究。

这是“九大”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望你们接到通知后，认真讨论，并将你们的部署电告中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生谈中央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两个文件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可以授权在一些有条件的单位进行发展新党员的试点工作。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的批语

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 100 多人就够了。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一，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的单位中进行：

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标准。

三，关于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

四，关于新党员的审批。

五，凡属下列情况的单位，不得发展新党员：

六，在发展新党员的同时，要对现有的党员继续加强教育。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林，周及文革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九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发《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现在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风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刘少奇审查定案报告上的批示

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这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整顿和发展，是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坚持了、捍卫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毛主席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来自党内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了必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现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以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首先是工农兵的绝大多数为出发点，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让共产党员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极其剧烈、极其复杂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伟大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反革命分子，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正确对待群众，并且经历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学习正确地识别和处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当前整党工作中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的问题。

为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还必须有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经过更新的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要选拔那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较好的、真正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朝气的同志到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来，逐步形成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

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反对保守主义。有这样一种人，对于从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新事物，总是百般挑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们总要用某种成规旧习来阻碍革命新秩序的建立。

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二、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周恩来在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今天开的是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数商定的是一百三十三人。

这次出席的中央委员，原有能到会的为四十位，补选十位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黄永胜同志、许世友同志、陈锡联同志、张达志同志、韩先楚同志、潘复生同志、刘建勋同志、李大章同志、吴德同志、刘子厚同志。中央委员原来是九十七人，现有五十人出席，过半数了。其他能出席的还有九位候补中央委员。

其次，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央文革今天出席的五位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参加碰头会成员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这七位同志。出席这次次的一共十二人。

再次，军委办事组的六位同志：黄永胜同志、吴法宪同志、叶群同志、李作鹏同志、邱会作同志、刘贤权同志，出席这次会议。

这次出席会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现在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了与上面重复的以外，每省出席两位，共五十二人。

人民解放军的大军区各出席一个人。有的大军区同志在前面已兼有别的任务，也就没再来人。所以，全国十二个大军区只出席九位同志。

最后一项，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出席了四位同志：郭沫若同志、李天佑同志、曹轶欧同志、郭玉峰同志。

总人数合在一起，重复的不算，共为一百三十三位同志，这是出席会议的全体成员。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

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

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

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你是很熟悉的。（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付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山东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

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

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这个人不行了。

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

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江华这个人，我是保过他的，许世友同志，你也是保过他的。霍世廉揭出他的问题，看样子不能保了，你还保吗？（许世友：主席说不能保，就不保了。）

有些事我看我们工作没做好。比如徐海问题，那里一个南京，一个济南，不怪两个军区，就是我们没作工作。现在办学习班，就好转了嘛。军队内部分成两派，野战军也分成两派。有几千人跑到南京，几千人跑到济南。要把人叫回来。（许世友：我有错误，没听主席的话。）

军队是可以讲清楚的。军队两派也好，三派也好，抓紧了就好解决。比如广西吧，也是两派。野战军地方军有两派。工作做好了，军队也就合作了。军队统一了，什么“4. 22”也好，“联指”也好，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当时不是说要××吗？我说不要这个办法，我们出布告“7. 3”、“7. 24”布告。这是一个发明。过去也搞过十条、八条，也不在群众中宣传，群众也不知道。你不宣传，群众也不懂得。你怪谁呀？也不办训练班，办训练班是从内蒙古开始的。内蒙两派那么对立，来北京办训练班，一个月就解决了问题。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党政权。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可以作工作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中央各部门，地方有二十九个单位，地方是徐州、保定、重庆，还有些问题，还得解决一下。

四川可打得厉害，双方都是几万人，无线电指挥，有什么不得了？天塌不下来。谁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万人？中国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错放了就是了。你说问题不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张国华：还剩五百人，都是坏人。）你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 22 年，从 1927 年到 1949 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比如，浙江省的“红暴”派，说来北京观礼的人数少，自己跑来 21 人。“省联总”要把他们抓起来，用绳子捆回去。清华工宣队做了工作，这次工作做好了，双方做了自我批评，不争了。（周恩来：看了放焰火，都高兴地回去了。）浙江两派也是工作问题，不是别的。

你们把九大的问题先谈谈，在尾巴上另外再谈谈这方面问题。

还有一个多中心论的问题。这是从总参谋部杨成武那里开始的，搞了一个“大树特树”，其实就是树他。

后来，北京学校都分成两派，都有武装，谁的话也不听。一个学校只能有一派，有两派的就多了一个。还不是多中心？工厂也分成两派，北京有例子，很多。

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了局势。北京八十万工人，现在才掌握了形势，办法就是工人开进学校去。那里知识分子成堆。要掺砂子。他们是粘土板结了，不透气，不长庄稼。

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9.16”炮轰聂荣臻。这个机关里谁办的？七机部也难办，听说有十万人，就有七万人是大学生。国防科委“9.16”他们炮轰你，还是很客气的。还得开工人宣传队进去。有些地方，就用这个办法，开宣传队进去。

就讲这么一点。

国际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讲。

（向林彪）你讲一讲。

（林彪：主席讲得很多，总理讲得很多，我没有什么讲的。）

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呢？（周恩来：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哪个是李德生？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那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现在到处分派，有“8.15”、“反到底”、“支派”、“踢派”。清华有“井冈山”、“4.14”；七机部有“9.15”、“9.16”。

到处都有这些事情，我们开始也没有想到。南京三派，后来又冒出一个“红总”，势力那么大。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1. 1. 1”。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

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

〔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原件注有：“康生、江青、文元、富治同志十七日在第一小组会上的重要插话要点（记录稿）”。〕

康生同志：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十六日前就酝酿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文元同志：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徐向前二月十三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文元同志：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时内蒙不是在闹嘛！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撒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那个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

文元同志：徐向前同志的口号，同谭震林和陈毅、李先念同志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

康生同志：捉杨勇、廖汉生也是他们叫搞的，北京军区也是个军嘛，那还不是乱军！

江青同志：还有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

康生同志：徐向前说“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徐向前平时不讲话，一到军委文革好厉害！

文元同志：自己暴露自己。

富治同志：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同志：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真乱军，不是保护老干部。

江青同志：真是乱军，刘贤权也叫人捉起来了。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他们搞的那个文件说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这样，中央文革变成“救火”的了。

康生同志：“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

富治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二月十六日总爆发了。“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提出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就是“二月逆流”时争论的中心。上海工人阶级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出动支左，给左派很大的支持。走资派看到要灭亡了，通过一些人出来替他们翻案，做垂死挣扎。

康生同志：陈毅同志说我们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陈在怀仁堂说延安整风，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不是很积极吗？现在还不是反毛主席。总理不是挨了整吗？康生不是也挨了整吗？他们完全否定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说，到底谁反毛主席？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大家质问他， he 说是讲的红卫兵，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是红卫兵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红卫兵吗？他的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

陈毅同志这些话是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延安整风、审干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统一了全党思想，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全国胜利，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毛主席领导，否定全国革命，否定解放战争，这话很严重。按这样讲，只有请王明来当总书记，把张国焘从香港请来，由陈毅同志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那对你们会怎样，主席讲伯达同志就杀头了，康生同志就充军了。

延安整风毛主席讲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准备。事过二十五年他们要翻案，所以，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十一中全会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陈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老实，他不是针对红卫兵，是针对十一中全会，针对林副主席的。余秋里同志讲你们不道歉，我就不检讨。（文元同志：主席说的对，举了手的，有不赞成的，有种说法叫“利令智昏”，站到反动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喊大叫，余秋里凶的很。）

（谢富治：阶级本能，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谢富治同志不断插话批评他们，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逼、供、信。

江青同志：李先念同志替“联动”说话，对“联动”是什么态度？骂我们抓的，我替谢富治同志顶着，那时他们冲公安部，冲公安局，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联动”是群众扭送的，主席叫放掉，我们连夜给他们开会，就放掉了。可是“联动”每次都骂到我和伯达同志头上。我们研究过抓九个，第九个就是董老的儿子董连国（编者：似应为董良翮）。“西纠”后期，有坏人利用青少年不稳定，到处破坏，打人太残忍了，觉得搞几个人煞住邪气。我们是经过讨论的、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董连国是主席叫他自动投案，总理告诉董老的。

富治同志：“联动”其中少数人，作了不少坏事。广大革命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几次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下了好几十个。“联动”也多次冲击公安机关。故“联动”问题完全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中央文革不仅没有提出捉人问题，相反的倒问过几次不要多捉人，这件事我最清楚。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将“联动”一律放掉。

文元同志：阶级感情问题。为什么革命群众受到残害不哭？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批判你要哭，是什么阶级感情？

富治同志：为刘邓司令部垮台的悲哀。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把反动纲领统统搬出来了，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为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翻案。

康生同志：有一个问题应引起同志们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十月一日林副主席讲话也提到了两条路线斗争。他们说，十三期社论开始老干部被整，干部靠边站。十月五日紧急指示是对军队的，当时军队文化革命落后了。他们说这个紧急指示错误是主要的。

江青同志：十月一日陶铸的女儿由上海到了北京，被陶铸的老婆带到天安门上，向主席告了一状，林副主席感到被动，搞了个紧急指示，军委、中央文革都讨论了的。放“联动”，连“西纠”的九个也都放了。“联动”的刑具非常残暴，完全是资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的刑具。

文元同志：他们就是为这些联动头头被批判而流泪。

富治同志：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谭震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江青同志：还有“三和一少”呢！那是王稼祥搞的。

富治同志：“三和”，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一少”，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援助要少。

刘少奇抬出陈云同志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

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三、周恩来谈几个老师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十月下旬，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几个元帅的问题

〔时间：下旬。此为传达周恩来讲的话，夹有传达者的话。〕

1、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九·一六”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好。

2、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3、“九·三”命令后，不让军队院校到北京来，是违背毛主席的串连指示的，这是叶剑英、聂、徐、陈几个军委付主席干的。

4、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象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5、叶剑英派工作队，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刘少奇、陶铸也支持肖望东。

6、66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付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付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付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

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7、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

8、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9、许立群（总政付主任、干部部付部长一抄者注：似误。许为原中宣部副部长）的问题已经揭开，但叶剑英不报告中央，许立群说生病了，叶就想办法让他住进医院，保护起来。

10、戚本禹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因为他们压抑群众运动，所以军事院校冲中南海。力量不足，和地方上的红卫兵联系起来冲。以后发展到全国冲军区（8月7日冲沈阳军区，占领了军区大楼，8月8日冲广州、福州、成都、济南等十多个军区）。他们倒打一把，说中央文革搞的。他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说中央文革不出来讲活。

11、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

12、在他们做了两次讲话的检查后，由中央文革的同志讲了话，才让他们过了关。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13、67年1月的高干座谈会（军以上干部参加的）林付主席不知道，他们不报告。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怪中央文革，叶剑英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满意。

14、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

15、讨论“八条”时，他们和中央文革有争论，争论完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当时总理就指出：“这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看成是另一圈了。”

16、“上方宝剑”问题，八条出来了，叶剑英说：“有了上方宝剑就好了。”这是非常错误的。

17、不听毛主席的告诫，毛主席在二月十四日亲自找他们讲过：中央文革是正确的。但他们在二月十六日还大闹怀仁堂。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又批评了他们，严肃地指出：你们把王明找回来，把张国焘找回来，把刘少奇找回来，让你们去搞。但是他们还是不听，六六年十月高干会议上就打招呼说：“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但是执行又是一回事。”是给他们打招呼的，但是他们听不进去，是世界观问题，阶级立场问题。

18、两个元帅带头大闹怀仁堂，叶剑英在一个小时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聂借口保护干部子女，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际上是关心“联动”。浙江军区张学伦的儿子领着省军区、省委、人委的高干子女组成一个连，到处抓人、打人。中央要他把他的儿子送来，他不送来，给粟裕要电话，要粟裕同志保。粟裕同志没理他。高干子女作坏事，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立，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徐鲁滨已经结婚，结果男人是大资本家的儿子，要她离婚，她和另一个要好的一齐要逃往香港，从广州把他们捉回来了。

19、四川捉人问题。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甘渭汉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

20、2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严肃地指出他们的严重错误后，又开生活会，他们毫无无产阶级感情，只有一个人说：看样子要检查，元帅、副总理都是如此。

21、赵永夫事件。赵永夫是付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二十三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八·一八给围起来，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说是林付主席祝贺的。二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到不对头，林付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

22、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23、军以上干部会不对头。林付主席于三月二十日作了报告，就是制止他们，指出：“不要提带枪的刘邓路线”，以后怕坏人钻空子，就把这段去掉了。不是林付主席指出，还有许多军以上干部借对“八条”的错误理解，犯镇压群众的错误。是谁在保护老干部？

24、叶群同志有一次听叶剑英说：“从来没有见过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兵诅咒战争的。”他把群众当成敌人，自己把自己同群众对立起来。

25、他们镇压群众后，有些学生在三座门静坐几昼夜，要找徐向前辩论，中央让他去接见群众，他不去。有的同志说：“外面冷得很，不要把他们冻坏了。”徐向前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对群众就是这样的恨。以后还是陈伯达同志去作工作，徐向前还说：“这是军队的事，谁要你管？”并说：“我用不着你们管，我没有什么错误。”江青同志是全军文革的顾问，但是他们开会不通知她，所以江青同志说：“他们把我开除了。”

26、聂荣臻同志不但对9·13，9·10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

27、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28、“多中心论”是聂荣臻搞的，开“学代会”（抄者注：应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选代表，硬要有一条拥护聂的方能当代表。“9·16”是反聂的，因此都不能当代表。总理发现了这件事，认为不对，要他们纠正，又补选了四十个，其中只有“9·16”的两个，而且这两个也是“9·16”中的“9·15”。以后两派打得没办法，总理为此事专门开会解决，又选了一些进去。但聂仍旧压“9·16”，聂说选举不知道，聂是国防科委党委书记，党委发出的通知他怎么不知道。

研究体制，他弄个×委，十八个院，160多个研究所，300多万人，还要把过去合并的研究院、所拿回来。他还把南昌的两个五万人的轻机厂，不经总理批准，也不报告总理，自作主张地改做了试验工厂，还假造是林付主席批准的。这两个工厂一个开了庆祝会，一个工厂把生产改为试验线了。他还派人到处挖墙脚，青年人就是愿意归科委，因为这样就成了解放军。老工人有家口，就不愿意动，闹得思想混乱。聂检查说他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9、对邱会作同志，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邱会作同志就是去年林付主席“八·九”讲话说的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付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30、总理讲，小组会大家对他们的检查很不满意，他们无所表示。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

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我要讲的问题，有以下六点：第一个，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个，是文化革命的胜利、意义和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第三个，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线、做法的问题；第四个，是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第五个，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个，是今后怎么做法。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四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听了林彪同志的讲话，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发表。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林总都讲了，同志们讲了很多。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

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议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付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

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1927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

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年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毛在别的人讲了几句之后又讲：）

注意政策，注意稳准狠中的准字。总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的，狠过了头的，也有太稳了狠不起来的。

比如上海同志讲，还存在有“老大难”的问题。几百万人的城市，不平衡状态哪里都存在，不平衡是自然现象，北京也是。

对学术权威不要搞得过分。

对老同志犯错误的，条件不那么符合，用协商的方法，选他们当“九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大会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基本部分能反映工农兵意见就好了。

你们谁有话，谁就讲。（当时李、朱、陈表态，略）滕代远搞湖南农民运动，你当什么县的委员长，叶得会就是在你手里杀掉的嘛。这个人是前清的翰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我看杀掉不那么妥当。你们各省都有，我总想找个机会给同志们讲讲，就这一次讲吧。

对大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出路。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还有×××，也是权威。这些人我们是保的。对这些人不要过分，会议上讲一讲。个别讲不行，报纸写社论也不行。一写他们就过关的。不批不行，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校长不一定当了，官不能作了，教授的头衔还得有，好领薪水。广东有个杨荣国、

赵吉安这两位是尊孔夫子的。拥护孔子的，在坐的还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尊孔的。你那个书上还有孔子的像。冯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向孔夫子。不赞成说孔夫子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范老把孔子也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

人家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不赞成。天津有个杨××说老子是唯心[物?]论者，我就注意了这个人，调查一下什么人。原来是个大右派。上海周谷城、刘大杰，刘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周写了中国通史。谈家桢是搞遗传学的，你们斗得很厉害吧？这个人是搞摩尔根学派，改了可以用，不改也可以。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国也没有几个。苏步青，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讲的就是这一点。

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准字。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地球照样转，胡弦不能拉得太紧了。对学术权威要注意，交给学生七斗八斗他就没命了。薪水扣了之后，有的只给20元，多的40元，他一家老小要吃饭嘛。我们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民主党派，有人提议不要，为甚不要？不如要一些好。因为问题决定不在民主党派，而在共产党里边。民主党派就是有问题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不出刘邓陶之类，民主党派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与其要他秘密地搞，不如让他公开地搞。对政协、民主党派现在还没有取消。至于是否要，这次还来不及讨论。这次有人提不要，考虑一下，下次会议再议。要不要，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派出作工作的人，也不太好。比如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少数人研究帝王将相，为了反帝王将相，要搞一点。比如科学院、大学里等。关于大学开社会科学学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十八、九年还没有解决，没有什么好结果。读四、五年大学，搞社会科学的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还不如劳动锻炼几年。先搞阶级斗争，再回去搞两年。大学还有两、三年，不是五年吗？已经两年了，再搞两三年就走光了。我相当赞

成斗、批、走。总要走吧。这批大学生都到工农兵中去，这是帮助他们的方法。他们没做工，也没有种地，大学两年不招生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上海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还有北京的？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尉站起来后问了年龄。）哪一位是刘殿英呀？（刘站起来）你多大年纪，（刘答：32岁）你好像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三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38岁，藏族）你会讲汉语吗？（达洛站起来答：“会”），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答：真藏族）

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龙站起来）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作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嘛呀？结果搞的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还有陈永贵（陈立即站起来），你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陈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冼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冼答：不认识）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冼答：都是兵）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青海的张××，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你在哪里？（张答：四川达县）多大年纪？（张答：52岁）没有那么大吧，虚报年龄。

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在坐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嘛，没有那回事。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就没有好人了，陕西出了个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不少，总理认识吧？（周恩来：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不好。开始是他，后来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要以为

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坏人是有的，开始不是以坏人面貌出现的。井冈山两个师长范××、杨××，还有两个团长都叛变了，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一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不过邓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

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

1968.10.31；中发〔68〕152号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幕，于十月三十一日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就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份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妄图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他们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担负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份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死

不改悔的走资派，脱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伟大推动力。它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国防，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乾淨，全部消灭之。

全会认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矛盾，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

伟大的斗争高潮。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苏修拼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全会相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会很高兴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对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恐惧的，只是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附件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起草的。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提议，将这个草案“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认为这个草案，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比较简明扼要，基本上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全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印发全党，作为讨论的基础。然后，由中央根据讨论的意见，作出修改，提交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要求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级党委，领导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认真讨论。这次讨论，应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路线，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结合起来，成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强大动力。

对这个草案的意见，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种分别集中整理，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底，十二月中，分两次报告中央。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四、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有关传达十二中全会的两个报告

1968. 11. 12；中发 [68] 156 号

毛主席批示：此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

十一月十二日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十一月九日“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和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一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两个报告所提意见，请你们参照执行。

附件一：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

附件二：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告

一九六九年一月，毛泽东

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的批语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

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贰、本节简论

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为九大作准备，代表的产生、政治报告的起草、党章的修改、刘少奇问题的处理等等。

二、八届十二全会的小组会上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右倾思潮的批判。这并不是什么由于少数人搞阴谋故意整人。首先是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一九六八年四月，刚刚处理完杨成武事件，这件事显示出在党内、在高层，确实存在着一股右倾翻案、右倾分裂的势力和思潮。同时，在一些省市又发生了所谓反复旧的风潮，其矛头是对着新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其次是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大会的需要。尤其是即将在九大上新产生的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在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统一。

三、关于刘少奇的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这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必须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指出：

“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这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

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

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版，第 26 页。）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一九六七年三月初，党外人士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这里说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得很好。”

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是指刘少奇。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级。

一九六七年五月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刘、邓、陶及其同夥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他们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使叛徒、特务得以混进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机关，长期窃据要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这些叛徒、特务揭露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引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要我们的。”

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毛泽东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谢富治讲话

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这个工作必须持续下去。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在北京市代理人彭真、刘仁是一伙叛徒、特务，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坏人，许多单位的坏人就是在他们的包庇下隐藏下来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要搞彻底，必须紧紧结合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他们的代理人。不要光看着本单位的几个坏人，这样就可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对准被这些家伙包庇下来的特务、叛徒、地富反坏右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左右，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说：现在我们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了。这可以说，我们终于在这二十个月反复的斗争中，粉碎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内奸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实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在刘少奇审查定案报告上的批示

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指出：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份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夥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二）关于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1，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

第一，根据杨剑雄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风+“扬”右侧）、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搞乱。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作为刘少奇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确实是不足的。但还有刘作衡（刘少奇的胞兄）的亲笔供词证明：民国十四年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押在监狱处廿多天。赵恒惕送他一部书并要刘少奇出狱后不在湖南搞，离开湖南。刘少奇答应不在湖南搞，出狱后就走了。

第二，但为什么刘少奇要刻意回避与杨剑雄的关系呢？

刘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宁乡县委转公安局的亲笔电报说：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

而事实却是：

一九二五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时，杨剑雄去看守所会见了刘少奇，后来又根据刘少奇的要求在长沙刘少奇的居处会见了他的妻子何葆珍。刘少奇与出狱后与何一道到杨剑雄的家里表示感谢。

一九二七年正月，杨剑雄又在武汉会见过刘少奇。

杨少岩证明：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杨剑雄供词称：民十六年正月。我在乡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国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他的家里）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诉了我乡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杨剑雄给刘少奇的信。并且还向刘少奇介绍了两个所谓“国术专家”。信封左上角批注的“杨剑雄介绍二位国术专家”，系王光美亲笔。此信证明，解放后刘少奇还知道杨雄的情况。

一九五一年，杨剑雄到北京找过刘少奇。

刘作衡交代：1951年正在土改时杨剑雄是个大恶霸地主在家站不住要找刘少奇我说以前你保过刘少奇要找你去找。

难道说这就是刘少奇说的：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吗？他这样说究竟是企图隐瞒什么呢？

2，关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内奸活动”问题

关于刘少奇在武汉时期充当内奸活动的证明材料，主要是由丁觉群、董锄平、成柱周等人在一九六七、六八年提供的。据说，后来这些人又有翻供的表现。

这个问题只能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吧！

3，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问题

第一，这个案子证明人比较多，其中：

孟用潜，他原来供认刘少奇和他自己都自首叛变，后来又翻供了。

丁基实，他提供的是听别人说的材料，后来复查时翻供了。

关辅金，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的助理技师，提供抓捕、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

徐廉奎，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的庶务主任，提供抓捕、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

陈元祯，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警察商埠三分局警察，原来提供在工厂审讯刘少奇一案的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关庆云，一九二九年充当奉天省会公安局行政科代理科长，提供省会公安局白局长谈刘少奇一案的一些情况证明。

刘青第，一九二九年任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原来提供审讯情况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刘多荃，一九二九年我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原来提供张学良处理这个案件的证明。这个人在复查时翻供了。

关辅金、徐廉奎、关庆云三人在复查时已病死，如果不死，他们肯定也会翻供的。如果说，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可以把假说成真；同样，这些人在复查中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也可以把真说成假。

仅有口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真凭实据。

第二，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当时刘少奇一案究竟是一个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还是与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

根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满洲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报导

共产党员潜入奉天纱厂秘密接头时将其一夥逮捕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

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

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

纱厂支部完全溃散,原和少、孟同时被捕之某工人同志,判罚四十天拘役。该同志十分简单,咬出许多秘密,决定开除其党籍。告密之崔某当然开除。

一九五二年刘少奇要王光美抄写的简历底稿。

刘少奇将一九二八年八月说成一九三零年春,将“被一叛徒出卖”,亲笔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

敌人的满洲日报,中共满洲省委两个报告均记载了奉天纱厂党组织被破坏和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的问题。刘少奇和孟用潜是由于叛徒崔凤翥与敌人勾结,支部书记常宝玉叛变出卖而被捕的。事实说明:敌人当时已经知道,这个案子是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而不是一般的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

一九五二年以前,刘少奇在自己的简历中也明确承认是“被一叛徒出卖”,为什么到了一九五二年又要改成“在罢工中”被捕呢?

刘少奇自己很清楚;如果是“被一叛徒出卖”,那就是一桩有关共产党的政治案,而且有人证物证,敌人就不可能轻易地把他们放出来;如果是“在罢工中”被捕,敌人又“找不出证据”,那就是一桩与共产党无关的罢工案,拘留一、二十天就可以放出来了。

那么,这两种不同说法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2008年10月7日初稿

2011年12月15日修改

第三节 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日到十四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

第二阶段，从十五日到二十四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

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分组情况如下：

二十九个省市，十一个大军区共四十个。然后是中央直属单位，政府直属单位，军委直属单位，海军，空军加一起共五个，共四十五个单位，分开小组会。小组很大，上海 80 多人，有时分开几个小组来开。

交流彼此经验，总结经验，就开大组会。大组是六个，东北三省加一个大军区加一个空军一个大组，华北两个市，三个军区，加中央直属单位是第二大组，华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加济南、南京、福建三大军区是华东大组，第四是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加上广州军区成为第四大组，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河南、湖北加上兰州、武汉两军区，加上海军区成为第五大组，贵州、西藏、政府机关直属、军委直属、昆明、成都两军区、新疆为第六组，共六个大组。

一、代表大会的第一个阶段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

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

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他如此强调团结和胜利，显然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共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二、三部分。

这个报告，用很大篇幅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随同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登上主席台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团主席，林彪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一）林彪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

（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一百七十六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

同谢富治等的谈话

第一、历史问题：

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有一个倾向问题。有时讲倾向，有时讲潮流。有时讲思潮，有时讲浪潮。在一个倾向下就蒙蔽许多人。只想到合作，没想到分裂。破裂了，一九二七年又来了一个倾向：只要工人农民，不要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其他党派就不行了。

教条主义主张，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小党派比国民党还坏。这就是还有欺骗性，不承认有第三势力。在这种势力下，又产生了“左”，其中也有右。这是十年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又来了一个高潮。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戴国民党的帽子。很多人不理解，想不通。其实我们是独立的。以后王明回来了，带来了国防路线，形“左”实右。（××插话，当时主席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时彭德怀很坏，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很感兴趣，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在太行实行了土改，三起三落。）后来，马歇尔来了。搞三人小组，说什么和平。实际上他们是帮国民党、蒋介石的。我们就准备打。我们准备一段时间，其中的就是准备打。皖南事件，有人认为是主流，实际不是主流，主流是抗日。八年抗战我们没上当，有困难，也有斗争。全国胜利以后，请程潜到北京谈判，他怕把他整垮。我去接他，出他意料之外。我到北京只接过这样一个人。

一个时期总要有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掩盖着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赎买政策。没收资产阶级不会敲锣打鼓。赎买政策列宁早就提出来了，列宁逝世得早，在苏联没有实行。

第二、落实政策。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人的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人。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万多人，抓了几百人。宣传队进驻以前，不交待任务，进驻以后，没总结经验，不找他汇报。北大三进三出，这样，对军队也不好嘛！63军就不要走了。这主要是领导不下去，层层听汇报，刘兴是63军政治部付主任，七个月来还没听他们汇报过一次。我原以为远的不好抓，没近的地方工作好做。但也不一定了，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付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

十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有些专案组不分青红皂白，关人容易，放人难，就是怕人家说右倾。四二年延安整风时，不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么！周兴抓了很多，不是都放了吗？但是很被动。重大特务案件，也是大部不抓，抓一两个就行了。右派分子不要随便戴帽子，帽子在我们手里，他要造反再戴嘛！戴帽子不是右派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家人的问题。为什么把他们推到敌人那里去呢？外调的太多了，收获不大。你关的人太多了，统统放出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过一两年也会好的嘛！聂元梓改了，就不错了嘛！

二月逆流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跳，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他们反对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象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还是一肚子气呢。

每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资产阶级是否要搞反复呢？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

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搞的时候目标要小，要集中，要具体，抓典型。当然有个过程，关人才不是好办法呢。我们历来不赞成。军队有禁闭，现在还有没有？（答：没有了。）不见得。北京部队还有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讲讲自己，如实行对犯错误的人分配适当的工作。对延安整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少数人翻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是否有人翻案呢？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总是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他们的能量很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第三、准备打仗。

要准备打仗，东北、西北、华北都要准备。准备好了，不打也没有坏处嘛！要准备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原子反应堆。日本投降时，是他们没有根据地，国小。二是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都被他们打完了，但是我们下面的人还要打。

苏修兵很穷，纪律不好。苏军进东北时，纪律坏透了。苏修兵一年只发一套衣服，还要人家拿钱。他们一是要东西，二是要女人，三要面子。珍宝岛，他们炮打进我们后方七公里，我们不反击，给他面子。打进七十、七百、七千公里，到郑州才好呢。我们就有办法了。割韭菜，但不是拨韭菜。打起来，我们发动，他们也发动，但他们不会发动。红卫兵很勇敢，很听话，凡是过去学校打得厉害的，这些学校红卫兵就听话。这次分配工作，军队不要，工厂不要，地方也不要。到军队开始不会出早操，睡不起嘛！后来比谁都起得早。开始他们不肯背背包，训练一个时期体力也有了。

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周恩来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的批示

拟同意送入二零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十三日，毛泽东召见大会秘书处，各大组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北京市小组有个简报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对这个问题，我已谈几次，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理出来，但不能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搞得差一些，搞得差一点的不那么准，扩大化了，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总理：应谈抓敌人，抓坏人嘛……）

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种在历史上不少，可以看看，我们的党发展的历史。（总理：不要只看到当前清理阶级队伍中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这是毛主席和大家谈话的中心和关键。）历史上很多经验教训要经常讲，时时讲，这样可以防止以后不犯少犯这种错误。

可以看看党发展的历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 1923 年召开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共合作，就是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刘仁静反对国共合作，张国焘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来张国焘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刘仁静变成托派，当了反革命，张国焘跑到加拿大去了，与王明合作，搞黑党，刘仁静是托派，是中国托派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他现在北京，关起来了。三次大会决定国共合作是正确的，但这种主要倾向掩盖了党的独立性，独立自主，国共合作掩盖着另一种矛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合作，不许斗争，不许批评国民党，批评是不行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主要是合作，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有的叫、有的不叫。河南省的李维汉就不叫，李维汉在马日事变就仓皇逃跑。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所以广大群众运动起来了。工人、学生、农民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特别是海陆丰，西部乡村，广西省东南等，但是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有我们的代表，但实权在国民党军阀手里。如果说我们当时在第一次大革命最后搞了些军队，一是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先锋队，林彪在这里，发展成两个师，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另一是广州暴动。

（总理：南昌起义大方向是对的，因为他向国民党反对政府开了第一枪，但是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不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搞土地革命。第二个是依靠外援，不自力更生。苏联代表当时答应给军火，可是打了败仗，给了也会失掉的。国民党在汕头开枪，就与之分裂了。南昌起义一是不搞土地革命，二是依靠外援，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我经常用这个例子向红卫兵讲，你们大方向对，但并不是什么都对。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大方向就保不住，这个我是有痛苦的教训的，但对红卫兵来讲对比差十万八千里。当时起义部队有个警卫团从武汉到南昌去，响应起义号召，没去成，后来遇上毛主席，就跟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这个警卫团其中一个战士就是现在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同志。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这一阶段之后，掩盖的另一个矛盾又出来了，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代表是蒋介石、汪精卫。武装斗争的失败，就被国民党吓坏了，我们党当中也有被吓坏了的。南昌起义，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错误路线，不久陈独秀分裂出去参加了托陈取消派。

（总理：取消派就是取消当时进行的武装革命。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口味，所谓不断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来到，国民党可以召开国会，我们应该参加议会，准备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完全错误的。26年，27年，28年，斯大林就批驳过托洛茨基。中国瞿秋白八七会议后，坚持这一点，所以1927年12月，广州举行暴动，口号就是广州苏维埃。这都是错误的，即是“左”的，只是强调不断革命，实际上是超阶段的。毛主席早就讲过革命就是不断的，又是分阶段的，把民主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超越阶段。陈独秀、托洛茨基是“左”的，但又是右的，这是历史教训，当时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叫托陈取消派，发展到1929年公开打起旗帜成立，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央，反对武装斗争，反对群众运动。）

蒋介石杀人，我们才拿起枪杆子去干，当时我们没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又有人跟刘少奇在武汉交械投降，刘少奇这个问题有材料，工人、农民运动都打散了，我们到乡下是敌

人叫我们去的，城市呆不住，蒋介石要杀，只有到乡下，既要打起来了，有人就要一切都打倒，不管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要打倒，除了工人、农民以外，都要打倒，农民中富农也要打倒。

民主革命有两个区别，一是资产阶级分为二部分，一是官僚买办，另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是不能动民族资产阶级，另一区别是只分配地主、富农出租或多余土地，不搞合作化，中国富农不发达，贫雇农，中农赞成土地按人口平分，“六大”也提出过这个口号，但“六大”没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没解决乡村包围城市，没解决革命重点在农村，当时有点城市如赣州，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教训我们，常常不只一次，二次，碰得头破血流，才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而犯“左”倾错误呢？是有原因的，与国民党决裂了嘛，要同国民党斗争，国民党要杀人嘛，拿起枪来，对待国民党，眼杀红了，当时有些人就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犯了“左”倾错误。

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是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底到28年初。二次是李立三，立三路线，1930年6月到8月。三次是王明路线，31年到35年初。康生同志在延安整风，发现叛徒王明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说李立三路线还是右倾机会主义，王明搞的更左。

（总理：王明在莫斯科作报告，吹嘘中央苏区红军有50多万。后来经过长征因为在江西站不住了，最后只剩下二万多人，王明在莫斯科听到了，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更厉害，时间长损失大。内战十年，主要是“左”的，但也有右的，比如江西的AB团、罗章龙在上海另立山头，张国焘另搞一套。

（解释一下：土地革命时期，反革命分子钻我们的空子，许多革命根据地发现反革命分子活动，反动的国民党派来的，江西是AB团，头是国民党五四运动中叫段锡鹏的，福建叫社会民主党，鄂豫皖叫改组派，湘鄂西洪湖叫改组派第三党，是有这样的分子，……久了变成复杂化，逼供信都来了。要防止扩大化，延安审干时就讲

过九条方针嘛，特别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错了要道歉，错了太多很不利，弄清后再处理，清楚了少杀，改造劳动，改造促生产。罗章龙在上海另立中央，立三路线后出了王明路线，有一部分右倾思想的人，不搞党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他们分裂党，另立中央，时间很短，可是把一部分很好的同志牺牲了，象林育南、李求实，他们是反王明路线的，至今我们还悼念这些同志，但头头并不好，罗章龙是头头。解放后，根据刘少奇叛徒哲学，用罗当翻译，在武汉大学教书，现在扣起来了。第三条是张国焘，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北，四方面军力量大，主席说张国焘不讲方针政策，只讲实力大小，他看一方面军从四万减少到八千，就不顺眼，就把队伍拉出去，搞分裂，事情是很危险的，张国焘想把毛主席领导的部队扣留下来，我们知道了就北上了，张国焘另立中央，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北上，又遇上了任弼时的二方面军，会合了，最后一、二、三个方面军都在北方汇合，很大的胜利，成为我们党领导主要骨干。张国焘搞分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一批判他，他不干了，后查明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在北京被捕就投降了，写了自首书，所以三方面军会合不久，他就逃跑到武汉投降蒋介石，只带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听到他要投降，又跑回来了。张国焘单人匹马，马也没有，单人一个，谁分裂党，下场就和张国焘一样。)

罗章龙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搞几天，以后注意我们党再不要分裂了。

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称犯错误的人，是王明 28 个半的人，但在苏联吃过苦。

(总理: 28 个半是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小宗派，与中山大学××搞在一起，只结合少数人，28 个，半个是有一个年纪很小，跟后面走走，中山大学一千多人，他们自称 28 个半布尔什维克，别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后在十中全会通过××的支持，当时中央犯了错误，他们就领导了六中全会，王明当了头子，后来暴露出来了。)

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中帮过忙，有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选他做中央委员有困难，他与朱德、陈毅差不多，许世友同志不同意选他们，说他们反对红四军几十年，红四军七大以后，

他们领导开八大，想到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中央请示，中央不答应，最后不敢指挥，又把我请回去。

其他是项英。（总理：新四军政委、皖南事变当逃兵。）

当时在江西项英不敢指挥，又不敢打，跑在后面。秦邦宪，张闻天一到苏区，在国民党围剿时搞那一套去了，听洋人的，一个洋人顾问李德，李德这人不好，不过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李德是第三国际派的，德国人，在东德反对我们。

因为这样，我们的军队遭到不少灾难。王明没到过任何根据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从未搞过，也未打过仗。28个半起的开始，他们却统治，当时有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使许多根据地丧失了。

然后是抗日战争时期，又是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掩盖着阶级矛盾，因为民族矛盾是主要斗争，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民族矛盾掩盖党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革命根据地。

1937年我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过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然后又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参加会议的代表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蒋介石……

（总理：毛选一卷 37.5.3 和 37.5.7 两篇文章。）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王明、博古搞右倾投降主义，从极“左”到极右，从王明以前就有一种情绪，只要合作，王明路线合作，就进步，到出了这种倾向，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根据地，要退到1927年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直到1938年。

（总理：可学主席1937年11.12文章）

领导机关是主要的，中央一直执行了正确路线，又联合又斗争。1942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次得到了许多教训，出现了许多磨擦，华北×××，×××，×××，华中有韩德勤、李汕洲，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所以单是马克思教育我们还不够，还要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我们。总之我们许多人几十年犯了错误，

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左”的错误就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错误，现在有人说延安整风是错误的，王明现在在莫斯科还这么讲。

在座的中年青年同志随时要记住历史上党的教训，警惕未来。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把许多人都团结起来了，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是有材料的，证明是叛徒、内奸、工贼，但邓小平没有历史上的材料，薄一波、安子文、彭真都与国民党有联系，当时我们不知道，现在搞清楚了，在这样一种倾向中，有的跟着跑犯了错误，但是不一定是叛徒、特务。（总理：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抗战胜利以后，开头人家传我们到重庆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

（总理：主席说得很轻松，当时可紧张了，不是说主席紧张，我们紧张，下面紧张。七大刚开完我们的领袖到虎穴去，我们跟主席去的人，党员，老百姓的心情能不紧张吗？主席临走时对留在延安主持工作的同志讲：不要怕，如果蒋介石把内战打起来，你们就放手打，打得越好，我就能回来。主席处处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后来，在上党战役，就是谢富治同志所在的部队把蒋介石一支很有影响的部队打垮了。）

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定了协议，蒋介石不算数。我在抗大时刘少奇在党校作报告，讲“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开始了，听说还向各地发了电报。（林总插话：电报打到东北，我们没传达，我们发了电报，说这是内战的开始，但没有公开宣布，到了××时才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资产阶级消灭，有人只利用，不限制改造。

两条路线，一条以为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另一条认为阶级斗争不存在，刘少奇搞了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了个地下黑司令部。（总理：为什么是地下黑司令部？他们网罗一帮子，勾结起来，别人不知道，搞分裂。）我看党内最危险的错误有三次，一次是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是王明，是两次路线错误，一次是左倾，搞了四年，一次是右倾，抗战时期，再就是刘少奇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不能不

利用它，又要限制它，你限制他，他就反对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事情，我与陈叔通说过。

（总理：陈叔通是民主人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当时敲锣打鼓，不是什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当时陈叔通赞成这种看法，到了五七年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开始发了篇社论，让他们放，后来他们都出来了，我们就进行反击，这次又来了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革命，由历史去下结论，叫文化革命也可以，是从文化革命开始的嘛。过去好多工厂、学校不在我们手里，很多在资产阶级手里，在国民党留下来的那些人手里，在知识分子手里，他们有后台，要真抓一下，搞一些典型，当一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林总插话：主席在北京抓了八个典型，就是六厂两校。）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去抓，过去北京市委我就管不了，不能抓，现在可以了，我就搞几个典型，统统抓，搞不过来，只好搞典型，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但是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去抓。

清理阶级队伍，军队也搞了一下，军队要谨慎。有一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特务，经群众审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就那么可信，他们是抓人越多越好，定的越多越好，搞专案的搞错了，要翻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搞错了，还得了？还是少抓一点好。象过去下乡行军打仗捉虱子，捉得越多越好，捉得不多不过瘾。（总理：我们都是捉过虱子的，你们到五七干校不要害怕，没捉过虱子的就不能说在乡下滚过。）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关了九百多，有些人关在牛棚里，有的关在地下室里，关起来就不好放，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戴高帽子，扫茅厕，知识分子扫扫地，搞搞清洁卫生也可以嘛！苏修写文章说我们整知识分子，王明写文章说我们杀知识分子，象秦始皇一样，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秦始皇杀了400多人，其实我们一个没杀，戴高帽子，喷气式有，没有杀人，戴高帽子，喷气式是三十多年前湖南农民搞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又翻出来了。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搞过，既然乡村的土豪劣绅可以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可以戴？当然，我们不赞成戴高帽子，不赞成搞喷气式的。

抓多了怎么办？要放，理由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该放，有扩大化的问题，各级领导要注意。

鉴于历史经验，各个时期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要各级领导注意历史经验，防止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尿急了才去挖茅坑，过去我们是到一个地方挖茅坑，现在不搞了，住营房了，军队长期住在老百姓那，老百姓就烦了，这次三支两军工作，军队和老百姓就融洽了。

（总理：军队三支两军受了锻炼，以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现在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甚至打死了也不开枪，执行任务不带枪，解放军战士在被围、被捆、挨打的时候还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现在不仅解放军战士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工人阶级也能做到了。1968年7月27日大家都晓得一天时间就动员了三万人，主要的都是毛主席抓的几个典型的工厂，开进清华园，出了事情，你们也晓得，五个打死，几百人受伤，但是他们还是怨话也没说，这一下，他们就无话说了，一切借口也没了，武器、工事都解除了，最主要的是到一个单位先不要表态，要进行调查研究，主席就是这样做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状态，一方面是有毒放毒，武斗的材料我都看见过了，都不如四川，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事情可以转过来，转过来让他们自己讲如何想把对方消灭的。

（总理：刚才我看到七机部两个头头，还是气鼓鼓的，头头打伤了嘛，我还是同情他的，可是另一边也打死人嘛。我劝你们受伤的同志把仇恨集中在刘少奇这伙人身上，你们都是阶级弟兄嘛，前世无怨，现世无仇，有什么怨仇呢？）

这场斗争不是讲要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我看还要一年左右，搞得好的二十年大庆就差不多了，你们不要搞宽了，先搞一、两个试点，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一下子都想团结不可能，先团结三分之一，过一段又三分之一，剩下的就孤立了。所有的工宣队都不能压制群众，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不要压倒一切嘛！

几个学生说几句怪话，反一下有什么了不起，贴了几条标语，要打倒，你就倒了，那就该倒；贴了许多标语要打倒，但是打不倒。反过来拥护你会更好。有一个……还要用，就是跟着彭德怀犯了错误，不象肖华、杨成武。

（总理：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付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掩盖着什么东西，还看不清楚，反对过自己的人，要照顾一下，乱一些没有什么，大乱以后才会大治嘛。

以后还会有浪潮，如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但不要引起反对苏联人民，中国人民过去反对外国人，不管好坏都反，几十年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才把外国人分了劳动人民和剥削阶级反动派。

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都是你们的经验，在座的不都是经过了，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了，胜利了，进城以后对资产阶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定息、股息。（全国股金有 22 万万元，每年给 5% 的利息，一千万万元，实际上许多人不拿的，每年五元，十元他就不拿了，发了十年，发出了七、八亿人民币，还不是用在中国增加购买力，但是他们工会不允许进，这样就把工人和资本家分开了，因为你拿定息嘛。）

你们抓几个工厂试试看，有的地方所有制还未解决，形式上解决，但形“左”实右。比如，北郊木材厂，南口机车车辆厂，权实际上在走资派手里，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对工人管、扣、卡，我看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至少大部分。学校、机关、一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进行改造，要利用群众力量去改造，过去只是上面来不行，你怎么说也不听，只有用群众力量去改造。选举，各单位由下面提，小组提，大组去讨论，有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

的讲话

我们这个会，是这样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全体会议？

开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先通过不发表，好不好？

.....

北京小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好多会议上讲了几次。

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些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为了开七大把两条路线搞清楚，我在大会上批评了犯错误的人。所以七大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过会后，确实团结了，胜利了，比中央苏区内战时期更加团结了。

中央苏区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头头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在当时情况下，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因为那时候，要与国民党斗争。国民党政府杀人，我们拿起枪对付国民党，所以出现了“左”。六届四中全会后更左了。王明的《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说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搞得更“左”，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那时候，他在莫斯科。红军有五十万，后来只剩三万，他就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抗日时期，王明回过来搞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有一个情绪，国共合作，就不要独立自主了。王明从苏联回来了，就领导了这种投降主义情绪，犯了错误。国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盖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根据地。

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现在有人说“整风是错误的”。将来还可能要出，不奇怪。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还在。那时也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也行。有的喊，有的不喊。当时河南省委书

记李维汉就不喊。（林彪：李维汉就不喊打倒土豪劣绅。）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有广大群众运动，土改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都有。过了一个时期，掩盖的矛盾突出了，蒋介石杀人，我们拿起枪干，当时没想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的人跟着刘少奇在武汉缴枪投降，有的地方打败仗。南昌起义不知道到农村去。我们到乡下去，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里呆不住，蒋介石要杀人。打起来了，一切都打了，资产阶级……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城市作坊也打倒……民主革命一句话，资产阶级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民族资本家。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路线。为什么不犯右倾路线而犯“左”倾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打仗。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了右倾。现在合作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发动群众，不要军队，不要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我在重庆时，刘少奇在延安党校作了一个报告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结果还向各地发了电报（董必武：我在重庆就没听说。×××：晋察冀在张家口传达了。黄永胜：听说给东北发了电报。林彪：东北也收到了电报。我们没有传达，发了一个电报说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的开始”。）谈判没有结束我就回来了，准备打仗。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写了个协议，签了字。这个协议算不算数呢？按道理说应该算数的，实际上没有算数。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也是胜利的大会。三年多蒋介石打败了。进城后又胜利地把许多人团结起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后来查明是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薄一波、安子文与国民党有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起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当时我们没有宣布，一直到土改后才宣布。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和平土改，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的。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公开和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

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但有些人在那里讲利用，不讲限制、改造。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大革命，由历史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管叫什么名字，总能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要搞典型、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林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在北京抓了几个典型。）我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抓。过去北京市委管不了，现在可以了。我只抓了典型，统统去管搞不过来。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典型。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去抓。（毛问黄永胜的清队工作）我们军队要谨慎。

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的专案组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交群众一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人搞材料不那末可靠。他们的观点搞得越多越好，象我们过去行军抓虱子，抓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翻案是不容易，要翻案是有领导错误，我不搞专案。

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家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讲个理由，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有的推一推可以下去，拉一拉可以上来。有的关在牛棚里面扫厕所（问张春桥）×××干什么？（张答……）知识分子扫扫厕所是可以的。

王明写文章说我们不要知识分子。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四百多人。我们没有杀，搞喷气式、戴帽子、游街、扫厕所，是一时现象。（康生：苏联报上登了彭真戴高帽子的照片。）戴高帽子是打土豪劣绅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翻出来，又给戴上高帽子，土豪劣绅能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能戴高帽子？我们反对戴高帽子，反对戴黑牌，反对搞喷气式，反对乱抓人。抓了就要放，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各个时期，主要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使同志们彻底了解我党的历史经验，避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尿急了，才挖坑。事先挖好坑的也是有的。

我们过去行军，到宿营地就挖茅厕。现在住了营房，茅房不搞一点是不行的。在老百姓那里住久了，群众会讨厌我们。我们这次“三支两军”，又使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融洽了。你们说“三支两军”，外国人不懂。

搞形“左”实右，“左”是形式，掩盖了右的本质。

我提议几个老同志都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函、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王明大家不会选他了。王稼祥犯了错误，还是做了工作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三日，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毛泽东九大全体大会上
的讲话

康老建议学习《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

还有一个文件，在延安党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报告，讲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讲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那时候刘少奇、彭真不赞成。过去几十年翻来复去犯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河南李维汉只讲一切联合，否认斗争。那时候一种倾向，既然同国民党联合，就不同他们进行斗争。同国民党斗争是不行的。如武汉那时候，我离开武汉去长沙，当时刘少奇、项英，只要联合，否认斗争。所以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代表就是蒋介石。汪精卫倒向反动阶级，也是倒下来的。党内也有被群众运动吓坏了，就是不敢提民主的口号。南昌暴动后城市呆不住，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的一个矛盾。国共合作时掩盖的矛盾就突出来了。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国共合作。但这股风也有另外一风，就是不要独立自主，发动群众，掩盖阶级斗争。现在反苏修不要掩盖苏联的广大工人、农民，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好坏都反了，经过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了两种：一种是帝国主义统治阶级，是坏人，一种是劳动人民，是好人。南昌暴动，召开“八·七会议”清算陈独秀右倾错误，以后主要是“左”的错误。有些中间流派，可以联合也不联合。城市

的小作坊不该没收的也没收了。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瞿秋白、李立三没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是不成事的。最大三次，一次是陈独秀，一次是王明，一次是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

彭德怀、高、饶也都是局部的，他不以党中央的正确不正确，而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力量大，一方面军力量小，所以另立中央。罗章龙就是湖南人。我对此人相当熟悉。也搞中央，不晓得为什么另立中央。不管当时中央有什么不好，有话可讲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吗？一个是张国焘，一个是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没搞几天。张国焘也没有搞几天。张国焘我认识他比较早，是北大学生，五四运动前在长辛店搞过工人运动。搞职工夜校，他当校长。1918年我就与他发生关系。这个人历来有大少爷味道。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搞国共合作，他坚决反对，他不会到。

土地革命时，犯右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主观打倒资本家，平分土地，可以过得去。六次代表大会解决这个问题，搞人口平分地。

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是犯错误的，经过中央苏区斗争的，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时帮过忙的。有个时候红卫兵贴他们的大字报，现在选他们进中央委员困难，其实和朱德、陈毅差不多。有人说朱德、陈毅反了……几十年其实也有时不反的。红四军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是想夺军权，心里又不踏实，到上海中央请示。中央批评是极端民主化。后来请我回军队了，我又不是复辟了吗？项英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要请外国人来指挥。至于王明，没有搞过一个根据地、打过仗，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那时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我们这些人是右派。

一个时期项英没有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吸取了教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情，不能不利用他，不能不限制他，不能不改造他。他们要反限制。有的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有的就反对，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场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有人乘机放毒，大闹一切。我看这样都无关大局。是指武斗。有的武斗几万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象军队稳不住了，其实不然。军队有两派，野战军、地方军各支一派。如保定、浙江、四川、贵州、

云南都是如此。这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了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过去搞武斗，现在应该联合，是人民内部矛盾，何必那末记仇。

看有些干部，叫他犯错误检查了没有事。有的人犯了错误，群众抓住不放，譬如杨勇。当然他有错误。是哪个下的命令把他关起来（有人说：是个老师下的命令，他们大闹一场，还强加于中央文革。）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是有问题的。杨、余、付主要是杨、余的错误大些，不过傅崇碧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都不讲真话。

现在的问题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要把政策落实，一年左右，自己要亲自抓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所有工宣队、军队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工人阶级压倒一切。你反军代表，就说人家反解放军。其实是几个学生说几句话。反工宣队就说人家反工人阶级。这些话不要这样提，反一下不要紧，要作工作。大多数是不同意他们这样做的。街上贴几条标语就倒了，风一吹就倒了。去年有人要打倒张春桥，有人要打倒张国华。打了半天，今年还在这里来开会。现在打的那一派比拥护的那一派还好一些。

所有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形式上解决了，是形“左”实右。如北京木材厂、车辆厂、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也有共产党，有的是走资派。他们搞物质刺激，搞奖金挂帅、利润挂帅，关、卡、扣、压。我看所有制还没有解决。不是全部没有解决，是相当一部分没有解决。学校也是如此，领导权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

今天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风英、孙玉国、纪登奎九个同志报名要发言。

还有谁要发言？谁发言就报名（等了一会，没人报名）先周恩来同志发言。

（周恩来：先通过，后发言）不发言谁晓得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啊？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的发言

同志们：

我完全拥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开幕式上的极其重要的讲话，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我热烈庆祝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导下的新党章的产生。

毛主席，在讲话中要我们回顾党的四十八年历史，我们应该经常回顾党的历史，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回顾党在四十八年所积累的胜利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回顾党在国际关系中的斗争经验，回顾我们为什么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二十年后的今天，又面临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只有懂得了这些，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都表示决心，并且坚决相信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一定能够实现。

林彪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精辟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承革命的学说，论证和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学说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并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中证明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象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

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林彪同志在报告中，扼要地系统地总结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和战斗任务，他在报告中，恰当地给予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以应有的评价。在分组讨论中大家公认，林彪同志这一报告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终紧跟毛主席，不愧是广大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

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会议以后，在他的指导下，在 1961 年首先在军内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然后很快就推广到全国，直至全世界，可以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这一红宝书把毛泽东思想所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大众化了，使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中都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思想上武装了亿万群众，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力的舆论动员，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5 年底，在毛主席发动《海瑞罢官》的批判之后，林彪同志揭发了罗瑞卿反党、反军的反革命阴谋，并且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形成与彭真《二月提纲》针锋相对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发表了它的纪要，这都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发表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1966 年 5 月 16 日《通知》，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一主要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在近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许多关键时刻，例如 1966 年 8 月十一中全会结束后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 年 10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 年 12 月的工业会议，1967 年 3 月军以上干部会议，1968 年 3 月 24 日揭发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问题的大会，1968 年 10 月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林彪同志都作了

主要讲话，他根据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彻底揭露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严厉地批判了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逆流和翻案邪风，牢牢地把握住了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航向。林彪同志这些讲话，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和赞扬，成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全国亿万革命人民、特别是对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战斗号令。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斗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全国解放后，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彭德怀的篡军、篡党阴谋被揭发后，林彪同志亲自主持军委的工作，林彪同志发扬毛主席古田会议的建军思想，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重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倡把我军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林彪同志提出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林彪同志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群众性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这就是他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一套作法，对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至在全世界人民中的大普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

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了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目前国内外形势是大有利于人民的，而不利於敌人的，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牢牢团结起来，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围，落实政策，奋勇前进，就一定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陈伯达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康生在中共九大的发言

1967年11月毛主席提出由党的基层组织参加修改起草党章。从那时到现在，整整一年了。在这个时期中，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了30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讨论和修改，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的教育运动。

1967年，毛主席把起草修改党章的光荣任务，首先交给上海党组的同志们，196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修改党章的经验，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工作的通知，于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章运动开展了。全国各地综合整理上报的修改草案就有126份。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又在全党、全军、全国进行了一次自下而上的广泛深入的讨论，集中整理上报的讨论情况和建议就有172件。还有大批人民来信。中央、中央文革认真研究了这些建议，进行了修改。经过四次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认真的讨论和修改，并根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决定，将新党章草案提交这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党章草案有哪些主要特点呢？

首先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最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深、用得最好、执行最坚决。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彻底遵照毛泽东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第三，新党章概括的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新党章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第五，新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的长处，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单扼要。

毛泽东在康生发言后说“怎么办？你们都是分秒必争啊！”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黄永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我们对美帝、苏修的侵略阴谋，要百倍地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我们要从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特别要做好政治思想上的准备。准备敌人早打，准备敌人大打。既要准备敌人打常规战争，又要准备敌人打核战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充满了胜利信心。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胆敢侵略我国，必将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近，苏修入侵我珍宝

岛地区挑起的武装冲突，遭到了惨败，充分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世界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而奋斗！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王洪文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陈永贵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孙玉国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孙玉国是来自珍宝岛的一个边防站的付站长，65 年入伍。三月十五日他在付营长负伤后，代理付营长指挥，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他一上台，朝毛主席敬礼。毛主席站了起来，招手致意，孙玉国发言中间，毛主席数次鼓掌。当孙玉国讲到“中国革命是打出来的，世界革命也一定是打出来的”时，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成员都鼓掌，微笑。

毛主席问旁边的人：他今年多大了？

然后又问孙玉国：你今年多大了？三十？（答：29 岁）

哪里人啊？（答：辽宁的）

噢东北人。老家在哪里？（答：河北）

打过仗没有？（答：没有）

毛主席开始向大家：他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王字加一点的玉，国是国家的国。这次珍宝岛打仗就是他指挥的，打退敌人三次进攻。敌人打仗用了飞机、坦克、指挥车，我们什么也没有。不用飞机、不用坦克、不用指挥车。我们的战士除了一个付营长，都是没有打过仗的。这次破除了一个迷信。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胜仗。苏修他们开的乌龟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乌龟壳

把人的勇敢降低了。我们打仗靠人的勇敢，靠不怕死，靠林付主席的二百米硬功夫。苏联有飞机、乌龟壳，我们是步枪、手榴弹，靠步兵。三月十五日来了许多辆乌龟壳，五百米我们不打，三百米不打，一百米还不打。五十米来了，我们一开火，他们的乌龟壳就翻了，不管用了。我们过去打仗没有乌龟壳，打胜了，还得靠人，靠步兵。乌龟壳我们有一点，但主要不靠他们。装甲兵司令来了没有？（回头看，没有。林彪说：“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来了。在下面。”黄站起来）我不是说不要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了，也不是说不要吴法宪的空军了。说还要靠步兵。靠二百米。要准备打仗，要做准备，各省都要能生产武器。主要是精神准备，新疆那里也可能要出点事。我们不打出去，边境上小打。可以放进来，给他些甜头，放进来后再打。

毛主席说：下面请尉风英同志发言，还是辽宁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尉风英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毛主席说：还有一个纪登奎同志发言。我们是老朋友了，他是山西的，在河南受了点灾难。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纪登奎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林彪在九大上的讲话

同志们，我没有准备讲话，但是我要插两句话。

听了总理刚才的讲话，事先我不知道他讲话的内容，他对毛主席的这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合乎实际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现在这样的地位，那中国就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国，那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红色的中国。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成为红色的、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这样强盛的国家，而能影响全世界，诸种因素中的最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伟大的英明的领导，毛主席是我们最伟大的领袖。

至于我个人觉得很惭愧，在我年轻的时候，很早在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合，那时年纪轻，并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切领导人中间，比较起来，前前后后我比来比去，我那时候就认为应该拥护毛主席，归根到底毛主席他很高明，我仅仅只有这么一点觉悟，并不是像总理说的那么高瞻远瞩，全面地看问题，没有达那个水平，说老实话，我几十年来确实拥护毛主席的，我整个思想水平可以说很低很低的，不象总理说的那么高，后来在工作中略为有些成绩，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贺龙底下，在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也早就没有了，一定没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肯定地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的。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能够允许我存在吗？那就变成段德昌，（二十八年开到鄂豫皖去的……）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而我的能够存在为党贡献自己一点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们跟着干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决定因素，那种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伟大的作用，我个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这里仅仅向同志们作这么一点简单的声明。

（发言完后）

毛主席说：还有谁发言？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的了。这还是少数。下面先通过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赞成的举手。

（毛主席也举手，看一看。）

有希望噢，大概是多数，通过。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

（毛主席举手，看看）

也有希望噢，多数，通过。

（然后毛主席宣布散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二、代表大会的第二个阶段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五日，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

它的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四十五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

这次会议把候选人名单增加了五人，共二百七十九人，其中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作为正式候选人。

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经过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九大随即宣告闭幕。

三、九届一中全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办法同样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

选出的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二十五人；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三十人(没有包括已去世的三人)中，有十二人继续当选。

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二百七十七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二百七十五票，黄永胜二百七十四票，江青二百七十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

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五人，此外，江青得一百五十票，黄永胜得一百三十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三十五票以下。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

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

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

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太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全体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全体候补中央委员都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了极其重要讲话。

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

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

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四、贯彻九大精神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八日，康生在中央召开的整党建党会议上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第一个问题，如何理解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方针？

还得注意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五十字”孤立起来，把历史方面割断。有时候甚至强调，好象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只是从“五十字”才开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只是“五十字”才开始的，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十月才开始的。不要把“五十字”同整个党的历史、毛主席的整党建党路线割裂开，不要把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

另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把“五十字”作为笼统的口号，应当有个具体分析。

“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

“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

“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

这都是当时的针对性。那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一些问题，主席又把他的建党路线，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

首先，我们研究“五十字”方针，应当看它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章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这是说明党的性质问题。所谓先锋队，就是先进的部队。所谓先进的部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部队。

我们这个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这是讲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讲的我们党的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它是无产阶级的，但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入党；它是革命的，但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可以入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而且是先进的分子才能入党。也就是说，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毛泽东思想，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些人才能入党。

在前一个时期，存在着把党的水平降低到革命群众的水平。曾经有一个时候发生所谓谁领导整党的问题，是以共产党的党员中间忠于毛主席路线的革命干部、部队的干部、支左的干部为核心领导整党，还是以红卫兵、那些各式各样的所谓造反派来领导整党？我们的整党是开门的整党，放弃党的领导是错误的，不依靠群众也是错误的，这两方面是辩证的。

第二个问题，“九大”通过的党章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四个特点，是明确了我们党目前的战斗任务。

第五个特点，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两次讲话的通知

1969.05.09；中发〔69〕21号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毛主席九大期间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康生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大会上的讲话

康生讲话

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我看有主要有两个倾向：

一，扩大化。各地不同程度都有。个别地方还犯了严重错误，现在正在纠正。这是一种倾向。主席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搞……

二，最近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个别群众组织的头头借口“反复旧”抗拒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思想，认为他是造反派，只能清别人，不能让别人清自己。他们对造反派不加阶级分析，不以一分为二方法看问题。造反派中间也混进了坏人嘛。“七·二七”进清华（大学），有个宛长福（注：贵州“四·一一”派的）就丢了四个手榴弹。说明造反派中有坏人。……一个是抗拒在造反派中间，革命队伍中间清坏人，一个是矛头指向解放军、军管会。这情况山东正在纠正，武汉也在纠正，河南也有，四川也有。完全是干扰毛主席的大方向。实际上是干扰“九大”的传达和落实各项政策。

这两点都要注意。防止扩大化，清理阶级队伍，干部。专案干部特别要注意。借口“反复旧”抗拒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组织头头要特别进行教育。

第二个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主席指出，不但整党员，而且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这里的问题开门整党还是关门整党……

有的地方作得好，向群众开门，不是形式上的，不是敷衍。另一种不敢让群众参加，，关门，半开半闭。所以整党问题中，四月二十八日的教导特别值得注意。整党一定要搞，但要小心谨慎，粗枝大叶就要犯错误。

陈伯达讲话（略）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大会上解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应当怎样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当前还有一种论调，有的地方流行所谓“反复旧”，昨天简单地讲了一下。山东开始的。据我晓得的，北京一些学校、一些单位收到过十一月十七日青岛杨宝华同志的讲话，提出了“反复旧”问题。这个讲话，散布到各地方。福建、浙江、武汉、河南、兰州、重庆、成都，都散发了，错误地提出了“反复旧”问题。同中央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提的反复旧问题完全相反的。武汉说是“全面复旧”。甚至说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掌权”。因此，错误地讲“无产阶级要再夺权”，“二次革命”。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他们把这种“再夺权”叫作“实行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完全歪曲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学说，实际上是反对林付主席的报告，反对“九大”的方针。他们打着旗号，说什么他们是“继续革命”，这样来了解继续革命，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

有的同志问：政治报告中，批判了刘少奇“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怎样理解？

按照这种“理论”，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高度的发展，生产力没有达到高度的水平，农村很分散、很落后，那

么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应该也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按照这种理论，社会的发展只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社会主义自然而然会来临，生产如果没有高度的发展，革命阶级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没有用的。

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农村分散落后，就不应该也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让资本主义很好地发展。按这个理论，社会发展指是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生产力发展，新社会制度就自然产生，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自然到来；生产力不发展，革命阶级自觉革命没有用。

这种“理论”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了，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苏汉诺夫以及中国陈独秀等等，没有一个不搬出这套“理论”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

第三个问题，什么是“七·二七”事件？

“七·二七”，即1968.7.27—7.28，毛主席接见北京红代会的五大领袖，提出了这一伟大战略：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问题，开展斗、批、改新阶段问题，对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这是有伟大意义的事。

第四，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是不是就是最后胜利？

现在有曲解。这种曲解说：主席不能说最后胜利，因此“反复旧”的人完全否定三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歪曲主席的话，利用主席的马列主义的语言，破坏革命，否认成绩，把红色政权还认为是“资本主义”。当然一些工厂、学校，机关还存在些问题，工宣队，军宣队工作中有缺点，斗、批、改的任务还没完，这是一方面，但如果歪曲主席的话，全盘否定三年伟大成就，那是完全错误的，形式上“左”，实际才真是复旧的……。

一、《历史决议》说，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这就是说，《历史决议》也承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经过党的九大批准，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它站在反文化大革命立场上，说九大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

胡绳的《七十年》说：“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条件并不成熟”。 “林彪、江青等人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人塞进代表行列中，造成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九大的政治报告，“贯串这篇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语，有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确立的特定的含义。它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它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第428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也说：“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 “九大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共中央一九八一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他们都说对了：贯串九大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九大使这个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了九大的政治路线。

二、九大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政治报告》

（一）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性质和特点

1, 必然性：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

2, 性质：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3, 特点：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二）阐明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完成了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十一月，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

第二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

（三）阐明了文化大革命下个阶段的任务、方针和政策

1, “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2, 党的整顿和建设

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整党建党的根本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三、九大的十分重要的成果是建立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一）中央机构中吸收了一大批从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干部和群众代表

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一些左派领导干部

在中央委员会中有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等一大批工、农、兵群众代表

（二）中央机构中也吸收了一些在文革中改正错误较好的领导干部

如陈锡联纪登奎李雪峰

（三）中央机构中保留了一大批从历次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老干部

如叶剑英刘伯承朱德李德生许世友李先念董必武等等

（四）中央机构中也开始出现带有宗派性质的林彪小集团
如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等等

2008年10月15日初稿

2011年12月15日修改